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周恩来与国民党高级将领



前言

在周恩来的人际交往中，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交往，是最具神秘色彩、而又最具魅力的篇章。中国的现代革命史，可以说就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史。而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与国民党直接接触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作为长期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作为国统区中共党的最高负责人，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和政协主席，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关系，可以说就是国共两党斗争历史的缩影。随着周恩来与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的握手与分手，国共两党及其指挥的军队进行着合作与对峙。周恩来在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交往中，既有兵戎相见的刀光剑影，更多的则是葡萄美酒夜光杯中的斗谋斗智，谈判桌上的纵横捭阖，愈益显出斗争的曲折和复杂。作为政治上的对手，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敌视他、仇恨他，但作为具有高尚人格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又不能不从内心深处钦佩他。周恩来与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谈判桌上是对手，谈判桌下是朋友。周恩来以其巨大的人格力量，征服了一个个国民党要员，使他们或与共产党合作，或走上了彻底拥护共产党的道路，有的在周恩来的影响和教育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长期密潜敌营，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周恩来的影响和策划下，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起义投诚过程，则更具有传奇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多次试图谋杀周恩来以扰乱大陆，周恩来却多次向蒋介石传递信息，以至直接给蒋介石送信：希望国共再度合作，台湾除外交归中央政府外，其他一切都由蒋介石管。当美国试图分裂中国，托管台湾时，周恩来又及时给蒋氏父子传出信息：支持蒋介石当中华民国的总统，蒋氏父子只要保住台湾，就是立了大功。对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周恩来给予了莫大的关心，经过整整十余年的酝酿铺垫，在周恩来环环相扣的安排下，使李宗仁终于冲破种种险阻，安然回国。对特赦的前国民党战犯，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关心他们的进步和生活，使他们一步步走向了新生。衷心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中，正是由于周恩来的悉心保护，才使在大陆的一个个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渡过难关。与此同时，周恩来对他们的家属子女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恩来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交往，充分展示了他的斗争艺术和化敌为友的魅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与伟大。

为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周恩来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交往史，作者从搜集资料到成书，整整用了五年时间。成书后，又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对全书事实进行了一条条核对，力求做到言皆有据，事皆可征。但是，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占有资料有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还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1997年7月

随着俩人的握手与分手，国共进行着合作与对峙 ——周恩来与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国民党特级上将。早年就学保定军官学校。1907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依附沪军都督陈其美，任团长。曾受命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919年后混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投机买卖。1923年到广州，任广东军政府大本营参谋长。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得到孙中山信任。同年奉派赴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孙中山逝世后。在1926年先后制造了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开始形成其个人的独裁统治体制。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并在各地“清党”，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国民政府主席。1931年以后，对日本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共内战，对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发动多次“围剿”。此外又不断制造军阀混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被迫结束牛年内战，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面抗战，一面与日谋和。1938年武汉失守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38年3月任国民党，总裁。1943年9月再次任国民政府主席。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面伪装和谈，一面积极部署内战，企图独吞胜利果实。不久，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1948年召开“行宪国大”，任“总统”，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代表，激起人民的强烈反对。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于同年率余部退至台湾省。后病死于台北市。周恩来与蒋介石半个世纪的关系史，就是国共两党数十年斗争与合作历史的缩影。从1924年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起，就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较量，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谈判斗争。蒋介石逃出大陆后，曾数次设谋用计暗杀周恩来；周恩来却连连托人捎信：希望国共两党再次和谈。当美国妄图托管台湾的重要时刻，周恩来又传出信息：我们不急于收回金门、马祖，支持蒋介石当中华民国总统，蒋氏父子只要保住台湾，就是立了大功。

一、黄埔岛上起风雷，一代英雄斗枭雄

1924年，孙中山为了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广州附近的黄埔岛创建了一所闻名遐迩的学校——黄埔军校。孙中山派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中国现代史上两个具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一个一代枭雄，一个一代英雄，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曲折复杂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关系史。这里，我们将撩开帷幕。将他们的关系史完全真实地、不带任何虚饰地呈现给读者。

1925年和1926年，是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崛起的年代。通过两次东征的胜利，蒋介石逐步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起家本钱就是由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黄埔军官学校。这时，黄埔军校内由于有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左倾青年颇多，许多人积极向共产党靠拢。这对野心勃勃的蒋介石窃取军校的领导权，无疑构成了严重障

碍，因此，这一时期，他表面上同共产党合作，表示赞成革命；实际上却随时在提防和限制共产党，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

以后，随着实力逐渐增长，蒋介石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1925年11月的东征途中，他即召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公开表示：

“现在，黄埔军校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但是，黄埔军校不可能分裂，要加强团结，为此，你们要把所有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我，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我。”

说到这里，蒋介石转向周恩来，故意将周恩来的军：

“恩来，你是军校共产党的领导人，但首先是军校政治部的主任，希望你积极配合，维护军校的团结。”

周恩来机敏地意识到蒋介石不怀好意，说：

“此事关系两党，我哪有权做主，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

但蒋介石仍不死心。晚饭后，他约周恩来来到汕头外的沙滩上散步。晚霞映照得远海近滩一片金黄，东征胜利的蒋介石显得踌躇满志，腰杆挺得笔直，保持着军人的威仪。

周恩来靠左与蒋介石并肩而行。后发制人是周恩来的一种策略，他不急于发问，而是让蒋介石先开口，看看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蒋介石在问过部队的政治工作情况后，终于话入正题：

“恩来，有件事我想了很久，想同你商量。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

说到这里，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

“当然，后者是我所不愿意的。”

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已日渐暴露。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向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

“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应该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给蒋介石似坚决回击。”

接着，他们商量，计划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队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周恩来带着这个意见回到汕头，准备在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立即向蒋介石正式提出。正当周恩来满怀信心与蒋介石坚决斗争的时候，等了好久，中共中央却来电不同意。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一次大让步。

陈独秀让步，蒋介石正好得寸进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蒋介石第一次向共产党员的公开进攻：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收到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一封公函，说是传达蒋介石的命令，通知海军局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

由于另一艘军舰正在检修中，李之龙只给中山舰下达了升火起锚的命令。3月19日晨6时，中山舰驶到黄埔港，向黄埔军校报到候用。

然而，这却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就在这时，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右派分子散布谣言，说“中山舰开向黄埔，企图劫走蒋介石，载往海参威”。当夜12时，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下令全市戒严；第二天凌晨3时，派人逮捕了李之龙，与此同时，下令解除了中山舰的武装。

周恩来得到消息后，顿时怒不可遏，冒着危险立刻赶往蒋介石那里，向他提出质问，怒斥其反共行径：

“中山先生刚刚逝世周年，你就背叛他联俄联共的遗训，你是总理的叛徒。”

蒋介石理屈词穷，气得脸色铁青，只是不住地“这个，这个”的嚷嚷着，恶狠狠地命人将周恩来软禁了一天。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向共产党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

面对蒋介石的突然进攻怎么办？是进行反击，还是继续退让妥协？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主张给予反击。于是，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一起进行讨论。周恩来对情况做了分析：

“2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头，我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七个，团长中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

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分析，但又觉得存在一个问题：即使是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反共反人民的。

这些分析不无道理，组织纪律观念颇强的周恩来说：

“究竟怎么处理，我们还不能擅自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

几天以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已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共产党的只有39人），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对于这件事，中共党

员、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气得大骂其父亲陈独秀：

“真是老糊涂！”

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又一大让步。

周恩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蒋介石进行着反击。3月30

日，他组织中共广东区委针对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发表《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因为现在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派对于共产党造谣诬蔑更加紧了，并且将影响到广东时局。”“共产党要求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的群众起来打破敌人的此种阴谋，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军阀，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为了组织力量开展与蒋介石的斗争，被迫撤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二百多名军队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由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在广州大佛寺举办一个特别政治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周恩来担任这个训练班的主任，并先后向学员做了《反吴（佩孚）与反帝国主义》、《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演讲。政治训练班的学员经过两三个月的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中工作。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政府和国民

革命军内部原来存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国民党右派势力这时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制造分裂、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已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反对革命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周恩来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切。是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认识最早的中共领导人之一。

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蒋介石正在不断扩充势力，为了拉拢周恩来，曾表示准备委任他以战地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征求他的意见，被周恩来断然拒绝。

为了从理论上批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无耻谰言，使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认清蒋介石的本来面目，武装大家的头脑。1926年底，周恩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接连发表三篇文章：《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

周恩来在这些文章中反驳了国民党右派制造的所谓目前民众运动“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的谬论，驳斥了国民党右派所谓“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的谰言，以明白的语言指出国民党右派势力存在这个客观事实。写道：“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无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然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因此，共产党人自然需要“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做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最后，他响亮地提出，“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已在恣意践踏并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反动逆流正在汹涌高涨，政治风云异常险恶。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一股反动逆流吓倒了，对国民党右派一味退让。

在这一历史紧要关头，周恩来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坚定不移地维护革命力量的团结，旗帜鲜明地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诬蔑和攻击。

二、蒋介石玩弄阴谋祭起屠刀， 周恩来痛定思痛揭竿再起

这年年底，周恩来奉命调到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离开了他工作了两年多的广州。周恩来到上海后，于1927年3月22日，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败5000军警，解放了在军阀统治下的上海。

对于共产党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蒋介石从中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力量，看到了对他独霸中国梦想的威胁，他下定决心：要向共产党开刀。26日，蒋介石坐楚同号军舰从江两赶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上，拿“外人说话”的口实，要求上海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后来又要求把纠察队改归他指挥调支。周恩来及时识破了蒋介石控制工人武装的阴谋，指示上海总工会以“纠察队不同于军队，性质完全是工人自己组织的”为理由，加以拒绝。

对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蒋介石也不予承认，下令要它停止活动。但为了麻痹工人，他又派人带了军乐队。吹吹打打，锣鼓喧天，以十分友好的姿态。给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来锦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奋斗到

底”。

周恩来在保持着警惕，从种种信息中已敏锐地觉察到有一些不正常的动向，并于 25 日向中共中央报告：白崇禧将薛岳师调开。将刘峙师调来闸北，“即将阴谋解决我们的纠察队”。

此时的上海，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针对这一局势。周恩来于 25 日这天决定：将上海工人纠察队改编为 8 个大队。一切武器集中由总工会掌握。30 日，周恩来在特委会会议上作报告，指出：“整个的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准备。”周恩来断言：

“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

后来事情的发展，确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共产国际的代表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正醉心于对蒋介石持缓和态度。对周恩来发出的警报，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反应。

4 月初，政治风云更加险恶，整个上海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后，加紧进行反共的秘密策划。4 月 2 日下午，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吴稚晖等，同特地从广西悄悄赶来的李济深、黄绍竑，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早日清党反共”。5 日上午，他们又举行一次秘密谈话，决定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咨请有关当局对共产党人作“非常紧急处置”。

经过上述紧锣密鼓的密谋策划，蒋介石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有恃无恐地开始进行军事上的布置。就在 5 日这天，他下令将刚由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来上海，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接着又限令不完全听命于他的第二、六军在 6 日前全部撤出南京，渡江北上。9 日，吴稚晖等 8 人公开发表反共的“护党救国”通电。同天，蒋介石赶往南京，颁布战争戒严条例 12 条，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任命白崇禧、周凤岐为上海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

仅仅在第二天，江苏的共产党领导人侯绍裘等十余人就惨遭杀害。

蒋介石在磨刀霍霍之后，已经开始举起屠刀，而且出手好快好狠。

但是，与蒋介石的剑拔弩张，举刀相向相反，直到这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仍醉心于妥协，以为这样便可以避免国共之间的破裂。5 日，他同刚由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发表一个《汪陈联合宣言》，说：“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希望敌人发慈悲只能是不切实际、自欺欺人的幻想。蒋介石反共的决心已下，这篇宣言，客观上起了帮助掩盖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作用，对上海工人阶级解除精神武装也起了恶劣作用。4 月 11 日深夜至 12 日凌晨，蓄谋已久的蒋介石终于大下毒手了！蒋介石是富有反动政治经验的。他在这个事件中使用了极端阴险而卑劣的手段。此时，总工会的纠察队总数共有 2700 人，分驻闸北、吴淞、浦东、南市四地。刘峙部第二师调驻闸北时，同工人纠察队的关系相当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峙师一走，调来的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却改变了姿态，对工人表示绝无恶意，局势在表面上仿佛松弛下来。11 日深夜至 12 日凌晨，上海青红帮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大批便衣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等，突然从租界

冲出，向上海总工会（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发起冲锋。一时间，整个上海枪声大作，弹如雨下。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英勇还击。正在这时，大批二十六军部队开到。先将前来攻打总工会的流氓完全缴械，有的用绳索捆绑。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不再怀疑，开门将二十六军迎入，谁知军队一进门，领队军官马上就变了脸色，说：

“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

这时，四周二十六军的机关枪已经架起，黑洞洞的枪口已朝向工人，猝不及防的工人纠察队在此情况下只得缴械。其他几处的情况，大同小异。

对于周恩来这位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是又怕又恨。因为他深知周恩来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设下了一个骗局。周恩来原来住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的整编和教育工作。11日晚上，蒋介石动手前，先由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装做没事似的邀请周恩来到师部去商议事情。周恩来考虑到要做二十六军的工作，立即赶赴第二师。后来，他在总结这次教训时，曾这样说：

敌人是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该放在保护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并且我的副指挥也去了。

周恩来来到后，斯烈的态度很是客气，但就是拖着不让他们再离开。就在这时，出现了上述二十六军对工人缴械的情景，敌人对工人纠察队下了手。12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后。立刻要原来同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黄澄镜在回忆中说：

我们到了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司令部，我看到周总指挥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这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我听到周总指挥义正词严地对着斯烈谴责道：“你还是总理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在总指挥愤怒的训斥下。不得不低着头说：“我也是奉命的。”

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了主意，向周总指挥表示事情“已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多次声明是误会，表示道歉。周总指挥根本不理睬，转头同我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了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同志办公所在地。

这时，各地的工人纠察队多被缴械，局面已经无法挽回。

对于这次与蒋介石的大较量，多年后周恩来还痛心地向人谈起，并总结教训：那时我们年轻，经验还不足，被骗到二师师部后，商务印书馆因为没有人指挥，就松劲了，一下子被缴去了。当然，不出去也要失败。但不至于一下子就失败，这是一个教训。

接着，他又说：

“我们那时做了一些工作，但不深入。最主要的是没有精神准备，没有下一步。”

“青年人革命热情很高。但我们那时好像天下大事就那么容易，青年稍微有一点成功就容易骄傲。至少是头脑发昏，结果给敌人骗了。”

此时的周恩来，年仅29岁。

中国工人阶级是极富革命性的阶级。12日清晨。各厂工人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后，纷纷集会抗议。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有数万人

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闸北数万工人拥往湖州会馆，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所；南市群众冒着大雨到东路军总指挥部请愿，要求立即恢复工作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取缔反动团体。

周恩来在被营救出来后，立即投入了与蒋介石的斗争。13日上午10时，他和赵世炎等人一起在闸北青云路广场组织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赴宝山路二十六军二师师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两里。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同群众一起游行。

当游行队伍进行到主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二十六军官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接着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在主山路上的游行群众扫射，前后达十五六分钟。群众因大队拥挤，无法退避，当场被打死的有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这就是惨绝人寰的主山路血案。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开始了！昔日的盟友翻过脸来，变成恶暴凶残、嗜血成性的刽子手。13日下午，上海总工会会所被封闭。14日下午，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被强行解散。无数革命者遭到逮捕和杀害。

整个上海，浸没在腥风血雨之中。

而对蒋介石的屠刀，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将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周恩来在14日转到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小阁楼上继续工作。这里离市区远，偏僻荒凉，巷子狭小，房屋破旧，附近居住的大多是吴淞机器厂的工人，是一处很合适的秘密据点。

蒋介石的叛变行径，使周恩来更加清醒、更加成熟起来。

很快，周恩来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这便是著名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强调必须坚决讨伐蒋介石，并提议：“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电文针对陈独秀主张对蒋缓和妥协的右倾主张，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暴动后，已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这次失败使周恩来认识到，要与蒋介石反动派作胜利的斗争，必须有工农自己的武装才行。仅仅3个月后，周恩来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他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22年的武装斗争，终于把蒋介石赶到了一个孤岛上去。

三、宋美龄：“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逼蒋抗日，在西安扣捕了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根据张、杨两将军的请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代表团赶赴西安，协助张、杨处理事变之后的事宜。经过周恩来的斡旋及其他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西安方面明确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终于打开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途径。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由端纳陪同，乘飞机来到西安。这是周恩来来到西安的第四天。宋子文是南京政府中亲英派的重要领袖，同亲日派有矛盾，又是蒋介石的妻舅。以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和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来说，自然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这次来西安的目的。一是为同蒋介石取得联系，二是为进一步探明情况。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

“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已经共同商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三方面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

随后张学良陪同宋子文一起去见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宋子文带来的宋美龄的信上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不知是悲枪还是激动，立时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呀！

宋子文到西安时，没想到周恩来也来到了西安，十分紧张，说：

“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和他同来的郭增恺主张他去见周恩来，因为周是个关键人物。但宋子文顾虑会被何应钦抓住把柄，不敢单独同周会面，就由郭增恺去见周恩来。

宋子文不来，周恩来对其心态已明白三分，坦率地告诉郭：

“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于事变，我们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

说到这里，周恩来呷口茶水，很是诚恳他说：

“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子文真是喜出望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十分赞赏。没想到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利益，对于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会如此地慷慨而大度。第二天，他即飞回南京报告。

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

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22日下午4时，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一起飞到西安。蒋介石被困囚笼，眼见得亲日派何应钦要借故将其除掉，他急欲获得自由，返回南京，所以在见到亲英美的宋氏兄妹后当即表示：

“我出去后即准备改组政府，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同时他还提出两个条件：

一是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此时的蒋介石可谓是驴倒架不倒，死要面子，死保自己“领袖”的尊严。

周恩来经与张、杨两位将军协商，考虑到在大敌当前、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情况下，亲英美的蒋介石有可能会转变立场，起而抗日，所以以民族利益为重，答应了他这两个条件。

23日上午，双方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

谈判一开始，周恩来提出了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

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周恩来逐一说明上述主张后，代表中国共产党表明态度：

“以上六项，只要蒋先生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

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答应转达给蒋。

下午，双方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爱国将领、放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天，会谈情况很快转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说中共愿意拥护他当领袖，十分高兴。对周恩来早闻其名，并带有神秘感的宋美龄专门会见了周恩来，说：

“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

周恩来看这位年轻漂亮、比蒋介石小许多的蒋夫人说：

“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

周恩来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同时，周恩来还谈到了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并对抗日的长期准备做了分析。

24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两人出席，西安方面仍由张、杨、周三出席。会谈开始，宋美龄的情绪好，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说：

“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在政治上求得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接着，她和宋子文对张、杨、周三谈及的一些问题也做明确的承诺。这些得到蒋介石允许的承诺，中国共产党长期内直没有把它公开发表。经过近半个世纪后，才在《周恩来选集》卷所收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第一次披露出来：

(子) 孔、宋组成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丑) 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开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寅) 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卯) 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辰) 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巳) 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午) 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 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 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西) 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由上述不难看出，周恩来在谈判中为了革命作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

这天下午，周恩来同宋子文单独会晤，并通过宋子文同蒋介石约定：晚间在蒋的住处与蒋见面。

就在周恩来见蒋前的傍晚7时半，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央书记处报告：

今日蒋答复张：(子) 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 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 蒋允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卯) 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 蒋意开国民大会。(巳) 他主张联俄联英联美。

接着，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很清楚，为了恢复自由，他需要作出一些明确的承诺。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领袖”之尊，

又不愿多作表示。因此，他想出了装病的主意，由宋氏兄妹预先对周恩来说：

“蒋先生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

周恩来何等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已经摸透了，他不作任何表示，只是淡淡一笑。待他走进蒋的卧室，望见蒋仍然躺在床上。蒋介石很会装，见周恩来进来，作出勉强在床上坐起的样子，请周坐下。

周恩来坐下，一边品茶一边对蒋说：

“蒋先生，我们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不少啊！”

蒋介石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

“是老了，国共打仗把我打老了。”

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说：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不卑不亢地回答：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周恩来接着问蒋介石：

“蒋先生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呢？”

宋美龄怕蒋介石难堪，忙接上话茬说：

“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接着，据周恩来 25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做了三点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注：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谈完这三点后，蒋介石故意表示出很疲劳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

“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

周恩来明白蒋介石至此已不想再多有表示，就说：

“蒋先生休息，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

坐在床上的蒋介石将身子往上直了直，挥挥手说：

“好，好。”

周恩来一边告辞，一边一语双关他说：

“请蒋先生善自珍重。”

周恩来告辞后，和宋子文继续交谈。宋子文坚决请求西安方面信任他，表示他愿负全责去履行以上各项条款，要蒋、宋夫妇 25 日离开西安。

张学良同意，并表示愿意亲自送蒋走。

此时的周恩来，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政治经验已经十分丰富，他在同意这些条件的同时，认为在走以前还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且不赞成蒋在 25 日就走并由张送去。

但第二天，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张学良不经与周恩来商量就于 25 日下午 3 时亲自将蒋介石送走，以致以后身遭软禁。

四、不见刀枪的交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个新的使命立刻又摆到周恩来的面前：同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

这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全局性任务。此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掌握很大力量，是国际问合法的全国政权。要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不能不同它进行谈判并取得一定的协议，为此就不能不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

步。中日民族矛盾的急剧激化，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加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达成这种协议有了可能。

周恩来在这场谈判中充分展现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从1937年2月开始，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历时达7个月之久。谈判的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尽管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波折，最后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经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周恩来与顾祝同、张冲等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后，于1937年3月下旬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通过宋美龄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15条意见先交给蒋介石。

一见蒋介石，周恩来先发制人，首先开宗明义他说明：

“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主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

蒋介石马上感受到了周恩来的厉害，周这一立场也是国民党整天挂在嘴上的。还没等蒋介石回过神来，周恩来又说：

“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谋求同蒋先生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诬蔑。”

言外之意，中共及其军队一定要坚持其独立性。

为了表示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周恩来明确表示：

“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先生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

当周恩来说到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运动时，蒋介石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嘴角也漾起了一丝笑意。

在谈话中，周恩来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几点合理的具体要求：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谈话开始时首先表示：

“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我们各自要检查过去的错误。”

接着他强调这次谈话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我个人合作即可。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对于具体问题，他表示：

“这些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我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决不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与红军打。”

当蒋介石说到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办法时，周恩来说：

“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

蒋介石表示赞同，立刻说：

“那就请你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

周恩来忙问：

“蒋先生有什么具体办法？”

蒋介石回答说：

“我还没有，中共可以先商量。”

乍看起来，蒋介石这次的表示确实很爽快，表现得颇有领袖风度，但周恩来对蒋介石有着多年的了解，一下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意图所在。在《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周恩来这样写道：

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

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

从杭州回到上海，周恩来又会见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并同李一起去看望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还会见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干部。以后，李延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联络各东北救亡团体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开展救亡运动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所用的密码飞抵西安。于4月初返回延安。中共中央立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在杭州同蒋介石谈判的报告，对这次谈判表示满意。会议根据两党谈判以来的情况，讨论了国内形势与党的任务，认为：“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在这以后，“停止内战的旧阶段已经过去，而转入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民族矛盾超过国内阶级矛盾，党今后坚持民族的统一战线方针，不为时局变动而动摇。党在新的环境中应善于利用新的斗争形式。”会议强调，“我党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努力争取领导权。”

关于合作和纲领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拟定一个方案，在下次会谈时向蒋介石提出。第二天，周恩来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写道：

我们商定办法如下：（一）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以抗日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征求蒋的同意，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结合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二）我们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征蒋同意，如蒋同意上述统一纲领及这一修改，我们可以答应赞同蒋为总统。（三）我们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主运动以影响蒋。（四）对其他具体问题，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四万五千人为定数，地方部队另编一万人，如此，除老弱妇女外，便无多余精壮青年。（五）如基本上及具体上均能满意解决，则我们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以争取公开活动，否则拟采取拖延办法，待事态发展，以便促蒋让步。

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正确说明了抗日和民主运动的关系。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他写道：中国共产党现时的活动中心是：“进行对日抗战的准备工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着重指出：“特别是民主运动，在目前内战停止、抗战准备期中更有其严重意义。也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发展南京抗日派的政治团结，才能提高反蒋各省的政治觉醒，才能扩大全国的抗日统一运动，才能争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同时也才能改变一些蒋介石的独裁观念与各省军阀的割据思想，以便于抗战的发动

和胜利。”

对周恩来的报告中提到的制订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等问题，中共中央都十分认真地对待，不仅提出了具体方案，对重要细节也都做了反复推敲。

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日、20日就这些问题分别做了讨论。在讨论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时，周恩来说：

“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的纲领；第二，要有联合的组织，才能行动，可以设想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像大革命时代一样，这一形式也有许多困难，不容易实现，另一种是参加联合战线，比较好活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为领袖。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关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些原则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得到承认。”

关于联合组织的名称，周恩来认为最好用民族统一联盟，同时提出了组织上的原则是可以加入，保存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

显然，周恩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十分重视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至此，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

五、蒋介石：请朱、毛出洋；

周恩来：要你出洋如何

4月26日，顾祝同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周恩来见到顾祝同、张冲后，把准备和蒋介石会谈的内容同他们先交换意见，并和顾祝同商议发放本月经费与寒衣问题、河西问题以及派人到鄂豫皖等苏区去等问题。

6月4日，周恩来到达庐山。此时的庐山，风景如画，环境宜人，在一片绿树掩映之中，坐落着蒋介石夫妇居住的别墅。周恩来到后，从5日至15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妻舅宋子文以及张冲参加。周恩来首先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细则共52条。他又向蒋介石申述来之前所准备的各项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没有包括蒋介石提出的同他个人合作的问题。

对于周恩来的到来，蒋介石表现了热诚的欢迎，并盛情款待，为之接风。然而在此背后的真实目的，则是要软化周恩来的立场，以让周接受他的主张。

蒋介石在这次会谈中的态度，同在杭州时相比，起了很大变化，给谈判设下许多新的障碍。本来，是他提出要中国共产党先商量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这次，他却完全撇开周恩来带来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来，他提出了具体办法：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组之，由我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也由同盟会加以讨论。

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的关系，并由此

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

蒋介石说完，看着周恩来说：

“恩来，怎么样，我对于你们够宽大的吧！只要你们真心实意与我合作，我是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周恩来一眼就看出，这个办法的实质，显然是要在“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名义下，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

蒋介石不等周恩来答话，又一气说下去，谈一些具体问题。对国共合作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他也态度大变，推倒在杭州时做过的许多承诺。他虽表示：在共产党根据以前声明发表宣言后，政府就发表3个师的番号，人数为4.5万人；但在杭州时他曾答应红军改编后可在3个师以上设立的总司令部，这次却只答应“3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

说到这里，蒋介石话锋一转，说：

“国共合作，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毛先生、朱先生要出洋，各边区的武装也要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国民党政府派正的官长，当然可由共产党方面推择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事情可由边区政府自己办。”

对于过去曾承诺过的允许共产党适时公开的问题，蒋介石不再提起，反而规定：

“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由中央尽量收容。”

周恩来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早有思想准备。他静静地听着，待蒋介石说完，他已思谋好对策，当即表示：

“有关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定；有关红军指挥机关和边区人事安排等问题，不能同意。”

接着，周恩来严词驳斥蒋介石的要朱、毛“出洋”的要求：

“你这是要我们共产党群龙无首嘛！假如我们共产党提出要你出洋，你将如何想！”

接下来，周恩来与蒋介石唇枪舌剑，反复争执，双方各不相让。周恩来看蒋介石要价太高，已不可能降低其要求，愤怒而退。

以后，宋子文、宋美龄、张治中往返周、蒋之间反复磋商，问题仍难以解决。

因此，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6月18日，周恩来到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为顾全大局，又准备作出重大让步。在提出的新方案中，“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国共产党准备在7月中发表宣言，其内容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及上交蒋的方案为根据。“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四万五千人。”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7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

这个新方案，为了能够达成联蒋抗日的目的，尽可能地照顾蒋介石所提

的要求，做了重大让步，表现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当然，该方案也拒绝或限制了蒋介石一些极端无理的要求，为以后的谈判打开道路。

为使谈判能达成协议，周恩来在6月22日就红军指挥机关问题致电蒋介石，指出“唯三师以上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党中同志皆认非此实无法进行改编，尤以朱同志去留影响极大，务请鉴察此间实情，改变处置。”

但挟武力以自重的蒋介石仍然坚持原议。鉴于抗日形势日趋严重，为了尽快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准备再作出让步，同意改编后的红军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力争以朱德为政治部主任。这已是中国共产党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做好准备，万一上述要求仍不能争得，只得在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

6月26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赴庐山，继续谈判。7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7月4日，他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为了部署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周恩来于7日到达上海。

就在他们到达上海的当天晚间，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何基津指挥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神圣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第二天，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甩掉国民党的特工人员，秘密会见了为中共中央担任联络工作的地下党员潘汉年和准备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周恩来对他们说：

“要注意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日本帝国主义想占领上海。用不了多久，上海和北平都会发生意外事件，形势会急剧变化。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等都可以围绕坚持抗战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联系广泛的群众，建立群众组织。我们主要要扩大党的政策和影响，团结积极分子，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既是合法也是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放手搞群众工作，不能离开隐蔽的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抗战的斗争是长期、艰苦的，不要因一时顺利而忽视了积蓄力量。要注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反对关门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不要大面积地搞群众运动，把力量一下子都暴露了。”

周恩来再三强调：

“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吸取了“四一二”政变时共产党人被蒋介石屠杀的教训，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和群众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如何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又防备有朝一日蒋介石有可能的屠杀，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二天，他以看戏的名义，来到黄金大戏院，实际上利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与上层民主人士、统战工作干部会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

六、心理战：蒋介石故意叫板，周恩来拂袖而去

7月13日或1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前往庐山。

在那里，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听取他们对国是的意见。但是，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3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为了争取这次会谈能取得进展，7月14日，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

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周恩来及博、林到庐山后，随即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但蒋介石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周恩来后来说：

“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激烈地争执发生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蒋介石在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把指挥权看得特别重，比以前对中共的允诺更向后倒退了。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他曾表示：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实行指挥权；并曾说过：“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次谈判时，一贯说话不算数的蒋介石又改口了。他于7月14日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他的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

明摆着，蒋介石想把红军的指挥权统统归他。

对于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周恩来十分气愤，他强压着怒火，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指出：

此与来（注：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不难看出，这是一封柔中带刚的信件，尤其最后句，表达了周恩来刚的一面。

17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提出：

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

18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其中包括洛、毛的上述意见，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

但蒋介石仍然十分强硬，在指挥权上寸步不让，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传达人事、指挥令，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周恩来具有十分坚强的原则性，对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条，决不能放弃。没有了这一条，共产党、红军可说即没有了一切。他当即严正表示：

“蒋先生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由于谈判已陷入僵局，洛甫、毛泽东在7月20日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

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有了洛、毛上述电示，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21日，他

们电告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并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1.5万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蒋介石的立场慢慢地有所软化，27日，蒋鼎文向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

28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编，编为3个师，4.5万人，上设总指挥部。在人事安排上，不报蒋介石批准，自行决定，由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这时，朱德、彭德怀等都在云阳。30日，周恩来和洛甫、博古赶往云阳，安排一、四方面军和七十四师改编事宜。

蒋介石就是这个德性，吃硬不吃软。周恩来等人离开庐山拂袖而去，他又有点发急担心了。8月1日，在云阳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张冲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第二天，周恩来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而对于毛泽东这一共产党人强有力的掌舵人，则不能出面。

4日，张冲回电称：开国防会议。5日，周恩来、朱德到西安。10日，偕同在西安的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地方实力派也都主张联共抗日。如主张抗日的冯玉祥和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在会议期间也纷纷同周、朱、叶会晤。共产党在南京实际上取得了公开合法活动的地位。

对红军参战后的行动方针问题，来南京之前的8月4日，周恩来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等在云阳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动抗战的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要南京发动全国抗战，我们争取参加和领导。为实现这一方针，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以主力出动为妥，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出去后要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进行侧面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次日，收到洛甫、毛泽东复电：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要按情况使用兵力，在此原则下，同意开拔主力。

有了上述意见，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有底了。

各方面的条件都近成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似乎已是指日可待了。但周恩来与蒋介石及其代表的谈判进展仍不顺利。8月12日，蒋介石派康泽见周恩来，对周恩来7月间交给他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

“你们的宣言，蒋先生认真看过了。提出了如下修改意见：不同意提民主，要求一律改为民用；要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

周恩来当即表示：

“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但是，形势逼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已严重威胁蒋介石的统治，使他不得不转变态度。就在第二天，即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了对

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已经清楚地看到，中月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此时，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在华北牵制日军，与在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作战战略上的配合。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在22日正式发表）。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在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七、蒋介石：八路军打正规战；

周恩来：八路军只能打游击战

周恩来在南京期间要与蒋介石谈判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八路军对日作战方针问题。关于八路军开赴前线后的作战方针，洛甫、毛泽东早在8月1日即致电周恩来提出：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周恩来等根据上述原则，与蒋介石等人进行了反复的谈判。蒋介石、何应钦原来还想让八路军打正规战，经过周恩来的据理力争，最后不得不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

18日，周恩来、叶剑英电告毛泽东等，说南京方面已同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部队仍以速开为有利，并提议“至少再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

中共中央当即同意这个建议，派红一军团为先遣部队，日内出动。自8月下旬起，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陆续由韩城等处东渡黄河，经同蒲铁路开赴抗日前线。

对红军在南方的各路游击队的改编，也是周恩来在南京期间要谈判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周恩来在8月17日电告中共中央：

现已与军何（注：指何应钦）商定，允许我方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意旨，并协助各边区传达改编……请令住鄂豫皖之郑位三及往闽西南之方方迅速来南京，其余如派往湘鄂赣边区的人员亦请送来。

以后，这些人员陆续到达长江南北各游击区，执行将当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任务。

周恩来经过与蒋介石长期艰苦的谈判，终于争得了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的合法地位，以及由共产党绝对领导这一重大问题。这是谈判所取得的十分重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取得合法地位后，需要在各地设立公开的办事机构。西安谈判时，顾祝同已允许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七七事变”后，阎锡山也允许在太原设立办事处。南京谈判中，国民党又同意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以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又先后在武汉、长沙、兰州等地陆续增设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等机构。

周恩来在与蒋介石等人的谈话中，所要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筹备公开出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那就是《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这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7月10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即在上海约见夏衍，对他说：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样年和章汉夫负责。”

接着，周恩来又约见刚在6月出狱的潘梓年，说服潘放弃到革命根据地去的要求，立即着手筹建党报的工作。

但在国统区要出版共产党的报纸，必须经过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周恩来在庐山和南京谈判过程中，同国民党几经磋商，终于达成了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协议。周恩来、朱德还在南京探望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同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何云、吴敏（杨放之）、徐迈进、楼适夷等聚集南京，从10月间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后来因为上海、南京先后沦陷，筹备工作移到汉口继续进行。

周恩来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还要求南京方面释放在狱中的共产党员。8月18日，他和叶剑英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当天，将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三人营救出来。随后，陶铸、钱玻等也分批获释。这段时间内，周恩来还在上海会见了刚从国外归来的叶挺，请他出面来做改编南方游击队的工作。

这次南京谈判历时十余天，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如边区范围和政府人员、国民党向八路军派遣军政干部等。由于抗日战争形势迅速发展，朱德先回陕北，周恩来也在8月21日离开南京。未了事宜由叶剑英（9月中旬又增加博古）在南京继续进行谈判和交涉。

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与蒋介石等人历经半年艰难曲折的谈判，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由于周恩来的谈判天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给予高度信任。从此，开始了他长达数年之久的与蒋介石及其代表的谈判生涯。

八、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退出共产党，不可能也做不到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进行了一个多月，于11月6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南方局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委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3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批准以周、博、凯、吴、叶、董六人为常委，江西、上海工作归南方局管。）

周恩来没有参加完这次会议。他在会议第二天发言以后就离开延安，在10月1日回到武汉。从此开始了他与蒋介石新一轮的谈判。4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转交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和统一战线的主张。8日，他将所谈内容写成书面意见交给蒋介石。14日，再次会

见蒋介石。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主张表示赞同，但对两党关系问题仍不表示明确态度。

这时，由于日军正以强大兵力开始向武汉进攻，局势日趋紧急，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陆续撤出武汉，周恩来同蒋介石关于两党关系的会谈不能不暂时中止。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蒋介石的内外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将重点逐渐由抗日转到反共，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周恩来处在同国民党交涉的第一线，亲历了这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他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西南和华南各省党的工作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事宜。由于有了长期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的经验，此时的周恩来变得更加成熟了，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沉着而又灵活地应对着。

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对于蒋介石的进步，周恩来都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对其反共和对日妥协，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撤离武汉后，经过天门、沙市、公安、常德，在1938年10月27日抵达长沙。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各部、会都在这里。31日，蒋介石发出《告全国国民书》，说明撤出武汉是为了保持继续抗战的力量，表示要坚持持久抗战、全面战争和争取主动。

第二天，周恩来、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蒋宣言今早发表，内容甚好，不妥处已改掉……蒋日前来长沙并转南昌，现回衡(山)，表示坚决主张宣战，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均赞助。

11月1日至3日，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武汉作战经过。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发言中强调游击战的问题。8日，他又到衡山见蒋介石。商谈今后抗战的军事方案。蒋介石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原则上同意。蒋介石明白他的一班文臣武将没有多少懂游击战争的，也没有一个赶上周恩来的，于是就要求周恩来说：

“请你写出一个具体方案来，方案出来，就可速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周恩来很快写出方案交给了蒋介石。

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召集南岳军事会议，讨论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到会的有高级将领三百多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出席了会议。白崇禧是主战派，他将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会议上，蒋介石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这件事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同。南岳训练班的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也担任了这个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他后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

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更有成绩。这几乎是
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多了，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
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在武汉就提出过各党派联盟的主张，那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定共同纲领，改革政治机构。周恩来曾向蒋介石建议说：

“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像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

蒋介石打的却是另一种算盘，那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溶化共产党，取消

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为他个人的独裁。国民党提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口号，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把这叫做“溶共政策”。

12月3日，周恩来经衡阳到达桂林。八路军刚在这里建立了驻桂林办事处，由吴奚如、李克农先后担任处长。这是经过周恩来同白崇禧商谈同意后建立的。周恩来、叶剑英在这里对办事处的工作做了详细布置，还会见了从武汉撤退来的一些文化界进步人士。

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到达桂林的消息后，即于6日晚在桂林主动约见周恩来。蒋介石的住处，桌明几净，布置得温馨淡雅，几支蜡烛闪着柔美的光。蒋介石想布置个友好宜人的气氛，并在这一气氛中会见周恩来。侍从们通报后，蒋介石主动迎到院中，握着周恩来的手，十分热情他说：

“恩来，快进屋，咱们好好谈谈。”

宾主坐定，略事寒暄，蒋介石给周恩来让过茶后，即切入正题，正式提出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内的主张。他对周恩来说：

“共产党跨党加入国民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从蒋介石热情的迎接中已猜出蒋要谈重大问题，并想要中共让步，已有思想准备。待蒋介石谈完，当即阐明了共产党的原则：

“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并不都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党。”

接着，周恩来又说：

“跨党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也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以采用其他办法，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

周恩来坚定的立场使蒋介石大失所望。只好快快地说：

“如果你考虑合并的事不可能，就不必电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但蒋介石这个念头并没有立刻打消。12月12日；他在重庆又约见代表中国共产党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继续洽谈。他说：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者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是跨党办法绝对办不到。”

他甚至说：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这次会见共谈了五六个小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玉章在四年后回忆说：蒋“力劝我们到国民党去作强有力的骨干，为国家民族共同努力，不必要共产党”。并说“如不取消共产党，死也不瞑目”。大家辩论了很久。他且特别对我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这次会谈，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溶共政策而不欢而散，没有任何结果。

周恩来在 12 月中旬从桂林到达重庆。29 日，逃亡到河内的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周恩来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随即发表《汪精卫叛国》的社论，并批判种种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1939 年 1 月 20 日，也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前一日，蒋介石又约周恩来继续商谈。对于这次商谈的内容，第二天周恩来在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里曾做了详细披露：

蒋昨晚约我，问延安（对国民党全会）有无意见，并又提统一两党事。我告以不可能。彼仍要我电中央请示，希望在全会中得到回电。我告以各地反共捉人事要他解决。他反说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即下级也常不安定，影响上级，意在这次会有人提此类事。他并说：汪走，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即暂不赞成统一，也要有新办法。我问他有何具体办法。他说未想得。其意盖欲我党对国民党全会有一具体让步，以塞众口，以利防共。

根据上述情况，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两条建议：一、对国民党的全会，中央应有一个表示。二、拍一密电，提出我党的具体意见，指出我党愿与国民党进一步合作，但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摩擦日益加甚，此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救急办法，提议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地就地解决纠纷，至少可弄清事实，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找进步一具体合作办法。

对于周恩来所提的与蒋介石斗争的策略建议，中共中央表示赞同，24 日拍发了致国民党蒋总裁暨五中全会电。25 日，周恩来将这个密电转送给蒋介石。电文写道：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宾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中共中央的坚决态度，使蒋介石看到通过所谓两党合并来取消共产党的做法是行不通了。于是，他在 1 月 21 日到 30 日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重新解释“抗战到底”的“底”，不是要打到鸭绿江边，而只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这次会上又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4 月 14 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还专门设立从事反共工作的特别委员会，开始了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共活动。

国民党五中全会，是蒋介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这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一直继续到抗战结束。

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重庆的周恩来，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动态和蒋介石的态度，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国民党政策的这种变化。国民党五中全会闭幕后不久，他即在 6 月上旬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开始走“向下发展的道路”，重心由外转向对内，眼光由看前线和沦陷区转向看共产党的后方。周恩来对这种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及时地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在前一个阶段，国民党当局及前线将领均一心一意计划如何支持长期抗战，如何深入敌后与敌展开全面战争，故当时的努力重在加强抗战的力量，谨严对外的立场，巩固团结，肃清汉奸。在后一阶段，亦即目前阶段，国民党的当局及后方军政机关，均重在如何对内，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古，摩擦丛生，一切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极受限制。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

四军，乃发生许多苛刻之要求，无理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

这时，国民党在各地的限共、反共活动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他们不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到处破坏共产党的组织，逮捕共产党员。在福建、江西、湖南、陕西都发生了暗杀共产党人的事件。他们不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电令取消晋察冀边区，河北省政府明令取消冀中、冀南行政公署。他们不准八路军在地方筹款，不增拨八路军所需的经费。八路军月饷每人平均只有六角七分，是国民党军队月饷的九分之一。他们不许八路军、新四军到敌后活动，并制造了“博野事件”、“土桥事件”、“束鹿事件”等一系列摩擦事件。就“博野事件”来说：正当冀中抗日军民同日军浴血激战之时，国民党军队一部突然偷袭位于博野县的八路军分区司令部，并在安国活埋共产党员多名。在冀南的“束鹿事件”中，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八路军一二九师1个连，杀害连指导员以下21人。

到处在流淌着共产党人的鲜血，到处都可以看到反共的逆流在增长，局势的发展不能不使人深深担忧。

对于在蒋介石怂恿下，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种种摩擦事件，周恩来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着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斗争。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在转送中共中央来电时，曾于1939年1月25日在重庆致函蒋介石陈述各地反共活动的情况，并驳斥国民党制造摩擦的种种借口，指出：“中共既成为党，当然需要发展”，但国难当头，“中共绝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之意图”。

周恩来是很讲究斗争策略的，在信中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留下了余地，说：各种摩擦加剧，“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中共愈顾大局，少数不明大义之人竟愈加一意孤行。”他希望国民党中央“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恢宏其量，于此基础上建立共信”，改善两党关系，“减少摩擦”，“合作到底”。

九、叶挺辞职，蒋介石忙寻借口；

力劝叶挺，周恩来挫败阴谋

就在这时，发生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由于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的不信任、不合作而辞职的事件。叶挺的辞职，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反响。蒋介石这一下得意了，见了周恩来就说风凉话：

“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

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蒋对新四军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不会派叶挺去）；一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两万，这样对我更不利。

为不给蒋介石提供口实，不使其借故另派其嫡系将领到新四军任军长，周恩来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

1月1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各项意见，并说：

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

叶挺对中国共产党是有感情的，他的辞职是不得已的举动。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工作，他于1939年2月初到达重庆，同周恩来、叶剑英进行了长谈。

叶挺是北伐名将，中共早期党员，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南

南昌起义后曾辗转欧洲 10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赴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并要求恢复党籍。考虑到此时他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会更为有利，中共中央决定他暂留党外。不久，他在中共中央的推荐下，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新四军军长，蒋介石早想拉拢叶挺，觉得这下有了机会，得知叶挺到重庆的消息后。很快就安排接见。他想利用叶挺还不是中共党员及与项英有矛盾，拉住叶挺，倒向他的一边，一见叶挺就极尽挑拨之能事：

“你是北伐名将，我过去一直都是很信任你的。你在新四军弄成这个样子，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呀！”

叶挺经过和周恩来、叶剑英的谈话，对蒋介石的意图已有了底，马上回答说：

“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蒋介石还不死心，又说：

“你如果不想回去，我可以另派你担任更高的职务。原先比你差得多的人，现在都担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了。我也觉得有点亏待你了。”

说到这里，蒋介石意识到这会有挑拨之嫌，马上又假惺惺地说：

“当然啦，你要还愿回新四军，也可以回去。”

叶挺立即做了肯定的回答：

“我在新四军人熟，对部下有感情，愿回新四军率部杀贼，坚决抗日，以不负委座的希望。”

蒋介石碰了软钉子，只好作罢，连连说：

“那好，那好。”

3 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王稼祥并转项英说：“叶挺到重庆后已见过蒋介石和陈诚。蒋介石问叶愿回新四军否？叶挺准备回去，并表示新四军问题好解决。周恩来的电报中还说，叶挺向他表示，“他只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注八路军。因在四军，蒋会怀疑他。”周恩来的电报说：“我们力劝其回。并以确立制度必能解决工作困难与关系。我拟向蒋、陈说与叶同往新四军，顾祝同已来电欢迎。”

周恩来陪同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向军部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并多次找项英谈话，要他搞好同叶挺的关系。周恩来严肃地批评项英说：

“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在周恩来帮助下，项英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但事实上仍没有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处境也未见改善。1940 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到重庆后，又当面叮嘱正在重庆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以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袁国平回新四军后又不肯传达，一直到“皖南事变”发生。

虽然叶、项不和没有彻底解决，但由于周恩来的工作，叶挺又回到新四军，堵住了蒋介石往新四军另派干部的口实。这一回合的斗争，以周恩来的胜利而告终。

十、蒋介石倒打一耙，周恩来针锋相对

这时的华北，国民党军队制造的摩擦事件日趋严重，愈来愈表面化。1936年4月间，山东国民党秦启荣部制造了“博山事件”，袭击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指战员四百多人。5月，陇东摩擦加剧，陕甘宁边区的镇原县被包围，枸邑县被攻占，整个边区受到进一步的封锁。同月，在陕西，国民党驻虢镇一部包围八路军驻虢镇通讯处，拘捕八路军将领、军属。

这时，周恩来已从东南回到重庆，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他立刻同蒋介石进行交涉。对河北问题，他根据中共中央的电示，向蒋介石要求更换河北省政府主席，维持晋察冀边区现状。后来，由于更换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共中央放弃了这一要求，对晋察冀，则因为蒋介石还没有直接电令取消边区，周恩来就改取拖的方针。对陕甘宁边区问题，周恩来要求国民党部队退出侵占的各县，停止挑衅活动。

对于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当局斗争的情况，他电告中共中央说：我们已将此类事件广为宣传，在抗议中特别指出，“此事与（国民党）中央限制异党活动的训令指示有关，我们已让无可让，只能起而自卫，以说明目前危机，促其反省。”

6月9日，叶剑英由南岳来到重庆。16日，周恩来、叶剑英会见蒋介石，商谈边区问题。蒋介石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首先倒打一耙，说：

“非边区停止向外进攻，不能谈判具体问题。”

周恩来针锋相对，当即反驳：

“并非我们进攻，乃被人所攻，边区为自卫行动。”

在周恩来据理力争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由双方派员调查。

由于各地摩擦迭起，陕甘宁边区周围的摩擦事件有升级的危险，为研究解决的办法，周恩来在6月18日离渝返延。为了防止蒋介石彻底翻脸后，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离开重庆前，周恩来主持南方局会议，对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做了部署。他及时提醒大家要在力争时局好转的同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要作必要的转变。

周恩来返延安途中，路过西安，会见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又同他研究了调解陕甘宁边区摩擦事件的具体办法。7月，边区形势趋于缓和。同时，周恩来电告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陈诚等人说：

“我返陕北后，边区纠纷渐归平缓，陇东、枸邑各依原状。静待解决。”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陕甘宁边周围刚刚稍见平静，河北的局势又急剧恶化了。6月22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突然率领五千余人，配合日军对冀中各县进行扫荡，偷袭驻深县的八路军吕正操部，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吕正操率部奋起反击，经过一天激战，除毙伤外俘获张部旅长以下二千余人，张荫梧只率十余人逃出。7月2日，周恩来从延安电告朱德、彭德怀，指出：冀中解决了张荫梧部，但张逃脱后必乱打电报，影响重庆在其他各处实行进攻，“请你们将张进攻冀中实情详报蒋、何、陈、李（济深）、冯（玉祥）等，并说明不得已自卫之原因，以证明责在张荫梧而不在我。”电报还说：“国民党因张受损失，必加紧进攻，请严防，尤重在友军杂居或接近之处。”

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张荫梧逃脱后，马上致电蒋介石，诬告八路军制造严重事件。7月22日，蒋介石授意陈诚致电周恩来提出抗议。8月2日，周恩来复电痛陈事实真相：“查冀中、冀南迭经敌之扫荡，均恃十八集团军之贺、刘两师及吕正操部坚持苦撑，始可保全现状。”“不仅华北军民

有口皆碑，公认战绩；即在敌方广播，亦只认与八路军激战。不谓乃鹿主席、张厅长不知是何居心，必欲诬八路军见敌潜逃，进攻友军。弟虽不敢谓鹿主席之弃冀南而往豫北为畏敌潜逃，但张厅长之在深、冀两县所发生之武装冲突，都由于张部挑衅”，首先包围吕正操部引起。“现张部乔司令明礼尚在吕部驻地，即日将带队归还张处，方可知此事。”

由于周恩来义正词严地公布了事实真相，也由于张部在逃窜中溃不成军，丢尽了蒋介石的面子。这年年底，国民党下令免去张荫梧的本兼各职。

接着，南方又传来了湖南“平江惨案”的消息。这次惨案，其实在6月12日就已发生。那一天，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包围了新四军在后方的平江通讯处，当场打死通讯处主任涂正坤活埋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八人。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周恩来在离开重庆时还没有得到消息。

7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得知事件经过后，立即致电陈诚提吐严重抗议。他在电文中说：

“弟此次回肤施（延安），原冀与敝党中央商讨巩固团结大计并求平服摩擦事态。乃北事未平南变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断言决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人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吾辈矢志团结，坚持抗战，对兹惨案，必须有以善其后，方能得事理之平。否则激荡愈多，愤懑难抑，弟虽努力亦难收效矣。”

接着，周恩来笔锋一转，巧妙地指向了这一切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蒋介石：

“请转呈委座，严令查明此案真相，对死难者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务必请严予惩治，并责令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此类事件，使中共党员得有生存之保障。”

7月19日，陈诚在蒋介石授意下复电周恩来，反诬涂正坤等“召集土匪，扰乱后方”，并称肇事的第二十七集团军“维护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22日，周恩来再电陈诚，严同驳斥。当然这些话主要是说给制造摩擦的总根源蒋介石听的。他指出：平江通讯处“向属合法机关，且与当地政府驻军久有联络，决不能诬为土匪机关”；自湘鄂赣红军游击队开往江南编入新四军后，“其通讯处在平江一带协助政府肃清土匪，迭有成绩，文白（即张治中）兄知之最清，今竟诬其为与匪相通，宁有是理？”“当武汉撤退，日军向南转进之际，当地土匪团队均曾劫夺散兵枪弹，独该通讯处招待散兵负责送还，当时驻军政府均有好评，一转瞬间，竟诬其灭尸缴械，其何能信？”“当弟由江南转往南岳之时，深知平江通讯处与地方关系素睦”，“而兄两至长沙，亦言湖南无摩擦，何相距月余竟造此口实，怎能令人置信？”

周恩来在电文的最后指出：

“倘兄愿弄清事实真相，以便公平处理，则请中央或九战区特派专员会同剑英兄前往查明，定可使此沉冤大白于天下。”

7月31日，周恩来答《新华日报》记者问，再次提出：

“肇事者为我抗战之国军，遇害者亦为我抗战之将士，此等反共阴谋竟波及抗战前线，不能不承认其计之毒，心之狠。盖武装惨杀，最易引起内讧，内讧一起，必致破坏抗战，此正中投降派制造内部分裂逼我中途妥协之阴谋。”

他要求国民党最高当局：

“本大公无私之怀，必能平反此案，为死者伸冤，为生者保证其最低合法权利也。”

“平江惨案”引起新四军、八路军将士和边区人民的极大义愤。8月1日，延安各界人士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等参加大会。周恩来送了挽联：上联是“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下联是“同胞须猛省，猜疑摩擦皆蒙日寇阴谋”。这副挽联，表达了周恩来满腔悲愤和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维护团结抗日的精神。

十一、毛泽东：恩来算是把蒋介石看透了

1939年8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原来打算在4月前后召开，因为周恩来的东南之行而推迟。由于政治局势的大幅度逆转，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动，需要对统一战线问题再一次做出总体性估计，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8月4日起，周恩来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这个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抗战两年的总结——经验与教训；二、目前时局的关键——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及克服危险的紧急任务；三、论统一战线。

在这一报告里，周恩来主要对蒋介石做了详细的分析，因为在国民党里蒋介石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周恩来一针见血地分析道：

“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讲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思想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特点。”

为什么蒋介石没有马上投降和分裂呢？周恩来认为。这是因为：一、投降将成为汪精卫的尾巴，或许会被迫下野。二、分裂会遭到国人甚至他部下部分人的反对，并且不能战胜中共。三、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很苛刻。四、国内坚持抗战的困难还不是完全无法克制。五、国际的妥协派还不是一定要中国全部马上投降。

周恩来冷静地指出：蒋介石也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承认现实。只要现实对他有利，也能影响他改变一些办法，但阶级的根本思想是不会变的。“幻想蒋放弃其阶级立场，特别是对敌妥协性、对英美依赖性、对内反共性，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使抗战延长，国内情形相当好转，以便于各方面的进步而已。”但就是这样，“基本的矛盾依然存在，仍然会随着进步而发展，常常妨碍着进步，有时更会发生新的危险。”

接着，周恩来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待统一战线的态度和心理状态，做了透辟的、入木三分的分析：他们原则上不承认中国有阶级的对立；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其合法的存在；然而它是怯懦的，只要事实的发展不危害到他的基本利益，同时，事实的存在已成为不可变性，它也只好承认事实，迁就事实，可以保存它未来的利益；但是它又是自大的，即使事实已经存在，只要它有权力否认，有可能拖延，仍然是不愿公开承认的，仍然企图设法取消的；因此，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它只是在不得已的默认中形成，在习惯中发展，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时局再有进步，也仍然会如此。

听着周恩来有理有据，鞭辟入里的分析，毛泽东及其他政治局成员不住地点头称是，毛泽东不时地记下要点。

根据上述情况，周恩来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方法：

一、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

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二、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能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三、在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四、在方式上，要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以扩大影响，便利工作。

对当前统一战线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周恩来逐一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明确原则和具体办法。这些问题是：三民主义问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关系、政权问题、军队问题、对地方关系、对各党派关系、民众运动文化宣传工作、边区问题、八路军问题和新四军问题。

谈到对蒋介石的关系时，周恩来主张：

“在他困难时援助他，在他蛮横时拒绝他；诚恳的批评，具体的建议；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他。”

关于对蒋介石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周恩来特别强调：

“有利的应该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自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地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

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尤其是关于对付蒋介石的一整套原则和策略，是我党对蒋关系的经验总结，显示了他政治上和斗争策略上的成熟和智慧，是一篇高水平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时对周恩来的报告做了充分的肯定，说：

“恩来算是把蒋介石看透了。”

周恩来的上述发言，成了我党与蒋关系的指导性原则。

十二、周恩来愤怒赋诗巧揭事变真相， 蒋介石气急败坏大骂戴笠

周恩来到延安后没几天，大约是7月10日，便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右臂因坠马而受重伤，为粉碎性骨折。于8月27日离延安赴苏联治伤，1940年3月25日回到延安。周恩来这次回到国内，在延安停留了一个半月，便又踏上征途，前往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并开展了新一轮与蒋介石的谈判斗争。

为什么周恩来要这样匆忙地赶往重庆？原因是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在日趋险恶。1939年底，当周恩来在苏联疗养的时候，国

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在华北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这次进攻被击退后。他们紧接着又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到重庆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正式谈判。

6月初，周恩来会见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说：

“中共诚意抗战并拥护蒋先生，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实行反共溶共剿共政策，这只能帮助敌伪。所谓中共要举行暴动推翻国民党，完全是造谣。中共是要发展的，但主要是在敌占区同敌伪争取群众。中共诚意希望合作到底，而有人却想分裂，准备投降，请蒋先生明察。”

蒋介石听后，干咳两声，说：

“对于抗战团结都是有决心的，任何困难决不畏惧，国共间的一切总是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

蒋介石表述了自己始终如一信念，就是都要听他的。

周恩来针锋相对，说：

“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来胁迫。”

蒋介石看周恩来硬起来，就推托说：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

这次谈判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他认为，蒋介石对国共破裂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投降的危险日益严重。

接着，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的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进行了多次商谈。当然何、白都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陕甘宁边区问题。中共主张按现状划界。国民党却只承认边区包括18个县。二是军队的编制问题，中共要求八路军编为3个军9个师，新四军编为3个师；国民党只准八路军编为3个军6个师加9个团，新四军编为2个师。三是划分作战区域问题。这是这次谈判的中心问题。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都开往旧黄河北岸。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企图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并使日本军队有可能在狭小的圈子里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当局十分狡猾，声称“划界”是为了避免摩擦，想用这种说法博得中间派的同情。

周恩来一眼就看穿了其中暗藏的恶意，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于是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划界，但必须实现六个条件：一、各党派在全国的合法权；二、人民在全部敌占区的游击权；三、八路军、新四军有正规军的足够战区（华北五省）；四、八路军、新四军有足够的补给；五、中共有冀、察两省的行政领导权和其他游击区的政权；六、八路军、新四军有发展的保证（扩充补给）。

所有以上这些，当然都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7月16日，国民党方面提出一个“提示案”，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

蒋介石由于本无诚意，在周恩来将球踢给他之后，其嘴脸就一下暴露无遗。他事实上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要求。中间派的同情又倒向共产党一边。双方的谈判陷入僵持状态。

7月27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就出现的新情况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研究。这次回延安，毛泽东提出：国民党区域的党，均由周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在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磋商后，8月25日，周恩来经兰州回到重庆。28日，他同蒋介石、白崇禧进行会谈。虽然周恩来表示愿作让步，蒋、白却寸步不让，仍坚持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一律开到旧黄河以北，游击队留在当地交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周恩来只得加以拒绝。

不久，周恩来又同何应钦进行一次会谈，仍然没有取得进展。

为打破僵局，9月间，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对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

这些提议，也被蒋介石搁置起来。

会谈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尽管共产党方面有着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国民党方面抱着僵硬的态度，国共两党的关系一时难以取得改善。

“皖南事变”前夕，周恩来继续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新四军北移问题，只要事件还没有发生，他仍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他和叶剑英同刘斐、张冲举行多次会谈。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在陕北、皖北和苏北的军事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警告国民党如不停止进攻应负国共破裂的责任；要求推迟新四军北移的限期。

就在这时，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来电，谈及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包围情况。接到项英来电后，周恩来马上写信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列举国民党在各地的反共事实，特别提出新四军皖南部队已整装上道，但一切补给无着，而国民党的军队却步步进逼，造成对新四军的半包围形势，使它失去渡江北移的可能，要张冲急报蒋介石予以制止。

12月25日，周恩来应邀去见蒋介石。这一天正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获释的四周年。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蒋以极感激的神情谈话。”

蒋介石一开始便对周恩来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接着，他又假惺惺地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16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

来罢软的，蒋介石又来硬的，他以威胁的口吻说：

“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至于政治问题，都好解决。”

周恩来静静地看着蒋介石的表演，待蒋介石说完，当场予以驳斥。

周恩来在第二天向中共中央报告时说：“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他冷静地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在电报里，周恩来一针见血地写道：

张冲回去，认为出乎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

周恩来确实把蒋介石给看透了，其估计十分准确。事实上，蒋介石要用武力把八路军、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决心已定。尽管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大努力，局势仍在迅速恶化。12月底，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国民党准备围攻新四军的部队已分别开到指定地点，构筑碉堡工事，基本完成对新四军的合围态势。但项英仍动摇迟疑，没有坚决行动，以至贻误了突围北上的时机。就在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说了那么多“好话”之后不到十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8万人的袭击。经七昼夜激战，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遇难。

周恩来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时，立刻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直接质问蒋介石：向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在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上，《新华日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华日报》在从汉口迁到重庆后，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经常在周恩来指导下工作。1月11日，《新华日报》社举行创刊三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到会讲话。正当他讲话的时候，南方局机要员送来中共中央的急电。周恩来看完，立刻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局势严重。这时，饭厅里

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才亮起来。周恩来借以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

“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他接着说：

“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到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

当晚，周恩来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的方针。决定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接着，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义正词严地要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他在信中说：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四周，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

但是，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仍然一意孤行。

1月17日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把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得知后，立刻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何应钦，厉声痛斥：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接着，同他驱车来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再返回红岩。

当晚，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仔细估计国民党命令公布后的局势，研究如何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

其时，国民党有着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稿件都需事先经过审查，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全部被扣。他们还不放心，那天晚上10点多钟，新闻检查所来到《新华日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新华日报》的大样。为了对付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报社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一种是给新闻检查所派来的人看，上面没有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是刊登有周恩来的题词手迹。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把题词写好后，派副官立刻送往报社，并且指示：要报社加强编排和制版力量，组织好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周恩来的题词共两条。第二版占六栏版面的是：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在第三版占五栏地位的是一首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血泪相和、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就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抗议。报社将题词刻成木版后，立即拼版，加速印刷。黎明前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红岩山偷运进城，送到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

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轰动了整个重庆。这天的报纸，上午就在市内销完，每份后来增卖到五角，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据说，蒋介石收到报纸后，气得不住地“娘希匹、娘希匹”的破口大骂，并把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叫去厉声训斥一顿。

2月2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

“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为了彻底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英美政府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本来是赞同的，但又害怕由此引起中国的大规模内战，不利于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利用英美政府的这一心态，周恩来进行外交斡旋，让其对蒋介石施压，因为蒋介石是亲英美的，靠英美支持的。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请周恩来到自己家里面谈后，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处理问题不要操之过急，以免迫成事变。英国政府收到卡尔报告后，也告诉蒋介石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2月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访问。他提出要见周恩来。14日，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针对美国因担心日本南进而急盼中国内部团结抗日、以便牵制日本兵力的心理，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

居里向周恩来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他也承认：要是没有内外压力，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不可能。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居里在离渝前的一次公开讲演里，又对国民党提出批评，他说：“中国应有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民主，必须改变腐败的政治机构。”

美国在援助国民党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这样骤然的变化，对国

民党是很大的压力，使宋子文“甚以此为虑”。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认为。目前剿共不是“最良时机”，主张严令国军不妄发一弹以防引起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蒋介石也一时慌了神，他在2月1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

这从反面说明，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外交施压，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周恩来还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斯特朗（美国记

者）回到美国后不久，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上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斯特朗立刻通过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苏联政府也明确表示了态度。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原定于1月17日晚举行宴会，莫洛托夫已答应出席。“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苏联外交部建议宴会改期。邵力子到苏联外交部去解释。洛佐夫斯基副部长批评说：

“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事高兴

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

在重庆，周恩来同苏联驻华使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向蒋介石施压。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先后向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质问。蒋介石这时还需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只得要张冲和王世杰分别宴请潘友新和崔可夫进行解释。

1月25日，潘友新会见蒋介石，向他指出：

“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他要蒋介石注意：

“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效果。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国内外舆论一片责难，英、美、苏三国政府不断施加外交压力。此时的蒋介石，突然发现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4日约见周恩来。为了制造一种暖色调的气氛，蒋介石特意安排宋美龄坐在一旁。蒋介石这次谈话的目的在于和缓对立空气，他不再有前一时那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开始就向周恩来表示：

“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

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

“这都是底下做的，不明白我的意旨。”

对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新华日报》问题、释放李涛等人、发护照等等，蒋介石表示都可以做到。周恩来又提到防地、扩军问题。蒋介石对防地问题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而是含糊其辞他说：

“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

为进一步表示缓和，25日，宋美龄又出面宴请周恩来和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组，张冲也在座。周恩来再一次谈了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等问题。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

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

在这以后，国共关系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这一次国共斗争，是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中间波涛汹涌，高峰迭起，引起全国及全世界的注目。在斗争中，周恩来始终处于第一线，折冲樽俎，纵横捭阖，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斗智斗勇的较量。

十三、蒋介石掩饰败绩诿过中共， 周恩来以实为据严厉批驳

从1941年5月7日开始，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突然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进攻重点是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地区。由于国民党上层对抗战的阴阳不定，军队士气低落，何应钦又指挥失当，改变原有部署，调走部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炮兵团，在中条山实行单线防御，这样，国民政府的军队在中条山战役中遭受严重失利，丧失七万多人。国内舆论对国民党十分不满。

为了掩饰自己失败的责任，国民党当局玩起了诿过于人的一贯伎俩，大吵大嚷地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没有配合作战。5月11日，周恩来会见国民党

的代表刘斐（为章）。刘指责八路军在西北集结重兵，而面对日军向中条山的进攻不予打击，不配合友军行动。

周恩来当即反驳：

“我军在华北及各地配合友军打击敌人，从未停过。所获战绩，妇孺皆知，并为国际人士所称颂，何能叫不打击敌人？至于与日妥协、移兵西北、打通国际等等，纯属谣言。反之，半年来，尤其是近四个月来，反共成为高潮，辱我党为好党，我军为匪军，到处打入、骂人、杀人，在西北更是彰明较著。”

对于周恩来的慷慨陈词，当晚刘斐向蒋介石做了报告。第二天，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不得不表示：

“能配合行动就好，只要有成绩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自然发给，捉的人我会命令他们放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谈好。”

接着，蒋介石一再要求周恩来请示延安，答复配合中条山作战问题。周恩来告诉他：

“中共中央已致电八路军总部，拟具体配合作战计划，请先生通知卫立煌和阎锡山，直接同八路军总部联系。”

蒋介石连连表示称赞：

“这就好，这就好。”

但是，就在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见时，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在宴会上公然向新闻记者造谣：“中条山激战时，第十八集团军不遵命配合对敌作战。”周恩来在第二天即列举大量事实向中外记者斥了许孝炎的谎言，以后又一再要求国民党当局更正。18日，他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

周恩来马上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质问此种造谣出于何种用心。蒋介石不得不派刘斐向周恩来说明：他只希望八路军有战报，没有其他用意。

十四、周恩来：蒋介石靠不住，请让林彪 代毛泽东与之谈判

这时，由于国内军事反共失利，财政和经济危机加深，人民不满情绪增长，一些地方势力产生离心倾向，加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争取国共关系好转的政策，促使蒋介石不得不谋求两党关系的改善。

1942年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主动约见周恩来。第一次会面时，蒋介石说已指定张治中和刘斐同中共谈判，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将继续去延安。第二次谈话时，蒋介石表示想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周恩来也表示愿与张治中、刘斐商量解决问题的途径。接着，蒋介石转入正题，说：

“我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会面，请恩来电告延安。”

周恩来在同蒋介石会谈后立刻致电毛泽东，报告他同蒋介石会面情况。他分析蒋介石这次约见毛泽东，“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在其初步解决新疆及回回问题之后，他又自己北上布置，其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供中共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会蒋一谈；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周恩来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除非偕同出来的是朱德。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周恩来的第一办法。8月17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

毛（泽东）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安谈一次，随即倚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19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说：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并说关于他见蒋的问题，中央尚未做最后决定。

素知蒋介石为人的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见蒋，他认为：目前蒋介石虽然有了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但具体问题尚未涉及，对共产党的压迫毫无减轻，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觉得蒋、毛会面时机略早。8月19日，他将自己的考虑电告毛泽东，建议：

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毛泽东这时仍倾向于见蒋。他先后致电周恩来说：

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周恩来对毛泽东为了民族大义不惜冒险的胆略十分钦佩。但仍坚持他认为毛、蒋见面时机略早的意见。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电文写道：

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叫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安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安（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经过周恩来反复说明蒋介石的为人及意图，毛泽东同周恩来取得了一致意见，接受了周的建议。

9月14日，林彪从延安动身，前往西安见蒋。但因陕北在8月底下了一场数十年未有的大雨，山洪暴发，路面被冲坏，致使他到西安时蒋介石已回重庆。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10月13日，由张治中陪同，会见蒋介石。林彪提到“毛甚愿见蒋，唯适患伤风未来，毛即问蒋好”。蒋介石对林彪的前几段话表示有兴趣听，但一听提到内战危险，便不耐烦，频频地看手表，约林彪在走前再谈。

16日，周恩来应约同林彪会见张治中。林彪说明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提出了“三停三发两编”的要求，即：

“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

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怕，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张治中将话头打断，建议林彪：

“先同各方面谈谈，然后再同我来谈。”

以后，周恩来和林彪即同刘斐会谈，刘表示一切都可谈，但要周恩来、林彪同张治中谈。

很显然，国民党当局对于谈判并无多少准备，诚意也不足。根据这段时间接触中的种种迹象，周恩来作出明确的判断：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党间具体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他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分析：蒋介石及国民党人都倾向于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来代替全面的军事破裂，但是，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而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第二，他们所说的政治解决，“乃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于他们的领导，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第三，“他们的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力前提。”第四，他们决不先提要求（不仅一切人避开不谈，连张治中、刘斐也绝不先开口），而要看中共方面能作出什么让步。

周恩来根据对蒋介石的深刻了解，预测着蒋介石此时可能采取的种种对策，一、如不解决具体问题，则目前可在表面上缓和，而实际上绝不放松压迫；二、如愿解决问题，必须我先让步（必须是军事上，而且是防地上让步），我不可能有具体收获；三、如我们只作口头上让步（如表示愿听调遣，但有实际困难，一时尚难移动等），则他们亦照常口惠而实不至（如中条山战役时答应发饷弹，二届参政会时答应释放叶挺）；四、如我们能做某些地区的让步（如东江游击队改编、湖北撤退等），他们也可实行某些让步（如“三发”等），但不会实现我们的全部要求；五、如何向蒋提出全部要求，而不提愿听调遣事，“蒋必默然不语，必使关系弄僵，不利于形势之缓和”。

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采取这样方针：“尽力所能及将两方关系先在表面上弄缓和，再谈根本问题，从原则上说服国民党改变他们的观念（如军队、政权等）至少使他们不能反驳。”他主张根据同蒋介石谈判的特点，采取灵活的做法：在林彪第二次见蒋介石时，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谈原则不提具体问题，或提到愿听调遣，但有困难；而对张治中，除要求停打外，还谈防地问题，说明我们愿听调遣，但还有困难，或进一步提到某些防地未尝不可移动，但必须解决许多困难，就此提出要求。

对采取这些做法后的结果，周恩来作这样的预计：“如此，林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两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接洽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在防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

因周恩来对蒋介石分析得如此透彻，毛泽东由衷地赞赏，他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在28日复电周恩来：

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

12月16日，在接到蒋介石14日的约见通知后，周恩来向林彪嘱咐了见蒋时的谈话的要点。当天下午，林彪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林彪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新精神。谈到两党关系时，要求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

蒋介石是谈判场上的老手，顾左右而言他，只是端着老师的架子，许着

空诺：

“只要我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不让你们吃亏的。”

但是，蒋介石不许再提新四军的事。

12月24日，周恩来和林彪按照中共中央12月18日的指示向张治中提出四点：

甲，共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乙，扩编4个军12个师。丙，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

周恩来声明：如认为这些条件可谈，就留林继续谈下去；如果认为相差太远，请蒋先生提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张治中逐条记下，答应向蒋报告。

1943年1月9日，周恩来、林彪再次同张治中谈判。张治中提出：中共所提四项同国民党中央希望相距太远，与何、白皓电相距也远。张个人意见，认为党与政府两项问题不大，但军队为12个师太多，军队北移必须限期开动。

周恩来答复说：所提四项与皓电精神并无不合，距离只在军队的数目和移动的时间。周恩来将这些情况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毛泽东复电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随后，周恩来又会见张治中，逐条宣读中共方面最后的四项意见：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军队问题。希望编4个军12个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力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作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等），亦可商量移动。

张治中逐条抄录并核对后送交蒋介石。蒋介石立刻召开临时军事会议。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多是国民党军中的死硬派，你一言，我一语，大多表示不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蒋介石所希望的，当然是这样一种结局，心中窃喜，就说：

“好吧，再说吧！”

于是，谈判进入搁浅状态。

同天，周恩来应约同张治中谈话。张治中说：

“何应钦称前方摩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

周恩来回答：

“谈判暂时搁浅是我们意料中事，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决定回延，如要谈可再来。我自己也拟口延安，以便使延安了解外间情况，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并希望同林彪再见蒋先生一次。”

张治中将情况报给蒋介石，三天后，蒋即会见周恩来、林彪，表示允许周、林回延安。这是“皖南事变”后一年半来蒋介石第一次答应周恩来回延安。周恩来将这一情况迅速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6月5日和9日，连续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催他速回，并嘱途中“勿耽搁”。7月16日，周恩来与林彪一起回到延安。

十五、周恩来寸步不让，

蒋介石以退为进

1943年9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来华，以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同时促进国共合作，打败日军。11月7日赫尔利来到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商定了一个规定国共关系建立联合政府的协定。

这个经过讨论后议定的协定草案全文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10日上午，会谈继续进行。毛泽东对赫尔利说：

“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重庆，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

赫尔利也说：

“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

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了字，还留下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地位。中午，赫尔利和周恩来同机飞离延安抵重庆。

到重庆后不久，即11月22日，周恩来、董必武应约同蒋介石见面。略事寒暄，蒋介石首先表示：

“希望毛泽东和朱德两先生自己来重庆一行，我们好好谈谈。”

周恩来并不正面作答，而就协定问题单刀直入：

“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仍坚持的，并愿为他奋斗到底。”

周恩来看了木然而坐、毫无表情的蒋介石一眼，留下了余地：

“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

蒋介石听到这里，脸上有了表情，说：

“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

说到这里，蒋介石干咳一声，强调说：

“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

周恩来坚持原则，毫不退让：

“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是有自己的要求的。”

说到这里，周恩来加重了语气：

“当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

周恩来侃侃而谈，词锋凌厉，无懈可击，蒋介石辩不过周恩来，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

“是的，是的。”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宴请部分国民参政员时，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我不能接受，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言外之意，政府只能由他的国民党一家把持。

会谈已不可能再有结果，周恩来于12月7日飞返延安。8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报告了在重庆谈判的经过。

美国特使赫尔利为了完成罗斯福交给的使命，于1945年1月20日再次邀请周恩来或其他代表到重庆“作一短期访问”，于是，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再往重庆。1月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谈判，赫尔利参加。在1月30日的谈判中，王世杰、张治中口头上表示承认结束党治。

周恩来十分善于捕捉战机，马上问：

“如何结束党治？”

他们表示倾向于开党派会议。

周恩来再问：

“会议的成分和内容是什么？”

对方本无准备，被周恩来刨根问底儿地一问，就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

“成分应是三方，内容是讨论结束党治、共同纲领、改组政府。”

第二天，周恩来同王世杰继续会谈，再问王：

“是否结束党治？”

王世杰大概已向蒋介石讨得了底数，这次又改口了，说：

“形式上不能接受。”

接着，周恩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国防委员会是否为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合作组成的民主机构？它是否有权力通过纲领、改组各院及军事委员会？是否有最后决定权，不受国民党的干涉？

所有这些，王世杰没有蒋介石的意见，一个也回答不了，只表示愿意考虑。

2月2日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一个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交给王世杰，内容是：党派会议应包含国、共和民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王世杰也同时交出他所草拟的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

周恩来看完后，立刻指出：

“方案里没有改组政府的字样，应仍以协定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

王世杰辩解说：

“以国民党、外党派参加的政府即为改组政府的实质。”

这样，双方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经过上述谈判后，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竟以傲慢的态度宣称：

“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这样，就等于拒绝把谈判再进行下去。对于蒋介石的傲慢和无理，周恩来怒不可遏，决定立即返回延安。

但是，就在第二天，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王世杰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歪曲国共谈判真相的声明。周恩来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在次日又代表中共中央就国共谈判问题发表声明，谴责王世杰的声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说明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所以使谈判毫无结果。

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18日，周恩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

十六、面对特务寄来的子弹

由于周恩来在重庆期间积极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接触，宣传中共关于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非常深入人心，使蒋介石感到了威胁。为了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主张相对抗，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的宪政实施协商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他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并且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党一手包办下的“国民大会”。这是国民党把中国引向全面内战所采取的一个严重步骤。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谈判已毫无意义可言。7日，周恩来复函王世杰说：

“先生所提之政治咨询会议草案，亦与敝党意见相距太远，但尚准备将敝党之主张作成复案，送达贵方。以供研讨。忽得蒋主席3月1日公开演说，一切希望，均已断绝……此实表示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圜余地。敝党方面自无再具复案之必要。”

1946年1月10日，由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在政协开会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重庆）各界协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每晚除请代表讲演外，并听取各界人民的意见。1月16日晚，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讲话时，国民党特务故意在台下起哄，使讲演会不得不中途散会。17、18、19这三夜，捣乱进一步升级：特务先在会场上狂呼乱骂，然后成群结队呼啸而去；以后就大打出手，抛掷石块，杂以爆竹，有几个青年还被他们殴伤。26日，政协代表黄炎培的住宅被国民党军警宪兵搜查。

政协会议闭幕后，2月10日上午，重庆各民众团体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群众近万人，周恩来也来到会场。突然，国民党特务四处喊打，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被殴致伤，台下群众被打的也有数十人。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无耻行径，周恩来极为愤慨，当即偕同陆定一、邓颖超和刚被释放的廖承志等到医院慰问，并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12日，愚蠢的国民党特务给周恩来寄来恐吓信，内附手枪子弹一颗。周恩来毫不畏惧，立即将原信交《新华日报》公布，予以揭露。

周恩来将锋芒再次指向罪魁祸首蒋介石。13日，他和陈启天、李烛尘等11名政协委员一起，联名致函蒋介石，抗议较场口事件；并访重庆市长吴铁城，要求政府和国民党推出代表检查与协商处理办法。

通过上述斗争，蒋介石不得不有所收敛。

接下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1946年6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谈中再次作出让步，三方通过终止东北

冲突的训令和恢复华北、华东交通线的指令。但周恩来已看得很清楚：尽管共产党为了挽救和平一再让步，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已经下定，决不会因此停步，“谈判将临最后关头”。当天，他致电中共中央：“我在停战、交通及美方职权上均做了某些让步，今日大致通过三个方案，足够表示我方愿求解决，留下的争论在整军，蒋绝对不会放弃他的打算。”他不能不作应付破裂的准备，要求：“请中央批准我在此相机行事，以便使谈判破裂做得愈于我们有利愈好。”

中共中央在第三天即复示：“你可根据既定方针见机行事。”

果然，蒋介石接着又坚持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白城子、热河、察哈尔、烟台、威海卫，并要中共领导的部队离开所有铁路线。这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周恩来的严正拒绝。

对这一阶段的谈判中蒋介石的打算与心态，周恩来后来有一段总结性的分析：

“东北3、4、5月大打，从沈阳打到长春，停战、政协都被破坏了。但为什么又有6月休战呢？因为国民党占了长春后，兵力分得很散，没有兵再进。当时我们在东北占了有利的地位，山东、山西收复了几个伪军占领的城市，这样国民党需要在东北实行几个月的休息，而在关内动手大打，于是有东北休战。23天的谈判，讨论了许多问题，我们还打算再让一二个地方以保全广大的解放区。在停止东北战争、恢复交通、整军等问题上，都做了许多的让步，但结果还是破裂，中心问题仍是政权问题，根据地问题。蒋在形式上是要我退出苏、皖、承德、安东、冀东等地，但他承认的只是黑龙江、兴安两省及嫩江半省，华北只是临沂、大名、上党等几个地区，想把我們完全隔开，先限制在这几个地区，然后再来消灭我们。”

事实使人们一步步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在经历八年抗战后渴望进行和平建设这个愿望出发，是尽力争取实现和平的，并且一再作出了让步，做到了仁至义尽；但事情不能由中国共产党单方面来决定，蒋介石、国民党却总是迷信自己的实力地位，层出不穷地横生枝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提出种种明知中国共产党无法接受的要求，蓄意把和谈导向破裂。周恩来通过自己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谈判，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了其反动嘴脸。

十七、南京斗法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和平谈判成功的希望已经断绝。但国民党还想利用谈判作为烟幕来掩盖内战的扩大，并想把和谈破裂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共产党，因此并不宣布停止谈判。这样，谈判在表面上仍继续进行，但它的性质已和前两个阶段不同。

对这个阶段谈判的特点，周恩来作过这样的概括：“这个阶段是表面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一方面是我们坚持政协路线，另一方面是蒋不断地破坏它。我们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这个方针，连马歇尔也对叶剑英参谋长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7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

这样，周恩来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当局，在敌人的心脏南京进行了更为艰苦复杂的斗争，直到1946年11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的十余人回到延

安。

这是一种在异常特殊条件下进行的谈判。国共破裂已成定局，环境更加险恶，对手是富有政治经验的反革命老手。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蒋介石是十分狡猾的，时而施加高压，时而又美言引诱，力图使你犯个错误，以便把破裂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周恩来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坚定而沉着地同对手周旋，一次又一次成功地用事实来揭露国民党，教育了群众。

7月2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一起去会见蒋介石。这是他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一次会见蒋介石。蒋介石重复提出，中共要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他说：

“这个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

蒋介石尤其着重于要我党我军让出苏北，说：

“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胶济路如不让出，则交通常遭破坏，就无法安定。北宁路无承德掩护，也不安。”

最后，蒋介石以很友好的样子，笑吟吟地说：

“如你们让出这些地方，全国人民都说你们好，你们不会吃亏的。”

周恩来呢，以软对软，也十分和气地回答他：

“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会，谈改组政府。”

周恩来对蒋介石所提问题逐条给以答复，并对驻军方案提出具体建议。但蒋介石的主张也是铁定了的，对周恩来所提方案丝毫不予考虑。于是，双方因“无话可谈而散”。本来，周恩来还想同蒋介石谈五师、办报、放人等问题，也因看到不可能有任何结果而没有提出。同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又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决定在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决定，事前既没有同中共方面商议，也没有向第三方面人士打招呼。

对国民党这种一党专政的行为，周恩来在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并郑重声明：

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敝方不受贵方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并仍坚持速开政协综合小组商讨国大及其有关问题之主张。

中国民主同盟也为此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但是，蒋介石认为此时其包围解放区的战略部署已经形成，内战形势对他有利，根本无意于实现和平，不但不肯就此罢手，要价反而越来越高了。8月6日，上个月14日刚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约见周恩来，说，蒋介石同意先成立一个非正式小组，由司徒雷登和国共双方商谈改组政府。但在商谈前中共必须接受下列五个条件：一、让出苏皖边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与承德以南；四、东北在10月15日前退至黑龙江、兴安及嫩江等省与延吉；五、鲁、晋两省须退出6月7日后占领地区。否则，停战、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

司徒雷登问周恩来：

“有没有商量余地？”

周恩来断然回答：

“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

他又反过来问司徒雷登：

“蒋何以如此无理，愈要愈多？”

司徒雷登只好如实说：

“蒋说形势已变。”

蒋介石是一个十分迷信实力的人，其政治就是强权政治。周恩来一针见血地说：

“蒋之错觉为：两三月后，他可从军事上进占苏北、胶济线 热南、同蒲南段、津浦北段、安东、哈尔滨，通过谈判得到当然好，通过打仗得到最好。或者边谈边打，拖成也好。”

司徒雷登两手一摊，耸耸肩，说：

“如此和平无望，似非内战不可了。”

周恩来说：

“这是蒋的方针。我们是无条件停战，依照政协改组政府 6 月协议，我们让步很多。今蒋要求无厌，故内战责任应由蒋负之。”

当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这次会谈情况。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说：“蒋之五条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你的答复很对。我各解放区正在动员全力粉碎蒋介石进攻。”

这以后，马歇尔、司徒雷登宣布谈判陷入僵局，调处困难。国共之间的谈判一时陷入停顿状态。

周恩来心里很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重开谈判，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第二天，他复信说：“我并非不欲回南京与阁下等共商停战之确切办法者，唯因政府当局不仅无停战表示，且更变本加厉，正在积极进攻张家口、哈尔滨、安东与苏北各地不已，若再冒昧商谈，徒骗人民，而为政府放手大打之烟幕，于真正和平决无补益。故宁留上海，以待三人会议之召开。”

30 日，周恩来再次向马歇尔送致备忘录。同日，他和董必武等又以中共代表团名义致函蒋介石，受命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函中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事态既已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周恩来认为有必要迅速向国内外公布事实真相，使公众了解国民党当局正在蓄意制造全面内战，使人民在精神上有所准备。10 月 1 日下午，他在上海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的有中外记者七十余人。周恩来一开始便说：

“从上次 8 月底和诸位见面后，过去了的 9 月份正如所预料的一样，是在‘拖中大打’的局势中过去了。全国内战越打越大，现已打到察哈尔大门。如果政府军不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进攻，我们便认为蒋主席决心破裂，最后放弃和平谈判，一切严重的后果和责任都应由国民政府负之。”

至此，广大人民群众终于看清：只要国民党攻占张家口，那便是和谈的正式破裂。蒋介石如果还有一点要保持中国和平的想法，他就决不能再这样做。

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已完全陶醉于他在军事上的表面优势，不顾共产党人的一再警告和各种建议，也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悍然于 10 月 11 日下午攻占张家口。这一下，蒋介石更加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当天下午就宣布国民党单方面决定召开的国民大会在 11 月 12 日如期举行。

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既是坏事，也是好事，那就是打掉了一些中间人士的和平幻想。本来，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在 10 日还赶来上海，想劝周恩来回南京继续谈判，周恩来没有马上拒绝。梁漱溟还颇为兴奋，在 11 日搭夜车回南京。但第二天早晨，他在南京车站下车时，看到报上赫然登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对记者们脱口而出他说了一句当时传诵一时的名言：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已没有什么可谈的了。11 月 12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政治谈判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还要做出一些姿态，装做还是要和平的样子。于 15 日一早，国民党派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到上海，找民主同盟、青年党的代表商谈，说是要邀请留沪的政协代表，包括共产党的代表，都到南京去，重开和谈，希望第三方面代表尽力调解。第三方面一些人士仍抱着一线希望，想从绝境中挽救和平。当天下午，张君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一同到思南路周公馆去见周恩来，劝说周恩来回南京。

周恩来已经作好撤离的准备。但由于考虑到第三方面不少人士对和平还抱一线希望，同时，也需要用事实对他们进行教育，因此，最后还是同他们一起到南京去了。21 日，他乘美军专机去南京，李维汉和许多第三方面人士乘民航飞机前往。

此时此刻，周恩来和这么多第三方面人士到南京去，各报都大事刊载，许多人对它仍抱有一线希望。谁想他们到南京后，蒋介石见面时握完手就说：

“我等你们很久了，你们赶快商谈吧，政府方面由孙科作代表，我原定前两天去台湾，为了等你们，今天才能走。”

说完，蒋介石即离席告退，接见时间前后只有 8 分钟。

大家都知道，在国民党方面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蒋介石作主，不得到他的同意，什么重要问题也谈不成。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开，许多第三方面人士基本明白了怎么回事，心一下凉了大半截。

蒋介石一边以会谈作幌子，一边仍然干着进攻解放区的勾当。正式的和谈还没有开始，国民党军队在 10 月 25 日又攻占了东北解放区安东。第二天晚上，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到梅园新村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当梁漱溟透露国民党军队攻

占安东的消息时，周恩来正在喝茶，盛怒之下，他猛地放下手中的茶杯，十分愤慨地说：

“我们要回延安，从此以后不再谈了。蒋介石和我们打了十几年交道，并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要怕国民党的压力，当初就不会有共产党！”

黄炎培、梁漱溟力劝周恩来暂时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误解。黄、梁并表示：

“第三方面以后有什么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得同意。”

这时，国民党军队加紧包围延安，政府驻延安联络官已准备撤退，国民党蒋介石彻底决裂的架势已明显地摆开。11 月 6 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

目前的工作在揭穿美蒋的欺骗，打破第三方面的幻想，故稍留几天再回延安。

11日下午，蒋介石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三天召开，目的只是想再多拉几个第三方面的人进去。针对蒋介石的企图，周恩来立即采取对策。很快，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发表书面谈话，指出对此不予重视，“国民党如果还有丝毫尊重政协决议的诚意，那就不是延期，而是停开其一党包办之国大。”这一谈话对第三方面影响很大，14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

由国民党一手把持的国民大会终于在11月15日上午开场。国民党以外，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由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第三方面的许多人没有参加。蒋介石多拉第三方面人士参加的图谋归于失败。

国民大会召开的同一天，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对蒋介石所操纵的一党国大予以揭露，指出一党“国大”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和平商谈的道路。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政府内战的政策未变。中共愿同一切真正为民主努力的党派和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16日，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对他说：

“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人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周恩来并告诉他，自己将回延安。

原来作为调停人的马歇尔看到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大既已召开，再没有理由挽留周恩来了，表示他将为中共人员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对这一阶段的谈判，周恩来以后做了这样的分析：7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

这场周恩来与蒋介石的斗谋斗法，又以周恩来的胜利而告终。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完成了自己在南京的使命，乘飞机返回延安。

十八、“幸亏总理没有坐这架飞机”

1949年12月，蒋介石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离开大陆，飞往台湾。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重新当上“总统”的当天，就亲笔写下三道手令，要杀大陆几个重要人物，以解被赶出大陆的心头之恨。其中主要是向周恩来总理下毒手，试图造成整个大陆的恐慌。

而周恩来还是希望化敌为友。1954年4月，当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新闻联络官熊向晖一口拒绝。事后他向周恩来报告，并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

周恩来问道：

“为什么？”

熊向晖回答：

“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相。”

周恩来皱了皱眉头说：

“不能抽象他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相呢？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家造成‘两个中国’的假相？”

周恩来的批评真诚、有理。

熊向晖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

“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

周恩来指示：

“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接着，周恩来还关照熊向晖，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大陆记者，向他做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意参加新闻发布会，中国代表团欢迎，有什么困难，也可以酌情帮助。周恩来特别提醒，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对周恩来这种大度的姿态，蒋介石却以暗杀相报。听说周恩来在 1955 年 4 月要出席亚非会议，并包用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蒋介石喜形于色，认为机会来了！

蒋介石把任务交给保密局的毛人凤，具体执行谋杀的大特务是谷正文，他是“特种工作”侦防组组长，诡计多端，嗜杀成性。他首先派特务赵斌丞到香港刺探周恩来的准确行踪。赵斌丞到香港后，通过各种关系，果然探听到了中国代表团确实在香港定下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作为载运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专机。为了实施这一罪恶计划，台湾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煞费苦心，专门制作了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模型，精心研究。与此同时，谷正文亲赴香港，不惜重金，以 60 万港币收买了香港航空公司一个叫周梓铭的雇员。真乃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周借飞机加油之际，让一名特务穿上机场制服接近飞机，将一枚特制的定时炸弹偷偷放入机翼中，很快，飞机呼啸着腾空起飞了。

其实，在飞机起飞之前，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已经收到重要情报，说蒋介石的特务要在香港启德机场给飞机安放炸弹。他把情报交给周恩来。此时周恩来正在昆明，看完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4 月 11 日，传来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南海上空爆炸的消息。北京大为震惊！世界大为震惊，纷纷谴责这种暗杀行动。

然而，蒋介石的阴谋并未得逞。4 月 5 日晚上 12 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的侦察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再次证实“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第二天凌晨 3 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立即把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召到办公室，指示他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措施。凌晨 4 时，公安部派人和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员一起，紧急飞往广州。第二天一早就潜入香港，对这个惊人的情报进行核实。但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

4 月 9 日晚上，刚做过阑尾手术的周恩来从昆明打回电话到中南海西花厅，向邓颖超道别，并隐约透露了此间可能遇到一点麻烦。但他还是宽慰邓颖超：

“蒋介石太蠢了！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我去万隆，当年在重庆我什么险没冒过，这点威胁能吓倒我？！”

虽然如此，邓颖超听了心中还是有几分不安，专门写去一封信，嘱咐他多加小心。

周恩来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是因为他和陈毅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十九、万隆，暗杀队逼近周恩来

蒋介石一计未成，再施一计。1953 年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等人，这时秘密潜回了万隆，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于组成的铁血团，也秘密派遣行动小组到万隆，开会、筹款、布置破坏。

从仰光绕道雅加达的周恩来和陈毅，准时出席了 4 月 18 日的亚非会议开幕式。

第二天，吃罢午饭，中国驻印尼的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外交部的陈家康等人正在下榻的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急驶而来，交给黄镇一份特急件。黄镇拆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然后交给陈家康等人，他们看了也都显得十分紧张。

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中国大使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3 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 28 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 3 月 10 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枝，而且领到印尼币 20 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 20 万盾，打中周恩来者加发 40 万盾。

好残忍的暗杀阴谋。他们几个紧急研究对策，决定写一个备忘录，递交给印尼政府。起草后，先送给陈毅看。陈毅看后气愤地说：

“他们还要搞暗杀！”

说着，陈毅把备忘录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也同意：

“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代表团内部开了紧急会议，人人要对周恩来总理的安全负责。陈毅激动地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于是，周恩来每次活动，都采取了安全措施。经过复杂地段时，杨奇清就指定外交部的申健和康矛召，在周恩来前面走，对他们说：“你们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遇到人多，他自己就和黄镇大使一左一右保护周恩来。

这一次，蒋介石又没有得逞。

二十、“台湾抗美就是立功”

1958 年 9 月 8 日、10 日，周恩来两次接见了来大陆采访的文史学家、

香港记者曹聚仁。此时我军正在炮击金门，周恩来托曹明日返港后以最快的办法转告台方：

“为了宽大并给予蒋方面子，我们准备以七天的期限，准其在此期间由蒋军舰艇运送粮食、弹药和药品至金门、马祖。但前提条件是决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否则我们一定要向蒋军舰艇开炮。内政问题应该自己来谈判解决。可以告诉台方，应该胆量大点，学学西哈努克的做法。美国可以公开同我们谈，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再来一次公开谈判呢？”

10月13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曹聚仁。毛泽东首先说：

“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们合作。我们赞成蒋保全金门、马祖的方针，只有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

毛泽东讲后，周恩来讲得更直接：

“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它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团结起来，最好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周恩来这里所说的小三角，是指此时台湾的三位掌权人物蒋介石、陈诚、蒋经国。

14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指出：

“美国国防部长到台湾是想压蒋介石减少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军队以至完全撤退，也就是想以金、马换取台湾、澎湖，并永远占领台湾、澎湖，这样一个办法我们不赞成，蒋介石也不赞成。我们不赞成是因为不能让美国因此换得一个冻结台湾海峡的局面。我们的每一方针，简单讲来就是要使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仍留在蒋介石手里，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里。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我们则是‘宁予家奴，不予外人’。我们把台、澎、金、马留在蒋介石那里总有一天会回来。”

10月17日，周恩来再次约见曹聚仁，而后审定《中央关于当前对美斗争形势的通知》稿。通知中指出：我们现在的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扩大美蒋矛盾，并且利用蒋不肯撤出金、马来拖着美国。我们宁可使台、澎、金、马多留在蒋手上一个时期，决不能让美国拿去。

由上述不难看出，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在与美帝国主义、蒋介石的斗争中，首先考虑的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并为此施谋用略，捭阖纵横。

“一定要保证李宗仁先生安全归国” ——周恩来与李宗仁

李宗仁（1891—1969）广西桂林人，字德邻。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1908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6年在护国军第六军（桂军）任排长。护法战争时，随粤桂联军入湘作战，任营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后回广西，任护党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1937年8月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组织指挥台儿庄会战，歼日军万余。1943年后，任国民党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辕主任。抗战胜利后，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948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同年底去美国。1965年7月回归祖国。这一爱国举动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在十年内战的烽火岁月，李宗仁和周恩来曾是战场上的主要对手。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中，为了民族大义，周恩来又是李宗仁抗战的积极支持者。台儿庄一战，使李宗仁名声鹊起，誉满全国，然而，此战胜利，却包含着周恩来的极大心血：军事上派张云逸率部策应，谋略上派张爱萍送去锦囊。共和国的黎明时分，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担心着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处境，曾建议他在南京留一嫡系师，以在解放军过江时率部起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然而，李宗仁并未照着去做，以至异国他乡漂泊数十年，成为一大憾事。李宗仁的归国之旅，更是周恩来所精心策划。其中险阻重重，杀机阵阵，但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海外游子终于安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一、李宗仁一战成名，却包含着周恩来的极大心血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更是不可一世，长驱直入把魔爪伸向中国的南方。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其他领导同志认为必须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而在东部应是李宗仁先生麾下的桂系军队担当主力。关于此点，周恩来曾在武汉和白崇禧将军议过此事，白将军应允赴前线向李宗仁先生面陈。

当时，津浦路的形势日趋紧张，李宗仁先生的最后决策尚不明朗，蒋介石的嫡系军队置敌于不顾，向南退却以保存实力，但在李宗仁的战区里还有各色部队，人们是否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更主要的，这些部队同武器装备精良、乘胜恃勇的日军对阵，是否有取胜的把握？周恩来和叶剑英决定派此时已调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张爱萍前去再做些工作并了解情况。周恩来把形势和掌握的确切情报一一向张爱萍讲了。他认为，李宗仁先生抗日爱国，桂系军队骁勇善战，担当此任是有把握取胜的。

最后，周恩来鼓励张爱萍说：

“相信你能不辱使命，说服李宗仁先生。”

张爱萍担负周恩来交给的使命，一路辗转到了徐州，按照周恩来的布置，首先向李宗仁先生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接着与之分析了有关此次战役的主要情况：

“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只想保存实力，置国土沦陷人民涂炭于不顾，失去了民心。司令长官崇尚民族气节，广西军队又以雄武善战名扬四海，其他地方军来到前线，也是为了抗日，亦可扬眉吐气，故求战心切，晓之以大义，定能同仇敌忾，协力奋战。日军如此蛮横无道、耀武扬威，实在欺中国无人。但骄兵必败，且孤军长驱直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击之良机。”

说到这里，张爱萍看李宗仁已经越听越有兴趣，就进一步分析激励道：

“ 济南徐州一线地形复杂，乃伏兵之地。据我们所知，以司令长官统率的兵力在此布阵定能获得胜利，我八路军在华北区还可作战略配合，歼敌寇扬国威，振民心垂青史，万望勿失此良机。 ”

张爱萍根据周恩来的布置说的这一席话，对敌情我情分析得透彻清楚，并恰到好处地赞扬了李宗仁的爱国精神，直说得李宗仁激情满怀。

“ 请转禀周主任， ” 李宗仁的颜面上泛着激奋的神情，慷慨激昂地说，“ 请他候我捷音！ ”

1938年7月6日，李宗仁由潢川第五战区指挥部回到武昌，入东湖疗养院治疗牙疾。原来李宗仁于1916在林虎手下当排长时，从肇庆东下讨伐龙济光，牙床为流弹所伤，碎牙迄今尚未取出，以后因戎马倥偬，未做彻底治疗。这一次在徐州指挥作战，宵旰辛劳，从而诱致牙床肿痛。白崇禧劝他入东湖疗养院检查，一经割治，20年瘤疾霍然而愈。此时适逢周恩来也住在东湖，所以特在寓所设便宴招待李宗仁，商谈加强团结抗战问题。此次会晤，周恩来征得李宗仁同意，在五战区成立了一个抗战工作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派李一范当政治部主任，李相符当副主任，在河南信阳一带展开活动。从此以后，五战区内的抗日力量得到很大发展。

二、周恩来传出消息：请李宗仁先生回来看看

1965年，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排除种种阻力，从美国回归祖国，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正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完成的。这要首先从周恩来安排李宗仁的老部下、同乡程思远从香港秘赴北京说起。

1956年1月31日午后，一位过去曾是程思远的部下现在左派报馆工作的广西同乡陪着一位总编来看程思远，手上还带来一份刊着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客人希望他对这一篇重要文献提出意见。

由于多年离开政治生活，嗅觉不灵，程思远草草地看了一遍这篇报告，提不出什么意见。客人们闲谈了一会儿，便带着失望的心情告别了。

两个多月后，4月23日，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客人再次登门，坐定以后，寒暄几句，那位总编就开门见山地说：

“ 我们接到北京的电话：任潮（李济深的字）先生希望你到北京去谈谈，如果程先生同意，来去保证秘密，也不办任何手续

这个问题提得太突然，程思远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想了一下说：

“ 请允许我考虑一天如何？ ”

次日，双方依约在九龙太子道一间咖啡馆会面。程思远答应到北京，相约不带行李，由那位总编派一个人陪他于当晚乘船往澳门，从那里去广州，拱北关将有专车迎候。

行程一切顺利，4月29日，程思远从广州乘火车至北京。是日，黄绍竑在全国政协开会。散会时，周恩来总理告诉他说：

“ 程思远今天到北京。 ”

程思远来京后，首先被安排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其后连续几天受到老朋友李济深、蔡廷锴、黄绍竑的宴请。5月6日晚，又在张治中先生家里吃饭，他是程思远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处长时的中央团部书记长，彼此共事多年。此外，他又是李宗仁代总统时的和谈代表团团长，所以对程思远特别照顾。临行时，他说：

“ 明天下午3时，政协礼堂三楼有一个酒会。通常周总理是不参加的，

但是明天他要去那里同你会面。”

程思远心里一阵激动，总理亲自与自己会面这是何等的荣幸啊。

5月7日下午3时，刘仲容陪程思远到政协礼堂，对程说：

“周总理曾问过我：‘程思远怎样？你三言两语答复我。’我说：‘当年在白崇禧那里，我们有明确分工，他做右派工作，我做左派工作，但他并不妨碍我。’”

在酒会上，张治中要程思远同他在一起。不多时，周恩来健步走来，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一面扬起右手打招呼，一面径直地走到程思远面前。张治中正准备介绍，周恩来已同程思远握手，说：

“程先生，欢迎你回来，我们1938年在武汉见过面。”

程思远十分钦佩周恩来的记忆力，是的，他与周恩来在武汉见过面。那是1938年初，程思远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办公室当秘书。一天，白崇禧要他去请周恩来对驻在蛇山玉冰堂的广西学生军讲话。这是他与周恩来仅有的一次谋面。而今事隔18年，周恩来还清楚地记得。

周恩来和蔼地问道：

“到不到东北去看看？那里已办了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和化学工业。”

“下次再去吧，这一回我不准备待得太久。”程思远想到此次没有带来替换衣服，所以这样说。

“如果你多看一些东西，到海外后就有更多的讲话资料。”周恩来以和善的目光注视着程思远，但立刻又改口说：“至少你要看看北京吧！”

这时，周恩来对站在周围的刘斐，余心清、屈武、刘仲容、刘仲华等人说：

“你们各位同思远先生都是老朋友，要陪思远浏览一下北京景色，并稍尽地主之谊。”

说到这里，同程思远握手告别说：

“我们改天还要谈谈。”

5月13日晨，程思远接到通知，说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他吃饭。上午11时，程思远依照预先的安排，由中南海西北门进入，到右面一间平房拜望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他在抗战时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而程思远当时是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兼三民主义广西团支部书记。在程思远主持的工作部门中，没有引起任何国共之间的摩擦，所以他很知道程的为人。程思远深信，自己此次来京，他是起了影响作用的。

中午，沐浴着北京的暖阳，程思远在李克农陪同下走进紫光阁，周恩来首先迎上前来同程握手。在那里，一些过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赫然在座，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还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董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可谓群贤毕集，极一时之盛。

周恩来首先讲话。他说：

“这一次程思远先生到北京，是建国以来我们同国民党人第三次会晤。第一次由叶帅（剑英）在广州与张公权接谈，我们保留他在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希望他回到祖国来，结果他到澳洲后，一去不返了。第二次是我接见龙绳武，希望他到海外做些有益于祖国统一的工作，后来他去香港，却溜到台湾去了。这次程先生到北京，我们很想借此机会深入地谈谈。现在首先吃饭再说。”

说着，周恩来首先举杯祝酒，欢迎程思远回大陆观光。杯光酒影，壶盏交错，各位陪客也纷纷向程敬酒，程思远如沐春风，心情十分舒畅。

在宴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了李宗仁先生 1955 年 8 月提出的对台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赞成李宗仁先生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说：

“台湾重新归还祖国以后，还需要国民党的军队保卫嘛。”

他对白崇禧批评说：

“白健生颇自负，其实政治上急功近利，没有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信，因此被骗到台湾去了。”

饭后，周恩来开始有系统地向程思远介绍国内外形势、对台政策方针以及对海外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期待。他已经当了七年的国务院（最早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对当前国际关系了若指掌，所以侃侃而谈，头头是道。特别是他态度诚恳，平易近人。给程思远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觉得周恩来是一个非常干练的、杰出的政治家。

谈到中苏关系时，周恩来说：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第一，我们是自己打出来的；第二，我们国家主权是独立的，领土是完整的。不仅如此，在 1937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中，曾对大连、旅顺以及中东、南满铁路给苏联予以一定的特权，这一切，我们以后都纠正过来了，这是人所共知的。”

谈到中美关系时，周恩来说：

“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可以经由中美两国讨论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

谈到国共关系时，周恩来说：

“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那就是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也曾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尽管这些年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起手来，团结对外。”

接着，周恩来说：

“对一切爱国的人们，我们都本着‘爱国一家’的方针，欢迎他们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可以回到大陆探亲访友，参观旅行，或者派人来大陆考察，只要在事先说明，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并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最后，周恩来要程思远邀请李宗仁、黄旭初、夏威、张任民等各位先生回来看看。

程思远理解，周恩来上面的话，是对海外国民党人的一次广泛号召，意义重大而深远。

次日，黄绍竑约程思远到新侨饭店饮茶。黄见面后即说：

“你此来得到周总理这样的重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程思远个人亦深有同感。

后来，情况反映到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那里，却引起他的严厉批评。他在复程思远的信中说：

“此行关系重大，事前竟不相谋，如此轻率从事，实属令人不解。”

1956年，是新中国自解放以后最好的年头之一，到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一派政通人和的大好景象。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如狂风骤雨的政治风暴以后，开始向海外招手，中共对民主党派也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中共“八大”中已确认阶级斗争是非主要矛盾，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前途光明和充满希望的一年。可是曾几何时，风云突变，1957年“反右”运动搞得过火，把一些本来是正确议论（如龙云先生批评苏联）作为右派言论，把一些党外知名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且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片面化、绝对化。从此“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党外人士不敢讲话了。程思远对劝请李宗仁回国一事只好暂时不提。

1958年末，程思远的女儿林黛凭《金莲花》、《貂蝉》两片得到最佳女主角奖以后，去纽约哥伦比亚读书，课余之暇，经常到李宗仁先生家里做客。那时李宗仁已搬到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从曼哈顿开车约40分钟便到，李那时只与夫人郭德洁住在一起，他看到林黛到来，一种念旧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与程思远又恢复通信，商讨天下大势。

李宗仁在一封信中提起，他藏有许多书画，不忍其将流落异邦，拟献给祖国以寄故园之思。与此同时，他又托一个广西同乡、《大公报》社长彝费民带信给李济深先生，明示他有叶落归根之想。

1959年秋，程思远从海外回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还来不及去看李济深，李却于10月6日因患脑瘤去世了。程思远到东北参观后，于10月24日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时仅张治中、邵力子在座。周恩来说：

“李宗仁先生回国定居的时机尚未成熟，建议他先走访欧洲。同时，也请思远先生向李宗仁先生谈谈回国后的见闻。至于他给国家献文物，是爱国主义的体现，政府可以接受。”

次日，周恩来又邀程思远陪他一起乘坐专列火车去参观密云水库，同行的有廖承志、罗青长和日本客人松时廉三等。这一天完全不谈政治，显得非常轻松。

1960年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回到香港，程思远告诉她：

“德公（李宗仁的字德邻）送给国家的一些历代名画，经有关部门鉴定，有的是贗品，但政府体念德公爱国的热诚，要派我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并送给他一笔旅费，以壮行色。”

郭德洁听后，心中不免一阵激动。

当交给郭这笔钱时，因数目很大，带在路上十分危险，于是由程妻开车送程和郭德洁到中国银行前门，程下车后，她俩就到后门去等候。程领了钱在后门上车，交给郭德洁，然后送她回去。程思远与郭德洁总是采取这种方式会晤，而从来不到酒楼饭店，以免被人跟踪。

郭德洁居留香港一个月，将要返美时，与程思远约定，以一种比较安全的方法通信。即使程同李宗仁来往的电信被检查，也不至于泄密。后来这一点一直做得很好。

196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年轻的肯尼迪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尼克逊，成为白宫的主人。一度与民主党有历史关系的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的适当时机。

刚巧在这个时候，于纽约大学执教的张歆海教授经龙绳文介绍，来给李宗仁划筹献策。张歆海从清华大学到哈佛大学，是留美学生中英文造诣最好

的三人之一。肯尼迪是哈佛出身，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邦迪做过哈佛大学文学学院院长，与张歆海是前后期同学。由于有这些历史条件，再加上人们对麦卡锡迫害进步人士抱有强烈反感，所以李宗仁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希望。

在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就职以后，李宗仁在张歆海的帮助下，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首先对他就任美国总统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希望在他的就职伊始对中美关系有所改弦更张。李宗仁在函中表示：自1949年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它既不切实际，又不合于美国利益，如不承认北京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则美国的亚洲政策，势将窒碍难行。

肯尼迪在复李宗仁的信中首先表示感谢，唯谓对华政策关系重大容当缜密考虑。李宗仁将来去信函寄给程思远，要程思远派人送交周恩来。程即照办转交。

1961年6月，周恩来要程思远到北京一行，程思远衔命由港北上进京，很快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他对程说：

“李德邻先生对肯尼迪所抱的期望太高了，目前展示在肯尼迪面前的问题太多了，权衡轻重，对华政策的修订还不会摆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

接着，周恩来要程思远寄语李宗仁，不要对美国过早地抱有幻想。周恩来重申：

“希望思远兄到欧洲去同李宗仁谈谈。”

1963年7月14日，李宗仁在米兰出版的《欧洲人报》上发表了一篇谈话，全篇内容贯穿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报社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向李宗仁问道：

“西藏和邻近地区（意指印度）不久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宗仁回答（由张歆海任翻译）：

“西藏一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所谓‘特殊的’国家。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去年冬天中印边境发生的事情。中国地图向来是把边界划得比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中国从来不承认这个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更靠南边一点。直到1951年为止，所有世界地图都把该地区划为中国领土。甚至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的地图也表明那里是属于中国的。如果该地区是中国的，则中国自可在那里行使主权，而不是侵略。”

“现在让我们来谈蒋介石吧。”

“我不能谈论蒋，说他的坏话是绝对不礼貌的。”

“那么就说说点好话吧。”

“关于蒋，我只能引用史迪威将军常说的一句话——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们都是失败者。”

“许多年来，蒋一直在领导台湾政府，但他常识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不会总结经验教训，每年他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光复大陆’，这完全是绝不可能的一桩事。”

“蒋对我没有像我对他那样的友谊。自1949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打扰他，我一直没有开口，而蒋则想些可怕的事情。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他怎能抹煞事实呢？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这篇谈话，无论李宗仁的初衷如何，但为其回归祖国奠定了很好的政治基础，以至在回归后不仅能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欢迎，也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三、深夜，周恩来密授“四可”原则

程思远牢记周恩来交给的历史使命，经过与李宗仁在通信中反复商量，李宗仁同意在1963年冬去瑞士同程思远会晤。程思远得此确讯，即于11月到北京向周恩来请示。

到京的次日，周恩来即约程思远到紫光阁吃晚饭，在座的仅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饭后，周恩来委托陈毅陪程在国务院礼堂看电影。到时，陈毅夫人张茜已在座。当晚看的是两部纪录片，一部是反映当时华北大雨成灾军民奋力救灾的情况；一部是黄山风景介绍。陈毅为人风趣，又十分健谈。他对黄山奇峰异松解说得非常细致，谈得头头是道，使人听起来津津有味。

程思远这次到北京，已不像上次那样住北京饭店，而是住在东总布胡同临时设置的一个招待所里，这表明周恩来要求此行必须十分保密。11月15日深夜，程正在酣睡中，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看手表正指着凌晨3时20分。打开房门一看，原来是罗青长副主任，他说：“很抱歉这个时候打扰您，请快穿衣服，总理在中南海等你。”

其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开会，周恩来日理万机，宵旰焦劳，只有在深夜才能抽出时间来接见程思远，这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生活紧张忙碌。郭德洁后来誉他为“铁人总理”，当是十分中肯的赞誉。

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周恩来首先抱歉地说：

“只是此时有空，把你深夜叫起，当然也是为了保密。请你先谈谈李宗仁先生的近况。”

程思远谈完之后，概括地说：

“德邻公的想法就是两句话：怀念祖国，不愿老死异域；叶落归根，向历史作最后交待。”

周恩来要程思远带“四可”、“四不要”的原则及过好“五关”的要求去欧洲同李宗仁商量。由于不便笔记，程思远虽然年大记忆力差，但还是坚持口诵多次，将其原原本本地背下来。这“四可”原则是：

- 一、李德邻可以回国看看，以后仍回到美国。
- 二、李先生返美以后，仍可以随时回来，祖国永远向他开着大门。
- 三、李先生可以离美住欧洲一个时期，以后再回来看看。
- 四、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

“四不要”是：

- 一、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
- 二、李先生不要介入美台关系。
- 三、李先生不要介入国共关系。
- 四、李先生不要介入第三势力。

“五关”为：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

这“四可”、“四不要”原则，表明了祖国对其游子的无比宽大和关怀。李宗仁于1963年12月14日从纽约飞抵瑞士苏黎世，住在一个旅馆里，

受到他的一位亲戚 K 先生的接待，程思远因为签证延误，迟一星期赶到，但此事歪打正着，却恰恰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特务的发现和追踪。

原来李宗仁于 1963 年 4 月 14 日从住处来到新泽西州的纽华克移民局，由该局副局长出来接待。李宗仁对他说：

“我想在年底前到欧洲去旅游一次。”

两周以后，该局便把签证手续办好，看来一切顺利。

郭德洁有一个侄女郭琼芳住在旧金山，她的一个邻居是联邦调查局特务。据他对郭琼芳说，李宗仁于 12 月中飞苏黎世时，联邦调查局曾派两个特务跟踪，当然没有恶意，只想知道他这一次赴欧有无进行什么政治活动。但这两个特务在 Savoy Hotel 住了

几天，见李宗仁只同 K 先生往来，此外没有任何接触。于是，两个特务便放下心来，到日内瓦去了。

程思远于 12 月 20 日到苏黎世晤李宗仁。久别重逢，俩人都

不禁热泪盈眶。谈起世界大势起了很大变化，俩人都禁不住感慨万

千。李宗仁那时已经 73 岁，人逾古稀之年，久居异国，总有落叶归根之想。所以他对周恩来给予的“四可”原则，在十分激动的同时，还是看重回国定居。对于政治，他已经不很热衷了。但认为国家只要能保持长治久安，就是很光明的。至于郭德洁是否会同他一起归来，他还不能肯定。

程思远劝解道：

“两个人回来，比一个人回来对外观感好一些，否则夫妻在最后分道扬镳，对外怎样解释呢？”

李宗仁点头称是，深以为然。

受到周恩来“四可”原则的鼓舞，12月24日，李宗仁满怀着兴奋和喜悦回到纽约，他对来到机场迎候的亲友说：

“好险，几乎赶不上回来过圣诞节。”

一次，李宗仁由张歆海陪同，去听英国作家菲利克斯·格林对西藏问题的报告。李因知格林经常去北京，会后特拉他入休息室一谈。李宗仁开门见山地说：

“格林先生，你不久将有北京之行，可否请你转告周总理、同意我早日返国定居？”

由此可知，李宗仁颇有迫不及待之感。

不久格林先生访华回到纽约，他对李宗仁说：

“你的话我已经转达给周总理了。总理听时态度很严肃认真，但一句话也没说。”

李宗仁听后怅然若失，未置一词。其实，这正是周恩来的虑事周详之处，若由一位英国作家传递欢迎李宗仁回去的信息，稍有泄密，将对李的安全构成危害。

后来，张歆海过港时对程思远再次提起李宗仁归国之事，说：

“像李德邻这样的人，北京为什么不请他回去呢？”

“时机还未成熟吧。”程思远只好猜测着回答。

四、周恩来巧妙安排，李宗仁脱险回国

1965 年 5 月，程思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转告李宗仁回国之心甚切，可否予以考虑，得到允可。6 月 13 日程接李宗仁幼子志圣电话谓李已赴欧。当由程妻石泓于 14 日在广州用电话向北京请示。次日，石泓返港，说周恩来

要程到北京一行。其时，周恩来已将李宗仁回国的一切事宜全部安排妥当，并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保证李宗仁先生安全归国。”6月18日，程思远准时飞抵北京，被接到中央统战部礼堂，在那里见到了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以及平杰三、冯铨、童小鹏。稍事寒暄后，周荣鑫告诉程思远说：

“周总理已于今晨飞往非洲访问，临行前将有关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安排事宜，由我们代为转告。请你前往瑞士苏黎世迎接李宗仁先生。你一到苏黎世即有专人前来联系，你将从他那里得到应有的协助。”次日，程即离京南返。瑞士虽号称民主国家，但对程思远此行签证却故意为难。驻港瑞士领事对程思远说，他看到程前年去瑞士的签证，只住了几天便回来，实属可疑，待他们考虑几天再说。显然是故意挑剔。于是，程思远便改办去罗马旅游，苏黎世只是过境签证。再加上瑞航从生意上着想，事情终于办妥。6月28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见到李宗仁，同时看到郭德洁也已赶到瑞士。事情十分明显，她将同李宗仁一起返国。原来在李宗仁离美后，郭德洁即着手把他们的房屋以低价卖给一纽约律师。移交时，精明的她对邻居贝克夫人说：“我一个人打扫这房子，实在太辛苦了，我将搬到市区去。”说完，一声“拜拜”，她便赶往机场去了。真是做得滴水不漏。

李宗仁与一位名叫吴尚鹰有约，相约同机返国，但他们在苏黎世等候多日，却不见吴氏到来，后来始知出事。原来李宗仁离美前交给吴尚鹰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作为赴欧旅费。吴是背着他的同居者伍女士打算只身归国的。次日，伍替他检查衣袋，发现了这张支票，查问起来，吴只好坦然承认，从此伍对吴形影不离，吴也就休想有行动自由了。

除了吴尚鹰以外，李宗仁还想与他的幼子李志圣同行。为了安全，有关方面计划邀李宗仁等人去外地小住几天。正束装待发，忽通知他必须在7月15日离开苏黎世，并关照说当飞机在日内瓦、贝鲁特加油时，一定不要下机。李宗仁知道必有原因，赶快订购瑞航13日下午2时飞往香港的飞机，他们当然不会坐飞全程，而是约好在中途下机。

据李宗仁的亲戚K先生后来对他们说，他送李宗仁一行上机回到城里，发现台湾方面从日内瓦派来两个彪形大汉正在等候着，其中一位是K所认识的，手里扬着白崇禧的亲笔信，口口声声要交给李宗仁本人。K先生灵机一动，编了个瞎话，对他说：

“李先生夫妇到罗马去了。”

两位蠢货倒也信以为真：

“那么我们在这里等他。”

从此，这两位“英雄”如影随形轮流监视着K先生。一直等到20日中午，他们从新闻广播里听到李宗仁夫妇已回到北京的消息，才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去。

为什么李宗仁一行能够不失时机地在魔爪还没有伸到以前就离开苏黎世呢？原来有这么一个监听小组，在李宗仁到苏黎世以后，就开始截留破译台方发往日内瓦的电讯。从这些电讯中得知台方将在7月10日有人带着白崇禧的函件前来。这意味着什么当然不言自明。所以，李宗仁等人也就立即得到了必须立即离开的通知，否则就来不及了。

7月14日凌晨3时许，李宗仁一行飞抵卡拉奇，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官员早已接到国内通知，上机来接。当他们走下舷梯时，发现下面停着一

辆救护车。此时，丁国钰大使正在车上坐候。后来丁大使向程思远解释：他接到情报，有人企图在李宗仁先生下机时向他下手。为了预防万一，所以他借口有一位害着重病的好友从欧洲来到，向有关部门借了一辆救护车来接机，这是一项比较妥当的安全措施。

李宗仁听说此情，深感中共的关怀和祖国的温暖，对丁大使连声道谢。

丁大使陪李宗仁一行到达大使馆时，天已蒙蒙亮了。

他们刚在大使馆吃完早餐，有人拿文件给丁大使看后当场说：

“李先生的消息在香港见报了。”

接着他念电文：

“今（十四）日香港《快报》在第一版头条发表了以‘李宗仁将返大陆’为题的独家新闻，霎时轰动了香港。”

其实这一消息也震动着全球。因为国际新闻媒介都要台方官员证实有否这件事，但后者根据他们的片面判断，矢口否认。下面引两条专电为证：

（美联社日内瓦十五日电）香港报纸推测中国前代总统李宗仁可能前往北京，此间台湾官员表示怀疑。他们说，他们已风闻香港报章的消息，谓李已由美赴大陆。他们未及表示李氏目前的下落。台湾的外交家称：“过去数年间香港及台北报章均发表同样消息表示李氏可能参加中共（原文如此），他以前绝不如是，我不知现时李要这样子去。对于中共他当然很有用的。”

（纽约十六日合众社电）中华民国人士昨日否认外传前副总统李宗仁在美国长住后将返中国大陆的消息。

他们说，李氏已出卖他在纽约的房屋并前往苏黎世市。同行的李夫人，曾由乳癌而动手术，将在瑞士休养；他们又说，李氏有一内弟在苏黎世。该方面人士强调称，李氏打算于他的太太痊愈后，返回纽约。

在卡拉奇休息三天后，1965年7月17日傍晚，李宗仁一行从卡拉奇上机，经达卡飞返祖国。丁大使亦同机随行。原来，这一天周恩来已指示中共中央调查部转告丁大使：仍按原计划不变，你同李宗仁同乘巴航班机回国。为何要在卡拉奇休息三日，丁大使揭开了谜底，他告诉程思远说，有人意图破坏这架波音747飞机，所以把它放入库中三日。这表明安全工作做得十分细致。也说明李宗仁回国险阻重重，十分不易，稍有不慎，就将危及其生命。

五、周恩来：希望大家不要有老革命 不如晚革命的想法

18日凌晨天蒙蒙亮，东方晨曦微露，李宗仁从机上俯瞰，发现下面都是崇山峻岭，绵延不绝。十分明显，这是粤桂边区。很快，广州已出现在眼前。此时，李宗仁显得十分激动，他已经久违祖国16年了。

飞机降落在白云机场，他们受到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广东代省长林李明等的热烈欢迎。在贵宾室里，宾主共用广式早点，边吃边谈，情景十分热烈。林李明轻声对程思远说：

“这是一出杰作。”

9时许，飞机继续起飞。11时到达上海虹桥机场，飞机徐徐降落。李宗仁所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会在那里欢迎他们。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民党派负责人刘靖基，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等也到机场迎接。

在等候飞机的时候，周恩来已就李宗仁归国可能引起的思想反映做工作：

“李宗仁能回来，我们欢迎。人重晚节，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并不能影响自己的觉悟，一个出身反动阶级的人，还是可以为新的阶级服务的。希望大家不要有老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想法，要看到李宗仁回国可以在另一个方面发生影响。所以你们回去还要做些解释工作。”

罗青长对程思远说：

“总理关心李德邻先生的安全通宵未睡，直到接获飞机进入云南省境的讯息，他才上床休息。”

李宗仁一行被接到锦江饭店后楼下榻。这里正在安装空调设备，准备把它建成高级宾馆。当晚，陈丕显第一书记在锦江对面的文化俱乐部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及程思远，周总理、陈毅也出席。

席间，陈毅一边不住地给李宗仁等布菜，一边说：

“国民革命军 1926 年誓师北伐时共有 8 个军，现在在国内的有 4 个军长，即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所以李德邻先生从海外回到祖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次日，即 7 月 19 日，周恩来在文化俱乐部接见李宗仁先生，在座的有程恩远、罗青长、刘述周和姚仲康。

周恩来说：

“我们很为李先生的安全担心。台湾方面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消息都是不准确的。过去他们自夸信息灵通，现在事实证明落后了。”

周恩来从国际形势谈到台湾问题：

“1955 年东南亚外长会议期间，英国外长艾登到香港，给我来了一个电报，希望在深圳和我会面。艾登想斡旋台湾问题，他的具体意见是：把金门、马祖以及沿海岛屿归还我们；我们可以提出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但台湾维持现状，维持到 10 年以后的若干年再说。……我们答复艾登说：‘欢迎你来看看，但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插手。’ 1955 年 4 月，我在万隆亚非会议曾发表声明：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后通过英国与美国达成了大使级谈判协议。

“如果中国拿原则作交易，就可以达成这样的协议：金马及沿海岛屿归还中国，中国保持对台湾的主权要求，维持台湾现状若干年。但我们不能拿原则作交易，不能这样做。1966 年陈诚访美，美国让陈看了中美会谈纪录，陈反而很受感动。知道我们不拿原则作交易。”

周恩来说到这里，重申“四可”精神：

“李先生说，回来不再出去，但是‘四大自由’还是要讲的。1963 年 11 月，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你的问题，还有你太太，你太太还可以去香港。去年我曾向罗隆基、章伯钧宣布，你们现在想出去，我们欢送；在外边住不惯，还可以回来。”

7 月 19 日下午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夫妇去拜访在上海小住的叶剑英。在北伐时，叶剑英在第四军当过参谋长。说来他们还是老战友，在平定湘鄂和进军江西之后，曾经并肩作战。

7 月 20 日上午 9 时许，李宗仁一行和周恩来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的陪同下来到上海机场。周恩来的专机先起飞 20 分钟，临别时对李宗仁说：“我先到首都机场部署一切，在那里欢迎你们。”

周恩来总理如此的细致，他要给李宗仁有贵宾所至之感，他要让全世界知道，共产党人的胸怀是何等的宽广。

7 月 20 日上午 11 时许，李宗仁乘坐的专机由上海飞抵北京。陪同李宗仁飞京的除程思远以外，还有罗青长、刘述周、姚仲康和王午成。

飞机在首都机场缓缓降落，李宗仁走出机舱，一看到眼前热烈的欢迎入群，即激动地停在门口脱下帽子，面带笑容频频招手，表示谢意。然后和夫人郭德洁，以及程思远走下飞机。

李宗仁下机后，赶忙向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走过来。周恩来向他伸出手说：

“欢迎你回来！”

李宗仁没想到会有如此众多的高级领导人前来迎接，紧握着周恩来的手，激动异常，连连称谢，眼里闪耀着泪花。彭真、贺龙、罗瑞卿也迎上前来一一和他握手。

在机场上欢迎李宗仁归来的，还有郭床若和夫人于立群、陈叔通，徐冰和夫人张晓梅、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叶剑英、傅作义、蔡廷锴以及军界高级将领王新亭、王宏坤、王秉璋。

当黄绍竑出现时，李宗仁不禁喊了一声：“季宽……”就跟他紧紧拥抱在一起。黄绍竑是 1949 年李宗仁当代总统时派到北京来进行和谈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事隔十多年，今天在北京见面，李宗仁拥抱着黄绍竑，大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慨。当年国民党派出的和谈代表团其他成员：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卢郁文、李俊龙、刘仲华、屈武等，也都到机场欢迎李宗仁。

这时，有人介绍李宗仁和原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认识，溥仪热情而真诚地对他说：

“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来！”

李宗仁连连点头。

周恩来对李宗仁说：

“溥仪新生了。你看他五十多了，不像吧？”

溥仪接着说：

“我 59 岁了。在今天我感到越活越年轻。”

李宗仁遂经溥仪的介绍和他的夫人李淑贤认识、握手。

接下来，李宗仁和前来欢迎的余心清见了面。在 1938 年台儿庄大战后李宗仁回到武汉，入东湖疗养院治疗牙疾期间，余心清也住东湖，与李宗仁过从甚密。1948 年余心清在孙连仲军中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逮捕，后李宗仁当代总统时设法把余释放。看今朝，忆往昔，大家都不禁感慨系之。李宗仁还与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见面。

在挂着“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的机场大厅里，在毛泽东半身塑像的面前，李宗仁宣读了他的声明。同时，程思远把声明的中、英文文稿分发给中外记者。

李宗仁在声明中指出：

16 年来，我以域外侍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

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李宗仁在声明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方照顾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对外，为最后完成国家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宗仁一行被接到当时北京最高级的饭店北京饭店暂住。当天中午，李四光、徐冰、周荣鑫来北京饭店与李宗仁夫妇共进午餐席间，罗青长对程思远说，报界登载有关消息时，把程称为先生这是周总理决定的。程思远心中一想，或许其中寓有深意，非所能理解。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迎李宗仁伉俪，气氛极其热烈。黄绍竑对程恩远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以盛宴招待个人，他从未见过。所以，对如此宴请，宗仁先生，觉得意义颇不平常。

李宗仁夫妇归国之后，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悉心照顾，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1966年初，专门安排他们到两广参观、游览。这年2月，他们来到南宁。3月8日，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乳癌却日趋恶化，所以李宗仁就留她在南宁明园饭店，李宗仁及其他人继续去柳州、桂林参观。此前，周恩来已专门关照有关方面把位于文明路的李宗仁原私邸修好，并重新设置家具，好让他们夫妇有暇时来住。李宗仁十分感谢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但由于夫人郭德洁因病不能同来，未免触景伤情，所以宁愿在棺湖宾馆一楼下榻。

3月17日傍晚，李宗仁接到南宁电话，说郭德洁的乳癌转为肝昏迷，这是一病理上的名词，意指她的乳癌把胆囊破坏了，以至面色蜡黄，进入昏迷状态。这预示着她将不久于人世，李宗仁立刻赶回。19日，以专机把她送返北京，一到首都机场，即由救护车送她入医院抢救。于3月21日逝世。

周恩来、彭真和夫人张洁亲自参加了郭德洁的遗体告别仪式。这表明她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周恩来亲自参加，对死者是悼念，对生者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郭德洁逝世后，周恩来对李宗仁更加关怀，专门批示统战部：李宗仁晚年丧偶，可能触景伤情，不如邀一些老友陪他去江浙一游，借此转移环境，休养身心。于是，李宗仁便于1966年5月7日偕黄绍竑、黄琪翔、郭秀仪、刘斐、陈此生和程思远乘火车去南京，统战部负责人宋堃和尹冰彦同行，到时受到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彭冲的盛情接待，到中山门外原蒋介石公馆住下。这样，使李宗仁改变了环境，避免了住在原处睹物思人，触景伤情，其心境逐渐好转。

8月27日，张治中请李宗仁及程思远到广东酒家参加一次晚宴。出席的主要客人是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陶铸；周恩来、万里也应邀参加。周恩来看到李宗仁气色很好，与去年回国时大不相同，遂说：

“德邻先生的身体好得多了。”

“回国以后，心情愉快，因此身体就好起来了。”李宗仁说。

六、特殊的保护

1966年，“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发展到9月，红卫兵对党外人士包括宋庆龄在内开展了范围广泛的“冲击”，幸亏周恩来及时采取了措施，不致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央统战部为了预防万一，专门委派了一位负责人到李宗仁家里，对李宗仁和程思远说：

“红卫兵到时，请他们进来谈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

为了保护广大党外人士，周恩来可谓煞费苦心。8月30日，他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8月30日经毛泽东批准，其中就列有李宗仁的名字。

接着，周恩来对李宗仁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送到解放军总医院。这一措施可谓用心良苦：既可免受红卫兵的冲击，有病了又可及时诊治。

建国17周年的前夕，李宗仁参加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10月1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当日下午，因体力不支从椅上向前扑倒，再度送院疗养。

得知此情，周恩来颇带歉意地对程思远说：

“当时发给李先生的两张请柬，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相，但这一决定没有贯彻下去，以致出事。”

李宗仁住院期间，曾请中医高手周朴考前来会诊。他诊断后说：德邻先生体弱需要大补才行，但怕他虚不受补，在药剂处方中姑用党参来试看。周恩来所料果然不错，即使用了党参，他也未能受用，康复希望甚微。

1969年1月中旬，李宗仁病情日益恶化，自知不起，于是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对于共产党和政府给予的关怀，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系念着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爱国知识分子，希望他们投入祖国的怀抱。1月25日，李又得一场肺炎，他在回国后曾得过几次肺炎，过去总是用青霉素治好的，但这一次不灵了。遂又改用它药，仍未奏效。延至1月31日凌晨30分，李宗仁去世，享年78岁。

李宗仁的治丧报告稿呈上了周恩来的案头。桔黄的灯光下，周恩来在认真的审阅着。他拿起毛笔，以那遒劲的周体，将“拟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改为“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并要求香港《大公报》、《文汇报》除发表李宗仁病逝的消息外，还要刊登李宗仁的照片。此外，还在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名单中加上了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修改的治丧报告。

李宗仁遗体告别仪式于2月1日下午3日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亲自主持告别仪式，向李宗仁先生默哀送别，表示了深深的悼念之情。

“张治中三到延安，是我们党的朋友”

——周恩来与张治中

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县人，原名本尧，字文白。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团团长、学生总队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曾任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1945年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积极协助释放被囚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任国民党代表。1946年，代

表国民党参加军事调处三人小组。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共代表团谈判。当双方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为国民党政府拒绝后，留住北平。同年9月，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张治中是为数不多的没有与共产党作过战的一个，两次内战爆发，他都借故避免上前线直接带兵与共产党打仗。而这些，都与周恩来对他的影响分不开。黄埔军校，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曾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热诚欢迎，但终因其目标太大而未被批准，成为他终身憾事。谈判桌上，他与周恩来常常是针锋相对的谈判对手；谈判桌下，他们又是互相尊崇的朋友。当张治中遭受同党的攻击而难以立足时，周恩来想方设法为其解围，而张治中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完成周恩来交办的种种有益于革命的事项。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团长的张治中，在周恩来的挽留下留在北平，成了他后半生的重大转折点。

一、黄埔军校，张治中向周恩来 申请参加共产党

1924年，孙中山先生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接受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规劝和建议，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建立了政治基础。接着，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岛创办黄埔军校，其问，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张治中担任教育长，开始了俩人一生中充满传奇色彩的交往历程。

大革命时期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张治中对三大政策特别是联共是始终身体力行的。在他看来，不进行国民革命则已，否则就必须首先发展和巩固国共两党的合作。所以，当北伐战争开始，他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之初，就向总司令蒋介石建议：

“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局面，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请周恩来担任。”

蒋介石则颇不以为然，说：

“我已决定由邓演达充任。”

张治中力陈己见：

“邓可以带兵或干其他工作，周恩来历任黄埔军校和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经验丰富，干练多才，为国民革命之大业计，此职还是由周担任最为适宜。”

蒋介石此时已在一心想着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当然不会同意张治中的意见，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已做决定，不好改变，总部财经委员会主任尚未定人选，你可以试着征询周的意见，看他愿意充任否。”

张治中想，财经委员会不是重要职务，但如周恩来答应充任，亦可体现国共两党的合作，便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对于蒋介石这种有意破坏国共合作，削弱共产党的行为，理所当然地被周恩来一口拒绝。张治中认为周恩来是很好合作的人，而蒋介石偏偏拒用，极下以蒋之决策为然。认为北伐军统帅部没有周恩来参加，是革命一大损失。

张治中当时认为，国民革命刚刚开始，一切言行应以三大政策为准绳，摩擦、斗争、分裂，都与三大政策精神不符，他从原则上是不同意的。但从具体表现来说，他又倾向于周恩来组织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所以从立场上说，是中间偏左。他与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熊雄、高语罕等往来密切，与苏联顾问接触也很多。由于处于左右两派严重斗争冲突之中，张治中的心情十分苦闷。

随着斗争的演变，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张治中的态度已明显站到共产党一边，思想左倾，言论激烈，以至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张的言行渐为右派所极端不满，背后给张赠送“红色教官”、“红色团长”的称号，把和张密切交往的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称为“黄埔四凶”。张治中想参加中国共产党，向周恩来直接提出了申请。

有张治中这样的干才参加共产党，当然是件大好事，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

“我个人表示欢迎，但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你回话。”

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正式回复说：

“中共方面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国共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等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在这段时间，张治中和中共的关系相当密切。周恩来是黄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张到黄埔担任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团长后，俩人一见如故，深相结纳；邓演达时任训练部副主任，张、周、邓三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局势，憧憬理想，十分投机。由于张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一方面为蒋所重用，又有保定同学的支持（张治中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当时校内军事教官大多是保定学生出身），另一方面与中共人员关系密切。所以就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张治中认为，革命事业才开始，国共两党只宜团结，不应分裂。

由于张治中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以至蒋介石也起了疑心，曾背后密询王懋功：

“张治中是否共产党员？”

王根据自己的观察，力言无其事，流言不足信，为张治中说了很多好话，蒋介石才不再怀疑。

二、同党溶井下石，周恩来力保张治中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是年底，张治中

从淞沪战场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不久，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驻武汉，常到长沙；徐特立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叶剑英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他们也常到长沙。于是，张治中和中共断了10年的关系又恢复了，与周、徐、叶时有来往。

1938年武汉失守不久，湖南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事件。焦土抗战，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张治中负责执行的，张对所部也有明确的指示。但执行人员听信谣言，仓促间不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到处点火。张治中在梦中惊醒时，火势已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无法挽救局势。事件发生后，全国一片责难之声，张治中深知闯下大祸，十分焦急。

周恩来事后由郊外回城，看到张治中的惊恐憔悴之状，就细细问明详情，指出其责任所在，并温言加以劝慰。张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送请周恩来审阅。

周恩来认为，国民党政府单纯军事抗战，不依靠发动群众，实施所谓“焦土抗战”的方针是错误的，所以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对此事给予严正的批评，同时对上述文稿字斟句酌，修改了多次，为了保护张治中这位与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老朋友，特别是对起火原因做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用、临时躁动外，还加上了“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

张治中看过周恩来修改后的文稿，激动得良久未能置词，他由衷地感激，认为正当各方责难纷纷、一些人落井下石之际，中共要人周恩来能对他持谅解态度，实在难得，终生铭感不忘。

三、“我代表恩来向新人致禧”

1938年5月，国民党新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座谈会。那次会是宋美龄主持的，邀请各省主席的夫人参加。张治中当时任湖南省主席，夫人因家务忙不能前去，故让女儿张素我代她参加了会议。那次会上，邓颖超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代表的身分，发表了对于抗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概况，并参加起草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她的发言使人耳目一新，给张素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0年国共合作时，张治中在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周恩来及邓颖超也在重庆，他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懈地努力。那一年6月6日，张治中的大女儿张素我和周嘉彬结婚，张治中在重庆嘉陵宾馆为他们举办了婚礼茶话会，出人意料又令张素我十分惊喜的是，邓颖超代表周恩来也赶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向张素我全家致贺：

“我代表恩来向新人致禧。”

当张素我切蛋糕时，邓颖超微笑着站在张素我的身后，一位摄影记者抓住这宝贵的瞬间按动快门，留下了这一永恒的纪念。每当张素我看到这张照片，想到敬爱的邓妈妈竟能在百忙之中专程出席自己的婚礼，心中就充满了温馨和激动。

四、张治中力排众议，周恩来免遭软禁

1941年底，日本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其私人代表居里来华谈援华抗日问题。居里临走时提出要约见周恩来。约会的前一天，在国民党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提议

“明日居、周将要会见，找个借口把周恩来软禁一天，使他们不能会面。”

接着，会上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主张软禁的意见占了上风。张治中既气愤，又感到好笑。开始时还在一旁静观，后来看越来越不像话了，就忍不住站起来说：

“约会的串，委员长当然不会不知道，现在他既没有交付讨论，何必白费时间？何况，现在还不清楚究竟主动约会的是居里还是周恩来。且软禁主张殊不高明，不仅将激起中共的反对，而且致使彼方误会，影响美援，可谓有害而无利，万万不可！”

至此，主张软禁周恩来的人不得不停止了喧嚣。

1941年元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亲痛仇快的事件一经公布，国内外震动，反对之声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不得不指派张治中和张冲去和周恩来谈判解决办法。

当时，周恩来住在上清寺曾家岩五十号，距张治中住处桂园甚近。张治中首先访问周恩来，表示歉意说：

“这是少数人的过激行为，希望能和平解决，不影响两党团结和抗战大业。”

周恩来严正地说：

“事件的性质很清楚，绝不是蒋所说的‘问题很简单，事件是很普通的整顿军纪的局部问题’，而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一次大暴露，方式是突然袭击。问题是很严重的，怎可能不影响两党关系？”

张治中对“皖南事变”一事也十分不满，但又不能不代表蒋介石说话，说：

“事已至此，总得设法和解为好，希望以全局为重，以抗战大业为重。”

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

“从各方面的强烈反应来看，国民党此举是极端不得人心的，对这个反共投降大阴谋，我们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加以制止！”

经过反复商谈，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六项要求：（1）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即取消新四军的命令；（2）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新四军番号；（3）恢复叶挺自由，释放被俘干部战士，抚恤死难将士；（4）逮捕各亲日派首领，支付国法审判；（5）停止华中几十万大军的“剿共”战争，平毁西北的反共封锁线；（6）严整抗日阵营，坚持抗日到底。

张治中认为这六条有一定道理，就抄报蒋介石。但蒋悍然置之不理，谈判中止。

五、“文白先生可否先送毛主席回延安？”

1945年秋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的一个高潮。谈判过程中，张治中和周恩来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为谈判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张治中不但是邀请毛泽东到重庆的建议人之一，而且和赫尔利亲到延安迎接，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到重庆后，他又慨然答应把他的官邸桂园腾出，借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使用；对于警卫问题、接待问题、会议程序问题等，都主动热情地和周恩来协商解决，处处表现出真诚合作的精神。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代表之

毛泽东驻桂园，安全是个首要问题，对此最操心的当然是周恩来。他不

仅对毛泽东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详细检查，而且对警卫工作亲自布置。毛泽东的警卫力量除他从延安带来一位颜太龙同志，还有原在重庆的龙飞虎，加上陈龙，共三人，力量是单薄些。

是张治中把毛泽东请到重庆的，他对毛泽东的安全也十分关心，就对周恩来说：

“政治部有警卫营，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工作。”

周恩来考虑再三，认为当时重庆十分复杂，散兵游勇多，前线下来的伤兵多，袍哥帮会多，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俩人商量的结果，决定由宪兵担任。张治中即和宪兵司令张镇去谈，张镇也非常痛快，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为邀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家吃饭。他在给张治中的信中说：

“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年，此20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叙也。”

可见戴季陶还是意识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重要性。毛泽东虽然活动极其紧张，还是应邀前往。

毛泽东已来重庆月余，此时重庆形势复杂，毛泽东身体也不太好。以毛泽东的安全为己任的周恩来为此焦的不安。同时，谈判已至末期，协定的主要条款除军队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外，已基本达成协议。周恩来于9月底专访张治中，说：

“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议好不好？”

张治中诚恳地问：

“预定哪一天走？”

周恩来回答：

“预定10月1日。”

稍停，周恩来盯着张治中说：

“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可不放心呀！”

张治中马上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慨然道：

“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很紧张，都安排了日程，要在10月10日后才行。”

周恩来十分赞赏张治中这种友好态度，至此，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说：

“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恩来和张治中谈起往事时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在协定条文基本确定后，国共双方商定于10月10日在张治中的公馆签字，11日毛泽东就飞回延安。这时，一直关心着毛主席空中安全问题的周恩来。当听张治中说蒋介石要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后即飞迪化（现乌鲁木齐）解决“伊宁事件”时，立即灵机一动，问道：

“文白（张治中的字）先生可否先送毛主席回延安，然后去

新疆？”

张治中立即答应可以，说要报告蒋委员长。经蒋介石批准后，张治中遂于 10 月 11 日陪送毛泽东乘专机安全返回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

六、“真是奇文，张治中要我们接济共产党！”

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后的形势是，日军投降后，大片沦陷区有待接收。国民党部队远在后方，靠美国的海空军运送去“劫收”；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由于长期坚持在敌后靠近沦陷区，可以开动“铁脚板”大踏步开进去。双方都在比赛，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军事问题和根据地问题就成为当时核心问题的核心了。

美国人为了战后的在华利益，十分重视中国问题。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指派其总参谋长、盟军欧洲统帅马歇尔来华参与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于是，周恩来、张治中，加上马

歇尔顾问组成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

在整军谈判中，国共双方意见是距离很远的，分歧也是很深的，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存在的主客观因素，特别是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作出一定的让步，使这场艰巨的马拉松式的调停得到结果，双方签订了一份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为了郑重其事，还举行了一个签字仪式。时间是 1946 年 2 月 25 日。在重庆上清寺的尧庐举行。参加仪式的三方面都到场了，还邀请了中外记者参加。这是一间约 50 平方米陈旧的会议室，下面一排是长桌，桌上摆着整军方案的中英文本，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先后在上面签字。而后三方面都作简短的致词。张治中、周恩来在发言中都认为这个军队整编方案得来不易。如能付诸实施，则可以结束 18 年来国共两党的纠纷和对立，使中国进入新的和平时代，全国人民所期待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国家将可实现。

周恩来、张治中都表示，对于签署的文件，将保证百分之百地实行。

协定签署后，为了保证协定的实行，决定军事三人小组到各地去视察。军事三人小组到达武汉时，周恩来和张治中商量说：

“中原军区李先念部处境困难，物资缺乏，希望能协助解决。”

张治中考虑之后，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亲笔写了条子。命令国民党后勤单位照发。后勤人员收到条子后议论纷纷：

“真是奇文，张治中要我们接济共产党！”

张治中对他们说：

“这有什么奇怪！《政协决议》通过了，整军方案签订了，今后国共还要进一步合作，组织联合政府，统一编组军队，共同建设国家，有什么不可以的？”

当然，张治中这种良好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七、不负周恩来重托，释放中共人员回延安

抗战初期，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在新疆执行亲苏政策，中共为了支援盛世才，曾先后派了以陈潭秋、徐杰、林基路、马明方等为首的党员赴新疆，后又派了许多青年干部去新疆乌苏学航空，再加上由苏联疗养治病后留新工作的人员，共达一百多人。他们帮助盛世才制定六大政策，改革政治、经济、教育、财政等，成效显著，得到盛世才的倚重。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希特勒全力进攻苏联，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危急万分。盛世才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苏联必败。于是，由亲苏转而反苏，在省内大搞白色恐怖，肆行镇压，在 1942、1943 两年先后把中共在新人员逮捕拘禁，进行疯狂的迫害，一些共产党员被杀，一百多位共产党人被逮捕

监禁。

1946 年初，张治中被国民党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办妥，正在候命出发。一天上午，门口突然来了一部小轿车，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机要秘书余湛邦远远就认出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连忙迎接进客厅，然后请张治中和夫人洪希厚下楼。

坐下略作寒暄，周先开口：

“听说文白兄将有远行，我们特来送行，祝贺您荣膺重任，一切顺利。”

“谢谢，有劳您和邓大姐的驾了。”张笑着说。

“西北地处边陲，情况复杂，您的任务是艰苦的，一切准备得怎样？”周恩来关切地问。

“是的，主要人事安排已定下了，大的方针也考虑到了，具体政策和措施还得到新疆后定夺。”张回答时显出自信。

“我们来看望您和夫人，一是送行，二是有件重要的事相托。”周恩来说，“我们有一大批党员在新疆被盛世才关押，处境危急，情况欠明，想拜托您到新后调查处理。”

“噢！我对此事无所闻，请道其详。”张说。

周恩来把事件原委详细地告诉了张治中夫妇，并说：

“盛世才是个杀人魔王，他在新疆的暴行文白兄是知道的。这是个特大的冤案，请你们到新疆后，首先查明主要负责人陈潭秋、徐杰、林基路等是否还在；其次，他们的待遇很悲惨，生活十分艰苦，请先予以救助，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些钱。最后请你们用尽一切方法，把他们释放出来。”

张治中慨然答道：

“释放政治犯是《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规定了的，当然要执行。我到新疆后一定快办，请你们放心。至于带钱去改善生活，这用不着，这点小事我还办得了。”

周恩来考虑得很细，又叮嘱说：

“考虑到由新疆到延安路途遥远，情况复杂，如释放后让这些人自己回延安，恐怕不行，还得请你们在释放后派人和交通工具护送到延安才行。”

张治中爽快地答应：

“好，我们一定照办。”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务必请你们帮忙照顾。”邓颖超还特别对张夫人补上一句。

“这些人里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她是文白兄在上海大学的同学。你们到新疆后可以和杨先联系。”周恩来最后说。

“是的，当然先找杨了解情况。”张治中答应着。

为什么张治中慨然答应呢？除了他和周恩来的私交好和一向联共、亲共的主张外。他当然也记得，1944 年西安谈判时，林伯渠就已明确提出“释放在狱的一切共产党员”的要求。1945 年重庆谈判时，中共代表又一再提出释放政治犯，后来写进《双十协定》，而且蒋介石还作过答复：“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张治中是个平生重诺的人，他认为国民党信誓旦旦，是不应食言而肥的。

张治中坐机飞抵迪化后不久，就派屈武到女牢去看杨之华。当时主管监狱的新疆省警务处处长胡国振竟然拒绝会见，屈武只看到了杨之华的女儿独伊。屈回来告诉张治中，张盛怒之下，叫胡国振马上来见，当面训斥他：

“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我派人去见杨之华，你竟敢阻拦，是什么意思？”

胡国振没想到新来的肯主席如此厉害，马上当面道歉，答应让屈武再往。屈、杨会面后，屈先把周恩来和张治中的谈话概要告诉她，然后详细问及狱中情况，杨一一答复。屈回来向张汇报，张治中马上派人带了钱到男女监牢慰问，说明张治中主任受周恩来委托，要设法送他们回延安去，知道他们生活很苦，已指示主管方面迅速改善，并带来一些钱，先改善一下生活。中共人员开始疑心是蒋介石的特务搞什么花样，表示不愿收。来人告诉他们，这是张治中的钱，不是别人的钱，张治中和周恩来是多年的老朋友，请不要猜疑时，他们才相信了，而且觉得对释放有点希望了。

张治中在和三区代表和谈告一段落后，飞返重庆继续参加国共和谈。1946年3月，张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于同月29日离渝飞新疆，途遇大风，至4月4日才到达迪化。杨之华等知道后，7日来信给张治中，询问释放回延安事怎样，要求先恢复自由和改善生活。张在信上批示：（1）立即改善饮食；（2）准许在狱中自由行动；（3）每月供给报纸并代购书刊；（4）准许有配偶者会见。当时国民党省主席吴忠信、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已准备移交，这个批示新疆警务当局是不敢不照办的。中共人员的各项待遇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张治中不负周恩来所托，在稍事休息后就挤出一部分时间亲自处理这件事情。

然而，事情的处理过程则是极其复杂的，充分表现了张治中一诺千金的性格和对中共党人的同情。事情是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首先，向警务处索要档案。当时警务处长胡国振、主任秘书胡步虬，前新疆省主席吴忠信任内没有处理这个案子。结果送到张治中手上的仅仅是一个花名册：新疆土产的桑皮造十行纸，上头只写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族别、逮捕地点等，非常简略，看不出什么问题。事后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许多是假的。

档案是否被毁掉？这有两种可能：一种较大的可能是确实被盛世才毁掉了。因为盛每搞一次阴谋冤杀案，都亲自掌握案卷，直接指挥处决。等到全案处理完毕就付之一炬，连痕迹也不留。另一种可能是军统特务把案卷扣下来了。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蒋介石的各系统特务，都直接向蒋负责，当地的国民党军政领导不能过问，这些特务都是有恃无恐的。

蒋介石是个杀人魔王，多年来如何对待共产党人，张治中不是不知道的。释放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虽然写进政协决议，并在报上公布，但众所周知，到具体执行时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所以张治中经过反复考虑后，就给蒋介石去电。电文是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起草，案卷也由余保存，连续来往电文三次。

张治中的第一次电文比较详细，大意是：盛世才在1942年9月和1943年4月曾借故先后逮捕了在新疆的一批中共人员。其中主要分子如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已在1943年9月被杀害，剩下的都是一般的，而且男女老

少中老弱妇孺病残者居多。这是一批政治犯，毛主席到重庆时已向您提出要求释放，您也同意了；而且先后写入《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这都是报上公布、中外周知的，不能不执行。现在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东北停战协定都已先后签订，其他有关问题亦在继续协商中，如能主动宣布释放，这对两党合作，对当前形势，都有利无害。同时，我到新疆来，奉行的是亲苏、和共、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政策，行前已向您详细陈述，得到同意，而新疆监狱中还拘留一大批政治犯，使我处于言行不符，自相矛盾的境地，我很难办，请准予释放送回延安。

数日后，蒋介石复电来了，未表同意，但索要中共人员名单。

张治中立即将名单用电报报去，电文中又再次强调：主要分子确已被盛世才处决，这都是一般的人员，此事由政府主动办理为好。我离渝时周恩来夫妇来我家提出了请求，如果拒不释放，中共方面很可能对外公开，指责政府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到时仍不得不动被动释放，但在政治上必然蒙受损失，权衡轻重，望速裁决。同时还指出，我去年来新，同伊、塔、阿三区代表谈判，他们也多次提出释放省内政治犯的要求，我已同意，并且写入关于政治部分的协议中。事实上吴忠信来新后已释放了一批非共产党的政治犯，包括包尔汉、阿合买提江、安尼巴图鲁、赵剑锋等。我和三区代表正继续商谈军事问题部分，一旦全部达成协议，必将大批释放在狱中的非共产党政治犯，如果单独把中共政治犯继续拘押不放，那就首先很难取信于三区，您给我到新疆的任务亦将难以完成。

不难看出，张治中将理由叙述得非常充分。若干天过去了，蒋介石仍未复电。

张治中十分焦急，决定再去电催促，并告诉蒋，他和伊、塔、阿三区谈判已获进展，估计5月底前就可达成全部协议，请对此案早日裁决。

这样，经过张治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争取，至5月10日左右，蒋介石复电勉强同意。

至此，案件告一段落。张治中即让余湛邦将案卷移交给行营驻迪化办公厅第二组党必刚（留苏生，曾在国民党军委顾问处当翻译，后任新疆省保安副司令），由他们承办以后释放护送事务。在这期间，屈武受张治中委派，不止一次地到狱中看望中共人员，直到他们已能出狱行走。

当时，东北停战协定虽已签订，但国共两党关系并无好转，张治中深恐中途有变，为对得起中共朋友周恩来，对释放和护送回延安的筹备工作抓得很紧。

筹备工作的第一件事，是派余湛邦和党必刚同到监狱探望这批中共人员。

筹备工作的第二件事，是挑选护送人员和拟订护送计划。张治中把这件事交给倾向于民主进步的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又把任务交给该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承办。他们提出以迪化县县长刘某负责护送。

张治中经过反复考虑，担心此人完成不了任务，需要一个级别较高较精干的人充任，于是特别指定由刘亚哲走一趟。陶峙岳告诉刘亚哲后，刘开始顾虑重重，有所犹豫，经陶一再劝说，刘才同意了。不久，刘亚哲的护送计划呈报上来，对所需车辆、药物、医生、警卫、事务人员以及动身日期、沿途路线都做了安排。张治中反复审阅，认为确无漏洞，才批示同意。临出发

前，张治中还特别召见刘亚哲谈话，详细交代任务，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一般的事务；是护送，不是押送；要注意礼貌和态度。你护送到兰州，兰州将另有人接你。迪化至兰州路远，又极不平静，虽有一排武装护送，仍须十分警惕。沿途要和驻军取得联系，必要时请他们协助。每到一地，须给我来电话或电报，随时有困难随时请示。这些人久困囹圄，身体都很衰弱，又多是老弱病残和妇孺，沿途饮食、住宿、行程都要妥善安排，不要出事。这是个特殊任务，不能拘守常规，只要遵照我的指示办事，一切由我负责。”

这一番谈话，进一步打消了刘亚哲的顾虑，坚定了其完成护送任务的信心。

接着，张治中分别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去电。主要强调得到蒋介石同意释放一批中共人员，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沿路放行并妥善接待。

与此同时，细心的张治中也把这件事的简要情况和动身日期电告周恩来，以使周恩来有所准备。动身前，张还派屈武代表他到狱中和中共人员见面送行，祝他们一路平安。

刘亚哲奉命护送一路顺利到达西安，却发生了麻烦。由静宁到平凉已是胡宗南的辖区。胡是以顽固反共出名的蒋介石心腹，车行到邠县时就收到胡宗南的急电，指令将中共人员送到咸阳招待所，不许直趋西安，听候处理。刘亚哲曾在胡属下工作，深知胡不怀好意，咸阳很可能成为中共人员的集中营，因此急电张治中报告请示。还没来得及等到复电，刚好杨之华来告诉刘亚哲，说有一同志突然病了，发高烧，很严重，要求急送西安抢救。刘灵机一动，心想这是个好借口，如连夜急行军，就有可能闯过咸阳，到西安再行设法。主意已定，马上发车，果然在深夜一点经咸阳时，检查站只有一名哨兵，刘亚哲佩少将军衔站在车头一呼而入，哨兵不敢拦阻，余车鱼贯凤驰而过，不久即到达西安。夜已太深了，无处住宿，刘以电话向胡宗南的副官处接洽，无结果，只好暂在附近的澡堂安顿。刘又想，明天让胡宗南知道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正焦急间，忽然想起西安有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于是急找被释放的高登榜和吉合商量，让他们马上去找办事处联系。结果很好，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建立即前来，把全体中共人员接去。

第二天上午，刘亚哲才去见胡宗南。胡宗南勃然变色厉声喝问：

“为什么不住咸阳招待所？”

刘亚哲巧妙对答：

“深夜过咸阳，无人接待，又遇有人病重，所以不得不直到西安。”

这样，总算遮掩过去了。其时，经过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努力，西安的报纸也登出中共被释放回延人员到达西安的新闻。但是胡宗南不死心，借口要进行政治审查甄别，不发汽油，不许离开西安。刘心想不妙，接二连三地给张治中去电报，杨之华等也一再致电张治中。张一面急电胡宗南，指示这批人是蒋介石批准的，应即放行。同时急电蒋介石，请他即令胡宗南放行。至此，胡才无法阻拦。这批中共人员因此在西安耽搁了约十日。

车队继续前进，于1946年7月8日到达陕甘宁边区的鸡加村，中共中央、边区政府、西北局都派人来接。刘亚哲即向来人办理全部移交手续。

在张治中悉心关照下，这一行程遥远、历时月余的重大政治任务至此圆满结束。

回来的同志受到党中央首长和许多同志的热烈欢迎，护送人员也受到热情接待。请他们吃饭，还分别赠送了一些皮筒子、毛衣、呢子夹衣、毛线等。朱总司令亲笔写了给张治中的道谢信，附赠狐皮筒子一件。还另发电报道谢。几个月后，张治中回南京，董必武又亲到张家看望，备致谢意。

是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中原军区发起进攻，挑起全面内战，这批中共人员幸好早日回到延安，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八、“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基已彻底动摇，全国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这时，蒋介石不得不再次玩弄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49年元月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南京国民党政府于3月24日组成“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张治中，代表有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日又补刘斐），秘书长为卢郁文。顾问有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容等。并要求中共早日确定和谈的时间地点，以便开始和谈。

3月26日，中共通过广播发表了和谈代表名单，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代表是：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加聂荣臻），秘书长为齐燕铭。中共特别声明，要以毛泽东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八条为谈判的政治基础。由上述和谈代表团和名字不难看出，中共对和谈是认真的。

周恩来与张治中是相知20余年的老朋友，但在谈判桌上又是对手。老朋友相见后，不是愉快的叙旧，首先是一阵唇枪舌剑。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于4月1日上午由南京起飞，下午3时到达北平。一下飞机，看到迎接的人不仅寥寥可数，而且连一个中共代表都没到场。经过介绍，才知道来接的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府秘书长薛子正和一些其他人。张治中等人都觉得很纳闷，原来设想首席代表周恩来会来接，现在连一个代表都没有，心下实在有点狐疑。同时，大家随身简单行李还要检查，心中颇感不快。代表和工作人员一起被接到六国饭店，又看到“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这几件事凑在一起，张治中等人心中的疑团更大了。

从郊区机场进到市区，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奇特现象，就是锣鼓声声，秧歌阵阵。因为好奇，到六国饭店一放下行李，南京和谈人员就跑到街上看个究竟。原来群众自发的跳秧歌，庆祝解放。三街六巷，到处人流如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各种不同服装的，在大街上尽情地扭动，人人汗流满脸，喜形于色，兴致之高，热情之盛，难以形容。这种解放区的新气象，使他们内心触动很大。

1日晚6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六人来六国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并设便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饭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商谈。商谈采取分头、个别对话的方式。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

这次交谈，周恩来一开始就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

“你为什么离南京前到奉化的溪口去见蒋介石？”

这样突如其来的质问，使张治中感到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周恩来接着又说：

“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的所谓下野是假的，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急忙反复解释：

“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要去的，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主席所提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六个代表中除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部去，我是首席代表，只好我去。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到很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南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可对这些人起到威慑作用：蒋既然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家乡，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这些人就不敢反对了。”

张的反复解释和补充，没能使周恩来满意。周最后说：

“不管你怎样说，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发布指示，说明你们不是要和平，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感到反复解释无效，也就动起了感情，引起双方的争执。以后在另两次不同的场合下，周恩来再次对张治中去溪口见蒋提出批评。张治中在解放后忆起此事时还说：中共对我去溪口反应如此激烈，实非始料所及，这件事对和谈的情绪是实在有影响的。我认为，这段经过反映了周恩来严肃的原则性，中共代表不到机场迎接和六国饭店张贴的标语，是绝非偶然的。

其次，谈到和平问题。周恩来问：

“我们的广播你们听到了，你们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心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何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诚恳地答道：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共方的——当然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

周恩来肯定地说：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

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提出设想：

“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商谈后，然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当然，你们也已意识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再拖延的。”

4月12日晚，双方代表再次商谈。这是一栋高大、宽敞、华贵而又幽静的清廷遗物——中南海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长排条桌，两端是双方首席代表的座位，两旁则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纪录人员的座位。布置简朴，气氛显得庄重严肃。

会议没有固定的程序，在双方首席代表同意会议可以开始后，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做了详细的说明，主要是：

首先，明确战争的责任在南京政府。南京政府自执政以来，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肆行反共；尤其自1946年以来，撕毁两党一切协定、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使全国遭受空前灾难，已完全丧失人民信任。国民党部队已为人民解放军所彻底击败，愿以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因此在双方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中，首先要明确战争的责任。

第二，关于战犯问题。主要战犯必须严惩，但不限任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将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

待遇。”

第三，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它所产生的伪宪法也是非法的，它所规定的伪法统理应废除

第四，国民党现在所保有的陆海空军、各军兵种、军事机关军事学校、工厂、后勤机构，一律加以改编，其拒不服从者，即加以讨伐。为完成此艰巨任务，特组设整编委员会。

第五，改革土地制度。全国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应进行改革，解放军到达地区，先减租减息，再行分配土地，解放军未到达地区，南京各级政府应保护各该地农民组织及活动，不得加以妨碍。

第六，凡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以及文件档案，一律移交联合政府审查，其中凡对国家不利，尤其出卖国家权利的，分别予以废除、修改或重订。

第七，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应准备交代；解放军一开进，即实行军管，除反动分子之外，对广大公教人员和官兵绝不使流离失所，对进步分子、有用人才，还给予出力机会，对生产机构悉予保存。

周恩来最后说：

“我们对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寄予极大希望，希望同意和签订这个协定草案，使和平得以实现，问题得以解决，一定为全国人民所永远赞许。”

接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大意是：

1. 关于草案的前文，我们认为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遗教和政策，是战败了。我们愿意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不过对过分刺激的语气希望减缓些。

2. 关于战犯问题，中共方面是大让步了。不过我们希望改为：“凡今后拥护和平者，可以给予宽大待遇，有背叛和平者，才应追究。”我们代表团诚意谋和，不想为此使会议陷于僵持。

3. 关于废除宪法与法统问题，我们无不同意见，只希望作文字上的修改。

4. 关于军队整编，原则同意，但具体方法步骤上希望修改：第一、双方军队各自在各自防区内改编，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不受单方面的指挥。第二、具体的改编办法，应另文详细规定，不必写入协定之内。第三，分两阶段进行，其负责机构，前阶段可名为监督或监察委员会，第二阶段才名为整编委员会。

5. 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我们原则上完全同意，这是早应这样做的，现在由你们提出，我们十分惭愧！

6. 关于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我们没有原则上的异议，但条文中规定南京和各级政府在联合政府成立前，一切须服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样，后者将被看成是太上政府，希望考虑。

7. 关于永远根除内战，保证永久和平，建立民主、统一、富强的国家气节，我认为非常正确。我今天固然代表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但本人向来是中共的朋友，在中共代表团诸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意提醒各位：国民党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责任落在你们肩上，我谨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民主的目标，建设国家臻

于富强康乐之境。

会议延至 23 时 15 分休会，双方同意会外继续协商。

4 月 14 日晚，中央代表团送来《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竹为定稿，不书“草案”字样。晚上 9 时，双方代表团再次在勤政殿继续开会。

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发言，对协定修正案做了详细的说明：

1. 我们对南京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凡是对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都尽量采纳，应该妥协的都尽量妥协，写成这个最后定稿。

2. 我们做了两个让步：第一、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双方机构采用合作办法，以解决一切过渡时期的问题。第二、军队整编委员会，不冠以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字样，就是说，军事整编，双方合作；政权方面，互相协商，但是解放军渡江和军队改编两点，我们不能让步，否则违反八项条件的精神原则。

3. 关于军队的集中整顿与改编，南京代表希望分两阶段进行，由双方各自负责，然后交由整编委员会统一处理。这是原则性问题，国民党打了二十多年的内战，靠的是反动武力，这个武力如不彻底消灭，另行改组，则内战仍无了之日，这点我们是不会退让的。

4. 关于解放军渡江接收地方政权问题，南京政府代表提出暂时行使政权，等到联合政府成立才交出来，这也是原则问题。军队是政权的先遣代表，北伐时就是在国民革命军中设政务委员会，军队所到，旧政权即予接收，新政权即行成立，这次人民解放革命运动，也不能例外。

5. 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们已接受了二十多处，主要的如战犯不提名单，“元凶巨恶”、“首要次要”等字样也删去；带刺激性的字眼如“反动分子”、“贪污分子”等字样也删去；关于军队整编，已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掉，改成“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6. 南京政府代表多次提出要求马上就地停战，我们没有同意，只同意协定签字后永无内战，并愿意在和谈期间暂不渡江。我们希望南京代表能说服南京政府毅然接受这个协定，并欢迎李德邻（李宗仁的字）先生、何敬之（何应钦的字）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贯贤先生能到北京来参加签字仪式。

最后周恩来正式宣布说：

“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订。但无论签订或不签订，到本月 20 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首席代表的最后宣布，有如晴空一声霹雳，使国民党的代表们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情绪又很快安定下来，意识到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原无足怪，心情马上转变为一喜一惧。喜的是中国问题将由此得到解决，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沉重灾难将由此得到解脱；惧的是个人今后怎么办？命运难以捉摸。

接着，张治中首席代表发言。他谈的不是对《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而是抒发自己的思想感受：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告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亦有历史作评判。

“孙中山先生去世 24 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

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

“近几年，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了，胸襟和态度都狭隘，应该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

“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实在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族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我们极愿把眼光放远些，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个时代，共同担当伟大的新的历史使命。”

这些话，是说给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听的，也是说给国民党代表听的，更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周恩来不无赞赏地静心听着。

最后，张治中又说：

“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大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这不但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是基于人类之爱、同志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我们同一民族里，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有能耐、有魄力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人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人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

对于张治中的这段话，周恩来马上加以纠正说：

“刚才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方，如果是指两个代表团，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根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以一道合作。但如果是指过去的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压迫中共及人民的历史，尤其两年又九个月的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和一切死硬派，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当年孙中山先生对清朝那拉氏的斗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

周恩来发言后，国共双方全体代表的会谈至此结束。

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住处，连夜开会充分讨论，一致认为中共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从全文看，虽然条件高些，但如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则唯有毅然接受。最后，大家推黄绍竑代表、屈武顾问把协定带回南京去，说服南京政府接受。

黄、屈于4月16日由北平飞返南京，即往见李宗仁，白崇禧在座。听了黄、屈的汇报，看了《国内和平协定》全文，李宗仁表示犹豫，白崇禧则极力反对，顾祝同则火速把协定送溪口呈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拍案大骂，说：“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国民党中常会随即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李宗仁、何应钦则立即给南京代表团来电，表示协定不能接受，请建议中共签订暂时停战协定。

是晚深夜12时，张治中接李宗仁、何应钦来电：

兄等此行劳苦，事虽不成，俯仰无愧。迎返代表团专机何时飞平请电告。

延至 22 日，张治中命人草拟电稿：

请于 23 日派机来平，预定 24 日回去。

电报发出后，张治中命人并正式通知中共代表团。

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团 21、22 两日一直商议的话题，大家基本上都愿意留在北平，投向人民怀抱。只有张治中反复强调：

“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的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中共代表团得到情况后，由周恩来、李立三、林伯渠一起来劝驾，表示恳切挽留，周恩来诚恳地说：

“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的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

对于中共代表的恳切真情，大家都认为有理，也都十分感动，只有张治中还是反复强调他“复命”的理由。至此，周恩来不得不恳切地对张治中说：

“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周恩来的话语恳挚、温和而又坚决，使张治中十分感动。

林伯渠和李立三也说：

“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的代表并没有马上撤退，以保持未来和谈恢复后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到了 23 日，南京方面果然派了一架专机飞平，以接回其和谈代表。然而走下飞机的竟然是张治中的夫人、女儿等一家七口，原来，周恩来唯恐国民党军政当局加害于张治中的家属，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趁机将其家属秘密送上了国民党接和谈代表的专机。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张治中于万分感动之中，再也不好意思说“复命”的话了。

事后证明，周恩来的话是完全对的。重庆解放前，蒋介石指使特务把杨虎城全家杀了，连秘书全家也下放过。逃台以后，为了找失败的替罪羊，把原浙江省主席陈仪，原武汉市长徐会之，原参谋次长吴石等人都杀掉了。张治中、邵力子本来是蒋的反革命两手中的一手工具，蒋逃离大陆，和的一手失去作用，“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张、邵等人的使用价值已经消失，而作为替罪羊则很合适。所以张、邵回去，必将成为阶下囚，其下场不是杨虎城，就是张学良。

北平和谈至此结束。一生为和平奔走的张治中将军，至此终结了毕生的和谈历史，掀开了他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工作的灿烂历史新篇。

九、 诤 友

张治中留居北平和亲人团聚后，虽然有了一时的欢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心情又渐渐苦闷起来，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他想：自己是个国民党员，现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了，人家会不会说自己是投机呢？蒋介石是国民党的

党魁，而自己是他的亲信、重要部下，现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了，人家会不会说自己是党员背叛了领袖呢？张治中被旧的伦理观念牢牢地束缚着。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等都来看他，劝他，帮助解脱思想上的包袱。最后，周恩来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十分坦诚的谈话：

“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

这一针见血的话语，尖锐中见着亲切，责备中透着真情，使张治中大有豁然开朗、顿开茅塞之感。是啊，为了大多数中国人

民的利益，还有什么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抛却的呢？

1950年，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中共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张治中极力拥护，写了几千言的书面意见送给周恩来，其中有“接受美帝的疯狂挑战，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等句。周恩来看后对他说：

“你这个将军这样激烈呀！别人可以这样说，你就不行，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说这话在国际上会有影响的，会发生误会的。”

这使张治中看到了在大政方针政策方面自己与周恩来的差距，也帮他提高了策略水平。

张治中到北平不久，就对周恩来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张通过中国的缓冲，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主张和各国发展贸易往来。他指出：各国人民贸易往来，互通有无是

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要同工业发达的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和清廷一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这些意见，都是有一定见地的。此后许多年，张治中每次外出参观

视察，都要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建议，供周恩来和党中央参考。他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在国号、国旗、国徽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在视察制度的建立上；在1954年制订的宪法草案关于

国家主席应否是国家元首的问题上；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的建议方面，都显出了他的独立思考，不盲从别人的特性。他的这些意见、建议，都受到周恩来和党中央的重视，好些已被采纳。

以道义相砥砺，在关键时刻进忠言，这是诤友。在周恩来、张治中交往中，彼此都是以诤友相待的。周对张如此，张对周也是如此。

建国以后，张治中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频繁而紧张，周恩来更是日理万机，废寝忘食。俩人除了公务上的接触外，从1954年起，张治中每年必邀请周恩来欢聚一次，周恩来从不拒绝。

十、周恩来悉心关照，张素初安然回国

建国以后，周、张两家都在北京，往来接触更加频繁。周总理和邓大姐对张治中一家非常关怀，体贴照顾，对张的生活以及子女的学习、工作都很关心。张的大女婿周嘉彬，1949年在甘肃会同新疆部队起义后飞往香港。解放后，张治中夫妇十分惦念。周

总理和邓大姐首先提出让周嘉彬和夫人张素我回国，并托在广州的叶剑英办理。这件事张治中夫妇很快如愿以偿。张的三女儿张素初原留学美国，也得到照顾，提早返回北京，与父母团聚。

这一年国庆前夕，张素我她们回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并

被邀请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周总理、邓颖超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和蔼可亲地问张素我：

“喜欢做什么工作？”

张素我回答：

“搞教学更务实些。”

于是，周总理把张素我介绍给外交部的王炳南。不久张素我被分配到外语学院担任教师工作，周嘉彬被安排到华北革大学习。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关怀下，张素我夫妇从此加入了新中国建设者的行列。

60年代末，我国政府释放了一批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周恩来授意张治中宴请在京的黄埔军校原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及家属。张素我和周嘉彬也被邀请。张素我在外语学院教书，下课后坐公共汽车赶去，迟到了。一到场，张治中就严厉地批评了她，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旁替张素我解释：

“她有课，有工作嘛。”

一句话，给张素我解了围，这虽是一件小事，却使张素我感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对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

十一、“你需要虎骨胶治病，现将尚存的两盒送上”

最使张治中一家感动的，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对张治中疾病的关怀。张患腿神经痛，老来频繁发作，步履维艰，坐卧不宁，甚是痛苦。周总理每次出国，常给张带来一些珍贵的药物补品。仅就1961年有账可查，经邓大姐手送给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亲收的就有：10月12日，虎骨胶两盒，燕窝一斤；10月17日，香蕉一大篓；12月20日，燕窝一斤。余湛邦手上还保存着邓大姐

1961年10月12日给张治中的亲笔信：

文白兄：

恩来告我，你需要虎骨胶治病，现将尚存的两盒送上，以供应用。这种药品是去年他访问柬埔寨时华侨所送的。另送你燕窝一斤，请晒收。

嫂夫人前问好

即祝

健康！

邓颖超

1961.10.12

十二、康主：张治中上黑名单；

周恩来：张治中做了件好事

“文革”当中，张治中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处境也很是困难。但他得知张治中受冲击的情况后，马上派人把他保护起来，并且在红卫兵集会上解释说：

“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江青在一旁也假惺惺地说：

“我们对张治中不为已甚，三到延安嘛！”

什么“不为已甚”！后来在康生、江青等人开列的人大、政协的黑名单中，“张治中”三字赫然纸上。康生还造谣说：

“马明方等叛徒同张治中勾结，隐瞒了叛变历史，回延安潜伏下来，是一批定时炸弹。”

周恩来针锋相对，批驳康生的谣言，在红卫兵、造反派的集会上指出：

“张治中释放和护送被盛世才监押的中共人员回延安是应我党的请托，对这批同志中央早就做了结论，没有问题。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

接着，周恩来还特地派人代表他到保护地 301 医院看望张治中，备致慰问之意，当了解到张的情况还好后，才放下心来。

由于周恩来的大力保护，张治中的处境稍好些，后来回了家。以后他因年老体衰，疾病渐多，于 1969 年 4 月 6 日去世。此时正是“四人帮”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仍然为张治中设立灵堂，并亲临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周恩来心情沉重地环顾四周，首先发现陶峙岳不在场，便叮嘱赶快通知他。然后看到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就想起张治中去世前手头还有一些机密文件，就对余说：

“你如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

十三、延续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中，张治中夫妇相继去世。敬爱的周总理也于 1976 年离开人世。邓颖超则把更多的爱心给了张治中的子女，张素我兄妹几人都不断感受到她那慈母般的爱心。

张素我的三妹张素初曾在美国读大学二年级，当时张治中写信，要孩子们都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所以她辍学而归。自 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缓解，素初在国外的同学纷纷写信邀她赴美继续读完大学。1979 年，素初决定到美国去留学。临行前，邓颖超接见了她，鼓励她说：

“要用功读书，广交朋友，为国服务。”

这三句话一直是素初在国外的座右铭。那天，邓颖超还送给素初一个蓝花布面的日记本和一个通讯录。最后，张素初、张素我同邓颖超在周总理的遗像前合影留念。

1988 年。邓颖超请张素我姐弟到中南海家中做客，素我和其二妹素央、小弟一纯都去了。邓颖超高兴地拉着她们姐弟几人的手问长问短，还风趣地谈到，在广东黄埔军校她和周恩来庆祝结合的宴席上，张治中开玩笑要“新娘子站在板凳上报告恋爱经过”一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接着，邓颖超把菲律宾总理马科斯夫人送的冰激凌端出来，让张素我她们品尝。热情的款待，和蔼的交谈，使张素我姐弟几人在邓颖超面前无拘无束，感受到了母亲般的关怀。

1990 年 10 月 27 日，是张治中 100 周年诞辰，与张素我她们阔别 42 年的大弟弟一真第一次携妻自台湾归来，邓颖超得知后，尽管身体不适，还是立即邀素我及其大弟、大弟妹及小弟去家中聚会。她对一真的回来表示非常欢迎，和她们谈到张治中曾为国共合作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然后鼓励一真说：

“你现在回来了，也可以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多做些事情。”

当邓颖超得知一真妻子因患乳腺癌做了手术，身体情况一直不好时，就关切地为其介绍了北京医院一位知名的中医大夫。一真的妻子后来一直找这位大夫看病吃药，直至回台后，还从台湾打电话请那位大夫继续治疗。

1992 年 2 月，张素我去医院看望病中的邓颖超，想不到那竟是与邓颖超最后的一次见面。望着她那清癯的脸颊，疲倦的面容，张素我真想让她安静

地休息，不要再说话。但邓颖超还是问这问那，还在惦念一真妻子的身体好了没有，当时她虽然被疾病折磨得有气无力，但语调还是那样亲切，笑容还是那样慈祥。张素我望着这位一生部在忘我地关心他人的长者，眼睛不禁湿润了。

张治中夫妇在世时，与周恩来夫妇时有馈赠和酬答，张治中夫妇去世后，邓颖超对张治中子女仍很关心，她曾派秘书带了兰州百合看张素我她们，有一次还将日本友人送的一个吉祥物送给张素我。邓颖超辞世后，身边工作人员按照邓颖超的意思，将她的遗物——套外国友人送的非常精美的麻纱刺绣编织餐具垫送给张素我留做纪念。张素我一直珍藏着这些纪念品，时时从这些珍贵的物品中感受到邓颖超的关怀与慈爱。

“先生乃千古功臣” ——周恩来与张学良

张学良（1901—）北洋军阀张作霖的长子，辽宁奉天人。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东北讲武堂毕业。历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卫队旅第二团团长、第三混成旅旅长、镇威军第三军军长、东三省保安司令。国民党政府军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西北剿总”副总司令。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扣捕蒋介石，迫蒋抗日，成为转换时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枢纽。后从西安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介石长期软禁。现移居美国。

1936年12月12日，随着华清池畔一声枪响，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一事变虽然事先中共并不知情，但张学良促蒋抗日思想的形成却与周恩来密不可分。早在这年4月，周恩来即与张学良秘密会见，作彻夜长谈，一致商定了联蒋抗日的方针。临别，张学良送周恩来地图一份，大洋三万，使周恩来大感意外。“西安事变”爆发，应张、杨之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协助解决。张学良闻讯大喜：周公来了，就有办法了。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转折点的转折点，张学良由此成为民族英雄。听到张学良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即赴机场劝阻，然而飞机已经隆隆起飞，张学良自此身遭软禁。从此，周恩来多方设法，呼吁释放张学良，虽无结果，但表现了共产党人不忘朋友的伟大胸怀。

一、学良秘留会周公，奉送大洋整三万

1935年冬，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里东际黄河，北靠沙漠，南临平原，西面荒凉，人烟稀少，道路崎岖，虽然比较荒僻，但是闹革命的好地方。国民党军要四面“围剿”红军，也不那么容易。但是，当时的陕北，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小，刚刚站稳脚跟的红军必须设法向外发展。如何发展？向何处发展？向南去，就要与张学良打仗，我党已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正在做东北军的工作，为争取一致抗日，不可采取军事行动，况且蒋介石的嫡系陈诚部在洛阳周围陈兵3个军，目标是对付红军。我军一面向南动，便会把蒋介石的嫡系大量引进西北。更主要的是，这时日本正在把侵略的魔爪由东北伸向华北。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局的基本特点出发，并结合西北和华北地区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苏区发展的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不宜向南、或北或向西，而应该是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革命根据地。东渡黄河有很多好处，可以把抗日的主张直接扩大影响于华北，可以解决经费给养，可以扩充兵员，开赴抗日前线，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结合起来。于是，在1936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准备率军渡河东征。

红军主力渡河东征，后方必须巩固。于是毛泽东在率军东征之前，就安排周恩来坐镇陕北，负责后方工作，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做张学良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不仅是抗日的需要，也是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一项重要部署，使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出师东征无后顾之忧。因为张学良当时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统帅着20万大军，布防在陕北苏区边界，在此情况下，做好张学良的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

周恩来先派在作战中被我军俘虏的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团长高福源回部，向张学良转达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同时，高福源被放回，这本身也是共产党有诚意的一种表示。所以张学良很快提出要与我党的正式代表会晤商谈。

周恩来十分高兴，便派李克农于1936年3月4日在洛川与张学良正式谈判。这次会谈是很重要的一步，是联合抗战的开端。李克农不辱使命，与张学良很快达成了几项协议，其中一项是：由中共代表请示中央，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直接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初步定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会谈中还确定由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于开展工作。

李克农回来后，将会谈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即电呈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毛泽东即刻电示周恩来：在适当时机会见张学良。党中央同时决定派刘鼎作为共产党代表常驻西安。

刘鼎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交谈，说明了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伟大意义。说得张学良十分高兴。张学良没想到共产党里竟有如此多的才高识远之人，对刘鼎肃然起敬，一定要留刘鼎住进他的公馆。这样，刘鼎便与他带的报务员，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东楼第一层东头南边的屋子里。刘鼎住进了张公馆后，与张学良时常见面，经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的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刘鼎也将张学良的态度随时报告中央。毛泽东得知张学良态度确有转变，始决定派周恩来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并电示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的肤施，正是东北军的防地。由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到肤施，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岭，约两天路程，周恩来只准备带二十多个骑兵警卫。由于蒋介石对张学良不放心，这一带到处是蒋介石的暗探，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

所以，有的同志不无担心地问周恩来道：

“为什么不叫东北军的代表到我们这里谈判，要是他们翻脸怎么办？”

有人附和说：

“是呀，上次谈判地点就在东北军的防地，就是对等，这次谈判也应该由他们上我们苏区来，这样才合情理。”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解释说：

“国民党没有这种气魄，不可能邀请各党派、各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应该积极采取行动，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这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再说，革命就是要担风险嘛。古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的脚步应该把肤施的路踩宽。”

又有人说：

“那就多带些兵吧！”

周恩来又笑了笑，说：

“这是谈判，又不是打仗。如果带了很多人马去，人家还会相信我们的诚意吗？昔日关云长单刀赴会，都安然无恙地回来，我有你们这二十多人马，谅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们也要相信张学良将军嘛！”

接着，他又问大家：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上南京去跟蒋介石谈判，同志们敢不敢去？”

大家坚定地表示：

“跟着首长，什么地方都敢去。甭说是去南京会老蒋，就是龙潭虎穴也敢闯。”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

“只敢去还不够嘛，还要弄清为什么敢去。”

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

“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祖国，我们哪里都敢去。”

周恩来连连夸赞说：

“好，好，只要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无所畏惧。以后上南京谈判，我还真想带着你们去哩！”

大家都高兴地拍起手来。

一切准备停当，即将出发。临出发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学良和王以哲军长，通知我方代表行期、接洽地点和会谈内容。电文主要内容是：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起程，8日下午6时前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商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告为盼。

电文发出，当夜就收到了张学良的回电，同意所列的条款和内容，会谈地点定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里。

接到张学良回电后，周恩来即带领李克农、高福源一行于4月7日起程，向肤施进发。这一天，天色阴沉，不一会便有鹅毛大雪迎面扑来，顷刻转成雨雪交加。周恩来一行冒着雨雪前进，于8日下午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周恩来让跟随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事不凑巧，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飞往肤施。刘鼎也随张学良同机到达。

为避开蒋介石的耳目，9日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悄悄进入肤施，走向谈判地点。此时彩霞依然停留在天边，肤施的轮廓依稀可见。肤施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过。城东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城东北的清凉山上有万佛洞和四季长青的松柏。可谓青山绿水，宝塔巍巍，把山城肤施映衬得庄严而美丽。

丽。

不一会儿，他们便来到了谈判地点天主教堂。周恩来在门口相等，高福源进去通报。教堂不大。但在肤施城里显得十分漂亮。它的大门是一列宽大的拱廊，四边有花环相衬，并饰以小象，两旁夹着两条有壁龛的柱子，往头是尖的。大门顶上有3条竖线花纹，竖线之上刻了一个抱着圣婴耶稣的圣母像。两侧外面有5个没有门洞的拱门，用花边描画出来。教堂四周建有围墙，显得安静而肃穆。周恩来左右打量，心想可能是因为这里无人打扰，便于保密；也许由于这里是肤施最漂亮的建筑物，张学良才选择在这里会谈。

周恩来正在教堂门口观赏之际，张学良闻讯出来，立即握住周恩来的手，颇为抱歉地说：

“欢迎，欢迎！肤施是我军布防的边境，蒋介石的暗探颇多，所以，对周先生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笑了笑。说：

“所以，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林木葱郁，绿水环绕，可是块宝地啊！”

张学良也说：

“对，对。肤施的确是个好地方。”

说着，周恩来与张学良携手走进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烛光的映照下，飘散着清醇的芳香。

一番寒暄，主客坐定。周恩来与张学良以前虽然互未见面，今天初次相会，却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张学良给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英俊；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印象是威武成熟，仪表堂堂。张学良心想：难怪人家说周先生是美髯公，真是名不虚传！那胡子多美，又黑又长，活似关云长再世。

周恩来为了活跃气氛，首先说：

“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张学良接上说：

“知道，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讲过。”

周恩来从未听说张学良在南开读过书，很是奇怪，便问：

“何以说张伯苓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直率地说：

“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

谈到这里，张学良爽朗地一笑：

“所以我和周公是同师啊。”

张学良这么敢于做自我批评，使周恩来感到他是个是信得过的痛快汉子，便由此入手继续详谈下去。

张学良也十分敬佩周恩来的勇气，心想：周恩来真算大胆，敢只身与我会面，如果我把他扣下他怎么办？因而，张学良也开诚相见。

俩人在直率、融洽的气氛中一直长谈近5个小时，气氛十分融洽，真是一见如故。

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坚决地说：

“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

会谈中，张学良希望进一步与周恩来商讨解决联共抗日的几个重大问题和难题。

当时红军东征山西，准备进入河北与日寇作战，并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口号。张学良对红军集中华北完全赞成。对在四川、云贵一带的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也完全赞成。他说：

“来多少都欢迎，经过东北军防区，我可以让路。”

但是他认为东征不如北上更稳妥，为此建议：

“红军北上抗日最好取道宁夏，绥远，解决降日的德玉，东向察哈尔。因为阎锡山部队防卫力量强，蒋介石又调中央军和地方部队入援，红军孤立作战，恐难立足。而且宁、绥人口多，粮食也多，可作红军后方；绥远邻近外蒙，便于取得苏联的援助。”

张学良是个痛快人，他热切希望红军早日与日军接火，这样，他就可以公开与红军联合抗日。否则他只能悄悄地和红军联合。

会谈中，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说：

“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

以前，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上决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所以当时李克农就回避了。此时，张学良又向周恩来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解释说：

“中共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其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意听听张将军的意见。”

张学良说：

“在国民党要人中，我只佩服蒋介石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据我回国后两年的观察，他有可能抗日。”

接着，张学良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对日本的态度。然后说：

“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谈到这里，张学良停了一下，说：

“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周恩来听后，表示能够理解张学良的想法，并且说：

“我党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

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政府已派入和共产党联络，准备同中共谈判。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等已由延安经东北军防线于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转达了这一信息。中共中央正在考虑联蒋抗日的问题。

张学良见周恩来没有批驳他，回答恳切，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心情很是愉快。联蒋抗日，是张学良企求解决的最大问题，他希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以壮大抗日力量，实现他率部打回东北去的最大愿望。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

张学良对发动抗战能否取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问：（一）他认为国家统一要集权，只有两条路，一是共产党式的，一是法西斯式的。同时讲了一通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的道理。（二）战争爆发，日本封锁中国海岸并扶植伪政权，中国如何取得外援？（三）日本对已占领要地固守如何办？日本内部能否起变化等等。

针对张学良提出的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式统治的观点，周恩来剖析了法西斯的本质，说：

“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法西斯是反历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没有群众基础。要抗日，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的。要发动民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联共。”

张学良听后，沉默良久，像是在沉思周恩来所讲的道理，从此便不再提法西斯主义了。

周恩来接着说：

“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完全封锁，军援既可得之英美，也可以得之于苏联。抗战持久可能引起日本内部哗变。”

张学良感到周恩来谈得一针见血，虽在有些问题上批驳了自己，但说得入情入理，他衷心佩服。

此外，他们在双方各派代表以及联苏、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上都达成了协议。但张学良还有个难题，就是他缺乏抗日干部，希望中共支援。在谈到互派代表时，张学良诚恳地说：

“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但我一个都不派。”

周恩来也坦率地说：

“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识字。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随时随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样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

周恩来看到张学良为干部少而苦恼，就帮他出主意：

“即使你有干部也要培养新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培训团。红大上面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训练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将来两边的抗大可以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

张学良懂得了干部要靠自己逐步培养，会谈后在王曲开办了军官训练团、学兵队等，用以培养抗日干部。这对团结、改造东北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教育了张学良，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他以后敢于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10日凌晨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年而印制的大地图（这是当时最精确的地图）送给周恩来，说：

“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

对于当时十分缺乏地图的红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宝物。

为了帮助边区解决经济困难，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三万块银元，以后又补送20万法币。

事后，周恩来对李克农、刘鼎等说：

“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对谈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周恩来第二天致洛甫、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再不进兵无以回答蒋（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说他隔岸观火）。”“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则须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事活动。”“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出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提出意见。”“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现有分化，蒋现在歧路上。他认为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他当离开他。”“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办，并可送弹药。”“彼此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大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

14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

从此，周恩来就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延安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周恩来感到张学良是在诚心诚意地交朋友，便于4月22日亲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唯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轸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并颂

勋祺！

周恩来 拜

4月22日晨

这封信，对张学良的评价甚高，对张学良的敬佩之情跃然纸上。刘鼎带着这封信回到洛川，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展读全信，深为周恩来特有的书法所吸引，更为信的内容所激动，十分高兴地对刘鼎说：

“今后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

张学良激动地来回踱着步，晃着手中的信对刘鼎说：

“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想象的好得多。我从未见到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给我印象很深。我和蒋先生相处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是否抗日。对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他第二步是要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这次会谈，使张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张学良所提的联蒋抗日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不久，中共将逼蒋抗日的方针改为联蒋抗日。从此，周恩来和张学良成为知己。而后，他们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共商抗日救国的具体事宜。

二、“周公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犹如平地一声春雷，突然爆发了。

这次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行抗日救国而发动的。他们一举扣留了蒋介石和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朱绍

良、卫立煌、陈调元等，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并没有与闻这件事。事变一发生，对中共已十分信任的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吸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中共中央接电后立即进行紧急磋商，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即复电张学

良：

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2月13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电张学良：

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

张学良复电：

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

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这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苏区以外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自然会引起举国的瞩目。国统区的人们期待着从周恩来的一举一动中来观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共的介入，能使“西安事变”有一个好的终结。在周恩来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在保安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周恩来面对的政治局势将会是十分错综复杂的，许多事都需要当机立断，不可能事事请示中央。

这是一副十分艰巨的重担。

周恩来勇敢而沉着地挑起了这副重担。15日清晨，他带领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共18人，扬鞭催马，迎风斗雪，驰向那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如卷席，陕北的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几度，当晚，他们在安塞住了一夜。第二天傍晚赶到延安北门外。

当地游击队已早早在此迎接，告诉他们，下午听到飞机的声音，可能是张学良派来接他们的，因为没有接到，又飞回去了。

周恩来不无遗憾地“唉”了一声，决定另辟新径。这时，延安城内还驻有民团，他们没有入城。17日清晨出发，绕过延安城西，到达城南两道川，准备到甘泉的张学良防地，坐汽车到西安去。突然，天空中又传来巨大的飞机轰鸣声。机警的周恩来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张学良派来的飞机，立刻写了条子，要张子华以南京来客的身份，进城同延安县长交涉，赶往机场。

这架飞机正是张学良的专机。张学良还派刘鼎随机来接周恩来。在机上，刘鼎向周恩来汇报：

“张学良在扣留蒋介石时，向执行者明确交代要抓活的，保护蒋，拥护他抗战，促其抗战。”

听到这个情况，周恩来心中稍安，认为同中共中央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对刘鼎说：

“‘西安事变’并未打垮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

讲到这里，周恩来满怀希望地说：

“希望张、杨两将军发动的这次事变，不要变成更大的内战，而能把抗战推进一步。”

飞机在西安机场徐徐降落。此时已是17日的晚上了，刘鼎陪周恩来一行到七贤庄一号稍事休息，剪掉胡子，随后就到金家巷一号张公馆去见张学良。张学良已在焦急地等待着周恩来的到来。12日那天他们虽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但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认识。许多事情都想等周恩来到后共同商议。凭着对中共和周恩来的极大信任，张学良对人说：

“周公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所以，周恩来一到，张学良就把他安置住在自己的公馆里。院子里共有

三幢小楼，张学良住在西边这一幢，周恩来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东楼。

此时已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六天了。这些日子里，局势在进一步的发展。南京政府里的亲日派何应钦掌握了实权，欲借讨张而置蒋于死地，他们已对张学良下了“讨伐令”，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刘峙已将5个师开进潼关，包围华县，进逼渭南。在重压之下，杨虎城部下的冯钦哉师也有不稳的消息。蒋介石的澳籍顾问端纳携带宋美龄致蒋、张的信件坐飞机到西安，由张学良陪同见了蒋介石。宋美龄给蒋的信中说：

“南京是戏中有戏。”

这使一直死活不开口的蒋介石受到很大震动。17日晨，蒋鼎文即带了蒋介石给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手令赴南京。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看法也很不一致：有的主张杀蒋；有的主张把他送到苏区去让红军处置；也有的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当领袖。

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周恩来来到西安后的当晚，即同张学良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一直进行到深夜。张学良先叙述了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映。当时，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直率地说：

“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我的意见是，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心想，难得张学良有如此高的见识，这确是从民族大义出发的，对张学良的看法立刻表示同意。说：

这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

但他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他的广大官兵的抗日思想日渐增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

接着，周恩来分析了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能导致“西安事变”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

“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

主义造成一个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

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

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周恩来的分析有理有据，明确而清晰。这一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同时，张学良对于中共能捐弃前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感到由衷的钦佩。

这是一个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周恩来当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他到西安后所了解的情况，并说：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准备“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一个处置办法当即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第二天，中共中央第一

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由于宋子文即将来西安谈判，周恩来同张学良见面的当天就一起商定了五项条件：

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他们又一起商定：为了迎击蒋军进攻，红军兼程南下，主力先开庆阳、环县击退胡宗南部，然后出渭水下游侧击从潼关西进的刘峙部。根据这项协议，红军先后进驻延安、瓦窑堡、延川、延长等城（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13日迁延安），并在西线控制了庆阳、环县、西峰一带。

当子夜钟声敲响的时候，会谈始告结束。这次会谈是富有成果的，双方达成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张学良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十分关心，因为从“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起，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连续发表文章指责张、杨勾结汪精卫受日本操纵搞政治阴谋。这更增加了张学良的疑虑。他一再询问周恩来这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却一时难以作出具体的回答。因为中共中央虽在“西安事变”当天中午即把事变情况电告了共产国际书记处，以后几天又连续将事变真相、性质和中共采取的和平解决的方针步骤电告国际，可是，直至周恩来动身去西安前，共产国际仍无只字答复。直到16日才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个电报，又由于密码差错，完全无法译出。中共中央在18日去电要求重发。毛泽东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及此事，说：“国际指示还未到。”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地确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周恩来告诉张学良：

“国际及苏联意见虽尚不知，但如日本及汉奸硬要挑起内战，我们只有在坚决防御下坚持抗日力量，争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汉奸，缩小内战，并连接到抗战上去。”

20日，共产国际的来电终于到了。毛泽东当晚8时立刻将电文转告周恩来。电报全文是：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这些意见，同中共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共产国际电报的到来，也使张学良吃了一颗定心丸。

三、“张汉卿是看戏中毒太深了”

宋子文坚决请求西安方面信任他，表示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以上各项，要求让蒋介石、宋美龄在25日离开西安。张学良同意，并表示愿意亲自送蒋走。周恩来同意这些条件，只是认为在走以前还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且不赞成蒋在25日就走和由张学良送去。但仅仅一天，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热忱的人，也是一个坦率、直爽的人。但他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容易感情用事，轻率冲动。准备放蒋的消息一传出，西安内部引起很大震动。25日一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口气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

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

蒋介石看到信后不禁大吃一惊，立刻要宋子文会见张学良，恳求他尽早放蒋。张学良怕闹出乱子来，也觉得不如把蒋介石早点放走，以免发生意外。

12月25日下午三点多钟，张学良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驻地，乘车直奔西郊机场。行动非常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蒋介石临别时对张、杨说：

“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蒋介石还把答应六项条件重申了一遍。张学良当即表示：愿意陪蒋先生回南京。接着就在飞机旁写了一个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在蒋、宋登机起飞时，他也登上启己的座机跟着飞去。这时已是下午4时了。

周恩来得到消息，立即乘汽车急驶机场，但此时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望着远去的飞机叹息道：

“张汉卿（张学良的字）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太深了，他不但（像窦尔墩那样）摆队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蒋介石一离西安，态度立刻发生了很大变化。飞机一到洛阳，蒋介石到了嫡系部队的地盘，马上有恃无恐起来，立即命令张学良让杨虎城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等被扣的高级将领。张学良电告杨虎城照办，西安方面遵照执行了。以后，又要西安方面放回被扣的50架军用飞机。但到了南京后，蒋介石更加变本加厉起来，立即命令将张学良软禁。12月30日，蒋介石又在南京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开庭审理。第二天，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几天后，又由国民政府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是蒋介石为了既挽回面子，又以儆效尤所玩弄的把戏。从此，张学良便失去自由，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徒生活。西安方面最初还希望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到南京后，能在三五天内安全返回来，这时才如梦初醒，确知他回不来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在1937年1月5日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俩人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就有12个师。他们不仅对“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等承诺完全食言，并且进一步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20年后，周恩来谈起此事时还说，“汉卿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是个遗憾，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对张学良为国家牺牲一切的举动十分赞佩。

周恩来与张学良这次相聚只有八天，但是在风云变幻的斗争中，他们相知更深了。

四、“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但交了一个朋友”

为了保卫“西安事变”的成果，为了营救张学良，周恩来和杨虎城以及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紧急磋商，连设七道防线，令红军南下驰援，做好防御。1月10日，周恩来致函张学良，表明红军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进退，并盼他回西安主持大计。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

自兄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

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足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及周，蒋先生休假

归里，中央大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尤以整理西北部令，直视西北如无物。杨先生虽力持慎重，查一般将士之义愤填胸，兼之以中央军着着进逼，战机危迫已在眼前。弟居此仍本蒋先生及兄在此时所谈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一贯方针，尽力调处。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时机危迫，兄虽处不自由之地，然一系西北安危，请即商量蒋先生乃依前今尽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弟纵处客位，亦当尽力之所及，为赞助蒋先生完成抗日统一大计，而首先赞助兄及杨先生完成西北和平伟业也。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蒋先生及兄均知之，必能辨其诬。弟敢保证，凡弟为蒋先生及有关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实践。只有蒋先生依预定方针逐步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大业可立就也。非者，任令大兵进逼，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至痛者，徒供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所称快。吾望蒋先生及兄有以制止挽救之也。临颖神驰，伫候明教，并希为国珍摄万岁！

周恩来

10号

11日，周恩来又致函蒋介石，要他实践在西安的承诺，撤兵释张。并表示：“我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他同时也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即去南京谈判的邀请，说：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周恩来的信，表示了对张学良的深切关怀，同时也使蒋介石假与红军谈判之名分化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伎俩无从施展。

西安形势稳定，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就又提出新的条件，要求和西安方面谈判。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欣慰地说：没有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

张学良是东北军唯一的领导者，东北军以他为核心团结巩固。他被蒋介石扣留后，东北军内部派系矛盾便日趋激化起来。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枪杀了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东北军面临着自相残杀的危险，西安又面临着内战的危险。为了坚持和维护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反对内战，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张学良惨淡经营的东北军，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在王以哲被枪杀后仅一个小时，就第一个赶到王宅，只见王以哲躺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他立即与刘鼎等人料理后事，设灵堂，以祭奠死者，安慰生者。周恩来还派共产党员刘澜波到渭南前线向要为王以哲报仇并进兵西安的刘多荃师长说明真相，陈述利害，要他偃旗息鼓。同时，周恩来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派刘鼎将少壮派首领孙铭九等三人送到红军驻地三原，而后转赴天津。这样既使少壮派失去了首领，不致再肇生事端，也使对方失去了报复的对象。因而防止了事态的扩大，坚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对于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张学良铭记在心中。“二二事件”半个月后，张学良在溪口对前去晋见他的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说：

“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但交了一个朋友，望袍泽今后维持这一友谊。”

在张学良被囚禁的几十年中，无论风云怎样变幻，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都是一致的。他肯定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

战的一个历史转变关键”。周恩来认为张学良是民族英雄，是“千古功臣”，对张学良的安危始终极为关怀，一有机会，便向社会呼吁，向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

五、“营救汉卿不要急切从事，我们已与台湾的人打了招呼”

1946年初，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有一天在会议上，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发言说：

“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这番义正词严的谈话，使在座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们一个个满脸羞惭，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得知上述情形后，十分感动地说：

“如家兄知道此事，必为他得到这样一位知己的良师益友，而感到由衷的愉快和安慰！”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离开重庆去南京前夕，在出席重庆文化界举行的话别茶会上，有人提起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

“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10年鱼的人，他这10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

大家听了这番苍凉的话语都十分难过，周恩来的眼内更是闪烁着悲恸的泪花。

同年12月12日，在延安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又严正地指出：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10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将军。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

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召开“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在会上首先说明，为了争取台湾和平解放，这次纪念会只是小规模地座谈。接着，周恩来对张学良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当年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北上抗日。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后，发现他们的士气也是要抗日，再加上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全国舆论抗日。这种民气人心影响了张汉卿，造成了当时的局势。这两支部队受广大人民和共产党的影响要求抗日，西安学生请愿，以后发生“七君子事件”，最后逼出了“西安事变”。因此，“西安事变”反映了人民抗日的意志。当时有两种可能，一是放蒋，一是杀蒋，我们是不主张杀蒋的。至今张、杨二人，一位牺牲了，一位囚在台湾。他们是千古功臣。张汉卿20年来始终如一，“西安事变”时的心情至今未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怀念他，尊敬他。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是很得人心的，不能不影响蒋介石及其内部，我们应该多做些工作。营救汉卿不要急切从事，我们已与台湾的人打了招呼，如果他们一定要置汉卿于死地，大家将来也不好见面。有人要以死救汉卿，结果自己陷进去了；也有人想用美国的力量救汉卿，这种办法是无效的。只

有一个办法，就是造成不能杀汉卿的形势。要做争取台湾、香港的工作。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情况，希望大家来写，交统战部或政协汇集。

周恩来在会上交待：凡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及记述首先要顾及他本人的安全；凡东北军的和张学良旧部有困难的均要照顾。

建国初期，有关部门对东北军上层人士均有所安排，以后范围更加扩大。

1959年5月25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便宴，迎接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从国外胜利返回。宴会上，周恩来谈笑风声，整个大厅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谈笑中，有人提到《参考消息》上登载张学良被处死的消息。虽然后来查明这个消息并不确实，但当时却引起了周恩来的强烈不安。他那谈笑风声的愉快神色顿时消失了，疑虑和痛苦的神情涌上了眉梢，两条又粗又黑的眉毛紧紧地拧在了一起。沉默了好长一会儿，他才沉重地说：

“我们不应当让张群跑掉（指1949年12月卢汉在昆明起义时，已被扣留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被放走一事），不然，可以拿他作为人质来交换张学良将军。”

“西安事变”25周年时，周恩来、邓颖超又邀请张学思、张学铭夫妇等二十多人在北京饭店共同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周恩来在致词中又一次肯定“双十二事变的本身意义，是在于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转变关键。从此建立了两党合作的必要前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当时，以张学良名义发表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已经披露，这是经台湾情报部门篡改后发表的，标题是诬蔑性的。席间，大家谈起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时也猜度此文，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感情激动，向周围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潸然泪下，沉默了一会儿，才深情地说：

“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

高崇民在悲怆中即席赋诗，后两句是：

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

周恩来听后纠正说：

“‘憔悴’二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说一人奋斗在东南。”

周恩来看了“忏悔录”后说：

“其中有许多是张学良说的，他说的是真话，如说发动“西安事变”未曾和共产党商量，这是事实，很重要。蒋介石幻想张学良在这个问题上诬蔑共产党，但张学良始终坚持事实，宁折不挠。

为了永久纪念“西安事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永远铭记张、杨两将军的功绩，在这次纪念会上，周恩来提出要编写“西安事变”信史。他说：

“发动‘西安事变’是秘密进行的，许多事档案不会有记载。目前参与事变的人绝大多数在大陆，可以让他们写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

根据周恩来上述指示精神，后来全国政协编辑出版了多册有关回忆录，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弥补了档案之不足。

六、与张学良的亲属们

对张学良的亲属，周恩来可谓关怀备至。

1952年，为了解决京津两地张学良家属的生活问题，周恩来特地指定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经手，由全国政协出面，将北京的张家产业承顺王府作价购买，钱款按张学良的家属人数平均分配，每人1万元。对于在海外不能回来取款的，也把应得的份额存入银行，待以后支取。

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1933年加入共产党，周恩来一直关心着他的成长。解放后，张学思被调到海军任副参谋长，1956年又被送到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深造。开始，苏联不理解为什么派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来学习，不肯接收。周恩来亲自向苏方做了说明，张学思才得以入学。不仅是张学思，张学良在大陆的其他亲属也都得到了安排和照顾。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夫妇被安排任全国政协委员，二妹、四妹及有病的八弟均受到照顾，就连过去服侍过张夫人于凤至的王奶奶和她的寡女都由全国政协发给生活费，数额与文史专员工资等同。王奶奶活到九十多岁才故去。她的寡女仍由政协赡养。

十年动乱期间，当周恩来得知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而病重时，挥笔疾书：“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301或其他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残酷迫害，张学思于1970年5月29日含冤病逝。周总理闻讯后不胜悲伤，几次指示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在毛主席、周总理、叶剑英的亲切关怀下，海军成立了张学思专案复查组，经过了三年努力，终于在1975年4月为张学思平反。

1974年9月29日晚，因癌症住院的周总理仍在灯下细细地翻阅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二千多人的名单。这个名单是要见报的，睿智的总理常常用这个机会为一些人平反。他边看边增加一些受迫害同志的名字。名单的第十七类，是统战部提出的，在这里他见到了张学铭的名字，感到宽慰。为了保证这些人能出席招待会，都能见报，他提笔给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写信，加以说明：

“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正操）案解（方）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

写到此，他仍不放心，又写道：

“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此时此刻，病情严重、仍然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仍然惦念着张学思、张学铭，更惦念着在台湾的张学良，并将无限思绪集于笔端。

七、“赵四小姐，聪明贤慧啊！”

1958年秋，周恩来来到北京东四八条访问张学良二弟张学铭，见到张学铭的夫人朱启筠时，总理问道：

“你认识赵四小姐吗？”

朱启筠回答：

“我和她从小同学，很熟。”总理听了很有感慨地说：

“赵四小姐，聪明贤慧啊！”谁都知道，赵四小姐名叫赵一获，她不惜抛弃优越条件，“自投罗网”，甘愿做一只比翼鸟，几十年一直与张学良相依为命，患难相从，始终不渝，这些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人间佳话，传为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美谈，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慕，事迹十分感人。周恩来给予她很高的评价，这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赞扬，而且表达了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深

切关怀。

八、口红里，夹着周恩来的纸条：“善自珍重，后会有期”

周恩来不仅关心着张学良在大陆上的亲属，而且也无时不刻不在记挂着在台湾的张学良本人，并想方设法托人给张学良捎去口信。

一天，住在香港的原西安绥靖公署高参郭增恺的夫人专程到台北，借在教堂做礼拜的机会见到了张学良夫妇，郭夫人悄悄地将一支口红给了赵四小姐。原来，口红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是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纸条上共 16 个字，后 8 个字是：“善自珍重，后会有期。”

九、临终前十八天，周恩来指示： 一定要设法关照好张学良

文革十年，周恩来殚精竭虑，心力交瘁。1975 年秋，他已是病体沉疴，卧床不起。但当他得知张学良患眼疾几乎失明的消息，十分焦虑，即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在临终前 18 天，周恩来还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向他交待一定要设法关照好张学良等。谈完这件事，周恩来吃力地说：

“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再谈。”

说着，便昏睡了过去。周恩来，十亿人民的总理，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仍念念不忘张学良这位“快慰平生”的朋友。

1990 年 6 月 4 日，张学良 90 初度，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专门致电张学良，向他祝寿，其中写道：

去台之后，屋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景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当牟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之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想先生思之亦必欣然而自慰也……我和何辈朋友们遥祝先生善息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

这里，邓颖超所表达的不仅是自己的衷心祝愿，也包含了周恩来生前未能实现的心愿。

“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

——周恩来与杨虎城

杨虎城（1893—1949）字虎臣，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陕西蒲城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参加陕西护国军。1917年任陕西靖国军第五路司令。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9年任国民党政府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接受停止内战，接受一致抗日的主张。1937年6月，被蒋介石逼迫离开军队出国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11月回国，随即被蒋介石长期监禁。1949年9月在重庆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随着华清池畔一声枪响，杨虎城与张学良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应张、杨所邀赶赴西安，及时做通杨虎城的工作，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枢纽。杨虎城被蒋介石扣捕后，周恩来多方呼吁营救，并一直关心着其后代的成长进步，将其后代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

一、“周公诚可鉴人，我杨虎城 更要以抗日大局为重”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于17日到达西安协助张、杨解决事变。第二天上午便到九府街杨公馆拜会杨虎城。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的友好关系，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杨问候。接着，周恩来向杨说明了昨夜同张学良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杨虎城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十分惊奇，因为他原来估计：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有长达10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虽不至立即杀蒋，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周恩来提出的和平解决方针，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杨虎城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感到对蒋介石将来能否抗日，是否不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施行报复，不能不有所顾虑。说：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我和张学良将军的处境就和共产党有所不同了。”

周恩来对杨虎城的这种顾虑表示理解，做了耐心解释。说：

“现在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迫蒋介石抗战，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英美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他制约日本，反法西斯阵营也争取他走抗日的道路。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虽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

杨虎城听了周恩来的意见后说：

“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会见时，周恩来还就红军误杀杨部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在同杨达成协议后又曾突袭杨部这两个问题，代表中共做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原来内心还存在的一些疙瘩。连连说：

“周公诚可鉴人，我杨虎城更要以抗日大局为重。”

二、“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突然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留。杨虎城受张学良的委托，名义上可以指挥东北军，但十七路军的力量远较东北军为小，而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又没有人能帮

助他共同控制局势，这就使他感到十分为难。

两军的高级将领，在张、杨扣蒋、实行逼蒋抗日、在西北结成三位一体时，他们能团结在张、杨周围；但少数人对联共本有一定的保留，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对两军进行分化收买、形势发生不利于西安方面的变化时，他们中不少人又有了不同程度的动摇。

这样，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西安实际上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针对西安内部这种状况，为了进一步实行分化，在张、杨两部间制造矛盾，南京方面在谈判中故意提出甲、乙两种方案，让西安方面选择。甲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乙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在这两个方案中，接受甲案则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东北军东开后“三位一体”自然瓦解。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信，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写信，劝他们接受乙案。这样，西安内部的矛盾就更明显：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回来，其他一概不论。

周恩来在西安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涉友军的内部事变，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处在建议和赞助的地位。1月15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对胜利没有把握。

周恩来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具体局势，向杨虎城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为了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虎城、于学忠（张学良部高级将领，受命统率东北军）通电就职。第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并可伸至咸阳。第三，主要的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

杨虎城依周计而行。

1月20日，派去见蒋的代表李志刚回到西安，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开会，会上没有谈出结果。第二天，请周恩来参加。这次会议决定：派李志刚携杨函再飞奉化，接受蒋的甲案，并对中央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驻防地区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张学良如一时不能回陕请给以名义。红军同意退回陕北。30日，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在潼关大体商谈就绪，采用甲案。

这在当时，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只要三方联合一致，实现这个方案，对西北局势尔后的发展是有利的。

然而，局势却在悄悄地起着变化。东北军中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少壮派军人为救出张学良，决心与中央军开战。杨虎城从今后十七路军及自己的前

途命运出发，也赞成打。

1937年1月28日天还没有亮，过去与杨虎城有过交往的南汉宸赶来向周恩来报告：凌晨3时，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杨虎城最后说：

“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周恩来听后，立刻对南汉宸说：

“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得对不起朋友的事。”

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红军司令部所在的三原开会。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

当晚，周恩来即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且对他们说：

“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很快，毛泽东、朱德等从延安来电，也同意这个方针。

少壮派的活动这时更为激烈。在他们的提议下，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出席。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战。决议由到会的四十多个军官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不同意渭南会议的决议，但又无法说服少壮派。为了稳定局势，第二天，他们派飞机到兰州把于学忠接来，因为他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代他统率东北军的。31日晚上，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级会议，参加的有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人，少壮派在室外旁听。会议一开始就出现长时间的沉默。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讲。周恩来说：

“我们今天是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

杨虎城又请于学忠讲。于学忠这才表示：

“我的意见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

接着，于学忠分析军事形势，认为现在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是不利的。王以哲和何柱国本来都是主和的，马上表示同意。杨虎城见东北军高级将领的意见已经一致，就说：

“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

杨虎城最后又问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

“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

最后，周恩来着重地说：

“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还会发生问题。”

事情的结果不幸为周恩来所言中，果然出现了严重的情况。这次会议的结果，与少壮派所期望的正好相反：不是由杨虎城下动员令出击，而是立即派和谈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去继续谈判，准备签字。少壮派仍不甘心，认为这只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于是，不顾大局，决心除掉王、何。2月1日晚，街上已贴出“除奸”的标语，西安城内的情势急剧地紧张起来。2月2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由卫士营一批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开枪将王打死。何柱国由于躲在杨虎城公馆里，才没有被害。

少壮派原以为只要除掉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同中央军打仗，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掉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久等必须离开西安。3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孙铭久等人，问他们何以自处。

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这时也慌了，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在这样复杂而困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

这些人一走，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了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后来，杨虎城被蒋介石逮捕。关进监狱。周恩来曾多次呼吁释放张、杨。

三、周恩来亲自关照，杨拯民得到解脱

周恩来在为释放张、杨积极活动的同时，对杨虎城的后代也给予了悉心照顾，与杨家的友谊在继续进行着。1944年秋天，组织上决定把已经参加革命工作的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从中共米脂县委调往关中军分区，周恩来于百忙中专门找杨拯民谈话，当时陈毅拿着电报来找周恩来商量事情，邓颖超在一旁看到杨拯民十分拘谨地坐在那里，就主动走过来和他聊天。她十分亲切地询问了杨拯民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等情况，使杨拯民感到非常温暖，精神也放松了许多。一会儿，陈毅走后，周恩来又继续和杨拯民谈了起来，这时候，邓颖超很自然地走到一边去了。

谈完话，周恩来和邓颖超带杨拯民去杨家岭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饭堂去吃饭。途中，周恩来不时被人拦住交谈。到了饭堂，杨拯民看到都是中央领导同志，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外，刘少奇、任弼时、李富春、陈毅等同志均在这里吃饭，有些不知所措。邓颖超又来和杨拯民闲谈。她告诉杨拯民：

“经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食堂有六菜一汤，主食有米饭、馒头、面条，你要多吃一点，喜欢哪样就吃哪样。”

邓颖超的热情周到，使杨拯民紧张的心情缓解了许多，温暖之情油然而

生。

1962年，杨拯民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有机会再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看完电影，邓颖超一下子看见了杨拯民，马上叫住他：

“你不是杨拯民吗？”

说着，她随即转身告诉了周总理。

周总理和蔼地说：

“我见过他的，他现在已经在陕西省委当书记了。”

杨拯民真没想到，相隔18年之久，邓颖超大姐在电影场还能一下子认出他来，使他十分激动。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杨拯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只好给总理写信。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没过一星期，杨拯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总理病重期间，杨拯民多方打听，想去探视，连写了几封信给邓颖超，希望看望总理，但均未能如愿。总理逝世后，天津当时在“四人帮”控制下，不让杨拯民来京参加吊唁活动，经过杨拯民多方努力，直到最后一天中午，王炳南才打来电话，叫杨拯民下午3时前赶到北京医院。这才得以向最敬爱的总理致了最后的敬意。

1979年，杨拯民突犯心肌梗塞被送到医院抢救，邓颖超知道后，立即给医院打电话，要求尽力抢救。由于她的关怀和医院的努力，终把杨拯民从死亡的边缘挽救了回来，并且在第一线继续工作了八年半。1987年，杨拯民第二次心肌梗塞，邓颖超又一次给予了直接有力的帮助，再次挽救了杨拯民的生命。此后，邓颖超又批准杨拯民到国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

有一次，邓颖超到西安视察工作，专门派秘书到杨拯民家，探望长期卧床的养母张惠兰，并带来邓颖超的礼物，慰藉老人，使杨拯民全家深受感动。1992年3月份，已是重病缠身的邓颖超得知杨拯民生病住院的消息后，又派人到医院看望，并送礼物表示心意，叮嘱杨拯民配合医生，积极治疗。

“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周恩来与阎锡山

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字百川。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投靠蒋介石集团，任国民党政府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与冯玉祥等出兵反对蒋介石，失败后逃往大连。1931年在日本支持下返回太原。1932年任太原绥靖主任。1936年阻挠中国工农红军开赴前线抗日。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推动下，曾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建立抗日决死队，进行抗日。在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于1939年发动“晋西事变”和“晋东南12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屠杀共产党员和牺盟会进步分子，摧残山西的抗日政权。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并暗中与日军勾结。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友人民的内战。1949年3月逃出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后逃往台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

阎锡山在国民党军中素有老谋深算之称，城府颇深。然而，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却处处被周恩来牵着鼻子走。他想让八路军打头阵，既替他打了日寇，又损耗八路军的实力，被周恩来一眼看穿，委婉回绝。他请周恩来代拟作战计划，没想到周恩来一天之内即将计划拟好，他完全按这一计划指挥作战，并由衷地赞叹：周先生是一个大人才，国民党里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周恩来和朱德策划的平型关大捷，使他深为佩服八路军的战术，并向蒋介石如实汇报战绩。

一、阎锡山：如照周先生的办法打，中国必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军向上海举行大规模进攻，蒋介石不得不同意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开赴抗日前线。8月22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先头部队从陕西三原地区出发，31日由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一二九师主力也在9月3日从陕西富平出发，随一一五师之后东渡黄河。八路军入晋后，由于阎锡山控制着山西的军政大权，许多问题需要周恩来前去和阎锡山谈判处理。

9月3日晚，周恩来和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乘火车从西安出发。第二天到达潼关，换乘木船渡过浊浪滔滔的黄河。在黄河对岸的风陵渡，阎锡山派来迎接的梁化之早已在此恭候，于是搭乘阎锡山派来的由两节车厢组成的专列小火车开往太原。阎锡山为了自成一体，在山西搞独立王国，把山西境内的铁路都修成了窄轨，以防他人进入山西长驱直入。其狡猾多谋由此可见一斑。周恩来将要面对的，是一个顽固而强硬的对手。路上，周恩来即同聂荣臻商议如何解决部队出征后面临的种种困难。周恩来说：关键仍然是发动群众，有了群众的支援，一切问题都比较好办了。过侯马时，聂荣臻等下车，率一一五师先头部队继续北上。周恩来等人在5日下午到达太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

从风陵渡一路过来，满目疮痍，到处是兵荒马乱景象。日本侵略军节节推进，已逼近晋东北边境。山西境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那年秋天，暴雨成灾，数万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大量从冀绥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

游勇和伤病员四处流浪，无人收容，更增添了混乱气氛。阎锡山派来迎接的军政官员个个都是忧心忡忡。而周恩来却充满着信心，同他们纵谈抗战形势和必胜的前途，处处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借以影响阎部军政官员。

阎锡山是山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从辛亥革命时起已统治山西 20 多年，一向闭关自守，不许其他政治势力侵入。过去，他奉行亲日反共政策。1936 年初，红军东渡黄河抗日就遭到阎锡山军队的阻挠。这时蒋介石的军队却乘机以“剿共”为名，大举进入阎锡山经营了 20 多年的独立王国。红军班师回陕北后，开入山西的中央军仍然赖着不走，这对阎锡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他曾经对手下人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对山西构成严重威胁，使日阎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使阎锡山深切地感到：降日、迎蒋都不是出路，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于是不能不另行寻找暂时的同盟者，向中国共产党求助。

于是乎，就在红军东征回师不久，阎锡山即秘密派人同中共中央联系，要求派遣全权代表长驻太原。1936 年 11 月初，曾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委的彭雪枫，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太原，建立秘密的联络处。随后，经阎锡山同意，设立同延安联络的秘密电台。“七七事变”发生后，又成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由彭雪枫任主任。

阎锡山的这一举动，部下有许多人不理解，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嘿嘿一笑，显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神秘地说：

“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只能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这就是阎锡山的如意算盘。

所以，当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时，阎锡山同意八路军经同蒲铁路开往前线。

对于阎锡山的这种两面性，周恩来可说是洞若观火，这次到山西，他就是利用阎锡山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一面，推动其抗战，以趋利避害。

9 月 5 日中午，周恩来等抵达太原。

秋夜静悄悄，凉爽而宜人。闪烁的灯光下，周恩来正在伏案疾书起草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文。他已经见过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秘书长贾景德等。但具体问题他们都不能解决，必须与阎锡山当面交涉。当时，阎锡山不在太原。几天前，为了作出抗战的姿态，阎锡山到设在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前线司令部去了。周恩来报告毛泽东，他将立即出发到岭口去见阎锡山。

汽车的马达声在夜幕中震响。此时正是农历八月初一，夜空只见星光不见月亮，周恩来和彭德怀、徐向前连夜赶赴代县的太和岭口。在他们身后，成千上万的八路军正在开向抗日前线，他们必须赶在前头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妥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以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等问题，并从事实上确立我党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阎锡山满脸堆笑，在他司令部的院子里迎候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一行。

阎锡山与周恩来虽是初见，但对周恩来却是早闻其名，所以不能不对这位客人刮目相看。他知道：早在 20 年代，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20 多岁的周恩来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多少年来，周恩来一直是声

名赫赫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到西安说服张、杨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一个周恩来，一个彭德怀，还有黄埔高材生徐向前，这样的谈判对手，阎锡山不敢等闲视之。

“周先生，彭先生，徐先生，三位一路辛苦，休息一下再谈如何呀？”阎锡山边由梁化之搀扶落座，边对周、彭、徐说。

“谢谢阎先生关照，请不必客气。”周恩来接着又说：“我们的军队正开往前线，许多事情需要立即与阎先生商谈。”

周恩来端起精致的茶杯，一边品着阎锡山准备好的香茗，一边看着阎锡山，说：

“八路军属于第二战区战斗序列，我们全军愿意受阎司令长官节制，以后还要请阎先生多多指教。”

“好，好。”阎锡山显出一副极为高兴的神色。

“不过，阎先生，八路军基本的作战原则，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周恩来特意加重了“独立自主”几个字的语气。

阎锡山半张着嘴，认真地听着这些新鲜的道理。他看看周恩来，轻轻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

“阎先生，从战争开始的这一阶段看，日本军队来势凶猛，整个形势目前是敌强我弱。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发动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周恩来用了较长的时间，详细分析了全国和山西的抗战形势，解释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阎锡山听着，频频点头。

接着，周恩来提到了刘汝明和汤恩伯在南口败北的情况。听到这里，阎锡山突然来了兴致，随口吟出他的一首新作：

南口之役失权衡，
准备毫无守何成。
八万精兵损半数，
致使雁绥枉经营。

阎锡山是惯于推卸责任的。周恩来听了，客气地报之一笑。

“阎先生，我们进行抗战，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广大群众是要抗日的。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听了周恩来关于要发动群众的一席话，阎锡山忙接过话茬说：

“我早就知道这是重要的工作，前年在南京开会时，我首先提出的就是武装民众500万，到现在尚未得到指示。在这紧急时候，我们可以在第二战区首先试行。”

周恩来看看身边的彭德怀，对阎锡山说：

“我们赞同阎先生的意见，请阎先生考虑，战地群众的动员问题是否应该有组织地进行？”

“对对对，我们有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战地动员可以再成立一个组织。”

经过反复商谈，双方最后商定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中共、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共同组成，第二战区高级参议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并由中共主持拟出工作纲领，经阎锡山同意后实行。

关于动员群众问题，周恩来接着说：

“阎先生，要动员人民群众，就要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实行战时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

对于这一建议，阎锡山沉吟半晌，没有吭声。

梁化之为免尴尬，也为了拍阎锡山的马屁，马上接过来说：

“我们山西在司令长官治理之下，嗯……国泰民安！”

周恩来瞥了梁化之一眼，笑笑说：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要努力做到一点，就是要动员群众抗战，就必须考虑并且实行给群众以利益，不能采取一种十足的绅士态度。”

“这个自然，这个自然。”阎锡山向后仰了仰身子，极不自然地说。

“阎先生，关于八路军的地区问题，我们的设想是在灵丘一带地区布防，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知阎先生意下如何？”稍停了一下，周恩来接着又说，“这个地区是在太行山北端，向北可以伸入到敌人背后，配合友军作战。”

听到八路军的作战问题，阎锡山来了精神，马上说：

“我已经命令部队，要固守内长城防线，重点防守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一带，希望八路军给予配合。”

彭德怀接过来说：

“我军可以开到五台、灵丘地区，配合友军布防平型关一带，于侧翼待机歼敌！”

“很好。”阎锡山表示赞同，“贵军可以在太行山北端进行游击运动战。不过，这里是山西、河北的交界地区，河北方面的事情还是请你们与徐永昌、刘峙商洽才好。”

周恩来点点头，说：

“我们准备去河北走一趟。这里的问题与阎先生谈妥了，河北方面估计不会有什么阻碍。”

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又向阎锡山详细介绍了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阎锡山饶有兴趣地听着，待周恩来讲完，他说：

“周先生可否把刚才说的内容写给我？”

周恩来欣然应允：

“好，我明天就写好交给阎先生。”

“关于我军的装备补充问题，请问阎先生有何见教？”周恩来不失时机地问道。

“嗯，装备补充么，这么办，先给你们30门炮，4000发炮弹，我下令兵站调运给你们。”

“我军在山地进行游击战，请阎先生考虑配备适用于我军作战的武器装备。”周恩来补充说。

“好的，好的，装备嘛，以后还要继续补充。我对贵军也有一个要求，希望贵军在山西省内不要更换所在县的县长。”阎锡山是个土皇帝，一向视权如命。

周恩来当然了解阎锡山的心态，为了团结抗日，爽快地回答：

“我军在活动区域内，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请阎先生令知各县县长对我军的抗战活动提供方便，并将我军的活动地区与任务通知当地友军。”

有了周恩来作出的此项承诺，阎锡山不禁笑逐颜开起来，又对梁化之说：

“这件事你去办！”

对阎锡山当时表示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周恩来等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希望他履行诺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周恩来说：

“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阎锡山搞的是阵地防御战，从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他的基本打算就是依托这些工事“守土抗战”。应该说，许多工事还是修得不错的。在参观雁门关防御工事后，周恩来在称赞工事修得坚固并符合实战要求的同时，建议阎锡山：

“修筑工事是十分重要的，但也不要单纯死守雁门关，而应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来破坏日军的进攻计划。”

阎锡山连连点头称是，对周恩来的建议十分赞赏。

对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周恩来指出：

“我军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与南下之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现在一一五师已经入晋，正在侯马一带修火车路，一二师即将入晋；一二九师还在整顿中，晚些时候才能出动。八路军入晋部队希望能以河北省阜平县为中心，将周围11个县划为八路军活动地区。”

河北阜平一带虽属第二战区管辖，但毕竟不是山西地盘，阎锡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表示同意八路军在这一带作战，并以太行山脉和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

在商谈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问题时，周恩来等提出将一一五师开到五台、灵丘地区，配合友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阎锡山也表示同意，并答应帮助将八路军迅速运送到平型关以东的涞源、灵丘地区。

谈判中，周恩来机智灵活，侃侃而谈，说得阎锡山暗自佩服。于是，他请周恩来帮助写一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周恩来对第二战区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仅用一天时间就写了出来。一个战区的计划，就是一个专门班子也得数天才能完成，没有想到周恩来一天就搞了出来，阎锡山十分钦佩地说：

“写得这样好。这样快！照周先生这样的办法打，中国必胜！”

接着，他十分感叹地说：

“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接着，周恩来等又赶到大同，和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见面，谈了两三个小时，傅作义对中国共产党很尊重，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度。因为国民党害怕发动群众抗日，周恩来在商谈中特别强调抗击日本侵略者不能单靠正规军，一定要把民众发动起来，与正规军共同作战。对于这次会谈，徐向前在其《历史的回顾》里曾有这样的描述：

“恩来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对他很佩服。”

当晚，周恩来等一行返回雁门关，在火车站过夜，第二天就回太原。接着，他们三人出席太原各界举行的欢迎会。周恩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号召民众起来共同抗战，他说：

“八路军开向前方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配合友军共同抗日，希望各阶层人民加强团结，以全民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攻。”

这时的华北时局，由于日军大举进攻，转瞬即变。日本侵略军决心要占领山西这块宝地，继续兵分两路，从北面 and 东面以大迂回姿态夹攻山西，妄图一举吞占。其中，北线沿平绥铁路向晋北进犯的兵力有三个师团，都是日军主力师团。9月13日，晋北重镇大同弃守。接着，广丘、蔚县等地相继被占。日军的企图，是要用重兵进据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然后直指太原。

二、平型关大战前的舌战

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八路军如仍按原计划全部进驻恒山山脉，必将处于敌军战略大迂回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变更了部署。17日，毛泽东提出了变更部署的意见：在此情况下，我3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提出将3个师分散布置在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太岳山脉。

1937年9月21日凌晨，朱德和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进抵太原。

当天傍晚，朱德、周恩来同乘一辆小卧车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因为要贯彻毛泽东关于改变八路军部署的电报精神，保证我军于适当时机实行部署上的战略展开，分别开进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等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必须找阎锡山谈判。在山西境内做这样的部署，不通过阎锡山是行不通的。

这是一整夜的行车。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摇摇荡荡，晃得人前仰后合，十分难受。

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汽车终于开到了太和岭口。

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顾不上休息，立即会见阎锡山。这个时候，八路军正在向北开拔，日本侵略军在向南进犯，眼看就要打在一处了。时间急迫，刻不容缓。

谈判首先从八路军的作战任务问题开始。阎锡山老奸巨猾，想用我军打正面。他有他的如意算盘：我军在正面迎着敌人拼上去，既打击了日寇的进攻，又消耗了我军实力，可谓一箭双雕。对于国民党方面想把我军推到战线正面，借日寇之手消灭异己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已有预料。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

“阎先生，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我军不可动摇的基本作战原则。我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敌后。我们要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让敌人前边占，后边丢，永远摆脱不了后顾之忧，使敌人既没有一个安全的后方，又没有一条保险的后方运输线。我们这样做，比那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在阵地上与敌人打堂堂之战、拼消耗的做法更有利于抗战，更有利于友军，也更有利于敌后的人民群众。”

朱德接着说：

“当然，在有利条件下，我军也可以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

周恩来与朱德的谈话互相配合，无懈可击，阎锡山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下才说：

“目前日军已经逼近内长城防线，希望我们双方的军队紧密配合，在这里阻住敌人。”

“是的，阎先生。我一一五师现已赶到灵丘一带，准备于侧翼伺机歼敌，配合友军防守平型关战线；至于我一二师，是否可以开到晋西北地区，向进攻雁门关之敌的后方出击，配合友军防守雁门关。”周恩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锡山说。

阎锡山已经领悟到八路军这样的部署对他防守山西会更有利，于是答道：

“就依周先生意见，请将部队迅速开进预定地区。雁门关方面的具体事宜可与杨爱源联系。”

朱德马上说：

“我回去立即命令部队开始行动。”

谈判一直到下午才结束。阎锡山最后表示，同意我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谈判中对我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以及兵力使用等问题也取得了一致意见。

下午5时左右，朱德要出发到五台县去。阎锡山特意关照：

“到了五台县请朱先生先到河边村我的家乡看看，我通知当地人员在我家里接待朱先生。”

周、朱二人高兴地向阎锡山表示感谢。

当晚午夜过后，朱总司令赶到了五台县河边村，由当地地方

官员陪同在阎锡山家里吃过饭，稍事休息，于23日拂晓到达五台

县城，然后到县城南的茹村八路军总部指挥作战，周恩来于同日

返回太原。

这时，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虽有一部分进行英勇抵抗，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消极防御的方针，不敢发动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70万军队抵挡不住日军30万人的进攻，一片“兵败如山倒”的溃退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开赴前线后能不能改变这种局势，已成为举国瞩目的问题：人民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英勇善战的军队能挽救这种颓势。

震动中外的平型关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打响的。

身处第一线、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对平型关战役的策划和发动起着重要作用，也是他与阎锡山共同商定的作战计划之一。战前，他和朱德同阎锡山在9月22日的会谈中，就已研究了平型关战役的计划。原晋军将领陈长捷回忆道：“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周恩来至雁门关岭口同阎锡山会商作战方略，决定用运动战来配合阎锡山所拟的平型关围歼日军的作战计划。”“他为我们讲授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这一回忆应是可信的，因为在周恩来和朱德同阎锡山会商的第二天，即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了侧击平型关日军的作战命令。24日，周恩来电告洛甫、毛泽东：八路军主力在灵、广以南待机，宋时轮支队出东北游击。电报中所说的灵、广，是指晋北的灵丘和广灵。平型关正处在它们的西南，是日本侵略军从广灵、灵丘南下的必经之地，八路军便埋伏在它的东北方向待机。

周恩来发出这份电报的第二天，平型关战役便按照预定方案打响了。我英勇的抗日健儿——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从9月24日晚上起，彻夜冒雨设伏在平型关东北由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右侧高地，誓与日军一决雌雄。25日清晨7时许，从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第二十七旅团主力和辎重车辆进入伏击圈内。一一五师主力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立刻展开猛烈攻击，歼灭日

军一千多人，击毁其全部辎重车辆，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而阎锡山所率各军，有的惧敌不前，有的保存实力，纷纷撤出阵地，没有参加战斗。

对于八路军在平型关的战绩，阎锡山也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详加报告。

平型关大捷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祝捷电报雪片似地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总部。它对八路军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顺利地敌后创建并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有着重大影响。

对于周恩来策划和发动的与阎锡山晋军配合打仗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首肯。平型关战役后的第四天，即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

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你们应要求阎锡山拿出一万枝枪来武装人民。

10月25日，他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以后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总结了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明确地规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平型关战役后，由于战局南移，阎锡山离开太和岭口，在10月1日回到太原。在太原失守前的一个月里，周恩来一直同阎锡山保持着频繁的接触，阎锡山出于对周恩来军事才华的钦佩，为了自身的利益，多次邀请周恩来参与他的一些重要作战计划的研究。周恩来当然乐于参加，借以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影响阎锡山。同时协调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三、周恩来握出大战部署，阎锡山依计而行

这时，山西战局的中心已转到历时近一个月的忻口会战。

忻口在太原以北90公里，处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一条河谷地带，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也是守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重要防线。在日军突破长城防线后，阎锡山一时慌了手脚，他已意识到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他经营多年的山西，于是急忙调集傅作义、陈长捷、王靖国等主力部队八万余人，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任忻口会战总指挥、傅作义任副总指挥，利用方中河与滹沱河的天然障碍设置防御阵地，阻止日军沿正太铁路西进。周恩来参与了忻口会战的作战研究。为了便于协调工作，经中共中央同意，他携带电台随阎锡山行动。

10月初，正是忻口战役前夕。周恩来在太原会见了阎锡山和卫立煌，针对即将出现的忻口大会战，向他们指出：

“中国军队必须依靠人民，改变战略战术，即应当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术，主动打击敌人。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单纯消极防御，而是要在防御中积极的‘反击突击’”。

这时，阎锡山、卫立煌提出：调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到忻口参加阵地战。

针对阎、卫这种只注重阵地战的想法，周恩来向他们做了论证：

“现今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是主力，但八路军有一个拿手好戏，就是游击战，可以在敌后游击战中起决定作用。现在日军正向太原方向进攻，我军不能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应该给一二九师独立自主的活动机会，使他能迂回日军的后方，寻找有利条件打击敌人。”

一席话，说得阎、卫二人口服心服，连连称是。

忻口会战开始时，阎锡山等根据北线日军分三路南犯的态势，把作战地

区划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正面的防御。周恩来仔细考察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兵力分布情况后，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提出修改意见。他认为：

“在中地区，应以小部钳制当面之敌，而以主力把敌军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消灭；右地区的部队要进行广泛的游击，以牵制敌军；左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止敌军的前进计划。”

为了配合忻口战场的战斗，他还提议：

“在作战中，我们还不要忘了发动群众，可以组织正太、同蒲两铁路员工和井陘、阳泉矿工，破坏铁路和煤矿。”

周恩来的这一方案，博得了参加会议的阎锡山、程潜、卫立煌、傅作义的一致赞同。阎锡山连连称道，立即下令执行。

对于这一计划，毛泽东也于10月5日复电表示：

“完全同意周与程潜、周锡山共同决定之作战计划。”

10月6日，周恩来又同阎锡山等商定：为了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队10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负责守石岭关和太原的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

阎锡山作为霸守一方的军阀，所注重的只是守住地盘和充实军事实力，其战略战术素养却不足道。其作战指导思想是只重正面堵击，打堂堂之阵。这种打法，在强敌面前势必损失大，胜算小。周恩来一再向他建议：

“正面硬堵不如以少数兵力钳制正面敌军，主力向东北出击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加强侧面部署，以阻止敌军突入，避免败绩。”

阎锡山同意改变部署，但周恩来的建议没有得到完全贯彻。

尽管如此，忻口会战仍是华北抗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取得较好成果的一次战役。

日军的主力本来用在晋北一线，因在忻口受阻，就转而加强沿正太铁路向晋东的进攻。这一路的中国守军仅有8个师，战斗力较弱。10月10日，石家庄失守。28日，娘子关失守。这样，忻口的后路有被包抄的危险。31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11月2日，北线数万守军撤离忻口阵地，退守到太原一带。

忻口会战刚刚开始之时，颇具远见卓识的周恩来就预测出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将以夺取太原为主要目标，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忻口和娘子关势难久守，为未雨而绸缪计，应及早部署太原的守卫工作。10月12日，他即向阎锡山等人提出：

“必须转变作战方法，力争在忻口等地区求得小胜利。保卫太原的战斗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众多的兵力守城或正面堵击。”

月底，周恩来会见《大公报》记者孟秋江、陆诒，向他们介绍山西的战局时又着重指出：

“我军必须变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积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阻止日军前进。”

这些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战略指导思想已日趋成熟，可惜的是阎锡山并未完全采纳。

太原失守后，山西正面战场上的大规模作战基本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全面展开。这是山西抗战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很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形势的到来，提出过许多战略性的指导意

见。周恩来到山西后，把布置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游击战争作为重大的战略任务，一直抓得很紧。9月22日，周恩来同阎锡山、黄绍竑商定，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在兵力使用上他们不加干涉；至于游击的地区，在山西境内要同阎锡山协商，但在敌占区可自行作主。9月底，中共中央提出华北党的工作要以发展华北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后，周恩来同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这一问题，准备将华北划分为9个战略区：绥西，绥蒙边，晋西北，晋南，冀察晋（以阜平、五台山为中心），直南，直中，冀东

（平津在内），山东。

对于同阎锡山协商，军政团结，武装民众，发展群众性游击武装，周恩来抓得更紧。10月1日，周恩来报告中共中央说：这些地区已有一批游击队，有的是我地方党领导的，有的是友军组织的。为了发展游击战争，还要运用上层统一战线，开展独立自主的群众工作，武装民众，组织游击队。10月2日，周恩来征得阎锡山同意，发枪4000枝用来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争。

四、共建动委会

10月12日，周恩来向阎锡山提出：我军游击战的目标在保卫

山西，这对支持华北抗战有重要作用，请阎司令长官放手武装民众，布置全省的持久战局。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山西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协助北方局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发动民众，进行地方政权的建设。这当然也必须征得阎锡山的同意，同其达成某些协议。

此时山西有一个重要的抗日团体叫“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它以统一战线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组建并领导指挥下的革命组织。它成立于1936年9月18日，会长是阎锡山，总干事是阎的亲信梁化之，但在实际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一开始就是宋劭文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党员薄一波到山西后，11月上旬到牺盟会工作，名义上担任牺盟会秘书，实际上负责该会的工作。1937年2月间，牺盟会改选，7个常委中除梁化之之外，其他六人（包括薄一波）全都是共产党员。这就为我党进一步掌握这一组织奠定了基础。

当八路军开入山西时，晋北沦陷区的旧政权由于战事动乱已经瓦解。这时，遍布山西各地的牺盟会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八路军、牺盟会出面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主持各地区的工作。它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参加，起了临时政权的作用。

9月初，周恩来在太和岭口第一次会见阎锡山时，即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经过商谈，阎锡山同意在晋北和绥远、察哈尔沦陷区成立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以实行战争的充分动员和游击战争的组织工作，八路军派代表参加。这时，阎锡山的心情是有矛盾的：随着日本侵略军深入山西，他觉得需要发动民众来进行抗战，但又不愿给群众以实际利益，更担心这样搞下去，山西沦陷的地方今后就难以由他把持了。

周恩来可谓洞若观火，明察秋毫，早已估计到了阎锡山的这种矛盾心理，事先即找薄一波做了研究，让薄一波去说服他。薄一波此时尚未暴露中共党员身份，只是以进步青年的面目出现，就向阎锡山解释说：

“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很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反而连个人情也落不到。”

薄一波精明干练，年轻有为，颇得阎锡山的好感，这一番话处处为阎锡山着想，阎锡山权衡半天，认为也只得如此。几天以后，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南汉宸带着草拟的“战区动委会”工作纲领，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阎锡山仅仅做了几处修改后，就批准了这个纲领。9月20日，他正式公布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八路军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

可以说，战地动员委员会是抗战实践中，在周恩来的提议和推动下，与阎锡山一起，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形式。

对于怎样开展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党内最初有过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如果不执行洛川会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执行错误方针的就是汉奸；如果不执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方针，参加工作的干部就要辞职或不去工作；应该用共产党的名义参加山西政权，如果阎锡山不接受，就公开批评。

对于这种不分时间、地点，不分析具体情况，机械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做法，周恩来在中共北方局会议上进行了批评，他说：

“能否在晋绥以共产党名义参加政权，这必须取决于南京；现在八路军在第二战区即将成为政权的重要力量，以八路军代表参加和领导战区动员委员会最为适宜，便于使新的政权组织逐渐取替旧的政权机关；党员个人参加这个工作的，在抗战中须力争我们主张的实现，而不是辞职；如果当局违背抗战方针当然应该坚决反对，否则就应该协商进行；许多事要积极地推动阎锡山去做，争取他所许诺的事能够兑现；对事可以公开评论，但暂时不要点名批评人。”

周恩来的这一番讲话，可谓达到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和谐统一。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9月14日和25日，周恩来曾两次向中共中央报告自己的意见。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北方局内部统一了认识。中共中央也肯定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在《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认为战地动员委员会这样的统一战线组织可以使共产党“经过国民党的这种共同行动，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合作。”这无疑是对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种充分肯定。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各级组织在山西普遍建立起来。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党组织的急躁情绪仍没有完全克服，由于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理解得还不透彻，有些人只愿单干，不愿同党外的左派和中间派合作；在组织上，不善于运用战委会的名义，不愿参加牺盟会，处处想以八路军的面目出现；在工作方式上，形成包办代替，开群众会时不加区分地笼统地骂晋军，引起了晋军的反感；对于友军、同盟者的真正错误，又不懂得批评和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

阎锡山对共产党八路军本来就有戒备，害怕左派同共产党接近，担心群众倾向共产党，而中央军又有倒阎的动作，因此，他对战委会逐渐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在10月14日致电洛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他认为：从大局看，要推动阎锡山前进。在共产党方面，要以团结反对分裂，以信任反对挑拨，以争取合法反对取消。策略是：巩固左派，联合右派。具体办法是：凡是可为阎接受者，尽量向他建议，由他出头去办，影响他周围

的人，以改变其内部成分；战委会的活动范围可暂限于指定县份，不必再求扩大；对民众的动员名义一律通过战委会、密切同牺盟会、教导团等的合作。他还表示：要同阎锡山、梁化之作进一步的恳切谈话，提出双方的共同前途，祛除他们的怀疑与恐惧，改变他们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以取得彼此信任，推诚相见。

19日，洛甫、毛泽东复电：山西须坚持与阎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按照一定政治原则与阎及其部下合作，对原则决不让步，对执行此原则的方法必须十分讲究，不可锋芒太露，引起晋军分裂。

在山西，除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外，还有以牺盟会为核心组织起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实际上是一支由我党掌握的武装，牺盟会、决死队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薄一波等共产党员手中，周恩来十分关心它们的发展。在牺盟会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上，他做报告，勉励他们做好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保卫山西，保卫华北。10月18日，周恩来、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要求凡在八路军驻地及其附近，如有决死队、教导团驻扎，不管他们有没有党的关系，都应该以积极精神争取和影响他们，同他们密切合作。即使下层有些摩擦，也应力求协调。电文最后说：

我们必须组织和发​​展这一左派力量，方能推动阎之进步。并请检查上述工作，是否有过左和关门的错误。

这时，中共中央已连电催促周恩来回延安开会。毛泽东在11月5日的电报中说：“周须速回延安开会，以便在月底赴长江流域活动。”周恩来在分别同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和朱德、任弼时等晤商后，离开工作了近3个月的山西，于25日和彭德怀回到延安。

周恩来在山西的三个月，也是公开与阎锡山谈判的三个月。在这些商谈中，周恩来与阎锡山有斗争有合作，以斗争推动合作，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谈判技巧。通过这些商谈，周恩来正确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阎锡山在山西的抗战，在山西初步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为其后抗日战争在山西的进一步开展，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秘密策动十二年，一朝起义建奇功 ——周恩来与刘文辉

刘文辉（1895—1976）四川大邑人，字自乾。国民党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早年为四川军阀陈洪范的部属。后改隶于刘湘。先后任师长、成都卫戍总司令。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后历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省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西康省国民党党部主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12月10日在四川省彭县率部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林业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刘文辉是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较早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当日寇大举进攻中国的危急关头，主张积极抗日的刘文辉在武汉躲过特务的盯梢追踪，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与共产党人吴玉章秘密会见，开始了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良好开端。在周恩来的影响和教育下，他通过周恩来与中共中央订立了联合抗日协定，并请求周恩来在其总部设立了电台，成为国民党军队里绝无仅有的现象。这一电台历时八年，刘文辉其间虽有反复，但基本没有中断与中共电台的联系。正是有了这一电台，在1949年12月，刘文辉根据电台传来的周恩来的指示，毅然率部起义，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贡献。

一、周恩来：希望刘自乾先生能 “变多宝为一宝”

1938年4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大西南的成都尚为后方，陆空交通仍然正常。这天，一架飞机腾空而起，飞向武汉。此时的武汉，在南京失守后，已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的高官要人都在这里。

飞机上，坐着一位肩宽体阔四十岁左右的男性，正在闭目静思。飞机飞过高山峻岭，大江平原，他却无意透过机窗欣赏这一览众山小的美好风光。他，就是川康地方实力派首领人物之一的刘文辉。他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康藏地区也成了他的势力范围。刘文辉是川康实力派中反蒋较早的人物，1929年12月曾通电反蒋，迫蒋下台未成；1930年9月，又第二次通电反蒋，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时时都想搞掉他。所以，1932年10月在与刘湘混战时，蒋介石便秘密插手，支持刘湘，刘文辉败北，退居西康荒僻边陲。

刘文辉与共产党接触较早，1926年，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刘原安同志就被刘文辉聘为秘密政治顾问。同年8月，他曾邀吴玉章同志主持成都大学，还表示愿出资办一日报，“宣传进步思想”。又要求“中共派人到军队中做政治工作”。随着革命低潮的到来，刘文辉又彷徨观望了一个时期，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抗战，国共二度合作，刘文辉决定再次建立起与共产党的联系。

刘文辉刚刚走下飞机，就有一群人前来迎接，为首的一位，刘文辉一看就认识，是国民党CC派头目陈立夫。陈立夫十分热情，但刘文辉明白，陈立夫貌似接待上宾，实系封锁包围，欢迎他下榻在江汉路豪华的四明银行四楼，以便隔绝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物的联系，特别提防他与中共接头，受到影响。

但作为既经深思熟虑、下了一番决心的刘文辉，不仅要与抗战时期的各民主党派见面，更要求与当今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中共联系。他同机飞来的高级幕僚随员中，就不乏主张联共的人物。他原准备试探摸索，从新

做起，哪料中共中央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整套战略方针，已做了原则决定，即由抗战时期常驻武汉的周恩来，全权代表，展开包括地方实力派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对于刘文辉的来临，周恩来十分重视，即派有公开职业而且都是四川籍的同志范长江（《大公报》著名记者）、陈依非（原《金陵日报》主笔）、邹趣涛（原《南京早报》主笔，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驻汉代表），具体执行党对刘文辉的统战工作。

为了做好工作，防止疏漏，事先，范、陈、邹三人一起被召到位于汉口租界的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面授机宜。当三人一起走进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并结合抗战形势，向他们进一步讲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给他们武装了头脑。接着，话题转到川康地方实力派的问题，周恩来着重要邹趣涛转告刘文辉如下一些情况和意见：

“自‘九·一八’事件后，国共矛盾已有所改变。任何中国政治势力，都要捐弃前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依靠群众，团结一致，把抗战进行到底，直到取得胜利。这才是中华民族唯一的道路。川康地方实力派应当走这条路。刘自乾先生不是称‘多宝道人’吗？这也有川康一般军政界人士的客观印象。但我们希望于他的是能够‘变多主为一宝’，理解和进入统一战线中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作出自己的贡献。它是人民之所需，民族之所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带有根本性的大好事。这样做，也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的谅解、同情和支持。”

谈话以后，周恩来还告诉他们一个决定：

“已请准派吴玉章同志为代表，先与刘自乾先生接谈。”

二、受周命，吴玉章设计会文辉

为了使吴、刘会面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范、陈、邹三人颇费一番心思，最后商定：让刘文辉以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公开出面发出请帖，招待武汉三镇中外新闻记者，举行茶话会，报告西康建省的经过，此时让吴老由《新华日报》记者陪同，乘人多拥挤的刹那间，由在招待会门口等他的邹趣涛引上四楼。

刘文辉到汉口的第三天，就按照约定的方式，完成了吴、刘见面的任务。刘一见吴就首先称赞：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共在政治上的杰作，对愿抗日的地方爱国将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身土布，从容不迫，颇具学者风度的吴玉章，左手端着盖碗茶的茶船子，右手食指循着茶盖打着转转，显得轻松而自如。谈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开始了。吴玉章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主要阐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号召的精神，详细分析了当前形势，透彻说明了党的路线政策，结合川康现实状况，指明了川康参加抗战的未来前景。吴玉章说得有声有色，有理有据。

刘文辉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频频点头，听得十分入神。最后，刘文辉说：

“听到趣涛转告，日前他晤到周恩来先生时，对我所说的一番话，真是肝胆照人，诚意感人。我回西康以后，当本着你们两位的指点去争取！去努力！”

这一次见面，确定了共产党与西康地方实力派的初步关系，使与西康地

方实力派的“抗日统一战线”有了良好的开端。

三、周恩来赠送精神“礼品”，

刘文辉智斗特务巧避检查

刘文辉飞返成都转雅安的行期很快要到了，周恩来得悉刘在每天的饭前茶后素有爱看书报的习惯后，便赠送了一套自汉口创刊到1938年3月止的《新华日报》合订本与社论集给刘，让他阅读后进一步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这套珍贵的精神礼品，是按月用牛皮纸为封底装订成册的。为了让刘文辉能够安全带出又不致给他找麻烦，周恩来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让工作人员新买了一个武汉时兴的铁条包皮包角的藤箱装置好，看来是一件普通行李，不易引人注目。

邹趣涛怕事出万一，又通过刘的张罗，搞了两张盖上关防大印的《委员长蒋重庆行辕封条》加封起来，混入其他都粘上封条的行李一起装舱飞蓉，以为这样装扮，就可十拿九稳，安全保险了。

飞机准时降落成都凤凰山机场，恰恰碰上了军统特务控制的稽查人员和宪兵，先见几个军官装束的人窃窃私语，后出现几个头戴草黄色美式船型帽的青年女郎，装模作样地摆出一付公事公办，谁都不怕的架势，临到刘文辉所有行李排队通过的时候，这几个女特务一定要件件打开检查。邹趣涛忙上前交涉说：

“这是西康刘委员长的随身行李，上有重庆行辕封条。”

但这几个女特务仗着有军统撑腰，异口同声地嚷道：

“这是机场的规矩，天王老子的行李都要检查！”

邹趣涛担心因小失大出岔子，赶快到机场休息室去给刘耳语，说明意外的纠缠，刘文辉情急智生，马上给同行的四川省主席张群说：

“听说你部下的稽查处与宪兵一定要打开我的行李，件件检查，是不是我们先走，就等她们慢慢检查算了？”

张群出于官场面子，当然觉得“面子”上有些过不去，立刻挽同刘文辉一道步行到检查站通道，面带怒色地训斥着这些不怀好意的男女特务，指着地下的行李说：

“这批大小行李，都是我和刘委员长的，你们莠笋叶子吃多了吗？”

那群男女特务，突然发现他们的顶头上司出现，而且很懂第二句话的歇后语是在骂他们的不长眼。特务们特有的奴才相马上表现出来，一个前倨后恭的小头目站出来打圆场说：

“对不起！主席。这几个小家伙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失礼！失礼！原谅！原谅！今后一定严加管教。”

当邹趣涛走出站口时，刘公馆早有小轿车来接。把这一箱不能检查的行李，交待从副官彭泽装车，随同刘文辉直驶玉沙街寓所，邹趣涛的任务，随着一场虚惊而结束。以后邹趣涛几度赴雅安菩提街刘公馆相晤，都曾见到刘文辉的卧室床头或茶几上，篇面翻开、折叠着的《新华日报社论集》，周恩来赠与的这些书刊，成了他很好的精神食粮。

四、联手共斗蒋介石

1939年夏，陪都重庆5月3日和4日，接连遭受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后，四川的地方实力派爆发了7位师长反对从川康地方实力派投蒋的王缙绪出任四川省主席的事件。7位师长的电文指出王的十大罪状，并调集武装力量在成都近郊，大有剑拔弩张的架式。这7位师长是彭光汉、杨晒轩、谢德

堪、陈兰亭、刘元塘、刘树成、周成虎，都是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亲信，实际上矛头是针对蒋介石的，是反控制反独裁的一个大回合。刘文辉躲在雅安，佯装不知；邓锡侯视察忠县石堡寨，观山玩水；潘文华驻守阆中，闭门下棋。蒋介石怕在抗战后院起火，不能不采取釜底抽薪之策，乃电邀刘、邓、潘三人赴渝，面商机宜。他们三人未行成都前，分别约来谋臣策士，估计形势一番，得出初步一致看法：

“众怒难犯，敢怒而不敢下手，是蒋介石此时此地的心情。”于是刘、邓、潘欣然应召，各嘱左右幕僚陪行，前后两部大卡车，作为警卫，中间5部小轿车，形成浩浩荡荡的汽车队，直奔陪都重庆，沿途小憩，不慌不忙，简阳吃“牌坊面”，内江品“蜜饯茶点”，隆昌赴“烧烤宴”等等，显得悠然自得。华灯初上时分，始抵重庆，均下榻曾家岩潘文华公馆。

刘文辉知己知彼，知道蒋介石特别痛恨他，只是现在他还有实力，蒋只是拿他没有办法而已。所以，刘文辉自然就另有一番心事在心头，晤蒋前，有些事，拿不稳，看不准，急需向共产党请教。他就要邹趣涛即赴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联系，邹碰见徐冰同志，说明来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3位同志出面，与刘文辉会晤，掩护的办法是第二天下午8时，先由徐冰陪同董、林、王，乘坐已担任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的那辆轿车开往约定地点，实行换车接人，就这样，在倾盆大雨之夜，把共产党3位同志顺利接送到潘公馆二楼客厅。

第二次与刘文辉会谈，主要是王若飞谈得多些，他首先指出：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已确定政策，从对外转向对内，虽经中共中央致电蒋介石，在日寇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秋，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始终听不进去，河北、华中等地摩擦问题，不断发生，实系汉奸理论的“曲线救国”论甚嚣尘上。我党是要彻底揭露，坚决反击的。无论时局怎样变化、华北、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要加速

向敌后发展的，配合津浦路西与东的济南根据地，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决不让步；继续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连接华南，形成整个抗战的基本力量，把反日侵略的事业进行到底。”

接着王若飞又谈到：

“蒋介石把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对势力，也把川康地方实力派看成非嫡系的杂牌军队，时时刻刻都在打主意搞垮吞并。我们多年打交道，深知蒋介石的德性是欺软怕硬，色厉内荏，你硬他软，你软他硬，如果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就会知难而退；如果妥协退让，他就会得寸进尺，直到把你消灭。”

这些推心置腹的谈话，使刘文辉深表同感，不禁会心地一笑。

就在这次雨夜畅谈的第二天凌晨，刘文辉就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的电话，当天上午10时蒋介石要单独约见他。不知是刘文辉出于素信佛教的生活习惯，还是心有余悸的敏感，但见他很快借用潘公馆二楼的角楼，加以打扫，整理洁静，设一方桌，将他随身带来的十多尊各式各样的小铜佛，陈列得井然有序，佛前置一三足鼎式铜质小香炉，内燃藏香，细烟缭绕。接着，恭敬虔诚地祷告起来，按佛家法规的跪拜，作“五体投地”状，默念经文，唧唧唔唔，然后在陈设的小佛中，选出一尊护身佛，藏名为“卡乌”，佛身缠有白色布条，系著名活佛汗衣撕下包裹的，装入一个上圆下方的小银

匣里，扣上玻璃前门，匣上系有黄色彩带，悬于胸前，再外套蓝色哗叽中山服，然后下楼用过早点，接谈一些来访者后即乘轿车，前往会见蒋介石。这样，在他想来，就觉得吉祥如意。心神安定多了。事实上，蒋介石这次“单独召见”，不但不是“鸿门宴”，而且是拉拢他，表示“亲切”，假惺惺地许以川康重任的画饼，以达到分化川康，分化刘、邓、潘的阴谋。

1941年冬，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暗中勾结日伪，积极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日益暴露。为了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防止投降危机，拯救中华民族，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对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党派做了大量工作。1942年2月，周恩来约刘文辉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的住处秘密见面，俩人恳谈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向刘文辉精辟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后，郑重地向刘表示：

“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够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在现阶段，就是要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起来坚决抵制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地方民主力量以支持。”

周恩来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更加坚定了刘文辉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同抗日，反蒋独裁的决心，他坚定地表示：

“请周公放心，文辉定当不负中共和周公的一番好意，积极推动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团结抗日，并抵制老蒋的反动政策。”

此后，对于团结西南五省抗战力量，刘文辉十分积极。周恩来出面在重庆大阳沟范庄杨虎（即杨啸天）居住的一幢房屋里，约集刘文辉（代表川康）、杨耿光、杨啸天（代表民革）、章伯钧、邓初民（代表民盟），还有云南、广西的代表谈话，宣传我党的政策，巩固与地方实力派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了使这种会谈经常进行下去，加强各方代表的联络，刘文辉建议搞一个“雅属社会服务处”来掩护进行工作，周恩来同意这个建议，当即推定邹趣涛为联络人。

既然事属机密，不能不严防特务的察觉。为此事前重托房主杨虎（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过上海警备司令，当时又兼任戴笠为头目的社会动员委员会委员，社会关系多，颇具保护色）抽出来专任范庄屋前屋后、屋左屋右的巡风望哨任务。大材小用，才容易不露痕迹。由于他此时思想认识发生变化，已由上海臭名远扬的杨虎陈群（谐音羊虎成群）时代，残杀中共党人的反共刽子手，转变为反蒋抗日的民主人士，所以他起到了一般人不可能起到的作用（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养起来，在上海安度晚年）。为了运用杨虎这种灰色面貌，刘文辉等人还设计他在范庄前厅会客室办了桌酒席，打着川剧胡蝶与电影胡蝶拜为鸳鸯姐妹、互学技艺的幌子，各邀同行或渝州名媛前来敬陪专座，献筹交错，珠光宝气，闹闹嚷嚷，极一室之盛。但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紧闭通道门户的后厅内，正在严肃认真地筹商着国家兴亡大事哩！

同时，通过交换意见，商定找杨啸天在上海租，一幢房屋作为地址，筹办一种十六开报纸，暂名《民众呼声》日报，经费由刘文辉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各出两万元，建立一个宣传舆论阵地。

不久，邹趣涛离开重庆到雅安展开“服务处”的筹备工作，刘文辉拨出西康省银行二楼几间房子，作为筹备处办公地点，并嘱民盟成员、时任银行经理的郑茂麇负责食宿交通。此后，沈志远邓初民，马哲民，黄药眠、姚觉五等人，就时常来往于成都、雅安、重庆之间。互相联络，筹商联合抗战事

宜。

另外，办大事需要大钱，队长远发展着想，从开源节流考虑刘文辉决定采取以商养政的办法，在成都顺城街筹建裕边公司，杨耿光和杨啸天推荐的安徽桐城人、老同盟会员姚觉五为经理，贩运销售康藏的麝香、冬虫草、狐皮、红花等山货特产，以便在尚健在的左翼同盟会员中展开活动。刘文辉为招贤纳士，壮大抗日反蒋的力量，也乐于结交这股政治势力，曾专请姚觉五在陕西街黄敬龄“姑姑筵”里的小房间，叫黄敬龄亲手做拿手名菜几样，款待这个神秘人物。席前，姚觉五向刘文辉大谈他亲蒋反蒋的曲折经过，大谈他新三民主义的观点，大谈他联俄联共联合农工的具体步骤，大谈他川康军政界联合起来，以决定半壁河山的命运等等。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刘文辉注意倾听，宾主融洽。刘文辉也表示出博采众议的襟怀。临别时，姚觉五还赠送刘文辉一柄桐城派文豪姚鼐遗物玉如意，送邹趣涛一方画家姚石倩篆刻的图章，留为纪念。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刘文辉积极团结西南进步人士反蒋抗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五、周恩来：请转击刘文辉先生， 这十二条记后即焚

1942年4月，重庆曾家岩五十号通知邹趣涛去一趟，说是有事面告。当邹趣涛走进小接待室时，董必武先出来握手致意，然后周恩来从后屋出来，与邹趣涛热情握手，以商量的口吻说：

“趣涛，你有空吗？有个重要的事情打算请你亲自赴雅安一行怎样？”

邹趣涛顺口答应说：

“只要是完成使命，再没空也当抽空，就请明白交代吧！”

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说：

“我们请准党中央草拟了八路军与二十四军抗日合作协定 12 条，现由我念给你听，不必记录，由你牢牢默记在大脑里，尽快到雅安，按照原文，念给刘文辉先生听，可同意他用纸录写全文，加深印象，至少将精神要点复习记牢以后，当场焚毁，以免意外，今后就根据这 12 条，双方要都遵守履行条约义务。”

邹趣涛时年 29 岁，年富力强，博学强记，很快牢记了 12 条协议的内容：（一）两军合作抗战到底；（二）设立电台，互通情报；（三）不在刘的部队发展中共组织；（四）联合抗蒋吞并，互相支援……等项。

邹趣涛接受这一任务，将 12 条牢记后，购到一张飞往成都的机票，再搭上二十四军驻守在蓉雅道上的毛国懋团部的小轿车，很快见到了刘文辉。按照周恩来嘱咐，进行转告，如法办理。刘文辉拿出几张白纸，将邹趣涛所念协定全文，郑重其事地提着毛笔，用他爱好的颜体行书，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然后凝神静气，反复默读熟记后，就擦燃一根火柴，将 12 条协定烧成灰烬，抛入一个盛水的茶杯中。

接着，他要邹带口信给周恩来：

“决定遵守协定行事！”

六、奇闻：国民党的军部，设下共产党的电台

为了履行抗战合作协定第一条，1942年6月，周恩来报经中共中央同意，派出王少春赴雅安刘文辉处设立秘密电台。开始直接联系。可是通话不久，联络呼号发生了故障。周恩来又一次通知邹趣涛去曾家岩五十号，将重

新编定的电台呼号，装置在一个很小的“红灵丹”药瓶内，面交给他，让他亲自送到雅安去。并反复叮嘱说：

“事关重要！路上万一出意外，只有连同红灵丹药面一起吞服掉！”

邹趣涛感受到这是周恩来对他的极大信任，默默地点头，坚定地回答：“一定完成任务！”

考虑到安全，邹趣涛约爱人同行，将红灵丹缝入她的贴身内衫小包中。伙同《新中国日报》的一位张姓编辑等数人，一道搭乘汽车，夜宿内江无恙，第二日到成都，即乘上熟人轿车，顺利到达雅安，将电码呼号面交给王少春同志。王少春满口湖北话，一身粗布衫，五尺个子，活像一个普通老百姓，并不打眼，平易近人，阶前空地，搭了瓜棚，种了蔬菜，仿佛带来延安风韵。邹趣涛立时感到亲切。尤其完成任务，一身轻快。

然后，邹趣涛去看刘文辉，他更高兴，说：

“短期电台不通，我几乎成了盲人聋子，外间战况政情无从得知，深为信息不灵通，处理事情无所适而焦虑。这下可好了，我又耳聪目明了！”

这一电台建立后，在刘部长达八年之久，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从未中断，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每天都有人抄写一份给他看。不但刘文辉本人从中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政策和人民军队的胜利捷报，同时，王少春又把刘的动态向党中央汇报，及时得到了党的直接帮助。

后来，许多国民党大员闻听此事后，不觉惊呼：奇闻！国民党的军部，设下共产党的电台。

七、周恩来：时机已至，立即起义

1949年10月，刘、邓大军直指西南，周恩来指示驻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部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要王争取刘文辉联合西南实力派一道起义。

经过王少春阐明利害，刘文辉明确表示了起义的态度。王少春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机宜。刘文辉所部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祯建议刘文辉把情况报告周恩来，并请示今后的行动。刘文辉考虑再三，指示杨家祯拟了电文交王少春报告周恩来。电文大意是：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处境困难，只好暗做准备。今已与邓锡侯等部约好，决定投向人民，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很快，王少春的电台收到了周恩来给刘文辉的指示电：我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中共中央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时机的选择，同时由钱瑛传达给中共川康党组织。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都地区负责人熊扬，又把这一精神传达到中共雅安党组织。10月上旬，熊扬、张安国与刘文辉的代表杨家祯具体商定了关于起义的时机，起义的准备，以及起义后配合解放军的具体部署。

根据商定，中共地下党派张安国长住雅安，以便商量有关起义事宜，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和参谋长杨家祯负责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10月下旬，刘文辉在雅安同王少春对形势做了研究，商量修改了起义的具体步骤、方法及对蒋介石的策略，便从雅安到成都，向邓锡侯、潘文华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并商定以他们三人为核心，联合一切反蒋力量，在解放军到来时，相机起义，配合行动。同时研究了对蒋介石所应采取的对策。

至此，以刘、邓、潘为首的川康地方实力派的联合起义，基本成为定局。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刘文辉等人起义的进展情况。12月5日，周恩来

电告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11月24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

8日，周恩来又电告刘伯承、邓小平：“已电告我派驻雅安之王少春同志，要刘义辉派负责人员携带密码、呼波至前线找你们接头，建立直接电台联络。在未建立之前雅安台与京台每日通报

两次，有报再经京台转你们。”

刘文辉在12月7日离开成都时，曾派一名副官将拟好的起义通电稿送雅安杨家祯，嘱杨待正式通知后再交王少春发出。电文经过一番周折，统一了认识，11日刘便急电告杨家祯将发电时间填为12月9日，交王少春发出。

12月8日，中共川西地下党、川康地下党、川东地下党、第二野战军派遣人员，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先后来到彭县的龙兴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相继赶到这里，参加起义工作。此时，这里成了川、康起义的中心。

12月11日，各方人士于龙兴寺召开了一次较大的会议，商定起义后的决策：

- 一、如蒋、胡军破坏蓉城，当不顾一切，断然予以攻击。
- 二、待解放军进至一日之行程内，即配合解放军采取攻势。
- 三、在解放军来到达前，敌如向我进攻，则以一部配合武装民众，袭击其侧背，以主力退守西山山地待援，并采取政治攻势。
- 四、胡宗南部未向我进攻，且解放军亦来到适当距离时，则向胡部严密警戒，确保崇、彭、新、灌，并在政治方面采取攻势，以牵制胡部之兵力，策反其部队，消除其战意，以促成其迅速崩溃。
- 五、通电表态，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走向人民方面；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司令员号召，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其他部队起义；起义部队以原编制、原番号就地待命；给养问题，由刘、邓、潘致函各专员、县长供应，并遵守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接着，刘、邓、潘三部的将领黄隐、谢无圻、杨晒轩、陈离、马毓智、万里、刘元瑄、伍培英、刘元琮、潘清洲、严啸虎、潘大迥等亦发出通电拥护起义。

12日，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根据雅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在雅安城召开了隆重的起义誓师大会，14日宣布西康起义时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改为临时军政会议），西康省民政厅长代省主席张为炯，也于12日通电全省各县宣布起义。

12月24日，朱德总司令复电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对其起义行动表示佩慰和嘉勉。新华社于29日向全国广播了他的起义通电。

“ 欢迎卢汉将军起义投向人民一边 ”

——周恩来与卢汉

卢汉（1896—1974）云南昭通人，原名邦汉，字永衡。彝族。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1914年毕业于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后在滇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近卫第十一团营长、第三团团长、第七旅旅长、第九十八师师长。1929年后，任云南省财政厅长、广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第六十军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解放前夕，于1949年12月在昆明率部起义。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周恩来的亲自策动下，毅然率部起义，从而关闭了国民党军逃往缅甸的大门。这一义举，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昆明起义”。

一、卢汉遣使投石问路，周公秘嘱等待时机

1946年至1949年，卢汉深感处处受国民党中央的排挤和控制，久已心怀不满。1948年底，滇军六十军在长春起义，九十三军在锦州被歼，这使卢汉大为震惊。共产党在全国节节胜利，云南境内的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武装力量蓬勃发展，以及云南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都在强烈地影响着卢汉。卢汉依托国民党蒋介石的信心彻底动摇，使他不得不另寻出路。

这首先要从卢汉通过宋一痕与中共中央、周恩来取得联系说起。

宋一痕原为中共党员，后与党组织脱离关系，但一直在寻找党组织。1946年9月底，宋一痕夫妇在卢汉的资助下来到香港，不久即与中共华南分局接上了关系。

1947年初，中共华南局的负责人方方约见了宋一痕。宋一痕向方方说明了想到解放区去的愿望，方方对宋一痕说：

“宋同志，你要求到解放区去工作可以，但现在的形势是后方同前方一样的重要，经组织决定，需要你回云南工作。”

宋一痕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并向方方谈了准备在适当时机策动卢汉在云南起义的设想计划。方方非常赞许，对宋一痕说：

“此举事关重大，需汇报中共中央后由中共中央做明确的指示，才能开始工作。你在香港等待中央的工作指示吧。”

其后，宋一痕将在香港得到的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在港各界进步民主人士、爱国人士对全国形势、云南形势的看法，加以详细分析写成一封长信，寄回昆明给卢汉。

1948年5月，宋一痕在香港遇到了准备回昆的熟人陈公宪夫

妇，因一直没有收到卢汉的来信，宋一痕向陈打听了卢汉和昆明的近况，并托陈公宪带一口信给卢汉，说：“我因在港有事，目前暂时不能回昆，有事请卢汉写信到港给我。”

1948年6月，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大部土地都已解放。这时宋一痕接到了华南局转来的中共中央指示：宋一痕秘密回昆了解云南局势，摸清卢汉态度，做卢汉的工作，然后速回香港向中

央汇报。6月中旬，宋一痕在香港经过化装，秘密回到了昆明。次日晚，卢汉即派副官开车将宋一痕接到青莲街卢的家中。宋一痕向卢汉详细谈了他在香港知道的一切，并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卢

汉进行了工作。卢汉表示必要时愿意考虑走起义这条道路，并要宋一痕在香港为他了解一些中共方面的情况。

五天后，宋一痕顺利回到香港，通过华南局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回昆的工作情况，中共中央认为宋一痕此次工作很有成绩，要宋一痕继续在港等待下步工作指示。

1948年底，全国大片国土相继解放，中共中央根据云南局势，指示宋一痕准备第二次秘密回昆工作。恰巧宋一痕在这时收到了卢汉的急信，要宋一痕回昆有要事相商。宋一痕立即向中共华南局的负责同志汇报了此情况，中共华南局负责同志即刻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共中央认为在云南进行起义策动工作现在已是时机，指示宋一痕回昆直接对卢汉进行工作，并对宋一痕做了具体工作的指示。

次日，宋一痕即从港飞昆。

宋一痕见到卢汉，说明了现在全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权已是“大势所趋，败局已定”，希望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望卢汉为了云南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

卢汉对宋一痕说：

“我通过多时的考虑，为了云南的父老，已决心走起义的道路。我近来这些天，已同在云南的老部下做了商议，大家也都愿意走起义的道路。关于什么时候起义，还要看时机。重要的是中央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驻在云南，如果行动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起义希望能够得到解放军的直接支援。为了以上这些事我已派出了一些人去联系。你已到香港两年，没有人注意你，主要是你在以前（指宋一痕的学生时代）就参加过中共组织。中共方面能够信任你，我想只有用你的关系去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你认为能行吗？”

宋一痕笑道：

“我此次回来就是接受了中共中央指示和您商谈的。您既有此决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我在香港已经同中共华南局取得了联系，一直都在进行这项工作。”

卢汉闻听，又惊又喜，风趣地说：

“难怪如此，所以你以前给我的信，和前次来对我说的话都是共产党的言论。真难得你看得那么远。”

接着，卢汉对宋一痕说：“你是中共中央方面派来的，有些事我就要问你，如什么时候能够进行起义，起义后的工作安排等等。”

宋一痕对卢汉说：

“这些事必须等汇报中共中央后，由中央决定。”

卢汉又向宋一痕问中共方面对起义人员的政策：

“我和部下们都悔恨是国民党的将领，以前做过一些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的事，起义后能否得到中共方面的谅解？”

宋一痕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卢汉做了一些解释。最后卢汉问宋一痕能不能直接见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宋一痕说：

“如果有必要，能直接见到的。”

卢汉为了表示起义的决心，当即由三夫人钟耀琼执笔，写了一份决心书，卢汉亲笔签名盖上了印章，交给宋一痕，要宋一痕代他亲自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卢汉还希望宋一痕把他所问的事代他同中共中央领导人面谈。宋

一痕当即表示一定办到。当天晚上，宋一痕由陈公宪开车秘密送回青龙巷，由席淑英的母亲将卢的决心书缝在宋一痕的西装马夹里。宋一痕又秘密约见了担任卢汉“干部大队”大队长的三弟宋彬。宋彬向宋一痕说：

“我们那里有许多人都相继跑到‘山那边’去了（指参加边纵）。 ”

宋一痕嘱咐宋彬说：

“你们现在要掌握住局势，不要轻举妄动，到时候卢汉会采取统一行动的。 ”

次日，宋一痕由卢汉派车护送至昆明机场，乘机回港。

宋一痕回港后立即向中共华南局汇报了工作情况和卢汉的要求，中共华南局负责同志表示：

“等向中共中央汇报后，约定时间就护送你北上。 ”

1949年6月间，宋一痕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由中共华南局护送他到北京去。宋一痕到北京后，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宋一痕将卢汉的决心书交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对宋一痕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让宋一痕在北京休息一段时间，看看北京和平解放后的情况，等待中共中央对云南起义的具体工作进行安排。

此后，宋一痕多次受到周副主席接见，并受到朱德总司令、李克农、李维汉等领导同志的接见。此间，宋一痕还会见了翦伯赞先生、李印泉先生等民主人士。

两个月后，周副主席再次接见宋一痕，告诉他：

“经党中央决定，你急速返回昆明工作。 ”

接着，周副主席并对云南起义做了三条指示：

- 1、欢迎。
- 2、既往不咎。
- 3、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待时机。

谈到联系方案时，周副主席指示：

“同中央的联系还是通过华南局派人联系。 ”

宋一痕建议道：

“我的妻子席淑英也同我一起在香港，她和我同甘共苦21年，是一个可靠的人，我回去，就让她留在香港继续同组织联系。党中央有指示，可以直接交给她，是万无一失的。 ”

周副主席同意了这一联系方案。

1949年8月，宋一痕从北京回到香港。宋一痕让妻子席淑英继续留在香港等待中共中央指示，对席淑英交待了联系办法，第二天即从港回昆，向卢汉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并同卢汉谈起了在北京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的情景；并着重介绍了北京和平解放后的情景，各界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情况等等。

卢汉听了很受鼓舞，高兴地说：

“看来我走起义这条路确是走对了。 ”

以后每天天黑后，宋一痕由卢汉派车从青龙巷接上五华山进行起义的秘密筹划工作，次日天亮前，秘密送回青龙巷。为了工作的秘密性，宋一痕化名“白云”，来接送的人都称他为“白参议”。

同时，宋一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昆明的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由于宋一痕不能公开工作，同中共地下党的一切联系都由席淑英的三妹席淑芳

进行。席淑芳当时是昆明求实中学的教员，昆明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的预备党员。

卢汉知道，要使起义顺利进行，还必须与在云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及边纵取得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因为此时的云南，国民党嫡系二十六军驻安宁、宜良和蒙自一线，宪兵十三团就驻在昆明园通街，昆明城里到处都有军统特务，还有不少国民党的特设机构，这些都对他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他指示其内弟、云南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尽快设法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取得联系。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的活动，龙泽汇时有所闻，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是云南龙陵县人，曾和龙泽汇一道在南京考取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八期），1932年毕业返昆，龙泽汇和朱家璧都在云南讲武堂当区队长。还有一个中学时的同学吴树桐，在卢浚泉的团里当文书。

如今，吴树桐已弃武经商，如果派他以做生意为名，前往游击队活动的圭山一带和朱家璧接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卢汉同意了龙泽汇的想法，就派吴去找朱。

吴树桐果然不负使命，到弥勒西山根据地找到了朱家璧。吴树桐对朱家璧说：

“龙泽汇叫我来找你，是卢主席的意思，希望你到昆明去一趟，有些事要和你商量。”

朱家璧1938年去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奉派到重庆，由周恩来亲自面授机宜，回云南在滇军做地下工作，担任滇军团长，1945年由于被国民党特务告发，撤出滇军，到边纵工作。他对卢汉与蒋介石的关系比较了解，一听就明白了卢汉的意思。但是事关重大，必须与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才能决定。基于这一考虑，朱家璧对吴说：

“我去昆明不大方便，如需要见面，最好请龙泽汇来，何时何地见面，待我们决定后再联系。”

吴树桐走后，朱家璧通过地下交通将情况向省工委汇报；并写了一封信经过省工委同意后转交给龙泽汇。朱家璧给龙泽汇的信是为了试探卢汉的诚意，主要内容是我游击队急需武器弹药，希望他们能作些支援。

同时，朱家璧立即向桂滇边前委做了汇报，提出积极做好统战工作，争取卢汉起义的建议。经朱家璧介绍情况，分析利弊后，前委同意了朱家璧的意见，并将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二、周恩来亲自派人策反，卢汉毅然举超义旗

为了进一步促成卢汉的起义，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也在物色人选，做卢汉的工作。这时，朱德总司令想起了一个人物来，他就是周体仁。

周体仁原为国民党傅作义部一个集团军的兵团副司令，后任北平市警备总司令，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起义后为人民解放军北平警备副司令员，对北平市的社会治安及文物、公共设施的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周体仁是云南景谷县人，傣族，与龙云、卢汉等较熟，经朱总司令推荐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决定派遣他到云南策动卢汉将军起义。

当李克农部长向周体仁转达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派他到昆明，策动和协助卢汉将军起义的意图后，周体仁毅然接受了这一重任。行前，周恩来副主席专门和周体仁谈了话，交待了任务，并请周体仁向卢汉将军转达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对起义部队的一贯政策：

“欢迎卢汉将军起义投向人民一边，起义后，对过去的事情一律不予追究，根据情况安排适当工作。但起义时机一定要掌握在解放军进军云南之时。”

周体仁带着周恩来的指示，于8月下旬秘密到达昆明。不久，国民党当局在昆明进行“九九整肃”，大肆逮捕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周体仁无法开展工作，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躲避到他的家乡农村中去。

9月下旬，昆明情况有些缓和，周即回昆明开展工作，10月初第一次悄悄地拜访了卢汉将军，试探卢汉对起义的态度，并向卢汉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和傅作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情况。

卢汉得知共产党、解放军对傅作义等将领的宽宏态度和对傅作义委以重任感到欣慰。但又不无忧虑地向周表示：

“再打下去不是办法，起义是条出路，但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已解放，这时起义恐已晚矣。”

周体仁以北平的和平解放为例，向他说明：

“当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傅作义才准备起义，中共还是接受傅将军的起义，何况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还未到达云南，起义还是不迟的。”

周告辞时向卢表示：

“如卢主席用得着我周某人时，随时可通知我前来。”

10月中旬，卢汉又约见周体仁，向周表示了率部起义的愿望，但又面带难色地说：

“中共中央曾通过香港有关人士同我有过联系，但不知何故联系中断，是否由于昆明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中共方面改变了态度？目前的最大问题是与中共中央联络不上。”

周体仁当即表示：

“如果卢汉将军决心起义，我愿意为将军与中共方面搭桥。”

由于蒋介石曾于9月初在重庆与卢汉进行过密谈，恐卢汉有变，周体仁只字不提自己是受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委派的。

与此同时，周体仁对卢汉及其部下起义的可能性进行了一些调查，接触了一些云南政界人士和将领。特别是同卢汉所部的骨干人物龙泽汇、曾恕怀、谢崇文等进行了接触，了解了一些情况，感到卢汉及其部下对起义是有诚意的。于是，周体仁第三次晋见卢汉将军，这次，他如实向卢汉说明，自己是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委托前来昆明与卢汉将军面商云南和平解放大计的，并转达了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希望，请卢汉将军率部起义，为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

卢汉将军得悉周体仁是受中共中央、周恩来的委托来同他面商起义大计、并有周恩来的具体指示时，感到十分惊喜，决心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立即举行起义。

周体仁又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云南举行起义的最好时机是在人民解放军消灭蒋介石的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之后，向云南进军之时，起义部队可配合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在云南的中央军。蒋介石还企图以云、贵、川、桂为基地组织最后防线，梦想阻止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对此，望卢将军高度警惕。

周体仁为了使卢汉能周密地做好起义准备，还介绍了傅作义将军起义前的筹划情况，建议起义行动要绝对保守秘密，对国民党特工人员和反对起义

的人员要采取坚决措施。指出昆明起义最大的障碍是国民党中央军新八军、二十六军和宪兵部队。

卢汉向周体仁介绍了云南的军队部署和双方（卢汉的部队和蒋军）的力量对比，中央军的兵力（两个军七个作战师、两个补充师）大于云南地方部队（两个军六个师）的力量，另外在云、贵边界驻礼着国民党的八十九军两个师；起义时如得不到人民解放军及时的支援将对起义部队十分不利。

卢汉同周体仁商量后，遂拟定了起义计划，由卢汉将军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身份，以阻击人民解放军入滇为理由，命令新八军开赴滇黔桂边界，二十六军开赴滇桂边界，将该两军调离交通沿线和昆明地区；将驻大理的卢汉第七十四军（余建勋部）调驻昆明地区协同九十三军（龙泽汇部）保卫昆明，侍命起义。以龙、余两军消灭昆明的国民党宪、警武装及其他国民党驻昆机构。这样，起义部队可以配合人民解放军将新八军、二十六军夹击歼灭于滇、黔、桂边界地区。在此期间要坚决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其他部队进入云南。起义时间预定为1949年12月15日左右（后因情况变化，起义提前实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到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这时，云南各地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更加高涨。在城市，工人、学生、街道居民都纷纷走上街头，散传单，写标语，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民主，要求解放；在广阔的农村，革命活动也很活跃，到处流传着“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迎接解放大军进山寨”的歌声。人民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震动着三迤城乡。

在这种形势下，卢汉牢记周恩来副主席嘱咐，分析形势，为起义的时机已到，于1949年12月9日逮捕在昆明的国民党主要军政人员，宣布起义。同时，还发出了起义通电，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各政委，全国各军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鉴：

云南人民，自民国以来，对民主和平统一大业，企希夙深，护国讨袁之役，早已昭然在人耳目；抗战军兴，更兴全滇人力物力，贡献国家。我三迤父老原期抗战胜利、国上光复之后，中国即可实现和平统一，致力于民主富强康乐之新中国建设。不料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弃革命，排除异己，为巩固其一党独裁的血腥统治，不惜穷兵黩武，残民以逞，破坏政协，挑起内战，以美帝为后台，阴谋消灭澎湃发展中的人民革命，致使我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重陷于水深火热的深渊，民族生机为之摧残殆尽。

汉忝主滇政，忽已四载，昧于时局之所趋，惧于蒋匪之威胁，未能及时团结军民，抵抗强暴，坐令数万健儿被调于反人民之战场，千百青年受难于反革命之毒手，反躬自省，负疚良多。

今当全国解放大业即将完成之际，蒋匪仍执迷不悟，横施压力，妄图将其残余势力撤退来滇，作最后的困兽之斗。时势至此已属忍无可忍。

爰为征询全体军政同胞之意，顺应全滇父老的要求，即日宣布与蒋匪领导下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断绝关系，全境自动解放，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并暂时组织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公私资财，听从中央人民政府暨革命委员会命令，并竭诚欢迎解放大军早日入滇接管。

今后，汉等誓以至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民主自由和平康乐的新中国而奋斗。

谨此电叩，敬候指示。

卢汉

1949年12月9日22时

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即复电卢汉，予以嘉勉。

云南在40年代曾有民主堡垒之称，蒋介石曾派来大批特务，镇压云南人民及民主运动，暗中监视卢汉，以便控制卢汉。后又派来大特务沈醉、胥光辅为保密局滇站正副站长，指挥特务在云南的所有活动。“九九整肃”时，毛人凤率领大批特务骨干，来昆明进行震惊中外的大逮捕。

鉴于此，卢汉在准备起义中对肃特工作非常重视。卢汉一面巧妙灵活地应付各个大特务，虚与周旋；一面命佘晓清和龙泽汇注意调查掌握特务动态，并在9月下旬秘密成立情报组，派李世荣为组长，直接按照卢汉、龙泽汇、佘晓清三人的意图进行工作。

9日晚，卢汉的部队首先包围解决了住在云南的特务大本营“保防处军统滇站”，搜获电台、电码密本、枪支、器材、文件、特务名册、相片及该站人员（按特务名册又捕获了一些原先未掌握的特务）。在北门街四川公馆的中央内政部调查统计局，在华山南路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局，在小东门外紫薇村一号的国防部二厅，在昆设立的指挥所等处特务机构，均由部队同时分别派兵解决，特务大部落网。

对于军统特务头目、昆明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伯先（朱家才的连襟），卢汉嘱朱家才（军统特务）将周叫到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杨肇骧处，令他开出该队队员名单交警各部队按地址逮捕。对于原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柏天民、云南绥靖公署政工处少将处长罗春波二人，由佘晓清用卢主席名义，派军官把他二人“请”到警备司令部，然后送往监狱。

这次肃特工作，由于卢汉早就注意，又得到地下党和全市人民的检查举报，所以。能在宣布起义后短时期内，顺利地将在昆明活动的大小特务，大多逮捕，漏网者较少。

由于重要的大特务徐远举、沈醉、周养浩、胥光辅、沈蕴存、张秉张、柏天民、罗春波、李元凯、唐宇纵、严家浩、李家杰等均已被捕，其余特务也都按名册住址一个个抓获，肃特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起义及昆明保卫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次肃特能顺利进行，沈醉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被卢汉扣留后，始有怨恨，继则细想，卢先生有那么好的条件，完全可以出国，他却冒着生命危险起义，使云南人民避免战火的摧残。而自己在云南摆下的这一大堆危害人民的烂摊子，如果不趁此时期来收拾，也就无法向后人做交待了。

沈醉也不能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以及对追随他多年的部下负责。他的全家都已送往香港、台湾，而他的那些部下们还拖儿带女在昆明没有走，他想：自己一念之间的转变，不但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一大批人。所以，便主动写出几个刚到昆明的大特务的住处，同时交出了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来的十多部电台以及武器等。起义骨干们看到沈醉当时的表现，很出他们的意外，原来他们认为最不好对付的人。却那么痛快地自动拿出“本钱”。其实沈醉此时是在想，再不能犹豫，错过机会就后悔莫及了。

卢汉起义后，国民党空军于12月12日开始对昆明轰炸，16日，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从地面发起总攻。卢汉率领全市军民，在昆明地下党和边纵的密切配合下，浴血奋战，保卫昆明。并于其间释放了李弥和余程万，

让其回去做各该军的工作。与此同时，刘、邓大军杨勇部从贵州进军云南，于 22 日逼进曲靖。国民党军队深恐遭到前后夹击，仓皇撤退。至此，昆明之围遂解。28 日，朱家璧率领边纵进入昆明，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至此，昆明起义在周恩来的亲自策动下、经过艰难曲折，终在胜利的凯歌声中完全实现。解放后，卢汉先后任云南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于 1974 年病逝。

“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 ——周恩来与张冲

张冲（1903—1941）字淮南，浙江乐清人。国民党陆军中将。30年代初任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包干事，主管情报事务。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年仅32岁，是国民党中执委中最年轻的一位。后任国民党组织部代副部长、军事委员会顾问处中将处长。1941年8月11日在重庆病逝。

在张冲与周恩来频繁接触的五年多时间里，虽然各自代表所属党的立场和观点，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谈判，其间也不免舌枪眉剑，但在大敌当前，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往中，张冲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进步。为联苏联共、团结抗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正如周恩来后来在《新华日报》代论《悼张淮南先生》中所言：“然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次，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

一、“你们何不通过在苏的蒋经国 做蒋介石的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个新的历史使命又在等待着周恩来。同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

本来，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蒋介石已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但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恪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非常关心周恩来安全的毛泽东于1937年1月5日和6日连电在西安的周恩来，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2月8日，南京政府的军队和平进驻西安。第二天，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到达西安。蒋介石委派他为国民党方面在两党谈判中的代表，以后又增派张冲、贺衷寒参加。中国共产党方面，以留在西安的周恩来为谈判代表，后来叶剑英也参加。

西安谈判由此开始了。

在两党敌对已持续10年、互相成见很深的状况下，谈判中应该采取什么方针？这是周恩来首先要考虑的问题。2月24日，他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致电洛甫、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五项原则：

- 关于谈判方针，我意：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唯国民党如能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万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 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天即复电同意，并且补充说：“关于阶级斗争，本党当然遵守抗日救国之共同纲领，以抗日救国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天职，引导中国人民为此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共同奋斗，但国民党在改善民众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方面亦需有切实之努力，因民众由于政治经济生活之不堪痛苦而

起的斗争，本党实无力禁止。”

2月26日，张冲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张冲最初是陈果夫、陈立夫的部属，后来成为陈立夫办理对苏外交及与中共谈判的副手，最后脱离“调查统计”工作，直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张冲由于才华出众、精明强干为蒋介石所器重，同时张冲又积极主张联苏联共共同抗日。临行时，他去向蒋介石请示机宜。蒋介石对于和共产党的谈判十分重视，似乎已胸有成竹，对张冲交待了谈判的底数：

“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不可再加。”

张冲一到西安，周恩来即约他谈话，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某些用词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利；并就红军改编的具体问题继续同他商谈。

2月27日，周恩来与张冲继续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为关键的问题：红军的人数问题。周说：

“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至少要有六七万，以6个师计，每师3个团，总指挥部在外。”

张冲虽然是蒋介石所倚重的干将，并派其作为与中共谈判的代表，但张冲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真心希望国共能再度合作，携起手来共同对日。在谈判中，他也向周恩来交了蒋介石的底：

“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恐其壮大，所以，红军改编后只能编四万人。”

周恩来回答不能接受，并请张冲从速解决接济红军给养和停止进攻西路军的问题。

3月1日、2日，周恩来与张冲继续商谈。张冲对红军持同情态度，提出红军主力可以编4个师16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8个团，共6万人。这时，张冲向周恩来建议：

“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此时正在苏联学习，听说还参加了共产党。你们何不通过在苏的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若是他肯帮着你们说话。或许会有希望。”

周恩来对张冲连声道谢后，当即返回住处，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建议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商量。

由于张冲提案与红军实力较为接近，3日，洛甫、毛泽东即复电周恩来：同意张冲对红军改编问题的意见。

但是，南京政府对此寸步不让。4日，张冲不得不告诉与他会谈的周恩来：

“南京政府来电只允许中共部队改编为3个师9个团。”

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张冲不得不作出让步，双方达成了红军改编为3个步兵师、2个工兵师共6万人的协议。虽然这一协议由于南京政府从中作梗最后未能实行，但张冲对中共的同情已可见一斑，因此赢得了周恩来的好感，奠定了俩人日后友谊的基础。

经过反复磋商，双方意见逐渐接近。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彼此认为许多意见大体已趋一致，决定将1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做最后决定，以便执行。这便是“三八协议”。

事情在最初似乎进行得还顺利，但波折很快就到来了。

当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三八协议”草案提交顾祝同后，两天没有消息。3月10日，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一起修改这些条文，11日，突然由贺衷寒另行提出一个修改案，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改动。其中提出：

红军改编为3个师，每个师的人数只能有1万人，共3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逐渐派人充当；“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一语，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一句话，就是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善后事宜中，也将停止进攻河西红军（注：指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西渡黄河而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一部分红四方面军和红五军共两万余人）一条删去。

对于贺衷寒的这一节外生枝，周恩来马上看出了其葫芦里在卖什么药，当即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贺衷寒的这一方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愈紧，即愈难在蒋面前讨价，特别是以河西问题胁迫我们。”他着重点明：“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中央书记处在12日复电指出：“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电报最后说：“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

在周恩来和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都未提到张冲，可见张冲是没有参与贺案的。

周恩来知道张冲对联苏联共持积极态度，也为了分化顾、张、贺，便用开顾、贺，于当晚单独约见张冲，指出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要他以原提条文电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见蒋。同时，为了不把话说死，也表示：

“我党只是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不因贺案而动摇。”

事情至此已很清楚：这些问题不是西安的国民党谈判人员所能解决得了的，需要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这样，历时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告一段落。

但是这一段的谈判并没有白费。它毕竟使国共两党开始了初步的接触。双方也达成了一些协议，如红军改编成3个师，在西安设立中共办事处等。从3月份起，国民党开始接济红军的军饷。周恩来在3月14日还同国民党将领、原黄埔军校学生李默庵、关麟征等会晤，他们都向周恩来表示不愿内战。3月下旬，周恩来亲抵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在这一阶段谈判时期，有一件事对张冲的思想影响很大。那就是1937年5月，张冲随国民党组织的考察团访问延安。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满腔热忱的抗日主张，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中共领袖一切从抗日大局出发，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伟大胸怀，以及光明磊落的态度使张冲深受教益，切身体验到中共为国为民的殷

殷诚意；而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记个人怨仇的高尚品格，更使张冲十分感佩。事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这说明，他的思想、感情与国民党里的亲日派、顽固派已有了明显差异。

张冲此次延安之行，做了一件少为外人所知的事情，那就是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此前西湖会谈时，蒋介石就已将一部密码交与周恩来带回陕北，以供两党联络之需。

电台既已建立，张冲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后，就亲自布置中统香铺营电台与延安定时联络，沟通信息。凡有陕北来电，张冲必守着译电员译好，随即拿去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有什么答复，口授要点后，他当即拟成电文，待蒋点头认可后，立刻赶到香铺营电台，守着译电员译码，等到报务员发完后才放心离开。

一天夜里，张冲拿来蒋介石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回电交给译电员潘眠石后，因身体不适离去。谁知电报只发了一半，译电员就去睡觉了。次日清晨，张冲到电台一看，大惊失色，狠狠地训斥：

“你们知不知道这电报关系着抗日救国的大事？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事！并且，这是蒋委员长亲自字斟句酌修改的要电，如果不给我即刻发出去，我要找你们算账！”

电讯人员看到平时和颜悦色的张冲如此声色俱厉，感到问题严重，马上用多部发报机一齐呼叫陕北，叫不应也把电文发了出去。一小时、两小时、半天、一天……直到第三天早晨，延安才突然答应呼叫：

“你们发的‘盲电’都收到了，当即送给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昨天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发生故障，只能收报不能发报，所以无法答应你们的呼叫。”

至此，张冲才如释重负，向电讯人员拱手道：“你们辛苦了！”带着笑意离开电台。

二、特务刁难，周恩来难返延安；

张冲仗义，亲取蒋介石手令

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11月，张冲作为赴苏“实业考察团”（实为军事代表团）的副团长，奉命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议定苏联援华办法。回国后即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顾问处中将处长，专司对苏事务。他由此增加了对苏联的了解，联苏联共的信念更加坚定。

与此同时，张冲仍尽心尽力地从事国共的联络工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39年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并回乡省亲，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议事，张冲都从中给予了大力协助。尤其是这年夏天周恩来回延安。之所以能够成行，更是张冲鼎力相助的结果。

国民党当局本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局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都是一些国民党的特务，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正在双方争执不下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十分气愤，知道必是上峰有令，就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

“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三、“一朝之中总有秦桧、岳飞，

我们是忠，他们是奸”

在与张冲的交往中，周恩来处处注意用正确的立场观点给张冲以影响和帮助，除了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及时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事实纠正其偏见。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出售屡遭特务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呢，不再和他争辩，就陪他趋车直赴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得知了事情真相，十分气愤，随即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制止措施。

1941年1月，国民党悍然发动了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举世为之震惊。张冲看了《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在地上，双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不发一言，气得连饭也没有吃。而当《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的题辞“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关社论报道，揭露事件真相后，他则深表同情。

国民党顽固派害怕事实真相被揭露，指使特务无理没收报纸，殴打报童，去《新华日报》门市部捣乱，政治压迫愈演愈烈。2月

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受阻，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管家宕口小学门前交涉达两个多小时。当夜，我党干部陈家康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

“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

张冲听后喟然长叹：

“我死必在君先！”

张冲出此悲言，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在此时，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当张冲谈出国民党应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反共死硬派竟破口大骂，还猛然将茶杯向张冲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沉重，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张冲对周恩来说：

“一朝之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

四、张冲：为国家计，我可以跪下；

周恩来：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
是政治问题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后，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的严正立场，在国民党发布1月17日通令，取消新

四军后三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

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天，又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1月25日，周恩来将这12条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转交蒋介石，并且充分运用它作为打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有力武器。这12条既义正词严，又合情合理。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在谈话中并指出：“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这就大大将了蒋介石一军，使他在政治上更处于进退两难的狼狈境地：既不能接受这12条，又提不出足够的理由来拒绝这12条，从而在全国人民面前更加输理。

就在这时，日军乘隙向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迫使蒋介石对内不能不采取和缓的步骤。国民党刚刚在1月17日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顶点，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便不能不悄悄收缩退却了。中国共产党敏锐地察觉到了时局发展中的这种变化。毛泽东在2月7日致电周恩来说：“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于是，斗争焦点便转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这个问题上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名单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十来天（1940年12月23日）刚刚公布。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这届参政会的第一次会议原定在1941年3月1日开幕。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的出席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留在重庆不走，据说是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为此异常焦的，他急于想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来，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非难，摆脱困境。

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随便地、无条件地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但这样做、又必须力争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同情。2月10日，周恩来同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左舜生、张君勱等民主人士会面，向他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原因。他们对此表示谅解。会面后，周恩来接受沈钧儒等的建议，又致电中共中央，主张以中共方面七参政员的名义将12条要求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

这是十分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极大地扩大了12条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又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对敌抗战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的同情。14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的这个建议。

一场新的而又十分巧妙的斗争开始了。2月18日，周恩来将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善后办法未得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这封公函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二十余人。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王世杰接到这封公函后十分紧张，猴急马跳，立刻找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请与周恩来素有交情的张冲出面斡旋。

张冲虽然对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十分不满，但他不能不为蒋介石说话，不能不为蒋介石办事。他接连找周恩来，要求将这封公函暂时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周谈话。

周恩来早就胸有成竹，当即严词拒绝，指出：

“10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

张冲劝道：

“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

周恩来爽快地回答：

“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仍是撤过黄河那一套。”

2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我想，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见蒋毫无结果，而且击退顽方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员来调解是必要的。”在国民党的严重政治压迫下，这样断然的处置可能带来什么后果，周恩来当然都想到了。他处之坦然，向中共中央坚决表示：“我们一切都准备了，即他捕杀讨扣，毫无所惧。”

离国民参政会开会只有四天了，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国民党方面越来越焦急，希望共产党能撤回七参政员公函，出席国民参政会。2月25日晨，张冲受蒋介石所派，又到周恩来那里去，谈了大约3个小时。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

张冲苦苦哀求，甚至说：

“为了国家计，我跪下也可以。”

朋友说出这样的话来，周恩来内心不能没有一点触动，但为了党的利益、抗战的利益，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他很快镇静下来，坚决地说：

“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

张冲又提出周恩来见蒋的问题。周恩来回答：

“目前见蒋亦无意义，因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

张冲急忙说：

“不然。”

接着表示：

“根据各方面可能的意思，可以有几项具体办法，请恩来先生向中共中央报告。”

张冲提出的这些具体办法是：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完全留华中，再归还一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归还叶挺和其他干部，边区或冀察政权照前议；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三、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请蒋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显然，国民党方面已走投无路，开始软下来了。周恩来不为所动，回答张冲：

“所提具体条件可以报告中共中央，但没有必要收回公函，更没有必要见蒋。”

第二天，周恩来又会见张冲，告诉他中共中央的答复：“非12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张冲看了来电后有

点不快地说：“这一电报等于破裂。”周恩来向他解释说：“责在国民党。我党为挽救破裂，故提出 12 条。”张冲又谈到具体条件问题。周恩来推拖说：“中央要我回去讨论。”张冲不赞成周恩来回去，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周恩来无法拒绝的理由，说：“你如回去，他们（指国民党）又要说你们破裂了。”哪知周恩来一句话就把他的理由给打翻了：“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张冲只好退却一步，说：“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必武）、邓（颖超）两位出席参政会？”周恩来态度坚决地说：“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不是在侮辱我们？”张冲想抓着周恩来要回延安发起进攻：“董、邓如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哪知周恩来立刻回答：“我本准备在此待捕的。”张冲没了招，只好又说：“即使董（必武）、邓（颖超）只出席一人也好。”

周恩来讥讽地说：

“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

并再次坚决地告诉张冲：

“出席是不可能的。”

张冲明白，私人交情不能代替原则，他要替蒋介石说话，周恩来要代表中共中央说话，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只好快快地走了。

3 月 1 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上一天晚上，各方面都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的消息。国内外的压力越来越大，国民党方面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蒋介石的侍从室从晚上到清晨不断用电话向王世杰询问中共方面的消息。王世杰没招，深怕蒋介石责怪自己无能，只好再请张冲出面与中共斡旋。开幕那天清晨，张冲等又奉蒋介石之命来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当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

“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地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是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

这一场政治仗打得十分漂亮。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是有足够理由的。因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的过错，这一点全国都已知道，中国共产党以不出席参政会来表示抗议，没有什么错，何况中共方面又已提出让步条件，国民党仍不答应，错更在他们方面。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进退失据，一筹莫展。因此，中共中央判断，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

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参政会开会的第二天周恩来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 12 条，并说：

“倘蒙诸君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

董必武、邓颖超也在同天清晨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说：

“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就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殷，提出临时解决办法 12 条附列如后。倘此 12 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这 12 条临时解决办法，是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在两天前提出来的。它的内容是：

“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

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七、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两集团军共应辖有6个军。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张冲收到周恩来来信后，仔细阅看周恩来提出的12条，知道蒋介石不能接受，就借口“时间过急，等于哀的美敦书”，将来信和12条退回。周恩来呢，干脆果断，立刻派人重新送去，并附信

说：

“倘此次竟因先生退此公函作为贵党破裂表示，斯诚弟所不敢置信。”这样，就逼着张冲不能不将周恩来的信转给蒋介石。

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又联名写信给黄炎培、张澜、张君勱、罗隆基、梁漱溟、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褚辅成、邹韬奋、张申府等各党派代表，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起见，“改定临时解决办法12条，具见于与参政会公函中。”并且申明：此等办法，我党实已委曲求全，倘能接受，并有明确保证，“必武、颖超必亲往参政会报到。”如果这样的要求仍遭拒绝，造成局势恶化，中国共产党人也已“问心可告无愧”了。

鉴于《新华日报》准备发表的《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一文遭到扣压，周恩来决定不经送审而自行出版《新华日报》增刊一大张，将中共方面有关本届参政会的全部文献公开发表，使广大群众都能了解。

这12条临时办法虽未被蒋介石接受，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这次国民党参政会，但中国共产党处理这个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已博得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力量的同情，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五、痛悼张淮南

虽然蒋介石还要用张冲做挡箭牌为他奔走谈判，对他“慰勉有加”，并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虽然张冲仍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为弥合国共两党裂痕而奔走呼号，但他已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至为沉痛。一天，张冲叫来军事委员会顾问处会计叶至刚，郑重嘱咐：“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间的折中很有意见，近来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他们暗杀。”

说完，张冲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待叶至刚：

“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柜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

张冲逝世后，周恩来也嘱咐叶至刚，将他与张冲的往来信件全部烧掉。迫于形势，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殊为可惜。

张冲虽未遭顽固派的毒手，却不幸于1941年6月患了伤寒，继后发展成恶性疟疾。他起初没有介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团结奔走操劳。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在病榻前轻声慰问，关切备至。张冲于榻还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临末一面，他自知不起，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保持联系，免使国共关系冷淡。其时，日军飞机日夜不停地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加之气候炎热，医护不周，政敌刁难，8月1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40里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

斯人既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两党主要领导人纷纷致电家属唁慰。11月9日，张冲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社大礼堂举行。会场内外挽幛高悬，哀乐低回，备极哀荣。蒋介石亲临祭奠，并撰送哀辞：“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在众多的挽联中，尤以中共领导人的几幅特别引人注目。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联名致送的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联为：“国土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叶剑英、李克农送的挽联曰：“豺虎尚纵横，大局岂堪重破坏；巴渝多雾瘴，忠魂何忍早游离。”

与张冲从对手到密友的周恩来，在时局艰难险恶的情形下，对张冲的过世尤感哀痛：“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他沉痛地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短联当哭，既表哀思，更忧时局。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追悼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讲到后来，感情激动，不能自抑，以至语不成声，闻者无不动容。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指示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的专页，并撰写了二千余字的纪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作为《新华日报》代论，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劳神焦思”，“奔走坛坫”；称颂他“独持正义”，“力维大局。”并说：“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代表中共和人民表达了对一位爱国志士的高度评价。

杯光酒影巧斗法 ——周恩来与胡宗南

胡宗南（1899—1962）浙江孝丰（今安吉）人，字寿山。国民党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黄埔军校毕业，蒋介石嫡系。1930年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师副师长、师长。1936年任第一军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率第一军参加湘沪战役。1938年春，任第十九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豫东战役，围攻日军土肥原师团。后历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推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率部进攻陕甘宁边区。1949年逃往台湾。

胡宗南作为黄埔军校的学生，颇受蒋介石的青睐，是十年内战时的急先锋。然而这位国民党军中的干城之才，又怎能是老师周恩来的对手！红军长征、包座之战，周恩来与毛泽东联手指挥，让胡宗南大吃苦头。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周恩来两次致信胡宗南，劝其退出内战，做民族英雄。胡宗南长期保存周恩来的书信，对其以后的态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抗战后期，周恩来由渝反延，途经西安。胡宗南此时正奉命进攻陕甘宁边区，为免遭老师谴责，意欲灌醉周恩来。然而，胡宗南哪里想到，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正是周恩来亲自布下的一颗冷子：中共地下党员。是他使周恩来提前得知了胡宗南的意图，挡住了黄埔弟子们的一拨拨儿敬酒，巧妙地揭露了胡宗南蚕食边区的企图。

一、胡宗南：把周灌醉

1943年6月下旬，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由重庆返延安，7月9日到达西安。途中，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电报，胡宗南部队有进攻边区迹象，嘱其到西安与胡宗南交涉。

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事先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通知陕西省主席熊斌等，如周恩来约谈，应矢口否认有进攻边区的意图。

二、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三十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

胡宗南还规定，在酒会上，对周恩来称周先生，对邓颖超称周夫人，对蒋介石不称委座、总裁而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

王超凡想到林彪与周恩来同行，又问：

“对林彪怎么称呼？”

胡宗南干脆地回答：

“不请林彪”（林是黄埔四期生，从苏联养伤回延安路过西安时见过胡，态度甚卑，胡瞧不起他）。

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经事先联系，邓颖超因身体不适不参加。胡宗南要机要秘书熊向晖乘坐他的专用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

车到七贤庄，周恩来热情地问道：

“贵姓？”

熊向晖抑制着激动的心情，一如平常，答道：

“熊向晖。”

周恩来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紧握一下熊的手，领他向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又忽然停住，让熊稍等，他转身返回里院。

不一会，周恩来出来，熊向晖轻声用英语说：

“请小心，提防被灌醉。”

周恩来会意地点点头。

二、周恩来：请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一杯

车到小雁塔，胡宗南早已在会场外等候，看到周恩来到来，“咻”的一声一磕双脚，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胡宗南虽然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但不愧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一看就知其训练有素。向周敬礼后，陪周进场。王超凡马上向环坐在四周的作陪者下令：“起立！”周恩来挥手致意。胡宗南陪周恩来在东侧中间的双人沙发上就坐后，王才向作陪者下令：“坐下！”

王超凡首先致欢迎词。在临结尾时说：

“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显然，这是在将周恩来的军。且看周恩来如何应对。

胡宗南尚是周恩来的学生，王超凡在周恩来面前，只能算做黄毛小儿。周恩来举杯起立，微笑着说：

“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一杯！”

此言一出，胡宗南一下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顿时不知所措。

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

“看来各位有难言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

说着，周恩来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谈话。

三、夫人们喝酒，周恩来喝茶

隔一会，胡宗南、王超凡事先安排好的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

“我们虽然没进过黄埔军校，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的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恩来不失礼貌地从沙发上站起，风趣地说：

“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的对，我就同谁干杯。”

这些夫人只是为了编词让周恩来喝酒，信口胡诌而已，没想到反被周恩来有礼貌地将了一军，一个个顿时张口结舌。

胡宗南情知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忙说：

“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

为了给这些人一个台阶下，周恩来就转向这些夫人说，我们就谈点别的。他同她们分别寒暄几句，把她们送回原座。她们不感尴尬，反而笑逐颜开。

周恩来继续和胡宗南谈话，既谈政治，又谈军事。

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专向周恩来。领头的说：

“刚才胡宗南同志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

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显而易见，这些人大有不把周恩来灌醉不罢休之意。

周恩来机智地笑着说：

“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

胡宗南忙说：

“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

胡宗南发话后，这些将军们个个遵命干杯。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姓名、职务。他们转身回座时，个个面露喜色。

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干咳两声，看着稿子抑扬顿挫地说：

“我们久仰周夫人，原以为今天能看到她的风采，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有光临。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这时，周恩来一改优雅的姿态，敛去脸上的笑容，十分严肃地说：

“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虽比过去好，但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

说着，周恩来举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周恩来只是喝了茶。

王超凡、将军们、夫人们轮番轰炸，却都一个个狼狈败北，不得不收兵作罢，结束宴会。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

“感谢胡副长官的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的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

说完，周恩来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四、胡宗南聪明反被聪明误， 让地下党员送周公

宴会完毕，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以学生的谦恭时周恩来说：

“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

熊向晖上车，坐在周的左侧。车子徐徐启动，胡注目敬礼，周向他招手作别。

途中，周恩来说：

“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

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顺便带给胡副长官。”

周恩来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悄悄握了一下熊向晖的右手。熊向晖明白，周恩来有话同自己交谈。

不一会，车子驶至七贤庄，周恩来领熊向晖到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着熊向晖的手，满怀爱护和鼓励地说：

“这几年，你辛苦了。”

听到这关切的话语，熊向晖禁不住流出了热泪。周恩来柔声说：“要忍住。”熊向晖懂得这是一双关语。周恩来看着手表，说：

“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

“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周问。

熊向晖理了一下思路，答道：

“这要看全局。1939年蒋让胡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胡现有3个集团军，对付三方面，左支右绌。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都是地头蛇，挟回民自重，蒋不得不给以兵权、政权，又怕他们坐大，反蒋、降日、联共，需胡‘慑’服。山西大部沦陷，潼关至宜川黄河防务关系重大，蒋要胡用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固守。如日军过河，进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国统区保不住，蒋即便想和，也无本钱。前年，蒋派次子纬国到胡的第一师当排长，现升连长，一直驻潼关附近，表明蒋对胡的信任和对这段河防的重视。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借助中国牵制日军。蒋军常败，使美失望。蒋怕美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去年，罗斯福派特使威尔基来华考察。蒋专门安排他巡视潼关守军和工事，检阅胡的精锐部队第一军的1个师，借助此显示蒋有力量、有决心抗日。蒋标榜抗日，可提高地位，取得美援，更需胡固守河防，‘东御日寇’。蒋胡早想侵占边区，但因既要‘东御’，又要‘内慑’，无力北进，又怕我‘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对‘北’方针在于‘制’，力图在西北将我限制在蒋划定的边区范围之内。这次蒋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但蒋胡扬言我军到囊形地带是越界，是威胁，还会继续侵犯，认为不致引起风险。”

周恩来又问：

“胡反共坚决不坚决？”

熊向晖回答：“我一度认为胡可能成为‘夏伯阳’，但这是幻想。胡受蒋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效忠、服从。蒋抗日，他拥护；蒋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自宜川沿黄龙山北麓经洛川至甘肃环县长达1300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投降，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日美开战后，他请求过河反攻，蒋未准。黄埔生杜

聿明等率远征军出国作战，他很羡慕。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去年中共中央通过王民英邀他访延安，他很想协调一些关系，蒋不准。这次蒋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大体情况已知，周恩来关心起熊向晖的安全：

“服务团那个女团长还找不找麻烦？（指胡部战地服务团团长李芳兰，此人曾认为熊向晖是共产党员，并向他提出加入共产党）你在安全方面有没有漏洞？”

熊向晖回答说：

“前几年，李芳兰找我重提旧事，我顶住。胡的特务头子曾给我看一封匿名信，信里说我是‘匪谍’，我当场拍了桌子，质问他是何用意，指责对我玩特务手段，我要向胡辞职，特务头子劝阻，说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诬陷我，希望我提防。对这类情况我都在以攻为守。胡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我牢记你和董老的指示，特别注意谨慎，事无巨细都当心。胡常出人意料，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认为，行踪保密，微服简从最安全；事先张扬，前呼后拥最暴露，反易招敌暗算。一次，他去西峡口会汤恩伯，仅带俩人，中途夜宿村塾，无意中发现我独自通宵警戒，给他以难忘的印象。经多年观察考验，他对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惊无险。如遇险，我能自持。”

周恩来看看手表，还有一点时间，说：

“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又紧握熊向晖的手，摇了摇，深情地说：

“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这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几位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送上熊向晖坐的汽车，另给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这时，熊向晖才意识到，他接周恩来时，周恩来问他姓名后，叫他稍等，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他在七贤庄逗留提供借口。熊还意识到，把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给他，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问起：你在七贤庄待的那一会，“八路”同你谈些什么？他就可以说：“他们忙着找、包、捆，让我看杂志。”

周恩来一行于7月13日离西安去延安。军统西安站为了表明恪尽职守，送来综合报告。其中提到有一人坐胡宗南的专用汽车到七贤庄，接送周恩来。去按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去送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带走几捆东西，看不出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此人拿着几本反动刊物。熊向晖故意将此送给胡宗南。他看后哈哈大笑，高兴地说：

“周恩来在西安，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胡宗南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十分信任、派去接送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却正是周恩来派来的坚定而机警的中共地下党员。

蒋介石大举进攻，冯玉祥送来绝密情报 ——周恩来与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原籍安徽巢县，生于直隶青县，长于保定。原名基善，字焕章。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行伍出身。北洋军阀时期，曾先后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曾电邀孙中山北上。同年11月5日取消清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将其逐出故宫。1926年去苏联参观。1926年9月，率部在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誓师，自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所部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参加北伐。1927年5月在西安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曾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以后，因为与蒋介石集团发生利害冲突，举兵反蒋，先后爆发了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1933年5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任总司令。后在蒋介石与日军联合进攻下失败。1936年到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被蒋撤职。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与卖国政策。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在美国组织旅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国，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遇难。著有《我的生活》、《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

冯玉祥作为与我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和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帮助建立“文协”，以团结文化人共同抗战时，冯玉祥不仅忍痛割爱，让在自己身边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主持该项工作，而且长期出资相助。当冯玉祥避难出国，即将成行时，周恩来专程往访，劝其将子女送往上海，以免在南京被害。特务为阻止冯玉祥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合作，曾给冯玉祥寄来夹着子弹的恐吓信，冯玉祥大义凛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周恩来，支持共产党。冯玉祥不幸遇难，周恩来在冯玉祥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亲自致词，并为其墓碑亲笔题词。

一、“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于1937年12月18日来到“战时首都”武汉，接着于21日即同蒋介石谈判。在十分匆忙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民族的抗战，周恩来同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冯玉祥原是西北军的领袖，具有民族气节，曾于1933年5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发动察绥抗战，后在蒋介石与日军的联合进攻下失败。在对待日寇的侵略上，历来是主战的。他同蒋介石矛盾很深，曾写信给刘湘说：“我同共产党交朋友，没有吃过亏；同蒋介石拜把兄弟，可弄得我好惨，请以我为鉴。”在他身边，常有几个共产党员在工作。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虽先后委任他担任过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但不给他指挥实权。他于1937年11月底迁居武汉后，到处发表抗战演说，主张抗战。1938年2月7日，周恩来通过鹿钟麟向冯玉祥表示：拟请一见。开始，冯玉祥顾虑到自己的处境，托鹿钟麟代为表示：“因外间耳目众多，不便相见，唯努力作不见面之默契可耳。”但是，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决定直接会见这位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人物，以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探讨抗战方略。”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与冯玉祥会晤于武昌黄土坡千家街福音堂，他们谈得很畅快，特别是对前一阶段华北和上海指挥的得失进行详细的探讨，谈话内容涉及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深得冯先生的赞许和拥护。

冯玉祥在当天日记里谈了对周恩来的印象：

“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

周恩来离开后，冯玉祥对他周围的人十分感慨地说：

“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

第二天，他在会客室写下了八个大字：

“吃饭太多，读书太少。”

19日，他又到汉口同周恩来等见面。周恩来向他谈到正在日见发展的国共摩擦的情况。冯玉祥感叹地说：

“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在这种时代不求进步，是一种自杀办法。为大众谋利益，为大众而信仰，哪有这种办法？”

“应当多送学生去陕北学习，以应时代的推动，不要被时代的齿轮压炸了。”

以后，他常派他的专车将周恩来接到寓所晤面，同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二、周公重托建“文协”，玉祥割爱荐老舍

当时的形势是：日寇的主力已逼近徐州，准备打通津浦路以配合夺取武汉，投降派的活动日益猖獗，甚嚣尘上。面临这种形势，为加强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一步团结荟萃在武汉的全国文艺界爱国人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与冯玉祥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请冯玉祥给予支持，帮助解决“文协”开幕地点等问题。冯玉祥非常慷慨，忍痛割爱，推荐在自己身边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主持“文协”的工作。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同志的紧张工作后，“文协”很快于3月27日在汉口商会礼堂开幕了。这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的一次盛会，周恩来邀请冯玉祥以“丘八诗人”的资格参加“文协”，还推选他为“文协”理事。在“文协”开幕这一天，冯玉祥被盛情邀请出来演讲。最后大家表演文艺节目。轮到冯玉祥表演时，他趋向台前，轻拂着一块手绢，大唱泰山民歌《柴夫的儿子》，博得满堂喝彩声。会后，冯玉祥又借普海春大饭店设宴招待与会的全体文艺界人士。当时，五六百位文友欢聚一堂，谈着团结抗战的话语，实为一大快事。

周恩来还向冯玉祥谈到：宣传抗战，须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如印刷、报刊等。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冯玉祥随即在汉口武库街成立了“三户印刷所”。他取“三户”的含义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在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与此同时冯玉祥还创办了《抗到底》等刊物，办得虽不很出色，但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他利用“三户印刷所”印刷了《列宁全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向延安图书馆赠送了大批图书。

随着周恩来的安排，洗星海领导的“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派了陶宏来教唱抗战歌曲，一时福音堂里天蒙蒙亮就响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嘹亮歌声，政治空气十分浓厚。

“文协”成立后，武汉遭受敌机大轰炸，由于没有会址，冯玉祥便以自己的客厅于4月4日供“文协”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老舍作为筹建“文协”的主要负责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

作。会后，冯玉祥为表示对“文协”的支持，请大家吃便餐，端上桌的是香喷喷的烧饼、油条、小米稀饭，饭虽简单，但表达了主人的一片心意。5月中旬，“文协”在福音堂东南楼老舍住处的客厅里召开第二次理事会议，周恩来作为名誉理事，应邀参加。对这次会议，老舍先生在以后作的会务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起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

此后，福音堂连续遭到敌机大轰炸，冯玉祥迁武昌东湖西岸六合村。8月，冯玉祥又资助“文协”800元，交老舍赴重庆，租到了张家花园和临江门等处作会址。以后，冯玉祥仍不断地给老舍送款，以帮助“文协”会务的发展。

冯玉祥受周恩来的面托，对“文协”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多次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许多进步人士被捕。周恩来请冯玉祥帮助营救，他都积极进行。在周恩来提议下，冯玉祥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先后救出了进步人士张申府、周茂藩等人。其中以救周茂藩最为难办，也最费周折，冯玉祥为此曾大骂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是法西斯。

三、为阻止和周恩来交往，特务寄来子弹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的60寿辰。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同志，都致电致词向冯祝寿，称颂他是一位反帝爱国的英雄。特别是周恩来亲笔写给冯玉祥的祝词《寿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最为恳切、热烈，现详录于下：

焕章先生60岁，中华民国30年。单就这30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处处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也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先生长于演说，凡集会，有先生到，必满座，有先生讲话，没有不终场而去的。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先生肯作谏言，这是人所难能的。先生生活，一向习于勤俭朴素，有人以为过，我以为果能人人如此，官场中何至如今日之奢靡不振！先生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需。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也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先生的德功，决不仅此，我祇就现时所感到的写出。先生今届六十，犹自称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趁此良辰，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

周恩来这篇热情洋溢的祝词，非常全面而中肯地评价了冯玉祥的精神和为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一位爱国将领的评价，对一位长期合作的朋友的评

价。这一天，冯玉祥格外高兴，中共领导，尤其是周恩来的祝词，使他激动不已。感到自己好像年轻了许多。他以《六十岁的小伙子》为题，作诗以自勉，表达了他以人民为主人，决心做抗日公仆的意志。我党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为冯玉祥贺寿的祝词，蒋介石在那一天就见到了。何应钦见到周恩来的祝词，不以为然，他在一个场合上说：“中央有一位大员，共产党把他捧上了天，此人不用提名，大家也知道。”同时，冯玉祥收到一封匿名信，他打开一看，内有一颗子弹，纸上写着：“你如与共产党来往，决以此弹对待。”这是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恐吓。冯玉祥冷笑着坚决地说：

“想阻止我和周恩来交往、和共产党交往，办不到。”放区发起进攻。由于我军事先有准备，敌人的主力被我军诱向东去，我中原部队的主力早已越过于汉线，跳出包围圈，分散突围。

冯玉祥将军从许多事实中，逐渐认清了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真面目，感到在国内已无能为力而且危险，因此，便与李济深等计议出国，李济深主张赶快走。

此时，冯玉祥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和言论，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他为了排除内战障碍，给了冯玉祥一个赴美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把冯遣往美国。

冯玉祥临行前，正在南京的周恩来曾专程往访，并谆谆相告：把不能同行的孩子，一定要先送往上海，切莫停留，免生意外。

冯玉祥到了美国，还念念不忘他和周恩来共创“文协”的艰苦岁月，他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最好的现象是大家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如同汉口成立的抗敌文协，是舒舍予他们领导的。我听说，这些拿笔杆子的文人，平时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评你，谁和谁都不易在一起；这一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雪我们全民族的耻辱，他们成立了抗敌文协，大家全团结起来了，把自己互相指责的精神，集中起来对准敌人进攻！开成立会那一天有几十桌客人，我唱了个歌叫《柴夫的儿子》，还讲了一段话。假如在政府的人和党里的新贵族，他们能了解到这一点，我想决不应该后来再弄个张道藩来专做挑拨离间的工作。虽然那位姓张的努了些力，到底也没有破坏文协的团结。也可见不以最大多数的利益为利益，而以少数人的利益为利益，永远不会成功什么事体的。

然后，他将子弹和书信装进信封里，派人直接送交蒋介石。蒋介石只好回信说：“陪都重地，竟有此狂妄之徒，殊甚痛恨，已饬戴笠限期破案。”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后来此案再也没有下文。

冯玉祥的旧部、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荃忱）在襄樊对日军作战中浴血奋战，壮烈殉国。在他牺牲三周年时，《新华日报》出版《张自忠将军殉职三周年纪念专刊》，周恩来写了题为《追念张荃忱上将》的代论，热情地赞颂：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不仅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们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中所需要的宝贵精神。我们在抗日战争最后的一段行程中，要有伟大的爱和憎，爱我们抗日的同志，恨那般杀死我们抗日同志的敌人，不调和，不妥协，一直打到最后胜利。

四、冯玉祥送来绝密情报， 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

1946年春，蒋介石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面同共产党谈判，一面在积极准备内战。大规模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冯玉祥将军获悉国民党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周岳在花园口设立中心指挥部，企图在潢川平原地区诱歼我鄂豫边

境桐柏山区的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以及中原军区的第一纵队。在这异常紧急的关键时刻，冯玉祥与周恩来在抗倭楼谈话时，郑重地对周恩来说：

“要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要相信蒋的和谈，中原部队要转移到陕、甘边区去。”

周恩来得知这一珍贵情报，立刻感到了它的分量，急忙返回驻地，采取紧急措施。6月下旬，蒋军全部进入阵地，向我中原解

冯玉祥不忘周恩来当年面托他支持成立“文协”的情景，他远离祖国，仍念念不忘“文协”的艰苦岁月，思念着周恩来对他的帮助与鼓舞。

五、为冯玉祥墓碑题词

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毅然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引诱，经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帮助，乘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准备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9月1日行至黑海，因轮船起火而遇难。第二年9月1日，我党在北平专为冯玉祥举行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会上周恩来亲自致词说：

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为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冯先生生前曾进行反蒋，尤其在美国最后一幕与美帝国主义曾进行了正面的斗争。今天反蒋的斗争快要胜利了，但是反帝国主义尤其是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今后相当长期年的事情。冯先生坚决地拒绝了美帝国主义对他的引诱，毅然离美准备回到中国解放区，接受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不幸中途遇难，实值得大家纪念。今天，我们纪念冯先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骨灰安葬于泰山，周恩来又亲为墓碑题了词。

周恩来与冯玉祥近10年的交往中，冯玉祥将周恩来作为良师益友，周恩来将冯玉祥作为与我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都极为融洽，每逢他们会晤时，都能听到他们达于户外的爽朗笑声。冯玉祥不是一个完人，但他后半生在与周恩来的交往中，由于得到了周恩来的帮助和鼓舞，使他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人民的英雄。这不但充分体现了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也体现了周恩来善交朋友，充分调动积极因素的工作艺术。

“从现在起，那是一家人了” ——周恩来与傅作义

傅作义（1895—1974）山西临猗人，字宜生。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在阎锡山部任第十军军长。1930年参加阎、冯反蒋战争，任津浦线总指挥。1931年后任国民党政府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1933年和1936年曾率部在长城抗击日军。抗战时期，先后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绥远省、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曾代表国民党政府去热河、察哈尔、绥远受降。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华北“剿匪”总司令。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条件，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部长。

周恩来与傅作义相识于抗战初期，周恩来关于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论述使傅作义深为倾倒，并在部队贯彻。傅作义以必死之决心坚守太原，是周恩来及时指明出路，使他得以保存有生力量，自己也幸免于难。傅作义与共产党签订北平和平协议，远在重庆的家属遭到国民党当局迫害，是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辗转回到北平，全家得以团聚。解放后，周恩来从各方面都给傅作义以无微不至的关怀。

一、“周恩来文韬武略精明过人”

1937年9月下旬，傅作义第一次在山西太和岭口阎锡山的司令部里见到了来访的周恩来，在和周恩来的晤谈中深受教益。傅作义回到部队，在召集军官布置作战任务的同时，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讲的要点：

“这次去和阎长官商讨作战事宜，我还见到了中共要人周恩来先生，你们各位都是听说过他的。他就今后的抗战，向我讲了三条，使我颇受启发。第一，现在的抗战，不仅是政府与政府打，也不仅是军队与军队打。我们是全民抗战，男女老少、工、农、兵、学、商都要抗日，这就要充分动员民众，军民紧密合作，一齐打日本。第二，要建立部队的政治工作，加强部队的纪律教育，鼓舞战斗意志，坚定抗日信心，提高部队素质。第三，抗战是长期的，不在一时一地的得失，敌人尽管武器装备比我们好，但时间一长，就会消耗光的。并且敌人是侵略者，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最后必然失败无疑。”

傅部军官们认真地听着，不时有人发出啧啧地赞叹，有人连声说：

“有道理，有道理，照这样的打法，抗日不愁不胜。”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对傅作义影响很大，后来他曾邀请共产党人到他的部队帮助建立政治工作，并在团以上单位设立了政治机关，在营、连两级设了政治指导员和助理员。

忻口会战后，日军向太原进攻，国民党军队逐步南撤。11月2日阎锡山召开太原防守会议，决定傅作义守太原，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激傅作义道：

“宜生当年在天镇、涿州给咱争了面子，守太原不会给咱丢人。”

傅作义慷慨陈词，决心与太原共存亡。

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一下就看穿了阎锡山让傅死守以削弱傅部的意图（因傅部不是阎锡山嫡系），暗暗为傅作义担心。

会议结束时，为人仗义的卫立煌副司令长官给了傅作义一纸“相机撤退”的手令，并说：“你现在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不过我看太原是无法固守下去的，必要时，需要撤就撤，撤出太原的责任由我来负。”

傅作义送走了卫立煌，回到指挥部后，即给周恩来打电话，告以城内所存剩余军用物资可速派人运出，补给八路军。

卫立煌的直言相劝并未能使傅作义改变自己以死守城，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决心。他在临战前写的遗书式的家信中说：

我奉命在平绥线担任前敌指挥，虽经国军浴血奋战，仍未能阻止日寇的疯狂进攻。目前战火已烧到太原附近，我已奉命担任太原城防司令，肩负保卫太原之责。……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国人和家人矣！

对傅作义坚决抗战的决心，周恩来表示钦佩，但对他这种死打硬拼的做法并不赞成。周恩来在临出太原与傅话别时，再次向他阐明自己的观点。他首先向傅作义分析了此时的时局，以及太原周围敌我双方的态势，接着指出：

“你是守城名将，勇敢善战，是可以信赖的。但现在的形势是敌强我弱，这就决定了抗战的持久性、复杂性。焦土抗战的主张是错误的；只顾一城一地之得失，也是不足为训的。要从最后看胜利问题。能够争取时间就是胜利，能够保存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务请深思熟虑。”

周恩来的一席话，有理有据，处处从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出发，使傅作义改变了誓死守城的想法，后来在太原城确实不守的情况下，相机撤出太原，保存了有生力量。

这段与周恩来的接触，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给部下谈起周恩来时，曾十分赞佩地说：

“周恩来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才，文韬武略精明过人，全身都是心眼儿。”

二、“一定要把傅夫人从蒋介石手里夺回来”

1949年1月，傅作义率所部20万人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使北平免遭战火涂炭，和平回到人民手中。2月22日，傅作义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了，傅作义向周恩来表示感谢时，周恩来诚恳地说：

“咱们从现在起，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

在北平和平谈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向傅作义的代表提出过希望绥远问题同北平问题一起解决，以缩短解放华北的时间。傅方代表认为：绥远条件还不成熟，还是暂时维持原状为好。

周恩来为了实现毛泽东关于“绥远方式”的指示，亲自处理了傅作义提出的一些具体事宜，例如批准傅作义的一批高级将领回绥远去。他们回去后，宣传我党的政策，对绥远问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当双方各派代表开始在北平谈判绥远和平解放的问题后，由于在有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使谈判进展不快。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又叮嘱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实现绥远方式不要性急，要冷静地考虑他们提出的条件，要理解他们的爱国心愿和困难。他们希望和平解决的思想是主导的，但也有幻想、顾虑，也有他们自己的难处，有许多是我们不理解、想象不到的困难和想法。我们应该积极、耐心地去进行工作，等待他们的觉悟，否则就不成其为“绥远方式”了。

4月26日双方继续谈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时又达不成协议。毛泽东、周恩来知道谈判情况后，决定全部同意绥远方面提出的条款，终于达成《绥远和平协议》，使绥远得以和平解放。

1949年初，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住在重庆张伯苓家中，和平解放北平签字后，傅作义来电接家属，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得知，把刘芸生从飞机上扣留下来。蒋介石几次要把刘芸生送到台湾当人质，又想把她送到渣滓洞，和杨虎城关到一起。毛泽东、周恩来对刘芸生的安全极为关心，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

“一定要把傅夫人从蒋介石手里夺回来。”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刘芸生几经周折，历尽艰辛，于1949年6、7月间转道香港，在1950年初到了北京。

三、“至少保他再活一年”

1957年，傅作义参加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工典礼后，由临汾抵太原时突发严重的心脏病，准备用火车送他回北京。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专机送心脏病专家黄宛大夫前往太原抢救，同时又让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随机前往照料。经过急救，傅作义终于脱离了危险。回到北京继续治疗期间，周恩来又两次到医院探视慰问，使傅作义夫妇深受感动。这是周恩来挽救了傅作义的生命。

1963年，傅作义心脏病复发住进医院时，周恩来正在准备出访，他专门从昆明打来电话给予慰问，并让邓颖超亲到医院探望，嘱咐傅作义安心养病。

长期的军旅生涯，使傅作义年轻时就患了胃病，1973年8月的一天，他吃馒头时，却觉得咽不下去，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胃里已有一大肿块，病情相当严重。医生告之最多能活三个月。

周恩来得悉情况后十分着急，立即指示：

“一定要尽力抢救、治疗，至少保他再活一年。”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傅作义住进医院。周恩来想得十分周到，还为傅作义安排了一些政治活动，使他去世前这段时间过得很有意义。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傅作义参加了1973年的国庆节，会见了美籍教授，又请他以个人的名义去信邀请商震先生回国。在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7周年大会时，傅作义因病情严重不能参加，就躺在床上口授发言稿，由秘书记录整理，整好后送到大会上由董其武代读。

1974年1月，傅作义病情继续恶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生部为他组织了医疗小组积极进行抢救，周恩来经常在夜里把大夫找去询问病情，商量医疗方案。在决定腹部开刀插管时，周恩来特别嘱咐医生，手术一定要做好，不要引起感染。

正月初二晚上，久病初愈的周恩来又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刘芸生家，傅作义虽因久病不愈很是虚弱，但见到周恩来，得到了很大安慰。4月15日，傅作义病情转危，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闻讯后还在罗青长部长陪同下到医院探望。他拉着傅作义的手说：

“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和平解放是有功劳的。”

傅作义已不能说话，但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下，表示听懂了周恩来的意思，受到了鼓舞。傅作义逝世后，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带病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在追悼会前还接见了刘芸生及全家人。

四、“这是小超请的客”

解放后的二十多年里，周恩来在公务繁忙中，经常花费大量时间，亲自向傅作义讲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各个时期国内外形势，并委托薄一波、习仲勋照顾傅作义。周恩来谈话诚恳亲切，使傅作义深受教益。1956年，

周恩来亲自安排傅作义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会议，随后又到苏联参观，并向列宁墓献了花圈。这是傅作义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1972年，周恩来宴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前总理大臣田中角荣，都安排傅作义出席宴会作陪，并参加了中日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这是共产党对傅作义政治上的信任，是周恩来对他的亲切关怀。因此，傅作义非常兴奋激动。

邓颖超协助周恩来对民主人士也做了大量工作，对傅作义、刘芸生等非常关心。有一次，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张治中夫妇、傅作义夫妇吃烤鸭，周恩来笑着对大家说：

“这是小超请的客。”

五、周恩来提议：刘芸生参加国庆宴会

傅作义逝世后，有关部门开始每月发给刘芸生48元生活费，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指示增加到100元，并把以前少发的也补齐了，这时正好商震回国，刘芸生按傅作义生前习惯安排了一切。商震看到刘芸生生活舒适、安宁，感到很很高兴。商震说：

“真想不到你们住得比我在日本还宽敞呢！”

傅作义逝世后的当天晚上，刘芸生从医院回到家里，这是她最为悲痛的时候。正在这时，邓颖超代表周恩来看望她来了。刘芸生感动得泪流不止。邓颖超安慰、鼓励刘芸生说：

“不要搬家，国家管你，听党的话，实事求是嘛。”

这些话给了刘芸生很大安慰。几个月后，邓颖超又将刘芸生接到家中，用新鲜荔枝、西瓜款待刘芸生，并问长问短，耐心地教她如何对待以后的生活。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仅在精神上和生活上关怀刘芸生，在政治上还给予更多的关注。像刘芸生这样一个家庭妇女，周恩来、邓颖超不仅亲自提议邀她参加国庆25周年宴会，而且又让她作为爱国人士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与国家大事。在这次大会上，刘芸生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带病在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当看见周恩来面容憔悴时，内心深感忧伤，暗暗祝愿总理身体健康。

“希望像抗战时那样，我们很好地合作”

——周恩来与卫立煌

卫立煌（1896—1960）安徽合肥人，字辉珊。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29年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四十五师师长。1931年任第十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1948年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沈阳解放前夕逃至南京，被蒋介石软禁。1949年秘密出走香港。1955年3月回到北京，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早在北伐时期，卫立煌就曾是周恩来的部下。抗战初期华北最大的会战忻口会战，卫立煌正是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实施指挥，使会战取得了辉煌战果。解放后，周恩来一直关怀着流落香港的卫立煌，想法做通卫夫人的工作，将卫立煌夫妇顺利接回大陆，使卫立煌从此走向了新生。

一、周恩来面授抗敌机宜，卫立煌取得重大战果

1937年8月，正值抗日战争掀起高潮之际，卫立煌在太原和临汾数次见到与阎锡山和他本人谈判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到很大的启发，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思想转变的一大关键。

第一次见面是10月初，在太原城内府东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阎锡山的客厅里。卫立煌此时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刚刚率领他的军队开进山西，他本人先到太原，和阎锡山商洽布置军队阻挡从雁门关南下的日军问题。

阎锡山跟卫立煌谈过了一些军事情况，接着就提到有关八路军的问题，说：

“共产党方面还派了一个重要代表到了太原呢。”

卫立煌忙问：

“是谁？”

“周恩来。”阎锡山答。

卫立煌一听十分高兴，忙说：

“好极了。我能够和他见见面吗？”

阎锡山答道：

“怎么不能。本来他和我约定，下午4点钟到我这里来，一会儿就要到，请都不用再去请。”

到了4点钟，周恩来准时来到了阎锡山的客厅。卫立煌连忙站立起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室内军礼，仍然像他北伐当团长时对于军政治部的周主任那么尊敬。周恩来马上趋步向前，热情地和他握手，说：

“10年没有见面，变化真大，没想到我们现在又回到一条战线上来了。”

一句话，勾起了卫立煌对过去峥嵘岁月的回忆。北伐以前，卫立煌在广州就听过周恩来的演说，非常钦佩。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亲自到前线督战，是卫立煌敬重的领导。当时陈炯明叛军，依赖英帝国主义供应的武器坚守惠州，东征军一时攻不下来，蒋介石就有点气馁了，打算撤下惠州不打，径往潮梅，沿着第一次东征的路线前进。周恩来认为第一次东征不彻底，所以陈炯明仍然捣乱，此次必须首先攻下惠州，仗才好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各级党代表身先士卒，黄埔学生浴血奋战，付出了很大牺牲，终于打下了惠州。先打惠州这一高见增加了卫立煌对周主任的信仰。1926年北伐开始，周恩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第一师的党代表，卫立煌是第一军的一个团长。由于蒋介石别有用心，

设置障碍，故意不让第三师里的军事干部和周恩来接触，所以第九团团长卫立煌虽然在公共场合中和周恩来多次见面，却从来没有单独谈过话。

在这次交谈中，周恩来对于卫立煌决心率部去忻口迎敌，给予热情的鼓励；对于阎锡山，则给予积极引导，对他愿意和共产党联合抗战，在山西省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以及成立新军，都热情地给以肯定。

周恩来向卫立煌谈了他7月间在庐山，8月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的经过，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当中的主要精神后指出：

“抗战有胜败两个前途，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要看我们往哪边走了。”

接着，周恩来深刻指出：

“中国军队必须依靠人民，在强敌面前改变战术才能取胜。在作战时应当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法。同时，在防御中要采取积极的反突击。”

这时，阎锡山提出了调刘伯承率领的一二九师到忻日参加阵地战的意见，卫立煌也表示赞同。

针对阎、卫的意见，周恩来反复说明：

“今天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是主力，但在敌后游击战中将起决定作用。现日军向太原方向进攻，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应该给一二九师独立自主的活动机会，使它能迂回日军后方，寻找有利的条件打击敌人。”

一席话，说得阎、卫二人心服口服。卫立煌连连称道：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周先生所阐明的战略战术，不愧是军事上的大谋划。”

周恩来关心着有8万国民党军队参战的忻口会战，10月5日，他又会见忻口会战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和副总指挥、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和他们一起商谈忻口会战作战计划。能得到武略过人的周恩来的指点，卫、傅二人当然求之不得。周恩来认真分析了敌情我情后提出：

“贵军应以忻口周围山地为固守阵地，采取诱敌深入之术，诱敌至代县、忻口一线，这样贵军利用有利地形，以转圆石于万仞山之势，从侧面猛烈出击，可收出敌不意之效。处于左右两翼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可同时向宁武南北、代县以东侧击敌人，协同友军作战，力争在忻口以北取得胜利。”

卫、傅二人听得入神，待周恩来讲完，才回过神来，连连表示将依计而行。后来证明，卫、傅二人实行了周恩来提出的战术，取得了歼灭日军两万余人的重大战果。

10月中旬，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又亲赴忻口前线，和卫立煌一起商谈作战问题。

二、“共产党与众不同，周恩来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卫立煌再次和周恩来见面是在11月初，从忻口退回太原之日，离第一次见面刚好一个月。

这时由娘子关进来的日军在占领榆次、太谷之后，往太原以南包抄过来，掐断了中国军队在同蒲线的南撤之路。太原市内已听见隆隆的炮声，情况十分危急。刚刚经历过忻口会战二十几个日夜鏖战的卫立煌，眼睛熬得通红，声音已经嘶哑，像生过一场大病一样，疲倦不堪，情绪低落，但是一看

见周恩来到来，精神立刻振作起来。他向周恩来报告说：

“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要不是娘子关方面的情况变化，我们真能够把板桓师团歼灭个差不多。这件事情没有完成真是可惜，太可惜了。”

接着又说：

“没有把一二九师调去打阵地战是做对了。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我们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样一来，使敌人没法从空中轰炸我们，是对忻口会战正面战场的极大支援，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于八路军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

周恩来询问卫立煌对下一步的作战有什么打算？卫立煌说他很发愁：

“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黄绍竑副司令长官的意见，集合从忻口和娘子关两方面退下来的军队，在太原附近再组织一次激战，凭近郊的山势，再打一阵。这种想法不很现实，太原已经陷于三面包围之中，让这些疲惫不堪的队伍——有些已经集结不起来了——再战是不容易的，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集结休整的时间是不行的。另外一种意见是阎司令长官的意见，让宜生（傅作义）兄守太原城，他的三十五军还是完整的，比较精悍。阎司令长官说宜生兄过去守涿州守了两个月，名闻全国，现在太原城中粮食弹药都够半年之用，要宜生兄再显一下身手。我看这个事情不好办，实在是犯愁。”

周恩来告诉卫立煌：

“我们要在失败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前途，认为没有办法，发愁，都没有必要。你不是知道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吗？胜败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就算太原保不住，只要我们继续抗战，不动摇，不妥协，实行全民总动员，进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最后我们定能改变不利的形势，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权。你不是知道八路军在敌后活动得很好吗？因为我们紧紧依靠了人民。假如山西省早就给了人民以自己组织自己武装的权力，形势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你说是不是呢？”

此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从太原逃跑，太原已经陷于混乱，周恩来还有许多事情急待料理，只能匆匆忙忙和卫立煌谈了几句，相约转移到晋南以后再详细交谈。

日军从3个方面向太原压缩，中国军民只剩下越过汾河向西南退走这一条路。当晚周恩来离开太原的时候，城内城外数处起火，日军的前锋已离城区的外围不远了。汾河桥已被军用汽车堵塞，只剩下一尺宽的空隙可通行。难民们拖儿带女，哭爹叫娘，挤做一团。

卫立煌在天明以前过河时，见堵塞的现象已经解除，不觉有几分欣慰。就在这时部队的官员报告，桥上的交通堵塞现象是八路军首长亲自指挥解除的。后来，代理独立第五旅旅长高增级又向他报告，是周恩来代表亲自指挥整顿的。这一切的一切使卫立煌在内心里感叹：“共产党与众不同，周恩来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十多天后，卫立煌在临汾再次见到周恩来，卫立煌十分惋惜他说：

“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去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守不住。最后只有依赖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了。”

周恩来向他分析目前的形势，指出下步的任务，说：

“目前我们的确有很大危机，敌人一定要向着风陵渡打过来，这只是个

时间问题了。日军希望在压迫我们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以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凑一个号称‘华北自治’的傀儡政府。现在上海方面的战事也已失败，中国军队退到嘉善苏州一线。日本盼望着在中国很困难的情形下和中国订一个停战协定，把他们在战场上获得的胜利用条约固定下来，作进一步侵略的准备。目前，国内外调停空气抬头，亲日派活跃，主张直接对日谈判，驻沪领事团公开从事和平运动，德国完全力日本说话，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些事情。因此，反对投降主义，坚持华北抗战，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事情。”卫立煌没想到周恩来对目前的形势会了解得如此透彻，坚定他说：

“妥协求和是做不到的，我就坚决反对妥协求和，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赞成妥协求和。不过今后的华北抗战更加困难，有些事情不好办。”

周恩来语调铿锵他说：

“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如果要问今后华北抗战能继续吗？能持久吗？我们回答：绝对地能！”

周恩来用了较长时间列举了大量理由，雄辩地论证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及其前途，充满信心地指出：

“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抗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如果中央能派得力的生力军，改变过去的防御战略，动员广大民众参战，则华北战争的危机可以改变，我们还能转到胜利的反攻。”

这些分析大大鼓舞了卫立煌抗战信心。他决心留在山西坚持华北抗战。

接着，周恩来又对怎样坚持华北抗战，提出了四项任务，第一是军队的改造，第二是开放政权，第三是开放民运，第四是肃清汉奸。特别着重讲述了第二、第三两条：

“现在民众动员很差，政权没有开放，民运没有开放，政府包而不办是普遍的现象，前线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后方得不到民众的援助。不要人民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只有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面抗战，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最后，周恩来建议，为了适应华北抗战转入持久抗战的新形势，黄河北岸应实行分区指挥，在南岸要成立预备军。

周恩来在山西境内与卫立煌的数次接触，给卫以极大的影响，使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直与八路军合作得较好。

三、太原朋友捎信劝归，卫夫人疑虑雪溶冰消

1955年1月18日，我国海军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美蒋订立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周恩来发表的严正声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拥护，也受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只有香港几家蒋帮报纸跟在美国的尾巴后头，唱出不同的调子。这些报纸不但诬蔑这个声明的本身，并且对中国报纸上报道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发表谈话也加以攻击，谩骂张治中等人是“传声筒”，听着中共当局说什么也跟着附和什么，是“奉命表态”，“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

1949年辗转来到香港的卫立煌看了这种报纸以后，大不以为然，立即和一些朋友说：

“这些话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

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这么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当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闻知此事后，立即来和卫立煌见面，支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仗义执言，并说如果卫立煌愿把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对于解放台湾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时告诫他，在香港可不能这么自由讲话。并和他商量，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卫立煌本人必须要藏匿起来，不然定会遭到蒋帮特务的迫害。往哪里躲藏好呢？发表文章以后返回大陆如何？

此事很快传到北京，周恩来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的同时返回大陆的办法。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但又听说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还心有疑虑，不大同意回到大陆，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找韩权华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此时邓颖超的秘书生病请假，由一个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这个韩德庄，就是韩权华的侄女，周恩来就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说是姨父过去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的，请姨父和姨母回来。

卫立煌一见此信，马上明白了是周恩来叫他回来的，非常高兴。1937年忻口战役前后，卫立煌在太原和周恩来几次谈话的情形历历在目。他在周恩来的鼓励之下，对于抗日建立了不少功勋。长期以来，每当报纸上发表有关周恩来的报告和消息，他总是要细读一番，从中吸取一些新的知识。现在周恩来请他回去，那再好也没有了。卫夫人也由此打消了疑虑。

于是，他携夫人悄悄乘船到澳门，然后再由澳门到广州，这一天是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把它看做是自己新生的日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先在祖国各地观光旅游。从广州到上海、杭州、无锡，一路饱览祖国的大好风光，一路受到热情接待。

1955年4月4日，卫立煌夫妇忽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周恩来总理即将出国，想在临行前会见卫立煌及夫人。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美丽的无锡，当晚即搭乘火车北上。此时俩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兴奋。卫立煌想到能和北伐时期的老领导，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朋友、现在共和国的总理见面，非常高兴。韩权华的心情更是非常激动，能够见到青年时代的老同学邓颖超，这是以前从来没能预料到的事情，火车一路风驰电掣，但他们还只嫌火车跑得太慢。

4月6日上午，火车准时到达北京，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使他俩十分感动。当日下午5时，即蒙周恩来接见，并设家宴招待。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回来的经过，并和卫立煌重叙了两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旧谊。邓颖超热情地和韩权华谈起往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热情款待，使得他俩毫不感到拘束，大有宾至如归之感。

周恩来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力量。他们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是那样诚挚、健谈，听说周恩来在第二天就要动身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他们更是感动。周恩来出国前夕，在宵夜呷食、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和他们做长时间的谈话，而且是那么从容不迫，精力充沛，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刚做了手术还不到一个星期。

第二天。周恩来为国务走了，邓颖超便亲自过问卫立煌夫妇的住房、生活、参观等各方面的安排。周恩来从万隆会议归来后，又和陈毅一起宴请卫

立煌，席间他们无拘无束地交谈，周恩来专门谈到了有关解放台湾的问题和一些党的政策问题。陈毅还特别针对韩权华离开香港前的想法，解释从前宣布战犯名单时为什么把卫立煌也列入其中的原故……

1955年6月，卫立煌夫妇从北京饭店搬到政府为他们安排在北京东单麻线胡同的新居，总理又亲自到新居看望他们，恭贺乔迁之喜。

1958年，戎马一生的卫立煌多病并发，住进医院。住医院后，大夫下让他看书，他就每天坚持听别人读报上的重大消息，对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的新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每当精神较好的时候，他就翻阅国庆十周年的纪念画册，爱不释手。

周恩来和朱德都一再到医院里去探望他。在卫立煌病势沉重，说不出话来时候，来看望他的周恩来就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同疾病做斗争。此时卫立煌虽不能用语言表达，神志还是清楚的，感动得流下了两行热泪。

卫立煌于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逝世。终年64岁。

1月20日上午，芍都鲁界在中山公园内中山堂公祭卫立煌先生。在中山堂公祭是很有意义的。明清两个朝代，这个地方是社稷坛，是皇帝祭祀土地神和谷伸的地方。旧时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代称，对这个地方看得十分神圣。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就停灵在这里受到人民的公祭。从此以后，社稷坛后的殿堂遂更名为中山公园中山堂。今天共产党在孙中山停灵的地方隆重公祭卫立煌，卫先生死而有知，当应含笑于九泉。

公祭大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主祭。周恩来原在上海视察，为了主持这个公祭大会，特地连夜乘车从上海赶回北京，亲自到灵堂来主持。

卫立煌病逝后，其夫人韩权华担任了国务院参事，在1975年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以后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时，她都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974年10月1日，是建国25周年大庆，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当时，韩权华正卧病在床，未能参加。第三天，邓颖超就来到韩权华家看她，并说。

“总理知道名单上有你，但报纸上没有报道你的名字，我打电话查问才知道你病了……”

此时的周恩来身体已非常不好，仍然操心着繁重的国家大事，还对韩权华如此关怀，使她感动不已。

对特赦战犯的关怀 ——周恩来与杜聿明

杜聿明（1905—1981）陕西米脂人。字光亭。国民党陆军中将。黄埔军校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任国民党军装甲兵团团长、第五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昆明防守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杜聿明作为黄埔一期的高材生，曾是周恩来的学生，但他后来却走上了追随蒋介石与人民为敌的道路。当他作为一名战犯被特赦后，周恩来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每逢国庆佳节，他都能准时收到由周恩来派人送达的请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欢度这共和国最盛大的节日。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在人民大会堂里，他得以陪同总理一起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得以参加周恩来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而举行的盛大宴会。他感到无上的光荣。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宇回国探亲。周恩来又亲切接见他们一家，当杨振宁称他为“先生”时。周恩来立即纠正：应叫岳父大人。欢声笑语中，杜聿明体会到了周恩来对他的尊重和关怀。

一、特赦仅十天，总理即接见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等10人作为战争罪犯被特赦，特赦后民政部门安排他们住进旅馆里。他们虽然感受到了投向人民怀抱的无限幸福和欢欣。但又都处处感到陌生，好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似的。他们住在旅馆里，整天不出大门一步，只是坐在房里阅读书报或给亲戚朋友写信，此外就无所事事。杜聿明在北京没有多少亲朋可访，只有在京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和好友郑洞国、侯镜如以及旧部黄翔几位来看望他，为他的新生致贺。杜聿明心里虽然高兴，但表现得却十分拘谨，即使是老友相见，也只是彼此寒暄一番而已。别的便不知从何谈起。

这样连续几天过着冷清的生活，旅馆的服务员和民政局秘书殷兆玉看出了他们的心理状况，知道这些人由于不了解人民政府是否准许他们自由行动，思想上还有顾虑，不敢冒昧从事；加上北京自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以来，市容有很大的改变，他们要是上街。可能连方向都辨不清，因而只好株守在房间里。于是，殷秘书和服务员热诚地向杜聿明等做工作，向他们说明：

“特赦后就享有公民权，在宪法范围内都可自由行动，没有任何限制，尽可以到外面活动，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探访的，也可以看看北京市容，或到公园里逛逛。”

同时还给他们介绍了公园、商场的位置和情况，希望他们随意到外面看看走走。

杜聿明等人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才开始活动起来。杜聿明作为一位新中国的公民，首先来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了四周雄伟壮丽的建筑群和广场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当他读了纪念碑上毛主席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色大字，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亲笔题词之后，便以惭愧仵悔的心情，肃立在纪念碑下，向近百年来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鞠躬敬礼，良久默哀。周恩来是他在黄埔军校的老师，此时此刻，他真是悔恨交加，

痛恨自己当初没有听老师的教导，而走上了为蒋家王朝卖命的道路。

然后，他仔细观摩了表现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革命斗争的四面浮雕。在天安门广场，他足足呆了半天才离开。自此以后，杜聿明等人连续畅游了故宫、中山公园、北海、景山等名胜古迹，心情无比舒畅，生活日益丰富，思想上再也没有什么拘束了。

12月13日，也就是他们被特赦后的第九天，北京市民政局殷秘书通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俊泉10人，14日下午有首长接见，不要外出。第二天午后1时许，驶来一辆擦洗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大轿车，把10人都接上了车。

“这是到什么地方去？”

“是哪位首长接见呢？”

大家都猜不着，又不好意思问。车经过北海大桥后，向左转弯，有人认出这是中南海的路。果然，大轿车一直驶进了中南海北大门。杜聿明等下车后，被领进一间大会客室，室内沙发排成一个圆形。这时，一位干部宣布：

“今天是周总理接见你们。”

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使大家惊喜异常。周恩来总理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政治部主任，给大家讲过话，上过课，黄埔第一期学生杜聿明、曾扩情、宋希濂、周振强和第三期学生王耀武，都亲聆过总理的教诲。他们早就想见到敬爱的周总理了，只是怕总理忙，不敢开口请求。今天，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竟然抽出宝贵的时间专门接见特赦人员，这对于杜聿明等人来说，该是何等的幸福！

但是，杜聿明又深感内疚地自审：老师对自己这样好，自己在黄埔毕业后，走上了与共产党为敌的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争罪犯，在老师面前又该说些什么呢？会不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呢？

此时此刻的他，喜悦、幸福和羞愧的心情交织在一起。

正当杜聿明激动不已、思绪纷坛的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徐冰部长指着一个人，给大家介绍说：

“这是清朝末代皇帝傅仪，他是在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

傅仪身穿一套蓝棉制服，戴一副深度白色眼镜。他听完徐冰部长的介绍以后，转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然后就座。

片刻，敬爱的周总理来了！陈毅、习仲勋副总理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几位先生，随着总理一齐步入会客室。大家起立，热烈鼓掌。杜聿明向总理行注目礼，他看到，老师仍然是神采奕奕，英姿勃勃，脸上透出和蔼的笑容，笑容里满含着宽厚，一如他那博大的胸怀。

总理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满面笑容，目光炯炯地环视了一周，然后首先询问每个特赦人员的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亲属情况。当听到杨伯涛介绍说，他的妻子没有追随胡璉的第十八军逃往台湾，而是回到原籍芷江，在县被服厂当三级缝纫工，自食其力抚养子女上学时，总理点头微笑，真如家人一般亲切。

阵阵暖流，沁入肺腑，杜聿明等大有如沐春风之感，刚才的紧张心情渐渐松弛了下来。

接着，总理对着曾扩情说：

“我在黄埔的时候还不到30岁，有很多学生年龄比我大，我当时感到有很大压力。”

曾扩情连忙答话。

“我那时已30开外，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

这时，总理转身和溥仪谈起旗人的习俗、服装和礼节来，说：

“我和人接触，一看到具有这些特征的，就知道他是一位旗人。”

陈毅副总理也风趣幽默地对溥仪说：

“我早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还是你的臣民哩！”

这句满含幽默的话，道出中国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时，杜聿明对总理说：

“学生对不起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

总理立刻回答说：

“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

说罢，总理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杜聿明又向陈毅副总理检讨说：

“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见面。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

陈老总摆摆手，笑着说：

“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这样无拘无束地漫谈了一阵以后，待大家从紧张中完全松弛、缓和下来，周总理对溥仪、杜聿明等11名特赦人员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他说：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是说话算数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

接着，周恩来谈了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前途问题、工作和生活问题。

关于立场问题，周总理指出：

“立场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就是人们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要经得起考验，要给人以好的印象。”

周恩来诚恳地教育大家：

“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120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

说到这里，他面向溥仪说：

“现在的国家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也没有搞好。今天，中国6.5亿人民站起来了。生于斯，长于斯，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

周恩来接着说：

“以民族问题为例，过去是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溥仪先生你在清末登基时才两三岁，那时你不能负责，但在伪满时代你要负责。在今天，各民族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各民族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互相帮助。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电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

谈到这里，周恩来扫视一下全体人员，又指出：

“民族利益与劳动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有了民族立场，还要进一步建立劳动人民的立场。就是要去掉剥削阶级的立场，逐步站到人民这一边来。希望第一批特赦人员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加强思想改造，不断革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步。”

关于观点问题，周总理说：

“你们有做新人的愿望，这很好。但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头一批特赦人员在这方面有进步，希望继续努力巩固。”

关于工作和生活问题，周总理说：

“工作、生活、劳动、学习、参观，要好好安排一下。参观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们进一步了解国内情况。你们要回家的、接着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

关于前途问题，周总理说：

“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你们做得好，狱中人会感到更有希望。”

周总理最后说：

“你们也不要把现在的一切都看得那么好。北京的巷子里还有很多矮小房屋。全中国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几十年。精神面貌也不一致，有的人进步比较慢。我希望你们：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党和国家对你们是信任的，你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

听着总理的谆谆教诲，沐浴着总理的光辉，杜聿明感到真是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周总理讲完后，章士钊先生发言，他说：

“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将军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周总理看了看表，觉得时间已经很久，该吃晚餐了，就问工作人员：

“预备晚餐了吗？”

工作人员说没有，总理十分歉意他说：

“以后再说吧。”

杜聿明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向周总理和各位师长鞠躬告别，恋恋不舍地走上汽车，从车窗里向后回望，看到周总理仍站在那里向他们招手，目送汽车驶离，眼睛不禁湿润了。

周恩来接见以后，统战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除安排周振强赴浙江原籍、杨伯涛赴湖南原籍探亲外，随即将住远东旅馆的社聿明及住在其他旅馆的9人，都集中住到崇文门内的崇内旅馆。这里面对东单公园，环境幽雅，交通方便。

杜聿明和大家一起首先认真学习了周总理的讲话，深切体会讲话精神，杜聿明讨论时发言踊跃，表示决心继续学习改造，不负总理的期望。

周恩来十分关心他们的学习，亲自看了他们的学习讨论记录。在此期间，他们还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工农业生产情况。统战部对社聿明等的安排是：凡在大陆没有亲属，及愿留北京的，可以留在北京；在外地有亲属者，可以前往团聚。其中曾扩情、卢浚泉、陈长捷、邱行湘4人，愿往外地和亲属团聚，为此，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在政协礼堂举行欢送宴会，并妥善安排了他们的旅行交通及家庭生活。

二、周恩来向蒙哥马利介绍：

他与陈毅打过仗

1960年5月26日，杜聿明忽然接到北京市民政局的通知，要他准备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杜聿明顿时感到紧张，因为他除了特赦时管理所发的

一套布棉服以外，自己没有添置新的衣着。时当春未夏初之际，没有合适的服装，怎么好去见外宾呢？岂不是给国家丢脸吗！幸好杨伯涛有几套旧中山服，是他爱人 1950 年从芷江来北京看他时带来的。杜聿明就拣他一套浅色的穿上，虽觉稍短些，但也还看得过去。

来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杜聿明才知道此次是周恩来和陈毅宴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和共和国的总理、副总理一起接待外宾，这是杜聿明连想也不敢想的，然而，这却是事实。他不由得在心中默念：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周总理伟大。这次邀请杜聿明作陪，是周恩来的悉心安排，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聿明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知名，互相倾慕。

当周恩来介绍到杜聿明时，诙谐地笑道：

“他同陈毅打过仗。”

蒙哥马利好奇地问：

“你们谁战胜了？”

周恩来指着陈毅：

“他获胜了。”

蒙转向杜聿明：

“那次战役中你有多少军队？”

杜聿明回答。

“100 万。”

“拥有 100 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

杜聿明幽默地回答。

“可是陈毅元帅有 200 万人，因为我手下的人最后都跑到他那边去了！”一时满座欢笑。

蒙哥马利对这次与杜的会见感到满意，他从和杜聿明的交谈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被俘国民党将领的政策，表示颇为赞赏。

在中国所闻所见的一切，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国后在《三大洲》一书中写道：“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世界必须现在就同新中国和好，并且平等相待。”这当是后话。

在宴会厅休息时，陈毅副总理看了看杜的穿着还算整洁，微笑着向杜说：

“你这身衣服挺好！”

杜聿明腼腆地回答说：

“这是我借来的。”

陈老总不禁哈哈大笑。

后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我国访问，周恩来总理设盛宴欢迎，也再次邀请杜聿明作陪。开宴前，总理向亲王一一介绍参加宴会的人员、轮到杜时，总理介绍说：

“这是杜聿明将军。”

这使杜聿明感到惊讶和激动：自己在过去是一名战犯，现在才改造为新中国的一名公民。总理非但不嫌弃自己，让自己参加接待外宾，在公众介绍自己时，还称为将军。

宴后归来，杜聿明深有感触地对朋友们说到这件事，深感总理对前国民

党将领仍然是尊重的，有适当机会还给出头露面。

三、“你们是第一批特赦的， 要做好改造的标兵”

为进一步教育杜聿明等人，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让张治中以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队长的身份，邀请在京的黄埔同学到颐和园聚会，并嘱咐有家属的也要偕同参加。总理为此还亲自给曾是黄埔一期学生、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陈赓挂电话，要他一定偕夫人同往。10月19日上午，大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到了颐和园。计有张治中先生及夫人洪希厚，邵力子先生及夫人傅学文，屈武先生，陈赓及夫人傅涯，郑洞国及夫人，侯镜如及夫人李松芸，黄雍、李奇中、覃异之，周嘉彬及夫人张素我，唐生明及夫人徐来，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等。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童小鹏两位也莅临主持。敬爱的老师周总理和邓颖超按时到达，大家起立欢迎。

周总理满面春风，目光环视了到会同学后，请大家就座。总理说：

“这次是黄埔师生联欢，大家在一起好好叙谈叙谈。”

总理对杜聿明等6人在红星公社的锻炼情况极为关心，询问得十分仔细。杜聿明等把生活、学习、劳动情况做了汇报，总理表示满意，说：

“这次文白（张治中的字）先生在颐和园休息，趁这个机会请文白先生邀约大家到这里见面。大家工作得很好，我很早就想和你们谈谈的。”

接着，邓颖超热情他说：

“我和黄埔没有关系，但我对黄埔同学也是关心的，今天也高兴和你们见见面。总理工作很忙，整天无暇休息，常常是早出晚归，连我也很少见面。”

总理再次教育勉励杜聿明等人说：

“你们是第一批特赦的，要做好改造的标兵。你们被特赦了，但是过去的历史罪恶还是客观存在不能改变的，不能因为特赦就一起抹掉了。当然人的思想行为是可以改变的。赦人不赦罪，大家要引以为戒，继续改造自己。”

会餐完毕，少憩片刻，总理兴致勃勃地问工作人员：

“大家相聚不易，要留个纪念，在哪里拍几张照好？”

工作人员马上引导总理及众人一行，到昆明湖北岸的牌楼前，以巍峨的万寿山为背景，连拍了几张集体照。这时，杜聿明心想，要是几名特赦人员和总理一起照几张应该多好啊。周总理马上看透了众人的心思，对杜聿明等6人说：

“我单独和你们6人站着照个相吧。”

说着，叫工作人员选择位置，让6人站在他左右。随着快门接下，摄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随后，总理让大家自由在园里活动，他和张治中、邵力子几位老人则回到介寿堂休息。邓颖超游兴未已，看到杜聿明在给别人照相，就走过去热情他说：

“我的技术不好，我给你们照几张吧。”

于是邓颖超选择了几处曲栏拱桥景点，拍了数个镜头，杜聿明视为珍品，一直保存终生。

这次黄埔师生颐和园联欢盛会，同学们和总理、张治中、邵力子几位慈祥的老师相聚，躬聆训诲，在杜聿明的心中留下了十分美好又永远难忘的记忆。

1961年3月1日，杜聿明等7人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这个机构是周恩来创意设立的。那是在 1959 年一次邀集 60 岁以上老年人士的座谈会上，总理建议大家：

“各位都饱经沧桑。阅历丰富，应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不失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不久，即在全国政协建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命专员若干人，并下设办公室。委员会主任是历史学家范文澜，副主任申伯纯。范老因身体欠佳不到会办公，会务由申伯纯负责。办公室所在地原是清朝顺承王府，宫殿式建筑，花木扶疏、环境幽雅。当杜聿明等到任时，办公室早把一切办公用品准备停当。文史专员的主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其次是组稿、审稿及整理编纂文史资料。文史专员除工作外，对于学习也不松懈。政协学习委员会有一直属学习组，成员为科学家及政协委员，如熊庆来、贝时璋、王雪莹、王克俊、赵君迈等，杜聿明等 7 人也编入这个组学习。在政协机关工作，生活上也得到相应的照顾。居住条件良好，每家都有寝室、客厅，还有暖气及卫生设备。按照公费医疗制度，文史专员享受高级干部同等保健待遇。

杜聿明对于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得到的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十分珍视，工作特别努力。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经历的事实记录下来，供史学家和后人参考。1961 年，他写了《辽沈战役概述》、《淮海战役始末》几篇；1962 年，又着手写他任东北保安司令时的资料，题为《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俱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

杜聿明等人到政协工作以后，每逢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就接到国家正式请帖，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与党和国家领导及中外贵宾同起同坐，感到无比光荣。特别是 1964 年国庆宴会的请帖，是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的署名，杜聿明等更为惊喜！当毛主席出现在宴会厅主席台上时，特向杜聿明等招手示意。在宴会结束后的归途中，杜聿明仍在激动地回味着这幸福的情景。

在周恩来总理及其他领导的亲切关怀协助下，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溥杰的日籍妻子爱新觉罗·浩，李以勳的妻子丘文升等，由海外回到了祖国；周振强、罗历戎，郑庭笈、贾毓芝、杨伯涛等的妻子，都来京团聚；溥仪、宋希濂、杜建时、董益三等都已娶妻成家。大家遵照周总理关于“家属参加生产劳动是一件喜事”的指示，除年老体弱确有困难者外，其中周振强、宋希濂、杜建时、郑庭笈、李以勳、杨伯涛等的家属，都参加生产劳动，有正式的职业。

总理闻讯，甚为欣慰，于 1963 年 11 月 10 日，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杜聿明、溥仪等文史专员和他们的妻子。总理考虑得十分周到，特定邀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张治中先生和夫人，傅作义先生和夫人参加，以使杜聿明等人的妻子有人作陪。参加会见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徐冰部长和张执一、平杰三、童小鹏、廖沫沙等领导同志，长春起义将领曾泽生、黄埔同学侯镜如、黄雍等也到场。

当杜聿明和他的妻子曹秀清接到总理的请帖时，都非常激动。尤其是曹秀清，早就想见周总理了。所以，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满面春风进入厅堂和她握手，并亲切地对她说“欢迎你回国定居”时，她更是激动不已。

大家就座以后，陈毅副总理首先讲话。一如平时，豪爽而热情。他说：“听说大家在政协工作的热情很高，认真负责，表现很好。大多数人都

安了家，扎了根，有所依托，这都是很好的。各位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党和国家对各位很关心，决定让各位在新中国的时代里，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总理很惦念各位，特邀请来这里见面谈谈。总理为此亲自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参加。我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这次集会，和各位见见面。最近台湾放出一些谰言蜚语，说各位还没有真正得到自由。我现在要问各位一句话：你们是不是真正自由了哩？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不自由之处，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

杜聿明和所有专员都一致表示：

“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

接着，大家对于台湾的造谣诬蔑纷纷痛加斥责。

周总理双手抱在胸前接着说：

“大家对于陈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要有正确的理解。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它客观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些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的规律，而且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适应这些规律并加以利用的时候，人才能作为自由的人。这就要求每个人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进而改造自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而要做到这点，主要需要从改造世界观着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任务。否则，就会不适应客观形势，感到一举手、一投足，处处都有矛盾，那怎么能有自由呢？对于这个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希望大家多考虑，最好多学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来改造、学习，投入到把祖国建设得更好的事业中去。”

杜聿明屏心静气，认真地听着，在笔记本上飞速的记着。这些政论，对于他是如此的新鲜和深逢。

总理最后说：

“以后还有很多人要被特赦出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成为他们的标兵。党和政府正在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安排你们中间一些人，参加政治活动。”

陈毅副总理继续说：

“为了让各位更好地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和社会面貌，总理指示在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安排各位带着家属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例览名胜古迹，我前不久陪各国驻华使节到安徽黄山例览，黄山真是一个好地方，奇峰异壑，苍松翠柏，风景优美，外宾们都赞不绝口，认为在欧洲没有这样好的地方。大家出去时，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谈话完毕，周总理邀全体台影留念，并一同进餐，尽欢而散。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后不久，关于请大家到外地参观游览的话很快就成了现实。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部长按照总理指示，对杜聿明等的参观浏览做了妥善安排。计划十分周密，分两阶段进行：1964年春暖花开之际，先到江南的苏、浙、皖、赣、湘、鄂等省参观浏览。预定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前返回北京；到下半年金风送爽的时候，再赴延安、西安、洛阳、郑州等地，于十一国庆节前返回北京参加庆祝活动。临行前，张执一副部长还设宴饯别，以壮行色。他叮咛大家由于舟车劳顿，一定要注意安全，并给每个专员发零用钱200元。由“民革”领导人陈此生先生率领，乘快车从北京直发南京。

这次周总理安排的游览，使杜聿明不但例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美好风

光，更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他由衷地赞叹：还是社会主义好。

四、特殊的保护

1966年8月。“红卫兵”掀起破“四旧”高潮。政协领导为了使文史专员们不致被卷入，宣布：

“专员暂时停止上班，在家里自行组织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文章。”

当天晚上，杜聿明和同院的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研究，决定第二天开始学习，家属一律参加，每天上午9时至11时学习半天，四人轮流主持。还决定在院内及大门口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这件事全由杜聿明一手操办，他用红油漆以仿宋字体工工整整地书写，但也没有挡住“红卫兵”到院里来“破四旧”。开始是北京各中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继之而来的是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他们把杜聿明家里的《文史资料选辑》、照相机、电动缝纫机都拿走了，还要把杜聿明儿子的骨灰盒扔掉。曹秀清急了，哭着说：

“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能丢！”

那些“红卫兵”终于发了善心，骨灰盒才幸免于难。

周总理知道了让聿明等人的处境后，当即指示政协领导，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并发还扣除的工资。在周总理的细心关照下，十一国庆节，杜聿明、宋希濂又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在那动乱的年月，给予这种待遇，具有明显的保护色彩，使杜聿明感到特别温暖和珍贵。就在这时，不知哪个单位的“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告示：

“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

果然，从此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折腾了。1969年秋，政协又将杜聿明等召回机关，恢复上班，杜聿明这才了解到，前一阶段对他们的保护措施，都是按照周总理指示而采取的。

五、周恩来纠正杨振宁：“应叫岳父大人”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为了打破中美长期对立的僵局，不惜移樽就教，正式到我国访问修好，与周总理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美国终于向全世界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继之，日本内阁大臣田中角荣也来我国访问，日中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并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为招待尼克松和田中角荣，两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国宴。在这样繁忙而紧张的日子里，他仍然在关怀着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两次都邀请杜聿明参加，使杜聿明感到莫大的荣幸。杜聿明为中美、中日恢复邦交感到无比高兴，认为这是新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和执行正确外交路线的必然结果。

就在中美恢复邦交的前后，杜聿明的女婿、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冲破重重阻力，于1971年及1972年夏季先后两次携夫人杜致礼回祖国探亲讲学。杜聿明、曹秀清夫妇第一次接到女婿女儿回国的电报时，心情激动万分，与分别多年的长女和女婿团聚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杨振宁博士一踏上祖国大地，即受到祖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使杜聿明、杨振宁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两次都接见和设宴款待了杨振宁博士及其家属，每次都和杨振宁亲切地交谈到深夜。谈话内容从科学研究、社会问题、国际动态到家庭生活，范围广泛，毫无拘束。总理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接见中当总理听到杨振宁博士

称曹秀清为妈妈，而称杜聿明为“杜先生”时，立即纠正说：

“应称为岳父大人。”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

接着，总理还询问了杨博士的父亲杨武之教授的健康情况。杨振宁回答说：

“我父亲患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曾两次发生休克。由于及时抢救，得以起死回生，我能与父亲相见合家团聚，是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对我父亲的关怀照顾分不开的。”

1973年暑假，杨振宁和杜致礼第三次回国探亲讲学。夫妇俩上午到达北京，中午就到杜聿明家共进午餐。政协机关怕曹秀清忙不过来，派人协助购买物品，并派了厨师代做饭菜。席间，有郑洞国、侯镜如、焦实斋、郑庭这等杜聿明的老朋友出席作陪。接着郑洞国又在四川饭店宴请杨博士夫妇。7月17日下午，杨振宁接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他，十分高兴。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就播送了这则消息。毛主席和杨振宁一起照了相，事后还送杨振宁一张。全家都感到无上光荣，把这张照片视为至宝，一直挂在杜聿明的会客室里。杨振宁还转达了毛主席对杜聿明的关怀，说：

“在接见时，毛主席专门对我说：‘代问你岳丈好。’”

毛主席接见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宴请杨振宁夫妇及杜聿明夫妇。

会见时，杜致礼和总理开玩笑说：

“你们还是重男轻女，杨振宁是安徽人，酒宴就设在安徽厅。我可是陕西人哩！”

总理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下以为忤。

这次会见，给杜聿明留下了十分幸福美好的回忆，每每忆起他都说：宴会气氛非常亲切，周总理对待我们，像家人般欢聚一堂。

杨振宁在祖国讲学回到美国后，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他是美籍华人协会会长，后来在邓小平副主席访美时，他主持了华裔举行的隆重欢迎大会，向邓副主席致敬，并保证：一定要继续力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消除台湾同祖国大陆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巨星陨落，举国痛悲。噩耗传来，杜聿明悲痛欲绝。他久久坐在椅子上，双泪直流，一幕幕动人的往事又出现在眼前：当年在黄埔军校时，总理作为一位革命家，投身革命，慷慨激昂，评论时事，由表及里，十分透彻，学生无不钦佩，几乎投袂起舞；而作为一位政治教官，对学生又是循循善诱，有如化雨春风，令人感到无比温暖。自己在特赦后，多次亲承教诲，总理的与人为善，感人肺腑。1973年5月，周恩来总理还组织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宋希濂等到广州黄埔岛。省视母校旧址，启迪他们发扬黄埔时期的革命精神。当杜聿明前往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鞠躬致敬时，无论如何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禁不住再一次涕泗滂沱。他望着安详地躺在灵床上的总理，久久不肯离去。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和伟大崇高的形象，永远地铭刻在了他的心中。

“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

——周恩来与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陕西泾阳人，原名伯循，1903年中举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长。后与宋教仁等创办《民立报》，反对袁世凯。1918年在陕西组织靖国军，任总司令。1922年创办上海大学，任校长。1927年初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委，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审计院院长。1931年后长期任监察院院长。后在台湾逝世。擅长书法、诗词。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书》等。

于右任作为国民党的元老，对共产对不免会有偏见。正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以大量的事实，使于右任同情共产党、倾向共产党。“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于右任对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径极为愤慨。在于右任对蒋介石的斗争中，周恩来总是勉力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周恩来派人向于右任面授机宜：留在南京不走，等待南京解放。然后参加新政协。然而。由于特务的挟持，于右任终未能如愿。当在台湾的于右任惦念着在大陆的老伴的80寿辰时，周恩来及时派人为她祝寿，于右任得知，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共产党的报纸，周恩来却请国民党元老题写报名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国统区发行有一张著名报纸——《新华日报》，它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方针、政策，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都及时地传递给大后方的人民，被誉为大后方的一盏明灯。而这张报纸的报头，则写得刚柔相济，苍劲有力。题写报头的，却是一名国民党的元老。

1937年底，南京。此时，国民党已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办报。于是，在周恩来的等划下，我党准备出一张《新华日报》。报纸的报头就如同报纸的眼睛，当然需要一位名书法家来题写。周恩来虽然有独具一格、笔力遒劲的周体书法，但他仍决定请于右任先生题写。于先生不但是当代书法界著名的“草圣”，也是中国最早鼓吹革命的报界老前辈，是国民党的元老，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如果请这样一位在国民党中德高望重的人物题写报名，不但使报纸生辉添彩，且更具政治意义。于是，周恩来专程前往于公馆。

对周恩来的到来，于右任十分欣喜；立即设宴相待。杯盏交错之际，周恩来盛赞于右任先生积极倡导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同时提出请于老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

“我党为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征得政府同意，准备办一张《新华日报》。于老先生积极倡导抗日救亡，为世人景仰，又是当代著名‘草圣’，特请先生为报纸题写报名，请先生不吝赐墨。”

于右任欣逢知音，当即慨允，并表示：

“这次全面抗战，两党均应贯彻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精神、希望贵报早与国人见面。”

说毕，于老运足底气，提笔而书，但他精益求精，总不满意，竟一连写下了19幅之多，最后选中其中一幅。

二、“周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1938年，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从苏联启程，绕道西欧，由海路回国。到香港后，屈武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派驻香港的代表廖承志，做了长时间的谈话，

从他那里了解到国内各方面的一些情况。接着，就取道贵阳搭长途汽车到达重庆。此时正值中秋佳节。于右任老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过江接他。到重庆后。通过王炳南介绍，屈武在《新华日报》门市部楼上第一次见到了他倾慕已久的周恩来。此时的于右任，由于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所以，周恩来除了谈些有关时局的问题之外，着重对屈武讲：

“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很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

从这次谈话以后，屈武在于右任处共生活了六年多的时间，一直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帮助做于右任的工作。

屈武和于右任生活在一起的初期，于右任对两党合作共同抗战的问题，确有过怀疑。有一次他问屈武：

“据说我们的国军（指国民党军队）在前方抗战，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支，他们不打鬼子，一味地扩充自己的实力，究竟是为什么？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屈武解释说：

“这显然是编造的谎言。”

接着，屈武列举了各战区一些国民党军队制造摩擦的事实，来说服自己的岳丈。这些消息，于右任从未与闻，马上问屈武：

“这些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屈武如实说：

“主要是王炳南告诉我的，有些情况是周恩来先生亲口对我讲的。”

于右任听到屈武同周恩来有直接联系，先是一阵欣喜，因为他知道周恩来的为人。接着又提醒说：

“你要当心啊！重庆到处是特务。”

这时，于右任已经察觉到，的确有人在向他耳朵里灌输反共的谎言。

1939年冬，有一次周恩来找到屈武，对他说：

“汪精卫已由重庆逃跑，投降日本去了。他虽然走了，目前重庆还有更重要更危险的投降派，他们直接间接地和敌人勾勾搭搭，请于先生注意。于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大敌当前希望他能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做扶倾救危的工作。”

汪伪组织成立以后，南京的汪伪政权曾派一个在上海活动多年的“CC”代表人物吴开先到重庆进行日、汪、蒋的联系工作。周恩来获悉之后，立即要屈武转告于右任，请他注意。

上述这些，屈武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地转告给了于先生。

于右任听到这些消息后，义愤填膺，坚决地表示，决不能听任一些人进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勾当。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包围新四军军部及所部近万人，残杀七千余人。事变发生后，屈武把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策划的事变经过，系统地告诉了于右任。对于国民党军队这种暴行，于右任非常气愤，拍着桌子大声他说：

“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

他沉默了一会之后，叹了一口气，又说：

“唉！讲了又有什么用处呢！”

看到这位爱国老人的正义表现，屈武深深地同情他有心无力的处境。以后，于右任听到了周恩来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扣发登载“皖南事变”真相的《新华日报》而坚持斗争的消息，以赞叹的口气对屈武说：

“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于右任对国民党上层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和贪污腐化的现象是十分不满的。他执掌监察院多年，曾想运用这一职权，做点澄清吏治收拾人心的工作，但是那些贪婪成性的人，正是握有实权身居要职的人，徒有虚名的监察院，又哪里能发挥作用！有一次监察院揭发了一件贪污案件，被弹劾者涉及蒋介石左右的权要人物。于右任坚持要执行监察职权进行弹劾，而蒋介石却坚持进行庇护。气愤之下，于右任表示要辞去监察院长职务。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抗议、他愤然离开重庆移居成都。

于右任走后两天，屈武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十分赞赏他说：

“于先生的姿态很好，这是对老蒋独裁作风一个有力的揭露。”

接着他以十分关心的语气对屈武说：

“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应该去成都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

周恩来还嘱托屈武，代表他向于先生表示慰问，并要屈武告诉于先生：于先生这一举动大得人心，但不要悲观。

根据周恩来的嘱托，屈武驰往成都。于右任在成都住在陕西同乡严谷声家，屈武便下榻于他隔壁房间里。于右任心情一直不好，在一个午夜后的4点钟，他突然起来敲屈武的墙壁，要屈武到他房里谈话。屈武到他房里坐在床沿上，他一脸惊恐地告诉屈武说：

“刚才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老蒋手持利刃，厉声对我说，‘你逃不出我的手，我要你的老命’，说着他就用刀向我胸部刺来，这样，我就惊醒了。”

接着他又说：

“这个梦是个不祥之兆啊！”

屈武当即安慰他说：

“做梦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吗？这和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

于右任叹口气说：

“蒋介石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心狠手辣，有什么信义可讲。”

屈武陪着他谈话，一直到天亮。

就在这天的早饭后，张群从重庆来了，屈武陪同于右任和他谈话。张群说：

“委员长派我代表他前来慰问院长，并且要我迎接院长回重庆；委员长有很多问题要向你咨询。至于监察院的事你不管谁能去管呢！委员长很诚恳地盼望你回去。”

但张群对监察院弹劾案的问题，却只字未提，显然蒋介石并没有改变他原来的态度。张群到成都敦请于右任回重庆，不过是给他一个转圜的面子而已。这一点于右任当然很清楚，加上当夜的一场恶梦，心有余悸，也乐得顺

水推舟。于是他对张群说：

“只要委员长不再干涉我在监察院的职权，我就回重庆为党国效劳。”

张群连声说：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这样，于右任同张群和屈武一同回到了重庆。

关于于右任在成都时期的情况和他回重庆的经过，屈武向周恩来做了详细汇报，当屈武说到于右任“惊梦”的时候。周恩来表示理解他说：

“看来，于先生脑子里还有些封建迷信的残余，老年嘛，旧的影响是很难一时根除的。”

屈武又说：

“于先生害怕老蒋害他，这种心理是有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的。”

周恩来分析说：

“于先生和邓演达先生不同，他这块元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绝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

三、“于右任先先被挟待去了台湾，
真是遗憾啊！”

1948年冬，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延续3年之久空前规模的内战，胜败之局已定。南京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在这一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玩弄起一再玩弄的以退为进的花招，于1949年的元旦发表所谓的“引退”、“求和”声明。他经过一番周密的军事布置之后，于1月21日下午乘飞机黯然离开南京，避居奉化，以下野之名，行暗中操纵之实。蒋介石走后，副总统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当时，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实现和平统一。就是南京政府内部的立法、监察两院，也是一片和谈之声。于是，李宗仁不得不在1月22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共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被推举为和谈代表团的顾问。

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反复磋商，于4月15日对拟定的八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达成了协议。这是双方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共代表团在会上正式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即南京方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必须在4月20日以前表明态

度。

就在双方代表团达成和平协议这天，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张治中接到李宗仁的电报说：

16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国民党代表团和中共进行谈判。

张治中立即召集团中成员，讨论这个电报，他首先表示意见，认为于先生此时没有必要北来。他说，于留在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和平协定》，南京方面批准后，再请他北来主持签字。大家同意张的意见，于是立即电复李宗仁：

请于暂缓来平。

会上并推定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飞回南京复命并请示。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此时仍在关心着于右任。16日晨4时，已经紧张卫作了一夜的周恩来找屈武谈话。屈武向他汇报了国民党

代表团对于于先生北来问题的决定。周恩来说：

“我都完全知道了。白天张文白已向我谈过。我曾对他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张文白说明了他不同意于先生此时北来的意见，我也不便过于干涉。”

接着，周恩来又说：

“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这一番话，周恩来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说出的。屈武内心充满了感激。

16日上午，屈武同黄绍竑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定稿乘专机飞回南京，山机场乘车直往傅厚岗李宗仁公馆。下午在李公馆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屈武和黄绍竑外，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黄旭初共6人。先由黄绍竑简要地报告和谈经过，即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李、白等入传阅。大家仔细看了文件，个个面面相觑，无一人发言，情绪极为低沉。后来还是白崇禧打破了沉寂，说：

“这样苛刻的条件能接受吗？”

何应钦接着说：

“问题重大，行政院要进行研究。”

显然是不满意的口气。

李宗仁和黄旭初一言未发。大家垂头丧气地散去，大有穷途末路的味道。出门以后黄绍竑就对屈武说：

“看来情况不妙啊！”

屈武急着将周恩来关于对于右任的安排告诉于，就说：

“我到于右任家去住，有什么消息，请用电话告诉我。”

说着，二人各自登车而去。

屈武驱车来到于行任先生公馆，见到于先生后先把北平和谈经过和在李宗仁公馆召开会议的情况告诉了他。最后，屈武说：

“看起来这个《和平协定》不会被批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

于右任叹气道：

“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不然我现在在北平。战争再打起来，我就留那里不回来了。”

屈武听到岳父有这一番表述，十分高兴，马上说：

“这正是周恩来先生的意思。不过文白先生也是好意。”

于是屈武就将周恩来希望于先生不要离开南京的意思告诉了他。并补充一句说：

“这是一个较好的补救办法。”

于右任“唉”了一声，叹息道：

“这恐怕办不到了。我的周围布满了特务，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我，能让我留下来吗？”

过了两天。黄绍过来电话告诉屈武：

“ 行政院召开了秘密会议，李宗仁参加了这个会，会议把《和平协定》否决了。白崇禧已回汉口布防，南京方面已准备继续打仗。 ”

接完电话，屈武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于右任，并劝他按照周恩来的意思不要离开南京。于右任告诉屈武：

“ 你先把孩子们（屈武的儿子和儿媳）送上飞机去上海，你留在我身边，看形势再决定去留动向。 ”

然而，国民党当局是绝不会让于右任这样一位国民党元老投向共产党的。4月21日早晨，在解放军渡江的隆隆炮声中，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要见于右任。来人身穿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服装，并带着一个武装卫士，态度十分严肃地对于右任说：

“ 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经突破了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到广州或者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

于右任想采取拖的办法，就说：

“ 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 ”

那人马上以威胁强迫的口吻说：

“ 必须马上离开南京。 ”

来人气势凌人，大有绑架之势，没有等于右任穿好衣服，就强将他架上汽车驰往机场。于右任要求先到上海，这样屈武就与他一起飞抵上海，一同到上海于右任家里。屈武问于右任：

“ 能不能留在上海不动，上海总是要解放的。然后再找机会到北平去。 ”

于右任无可奈何地说：

“ 在南京的情况你不是都已看见了吗？上海撤退，我同样地会遭遇被强迫架走的命运。 ”

接着于右任反过来劝屈武说：

“ 你也最好先留在上海，然后我们一同到广州，寻找机会由广州到香港去，再转赴北平，这样，还是有希望的。 ”

屈武则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 我不能去广，州，我要回到新疆去。 ”

屈武之所以要回新疆，是因为周恩来已向他布置，要他回新疆去策动新疆的和平解放。但他并没有向于右任说明回新疆去的意图。恰好这时郭寄峤奉命回甘肃布防，向于右任辞行，屈武就趁机告别于右任，搭乘郭的专机抵兰州，然后搭乘便机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屈武对于此时离开自己的岳父大人，心中当然颇不是滋味。但为了新疆和平解放的事业，他只有舍小家为国家了。此时此刻的他，只有默默祝愿岳父及全家平安，能够辗转到达北京。但是，于右任经香港去北平的愿望终未能实现，还是被国民党挟持到了台湾，成了他的终身憾事。这也成了周恩来一大憾事，他曾说：

“ 于右任先生被挟持去了台湾，真是遗憾啊！ ”

四、周恩来关照：为于右任夫人祝寿

解放后，屈武的老伴于芝秀（西安市政协委员）一直随侍她母亲——于右任老先生的夫人高仲林住在西安。于老先生通过他在香港的一位老朋友吴季玉先生，和他们互通音讯。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胡子’（这是一些人对于右任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

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

“‘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恩来看到这封信后，很快将信转给屈武，并要屈武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80大寿。屈武接信，立即计算日期，于夫人的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陕西的风俗，可以补寿，经请示，周恩来表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可以给予夫人补寿，还让人转达他的话：

“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

于是，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屈武带着儿子、儿媳和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同赴西安。陕西省委统战部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所有于右任在西安的亲戚故旧，包括他的老朋友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韩望尘，全国政协委员茹欲立，陕西知名人士杨子廉，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齐夷等，男男女女共二十余人参加宴会。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轻松欢快的气氛。于夫人对党和政府的关怀深深感动。她兴高采烈，喜形于色，并诚恳地对大家表示谢意。

五、“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

事后，屈武决定写封信，把这件事辗转告诉于右任，让他分享其快乐，同时使他知道周恩来代表政府对他和他留在大陆的家属的亲切关怀。但这就必须在信里写上周恩来的名字。那么这封信到台湾，如果被无孔不入的特务们发现，对于先生将产生什么后果呢？屈武反复思考，无以为计，于是就到邵力子先生家里向邵老请教。邵先生和于先生有几十年的深厚友情，这是许多人所知道的。

等屈武说明来意，邵力子略一沉吟，高兴地说道：

“有了，你在给予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

看屈武有些不解，他接着说：

“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少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周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恩来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总理，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

屈武按照邵力子所教的方法把信写好，连同祝寿时的照片等物请吴季玉转交于先生。后来吴先生给屈武来信说，于先生收到屈武的信和照片等，真是高兴到了极点，大有喜出望外之感，不禁热泪横流。特别是周恩来对他的关怀，更使他非常的感动。他要吴先生告诉屈武向周恩来表达他诚挚的谢忱。他在给吴季玉的信中，对周恩来的称呼也用“濂溪先生”，可见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足见邵力子先生的设计和判断是很高明的。

就在屈武接到这封信第二天的一次晚会上，屈武见到了周总理，并把吴先生来信的内容报告了他，周总理听了很高兴，说：

“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使于先生的心情舒畅，这是党的一项统一战线工作，屈武很了解这不仅仅是对于先生个人的问题，而是体现了党对所有像于先生那样热爱祖国的人们的态度。

于右任先生晚年写了不少怀念家乡和大陆的诗，透露出他对统一祖国的渴望。就在临逝世前，他还发出了凄楚动人的怀念大陆的哀音：

葬我于高山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见兮，
只有痛苦！

这首诗表达了一位游子怀念故土、盼望祖国统一而又难以看到的痛苦心情和高尚情怀，这固然与于先生一贯的为人和思想有关，也是周恩来长期做其工作的结果。

“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

——周恩来与程潜

程潜（1881—1968）湖南醴陵人，字颂云。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前清秀才。1904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参加武汉保卫战。后历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护国军司令、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九江卫戍司令、江右军总指挥、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湘鄂临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掩护过一些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任武汉行辕主任。1947年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后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与陈明仁等宣布起义。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程潜做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封疆大吏，在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策动下，他毅然率部起义，使湖南省会长沙免遭战火，和平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后，周恩来对程潜一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一、周恩来：争取程潜站到我们方面来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为了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周恩来在这年的6月2日致电正在香港的乔冠华：

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

7月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电报中说：“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他“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

以后，周恩来又一直细心地指导这一工作，直到程潜、陈明仁等8月4日在湖南宣布起义。

二、“听说你夫人生了一个‘千金’，这好啊”

解放以后，已担任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之中，仍然没有忘记老朋友，常去看望程潜。总理对程家特别关心，工作很细，给全家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程潜和夫人郭翼青婚后有过16个孩子，但因身体不好，只活了6个女孩子。生最小的女儿时，总理特别关心，他知道程潜年纪大了想要个儿子，就打电话安慰他说：

“听说你夫人又生了一个‘千金’，这好啊。”

三、没病住进301

这个孩子不满周岁时。总理来看程潜，还特意要看看孩子。他很喜欢她，抱过去逗她玩。并问程潜和夫人为她起了什么名字。

“文化大革命”初期，程潜从湖南回到北京。当时政协刚召开过一次会议，他向大家打招呼：如果红卫兵到家里来，要允许和欢迎他们帮助大家“破四旧”。因此对红卫兵的抄家行动程潜已有准备，把一些不合时宜的照片、资料全部都付之一炬。红卫兵来后觉得程家没什么问题。破得很好，只是说住的房子大了些。秘书向他们解释：这房子不是程潜私人的，是国家分给他们住的。程潜年岁大，来往人多，所以住这样的房子。因此红卫兵很快就走了。不久，国务院来了一位同志要接程潜走，他不报姓名，不讲工作单位，

不允许家人相随。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外边又那么乱，夫人很害怕，就悄悄地让程潜的司机去看看（司机常与程潜外出活动，认识的人很多）。司机回来说是总理办公室的人，他们才稍放心。临出门时，那位同志又叮嘱程潜将名字改一改，后来就用程潜的小名。原来，是周恩来将程潜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了。这个时期，家人不能和程潜见面，衣服、用品都是组织上派人来取的。后来在电视中家人看到他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知道他没有问题，才安下心来。

程潜在301医院住了3个月，十分想家，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向主席提出要回家，主席同意了。程潜回来后，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但周恩来却不能放心，特地派了两名市公安局的同志住在程潜的家里，保护程潜的安全。

四、“程潜先生生前一直想用棺木，这是可以的”

1968年初，程潜在家中不小心摔了一跤，造成骨折，送到北京医院治疗。周恩来得悉情况后，马上派来了大夫和护士（林伯渠同志的儿媳妇，是一位很有护理经验的护士长），制定了治疗方案，决定为程潜做手术。总理批准了这一方案。但是很快北京医院发生了大变动，总理派来的大夫、护士全部被撤换了，治疗方案也全部改变，采取保守治疗。他们对程潜的态度也很粗暴，程潜因腿痛要求按摩，工作人员就说：你还让人侍候？像你这种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你贴大字报。程潜十分生气，很不理解这种做法。到4月份，程潜由于肺炎引起大出血而去世了。

程潜生前一直想在死后用棺木安葬，在湖南老家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副棺木。“文化大革命”中棺木的一角被造反派劈坏了，但修一修还可以用。家人劝程潜不要迷信棺木，还是火葬为好，给他做了不少工作。他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也就同意了。因此程潜去世后，家属提出了火葬。但周恩来了解程潜的心思，专门派人来与家属商量，并传总理的话：

“听说程潜先生生前一直想用棺木，这是可以的，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可以给湖南方面拍个电报让他们送来。”程潜的夫人说：

“感谢总理的好意。我已和孩子们商量妥了，都同意火葬。”但周恩来一直不放心，四次派人来商量，最后一次才决定火葬。

程潜的家属为此深受感动。

程潜有6个女孩子，程熙是老大，因身体不好，一直在家学画。她也曾要求参加工作，但因程潜经常忙于北京、湖南两地的工作，所以毛主席让她在家照顾程潜，不要急于出去工作，并说将来一定会给她安排工作的。

程潜去世那天，家里来了许多警卫，程熙估计有中央首长要来，就和母亲商量给总理写封信，谈谈家里的情况。提出：第一，现住房太大，开销也大，希望换房；第二，父亲去世，母亲无工作，妹妹年幼，家里生活无依靠，希望为自己安排工作；第三，父亲去世前写了几首诗表达他想见毛主席的心情，希望能转呈主席。

那天，总理、江青、康生、谢富治都来了。总理接信后说：你家孩子还小，要国务院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照顾好你家的生活。

五、程潜女儿被抓，周恩来指示放人

程潜去世后不久，二女儿（在第二外语学院）就被抓起来了，原因是这样的：程潜和毛主席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他每次提出见主席，主席都是有求

必应，马上会见。每次见面时都由程熙陪程潜去，周士钊先生也在场。但“文化大革命”后，程潜多次提出见主席的要求都没有回音，因此程家的几个孩子就对包围在主席身边的林彪、江青等人产生了怀疑。那时舒同的女儿舒均均（在芭蕾舞学校）经常来程家谈天，她们谈了这些问题。这个女孩子把谈话内容写在日记本上被造反派抄出，立刻受到围攻。程潜二女儿所在学校二外的军代表是空军系统的人，他们有的是林彪的爪牙，反对周总理和陈毅同志。二外造反派的头头曾叫嚣：一年打不倒总理就二年，二年打不倒六年准打倒，说周恩来肯定当不成总理。程潜二女儿受牵连是因为她在与舒均均说话时曾说：如果让人民投票的话，我就投陈毅同志的票，由他来负责军委工作。言外之意，不投林彪的票。这些话在舒均均的日记本中被发现后，程潜的二女儿被打成反革命，与舒一起被定为程——舒反革命集团。

郭翼青为此急病了。恰巧这时有人来看程熙，听了她的诉说后，就让她给总理写信反映情况。程熙当即给总理写信谈了二妹的问题，并托人交陈毅转交。陈老总看到信后十分气愤，在当晚的宴会上见到总理后便转交了程熙的信。总理马上派人去二外交涉，指示放人。

六、王海容：“是总理要我找你们的”

程潜去世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家属和蔡廷锴、蒋光鼐、张鼎丞等家都搬到一个地方居住，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照应。这也是总理对这一批人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程潜去世后，有关部门发给家属 500 元钱就不再管了。在全家人感到最困难的时候，程熙收到了王海容寄来的一封信，让她到外交部去一趟。程熙应约而去。见面后王海容告诉她：

“是总理要我找你们的。”

王海容首先问了她们家庭的经济情况，有什么困难。程熙谈了湖南老家的东西问题：

“因工作关系，我们在湖南、北京两地都有家，父亲私人所有的东西都在湖南，而北京家中的用具都是公家的。这次搬家不能动公家的东西，又无钱购买，想从湖南要一些自己的东西，但湖南方面不但不给反而训了她们一顿。这样，程家的家产全部‘捐’公，只退给了 9 元 7 角钱（东西都被造反派头头们分了，后来落实政策才从这些人家中收回一些破损的家具）。另外，1948 年国民党将我们全家迁到香港做人质，曾给我家一笔安置费，我母亲把这些钱都存在香港了。父亲起义后，我们回到父亲身边，一直未动这些款。‘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曾写信给毛主席请示能否拿回这笔钱（因孩子多，家庭生活感觉困难）。主席说：能取就取回来，取不回来我们共产党还养不起你吗？后来陶铸同志帮助取回这笔钱，但因银行冻结，一直未能取用。”

此外，程熙还谈到了自己的工作问题。

王海容很快将这些情况向总理做了汇报，周恩来马上让国务院管理局解决程家困难，批准发给程熙母亲和姨母每月各 100 元，无工作的两个孩子每月 20 元。周恩来还说：“这笔生活费就固定下来，孩子有了工作后仍照发。”至于程熙的工作，因当时社会太乱，总理让她暂在家中等候，以免出意外。1970 年程熙结婚，爱人也无工作，总理就让卫生局给她爱人分配了工作。对于程熙的工作问题，总理一直想着，过一个时期就了解一下情况。1971 年，

周恩来根据程熙的特长，让国务院将其分配到“图博口”系统的明清历史档案馆工作。

总理心很细，他派王海容来程熙家联系，了解生活中的困难，并及时予以解决。王海容看到程潜的夫人有心脏病，住七层楼上下很不方便，就汇报给总理。不久，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程家全家搬进了红霞公寓。总理去世后，在邓小平的关怀下，湖南省落实了政策，解决了程家在湖南的房产问题。

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程潜全家人对周恩来产生了十分深厚的感情。“天安门事件”时她们全家都卷了进去，姐妹们每天都去天安门（天安门广场的7个花圈就是她们家送去的）悼念总理，抗议“四人帮”的反动行径。程潜的小女儿表现得最勇敢，结果被当场拍了照。虽然第一次“漏网”了，但在反对某些人不让纪念总理的活动中还是被抓了起来，关了8个月，后来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才被释放。

“可惜白崇禧被老蒋骗了，到台湾去了”

——周恩来与白崇禧

白崇禧（1893—1966）广西临桂人，字健生。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23年任广西讨逆军参谋长。1924年任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和桂军第二军参谋长，成为新桂系军阀的首领之一。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4月，在上海直接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国民党政府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十三军军长。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失败，被迫逃亡国外。后回国与李宗仁等长期盘踞广西。1931年国民党宁、沪、粤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桂林行营主任、军训部部长。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战略委员会主任、华中军政长官。1950年所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垮后逃往台湾，任台湾“总统府”战略问题委员会副主任。后在台湾病死。

白崇禧虽是反共专家，但在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充分调动其积极因素，不失时机地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鼓舞士气，白崇禧请周恩来给自己的部队讲话；为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大战，他又向周恩来虚心问计。当周恩来送他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他深为折服，即向蒋介石推荐。

一、将要出征，请教周公

白崇禧就其一生来说，是反共反人民的。但在抗日战争初期，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他是一位主战派，是主张联合中共一起抗日的。1938年2月中旬，广西学生军从桂林出发，经过武汉，准备开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国民党军队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特嘱秘书程思远邀请周恩来对这批学生军讲话，说：

“共产党抗日坚决，政策也对头，你去请周先生给咱们的军队讲讲话。”

周恩来那气宇不凡的风度，和蔼可亲而又令人尊敬的仪容，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清澈敏锐的眼睛，使人感到具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感人力量，紧紧地吸引着这批学生军。周恩来那天的讲话是鼓励这些青年们利用一切机会，采用一切办法，动员人民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听众对周恩来饱满的革命热忱、坚强的战斗意志和热情洋溢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周恩来是对桂系军队讲话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

1928年3月初，日军在津浦线北段大举增兵，由少壮军人派的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率领，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奉派去徐州协助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白崇禧行前，特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参谋长到其熊廷弼路寓所，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周恩来对白建议：

“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的国军，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基本上采取了周恩来所指出的方针，从而取得台儿庄大捷。

二、周恩来为白送毛著，白崇禧荐给蒋介石

台儿庄胜利之后，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如当时的《大公报》就在一篇社论中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主张徐州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的方

针应该改变。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5月26日到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在讲演中，毛泽东一方面驳斥了当时国民党内汪精卫一派的“亡国论”，另一方面又驳斥了台儿庄大捷后言论界出现的“速胜论”，而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方针。

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就送给了白崇禧一本。白崇禧认真阅读，对其精神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推荐给蒋介石，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1938年10月23日夜，蒋介石派白崇禧离汉口（副参谋总长办公室已从9月起迁至汉口）乘汽车到鄂北钟祥会晤李宗仁，洽商五战区军事部署。之后，白即由鄂西经沙市、常德打算去长沙。白崇禧当时所乘的是一辆德国造的吉普车。24日夜，车到十里铺附近，机件突然发生故障，白乃下车等候司机修理。时间不长，周恩来乘汽车随后赶至，他一见是白崇禧，即下车说：

“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们这里不远，你还是同我一道去长沙吧！”

白崇禧听后十分感激，马上应邀同车南下。周恩来是做统战工作的能手，他从来不错过任何机会来加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沿途周恩来对白崇禧谈起他早年在南开读书以及留日、留法的经过，后来又谈到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在谈吐中，白崇禧发现。周恩来不仅学识渊博，见解高超，并且胸怀坦白，肝胆照人，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对白崇禧说：

“武汉失守以后，应该在敌后广泛武装群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区。”

白崇禧听后颇受启发，深以为然。因此在11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南岳会议中提出建议：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召集各省军官施以运用游击战术的训练，以八路军叶剑英参谋长为教育长。并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沦陷区分会，其任务为发动民众对敌全面抗战，消灭敌伪组织，阻止敌人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这一机构后来由蒋介石自任主任委员，以李济深为副主任委员。

南岳会议后，蒋介石对白崇禧说：决定设置桂林行营，以白崇禧兼任主任，指挥长江以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周恩来在从武汉南撤去长沙途中，已对白崇禧说过，中共中央为适应武汉失守以后的形势需要，将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已派李克农担任主任。白崇禧允予协助。桂林行营成立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在桂林桂北路206号开始工作。白崇禧不忘对周恩来许下的诺言，立即面嘱桂林守备司令王泽民，对该处负责人员的安全予以多方保护。以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发展成为党的统战工作的前沿指挥所。

1939年2月16日，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成立一周年纪念日，白崇禧特在桂林行营大礼堂举行纪念仪式，请周恩来莅临讲话。之后，白崇禧令广西选拔干部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并要广西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周恩来曾多方派人做白崇禧的工作，挽其留在大陆，但白崇禧还是去了台湾，最后客死他乡。

后来，周恩来多次惋惜地说：

“可惜白崇禧被老蒋骗了，到台湾去了。”

“我看过你写的文章”

——周恩来与沈醉

沈醉（1914—），字叔逸。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先后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总司令。1949年12月被卢汉扣押，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2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任政协文史专员。1980年被中央有关部门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1981年11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我这三十年》等。沈醉曾是国民党军统的著名特务，战争年代多次组织对周恩来的侦察跟踪；他作为战犯被特赦后，获得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接见中，周恩来向他道出了自己屡屡摆脱特务跟踪的奥秘，使沈醉大为赞叹，自愧弗如。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沈醉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使军统的黑色内幕得以曝光。

一、沈醉请罪：我对总理搞过侦察；

周恩来笑说：只是当了我的义务随从

1960年11月28日，沈醉作为一名经过改造的战犯被政府特赦。1961年春节刚过，正月初四那天，中央统战部又邀沈醉他们第二批被特赦的人员和首批特赦的在京人员一起聚餐，李维汉部长和徐冰、薛子正副部长、国务院童小鹏秘书长等人都参加。聚餐后，徐冰谈到对首批特赦人员工作安排的_{问题}时说：

“首批特赦人员在农村劳动一年期限已满，政府决定安排他们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委员会任专员，待遇也会比现在高。”

这样优厚的安排，实在出乎沈醉的预料。

最后，童秘书长说：

“周总理准备接见第二批特赦人员。”

这个消息使沈醉无比兴奋。真没料到，周恩来总理在日夜操劳中还抽时间来接见特赦人员。这对大家是多么大的鼓励啊！

2月21日这天上午，民政局王主任陪沈醉等去见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恩来、陈毅、罗瑞卿亲切地接见了特赦人员。周恩来先过来个别地跟特赦人员每个人谈话，然后集合起来讲些国内外情况。

周恩来跟沈醉谈话时，沈醉首先向总理请罪，说：

“总理过去在上海、重庆、南京等地时，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使一些特务，对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

周恩来听了，爽朗地笑起来，并且很有风趣地告诉沈醉。说：

“你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起过作用，只是当了我的义务随从。”

周恩来特别谈到他那次去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说：

“那一次，我清楚地知道在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监视着，服务人员也是由特务来充当的，可是我每天都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传递文件。”

周恩来问沈醉：

“我和地下党见面，你们发现这些情况没有？”

沈醉如实回答：

“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你们的同志便会被特务秘密逮捕。”

周恩来接着说，他在上海为党工作，与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去上海吃喝玩乐不同。他也经常看电影，那就是他与同志们见面的时候。周恩来很高兴地告诉沈醉：

“我发觉自己每天出门，总有一大批特务在跟随着，以使我不便去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我就利用看电影的机会来接见这些同志。当我一走进电影院时，特务们就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我前门进去，又从别的门出来。但是我的座位前后左右的位置上，都是我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映，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只能守在门口等候散场。而我总是在散场时最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我，其他同志就分散走开了，所以，对我的工作从来没有什么影响。”

沈醉暗暗佩服周恩来的机智勇敢，心想，不要说自己，连戴笠都不是周恩来的对手。

二、“你把军统内幕如实写出来， 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周恩来说完这些之后，又严肃地对沈醉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对周恩来的这一段话，沈醉是深有体会的。过去沈醉为效忠蒋介石干过许许多多危害共产党和人民的事，并曾一直担心共产党会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然而在他改造的11年中，从管理员到高级的公安干部，从昆明监狱到北京战犯管理所，都不曾有人用军统的某种刑法来对付过他；相反，他们都是认真执行党的改造政策，从生活上照顾、从思想上关心他，而且从不侮辱自己的人格，不计较个人仇恨。不过，对周恩来提出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句话，沈醉还有点茫然，连忙问道：

“总理，我们还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吗？”

周恩来启发他说：

“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不论是你自己于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所以，你把军统内幕如实地写出来，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接着，周恩来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待过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待，政府决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去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所以都可以把他们写出来。

谈到这里，谭震林有紧急事要找周恩来，周恩来只好离去。陈毅就接着和沈醉谈话，对他说：

“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便写一点。这不能像写小说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

这次接见，一直到中午12点多钟，周恩来邀请沈醉等人去餐厅吃饺子。

周恩来很风趣他说：

“今天南方人多，但还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请大家吃过年饺子，因为今天是阴历正月初七，农村还在过年。不过大家不要在这里闹笑话，过去北方人请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以为饺子是点心，好菜在后面，所以只吃几个，等后面的好菜吃，结果是饿着肚子回去。今天只吃饺子，后面没有准备菜，大家一定要吃饱，不要饿着肚子回去。”

听着周恩来这幽默风趣的谈话，大家都不禁笑了起来。周恩来要大家随便些，他说有点事进去一下。陈毅便领大家进到餐厅。也没给周恩来留下主人坐的席位，叫先进去的先坐。饭厅不大，两个圆桌分坐十多人。沈醉走在后面，便找到一个靠墙的角落坐下。

当服务人员把四个冷盘先送上来时，陈毅还没等周恩来进来，便叫大家先吃。大家都不好意思先吃，陈毅却带头吃了起来。周恩来走进来时，只有沈醉左边还有一个空位，便走过来坐下。

此时此刻，沈醉感到无比的温暖，心想，过去替蒋介石和戴笠拼命卖力干反共反人民的事，他们却把自己当成家奴一样看待。特别是蒋介石，自己去见他时，有时连坐都不让坐下。今天周恩来接见众人时，是这样随随便便，平易近人，实在出乎意外，几乎激动得掉下泪来。

周恩来一边吃一边和沈醉继续谈他那次在上海的情况，说他明明知道特务们成天在盯着他，但他还是先后约见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几十位同志。说到这里，周恩来笑着问沈醉：

“你们一个都没发现吗？”

沈醉回答：

“是的，一个也没发现。”

这时，沈醉很好奇地问周恩来：

“我们怎么没发现总理通知过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约见？”

周恩来笑道：

“我为什么到上海要住在新亚酒店里呢，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你们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侦察我，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保护我，并给我当交通联络，电话你们会偷听，所以我不能打电话；而我每天出动，利用乘坐出租汽车、进餐馆时付账、买东西时付钱等机会，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人，把我要约会的人的名单给我送出去。”

周恩来还告诉沈醉，军统和中统等特务机关搞的那些鬼把戏，他知道不少，不过不能串连起来，有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所以需要沈醉把这些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众人辞别周恩来时，周恩来和每个人一一握手。轮到沈醉时，他有力地握着沈醉的手，再次嘱咐道：

“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周恩来的话，沈醉一直牢牢记在心上，决心在自己的后半生竭尽全力，把过去军统的罪恶如实地写出来。有一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申伯纯、米暂沉等召开座谈会，沈醉表示要把戴笠的生平、军统的内幕、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等材料都写出来，而且一定要写好。这是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啊！

三、“我看过了你写的文章”

1963年11月10日下午，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度厅再次接见了在京的四批特赦人员及其家属共二十余人。张治中、傅作义等也在座。

周恩来给大家讲话，勉励大家好好工作，希望大家幸福愉快地度过晚年，并让大家在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到江南等地去参观游览，看一看解放十多年来祖国各地的新面貌。

在酒席宴上，周恩来热情地向大家劝酒，他将酒杯伸向沈醉的酒杯，一边和沈醉碰杯，一边说：

“我看过了你写的文章，希望你把自己所知道的特务活动都写出来。”

周恩来的话给了沈醉莫大的鼓舞。想不到总理日理万机，还抽出时间来看自己写的东西。

接着，周恩来和陈毅与众人一起合影留念。和周恩来一起合影，沈醉感到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荣誉。十几年来，沈醉一直把这张照片珍藏在身旁。

“你是起义将领，怎么能让你回去种地呢！”

——周恩来与郑洞国

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历任国民党军师长、军长、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及兵团司令等职。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的重要时刻归向人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

郑洞国于长春起义，产生重大影响；周恩来设宴款待，给以亲切鼓励。当郑洞国由于不明党的政策提出回家种地时，是周恩来的诚心挽留使他疑虑顿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一、一封未收到的劝降信

1950年的金秋10月，在1948年我军长春围困战中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来到北京。在京期间，他荣幸地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宴请。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时，郑洞国感到意外和兴奋，想不到事隔多年之后，周恩来还一直记挂和关怀着他这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同时也想起了两年前一件令人感动的往事：1948年10月18日，困守长春孤城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在长春山穷水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了将郑洞国从黑暗中挽救出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郑洞国，分析形势，晓以大义，劝他顾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举行反蒋起义，回到人民的行列中。信件全文如下：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译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10月18日

这封充满黄埔师生情谊的信件是用电报转达到前线的。次日上午，解放军进驻长春时，交给了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转交给郑洞国。可惜因当时郑洞国的司令部附近枪声四起，市内秩序混乱，史说派去的人未能把信件送到，郑洞国到解放区后方知此事。郑洞国虽然未曾得悉老师之大示，但对于周恩来的这番亲切关怀，是始终未能忘怀的。

二、“你是起义将领，怎么能让你回去种地呢！”

10月的一天，沐浴着金秋的凉风暖阳，郑洞国准时来到周恩来家中，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另一位老师聂荣臻也已在座。见郑洞国走进会客室，周恩来连忙起身，快步迎了过来，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郑洞国，紧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你，我们很久未见面了，难得有这个机会呀……”

郑洞国被周恩来的坦诚、热情所感动，觉得周恩来还像当年黄埔军校的周主任那样诚挚可亲。一时真是百感交集，两行热泪几乎夺眶而出，半天才愧疚他说出几句话：

“周总理，几十年来，我忘了老师的教诲，长春解放前夕，您还亲自写信给我，我感谢您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

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郑洞国的话，微笑着说：

“过去的事不提了，你不是过来了吗？今后咱们都要为人民做点事嘛！”

大家落座之后，周恩来亲切地问郑洞国：

“在北京是否还有熟人？”

郑洞国想了一下，说：

“有位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叫李奇中，与自己交谊甚笃，据说他现在在北京。”

周恩来马上说：

“这个人我知道， he 现在是政务院参事。”

随即吩咐工作人员快去请来。过了不久，李奇中便乘车赶到。师生四人相见，分外亲热。

吃饭的时候，周恩来详尽地询问起郑洞国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关切的神情犹如家人一般，使郑洞国如沐春风，从心底里感到无比的温暖。周恩来还和蔼地问郑洞国：

“今后有何具体打算？”

郑洞国不知道国家将如何对待像他这样的起义将领，想了想，就试探着说：

“自己别无所长，人也老了，打算回家乡种地去。”

李奇中在旁插话道：

“好哇，你在老师面前还敢称老？”

一句话，说得一桌人都笑起来。

周恩来马上看透了自己这位学生的心思，亲切地说：

“你是起义将领，怎么能让你回去种地呢！再说，你还不到 50 岁嘛，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多为人民做贡献，现在国家建设刚刚开始，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呀。”

周恩来的诚恳态度使郑洞国非常感动，马上表示：

“准备先回上海治治病，料理一下家务，再听候安排。”

周恩来表示理解他说：

“你先回家休息一下也好，身体养好后随时可以来。”

席间，周恩来还询问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驻印军在缅北与盟军联合作战的情形。此时正值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曾担任过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的郑洞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军的作战特点，指出美国人打仗主要靠武器装备，打不了硬仗。为证明这一点，郑洞国还特别举了几个实际战例加以说明。

周恩来和聂荣臻认真地听着，不时插话询问。待郑洞国讲到美军非常依赖空中补给，如过去中美军队共同执行作战任务时，美国兵行军走累了，就先丢弃武器弹药，然后再丢弃衣服，待到达目的地，浑身只剩下一条短裤了，

以至空运的装备只好先全部补充给美军时，周恩来不禁开怀大笑了起来。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周恩来多次引用郑洞国讲的这几件事，激励大家要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克服某些人头脑中的崇美、恐美思想，坚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心。

1951年冬，郑洞国从上海写信给李奇中，谈到自己目睹祖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心情格外振奋，准备春节期间再到北京看看。李奇中接信后，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很快给郑洞国打来电报，邀他去京。

春节前夕，郑洞国到了北京，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政务院再次会见并宴请了他。一见面，周恩来还是那么亲切地关怀备至，问长问短。郑洞国心情十分激动，坦诚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认识，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听了郑洞国的汇报，周恩来格外高兴他说：

“你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步，这是值得庆贺的，我代表大家欢迎你。你的年纪还轻，完全可以多为人民服务嘛。”

郑洞国恳切地向周恩来表示：

“感谢总理的关怀，我把上海家中的事情安置好，很快来京工作，听候总理安排。”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起来，说：

“好，好，你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嘛。”

春节过后，郑洞国赶回上海安排家务。大约5月中下旬，郑洞国再次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报，表示一切准备妥当，随时听候总理安排。周恩来很快复电，要郑洞国尽快来京。

1952年6月，郑洞国举家迁往北京，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这是郑洞国第一次和人民政府的实际工作发生关系。看到新中国成立仅仅几年，水利建设工程规模之大、收效之宏，就已举世瞩目，心中格外振奋，感到共产党确实是一心一意造福于人民的，决心竭尽自己的全力，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最关键的作用”

——周恩来与何基沣、张克侠

何基沣（1898—1980）河北藁城人。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冯玉祥部队。1931年任二十九军一九旅副旅长，后升为旅长。“七七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在平汉线通道卢沟桥、八宝山一带，多次挫败日军的挑衅。“七七事变”发生时，指挥部队进行抵抗。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命回原部队工作。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任国民党政府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根据中共的指示，与张克侠一起率领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军和第五十九军两万余人起义。建国后，历任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局局长、国家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

张克侠（1900—1984）河北献县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在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任少校科员兼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及队长。1925年任西北军学兵团团副。1927年春天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高级参谋、干部学校校长、国民党政府二十九军副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副司令。1945年后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率部在贾汪、台儿庄举行起义，起义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先后担任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并兼任淞沪警备区参谋长。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森林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央林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他们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同时又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密潜敌营，隐忍待机，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为人民立了大功。

一、周恩来介绍去延安，何基沣加入共产党

何基沣、张克侠所在的这支部队，其前身是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对于这支部队，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早在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以极大的精力对冯玉祥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军进行了争取和教育工作。1926年3月，党派刘伯坚、邓小平、李林等到冯部政治军事学校，发展党的组织，宣传进步思想，素有“第二黄埔”之称。在以后的几个历史时期，共产党又通过派入党员，组织进步骨干赴延安学习，由共产党地下党主办干训班和创办子弟

中学等形式，有组织、有领导地秘密宣传共产党的理论、政策，灌输爱国爱民思想。所有这些措施，对教育、争取中、下层军官向革命靠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还在该部发展了秘密党员，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和何基沣。上中学时，为抗议袁世凯接受

日本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丧权辱国“二十一条”，愤而投笔从戎，考入陆军清河军官预备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他冲破重重险阻，到达广州，先后在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任少校科员、讲武学校教育副官和队长。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他担任了学生营营长。

张克侠为追求光明，探索真理，在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支持下，于1927年春至1928年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认识到只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才能建立起光明的世界。1929

年，张克侠在上海经张存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组织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并肩负党的使命回西北军工作。

张克侠二十年如一日，在敌人营垒之中勤恳工作，教育争取进步青年，开展秘密活动，提供重要情报，为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初，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军副军长的何基沣到武汉。“七七事变”发生时他是第二十九军旅长，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就是他所属的吉星文团。对于这位爱国名将，周恩来专门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热情地称赞说：

“南京中山陵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

并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他到延安去看看。

经过周恩来的安排，何基沣于这年2月问秘密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见。离开延安前，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1939年1月，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

从1936年开始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该部曾先后五次有组织、有计划地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内容开展活动，为该部后来走向光明打下了基础。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挑起内战，消灭共产党，加紧了战争的准备。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动员了多方面的力量，从各个渠道入手，开展了多层次的策反工作。

二、南京，张克侠悄悄钻进周恩来的小轿车

张克侠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1945年10月由信阳赴徐州途中，同刘汝明、张岚峰、孙良诚、郝鹏举、吴化文等原西北军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共同商讨组织以反对内战为宗旨的“西北军大联盟”事宜，并于1946年夏致书冯治安，敦促其负起组盟重任，信中称：“现政府之情形，腐化至不可救药”。“为这样的政府流同胞的血”，“真是悲惨耻辱的事情”，“如有第三者力量突然宣告脱离战场”，“定可以打击政府中顽固腐化把持政权，推动战争的一派，使之失败”，并宣言冯治安“身居要地，首当其冲，不容犹豫。迅速决策，以利国家。”

1946年夏天。忽然得知冯玉祥先生要出国考察，张克侠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便以送行为由，从徐州到达南京，住在冯玉祥的寓所。

张克侠知道周恩来副主席住在梅园新村，十分想见到他，便通过曾在冯玉祥处工作过的王冶秋，请他代为与中共办事处联系。要求见周恩来副主席，希望安排一次见面。第二天，王告诉张克侠说，周副主席约定在次日傍晚时分，在冯玉祥寓所附近一个偏僻去处的公园外面相会。

约定的时间到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准时开到。车门打开，张克侠看见久已渴望见到的周恩来副主席身穿中山服，镇静地坐在后座向他点头。张克侠跨进去刚坐在他身旁，汽车便迅速开动前进。车上，除司机外，还有一名警卫坐在司机旁边。

张克侠立即汇报了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部署情况，周副主席时而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张克侠，时而沉思点头，当张克侠向周副主席谈到今后的工作和组织起义的问题时，周恩来指示：

“现在，要向国民党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只有奉

陪。我们不但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去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你们的起义，要听上级的安排，要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最关键的作用。”

张克侠表示：

“我所在的部队和我相处很久，彼此均很熟悉和信任，在作战中，他们肯定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起义是无条件的。只要下命令，我可以保证随时起义，现在部队中的斗争很复杂，有不少反动的国民党军官，还有一批特工人员，为了预防敌人的破坏，保证起义的顺利，请求解放军在进攻前派联络人员到我那里去，以便很好地配合。”

周副主席表示赞同地点点头。他沉思一刻，环视四周，又看看表，忽然紧紧握住张克侠的手摇动起来。

张克侠明白：这次谈话必须结束了。张克侠知道，面前这位党和军队卓越的领导人，工作日理万机，在国民党反动派气焰极为嚣张的时候，还不避风险在国民党首都的南京街头上，从容不迫地接见自己，作出了重要指示，这是何等的气魄啊！

汽车在一个僻静地点停下，当张克侠迅速下车后，汽车立即疾驰而去。

次日，王冶秋同志向张克侠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

“董老说，你在车上的谈话很重要，很有价值，但当时干扰太多，还有一些问题不十分清楚，最好写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

张克侠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很快把徐州敌人布防情况和自己的要求，写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材料，转交给周恩来副主席。

三、关键时刻举义旗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关键时刻，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牢记周恩来的教导，在华东野战军的策应下，于1948年11月9日在淮海前线率部起义，对我军完成预定作战任务，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让开了百里防线，敞开了徐州的北大门，使得解放军3个纵队顺利通过该部防地，拦头挡住了国民党黄百韬兵团十多万人的西逃之路。对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毛泽东于11月18日给刘伯承等人的电报中对此作出高度评价：“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

后记

为了表现周恩来在领导统战工作、地下工作以及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的丰功伟绩，编著了《周恩来与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二千余万字的有关文献、回忆录、传记、年谱及党史、军史、国史资料，如果没有这些文献、书籍、文章及资料，该书是难以完成的。由于书目繁多，恕不一一列出。这里，谨向有关书籍、文章及资料的作者、编者、出版者致以诚挚的谢忱。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二图书编辑室主任刘增新、编辑侯健飞的悉心指导；军事科学院有关专家和同志在百忙中审读了书稿，并做了认真勘正，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参加本书写作和提供资料的，还有高小峰、方军、贾志强、白尘、盖小华、支敏、刘春风、刘斌、朱军、张大伟、明志敏、何晓东等。

作者
1997年7月

